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維普數據庫全文收錄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2026

第2卷第6期

6

編輯出版：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辦 香港社會科學學術智庫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編輯出版 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編輯部
編輯部郵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gotu.wisvora.com



HONG KO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THINK TANK LIMITED
香港社會科學學術智庫有限公司

總編輯 陳科存

副總編輯 梅見華 孫文傑

編輯委員會

李兆祺 林鑫 蘇天 穆艾偉 熊森浩

劉兆模 呂憬若 黃少安 劉宇 葉明裕

陳曦 景瑞亮 崔健 王正威 李澤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吳廷雙 穆海尚 曹一君

陳立立 舒波 袁臣輝 郝淑茹

版权声明

文章版權由文章作者所有，單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所刊載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進行許可。根據該許可協議，任何第三方在明確署名原作者與出處的前提下，均可對本刊內容進行複製、傳播、演繹使用，無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個別授權。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許可



Gotu Track

國圖出版

廣東國圖專注於數位學術出版基礎建設與學術服務創新，致力為全球科研工作提供專業、規範、高效的出版支援。公司透過建置數期刊平台、孵化高水準學術期刊、提供國際出版服務，通過出版學術期刊、舉辦學術會議，推動學術界與社會各界的對話與合作。

www.wisvora.com

gotu-track@wisvora.com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52

網上出版 ISSN 3079-4560

維普數據庫全文收錄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維思沃爾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界將軍澳景嶺街 99 號啟德

工業大廈 8 樓 D07

publisher@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國大陸編輯出版

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本刊依投稿原稿字體發行
不作繁簡互轉調整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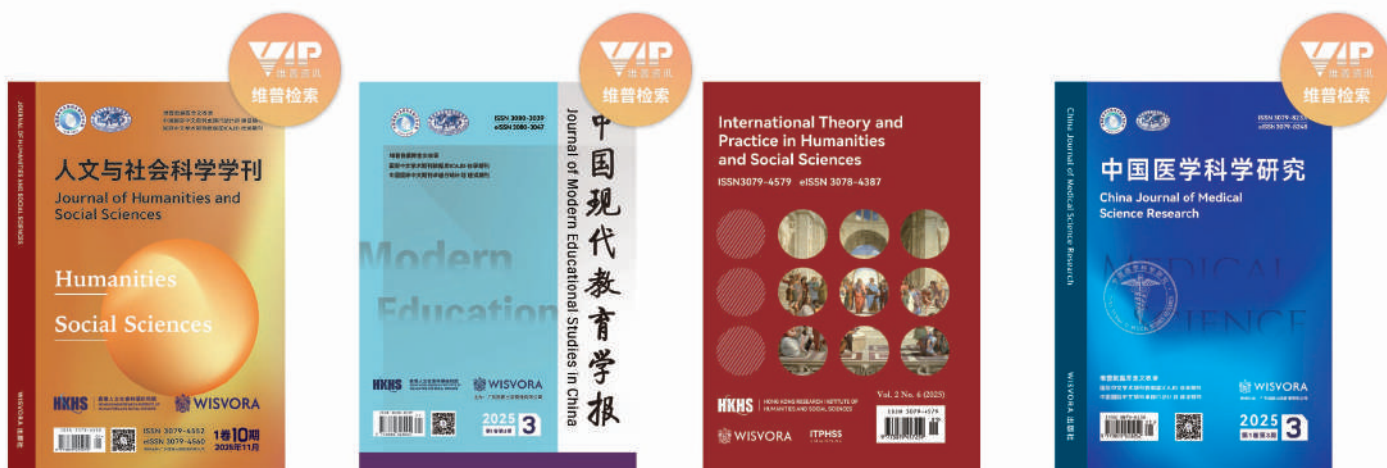
维思沃尔出版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WISVORA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WISVORA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国际学术出版商。我们相信，跨学科前沿研究对于理解世界和解决现实挑战至关重要。WISVORA出版社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致力于打破学科界限，将研究见解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深入的分析 and 有效的策略。

WISVORA 还致力于推动中文学术成果的全球传播，设立多个覆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艺术等领域的中文学术期刊，为中文作者提供更便利、更高效、更专业的发表选择。我们重视学术原创性与表达自由，采用快速审稿、开放获取、普惠版面费机制，努力构建一个包容、多元、国际视野下的中文学术传播平台，助力更多优质中文研究走向世界、服务社会。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10+

我们目前已成功运营10余本学术期刊，涵盖人文社科、管理、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

我们运营的期刊数量

400+

已有来自全球的300多位学者参与我们期刊的编辑、审稿与学术合作

我们的合作学者数量

10000+

我们的作者社群已超过3000人，汇聚青年学者、博士生与研究机构专家

我们的作者社群规模

www.wisvora.com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经济与管理研究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生成式 AI 赋能潍坊文旅产业创新路径研究 - 程丹丹..... 1-7

生态环境法典中现场检查权的多元主体结构之解释论建构 - 王逸..... 8-14

基于"人工智能+文旅"创新融合模式的乐山非遗文化旅游空间决策模型构建 - 周啸、潘娟、周星汉、张雷..... 15-18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袁一君..... 19-27

基于线性规划的中国清洁能源投资配置优化研究 - 边曦悦、王越舟、奚梓嘉、徐梁越..... 28-35

权力：一种支配关系还是行为能力——当代权力概念研究的核心争论 - 郭力..... 36-41

后殖民视角下拉美自主发展的结构性束缚分析 - 赵佳文..... 42-47

区域与发展研究

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传播的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 - 冯丽娜..... 48-52

AI 古村落转译工程——以南社古村落为例 - 陈泽、龙海鸣、张慧文..... 53-59

融合户外教育与安全创新：构建山地运动可持续发展框架 - 向浩荣、罗晓珊、林宇凯..... 60-64

虚拟社区的情感补偿机制与认同构建逻辑——基于中国社会转型语境的研究 - 李心蕊..... 65-70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非遗小食的外宣英译研究——以江苏常州非遗小食为例 - 周雪莲、徒文坤、张玉、瞿欣怡..... 71-75

教育理论与实践

数智时代思维可视化工具在高中英文小说文本解读中的应用——以 After Twenty Years 为例 黄明凤..... 76-80

"被看见"与"怕评价"：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中的矛盾心理与价值引导 - 耿子涵..... 81-85

高职院校教师能力清单制定的难点与策略研究 - 胡梦蝶、郇久阳、殷雨时..... 86-89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价值、困境与策略 - 王旭方	90-93
即兴舞蹈对于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创造能力策略研究 - 许喻娴、古 红	94-97
"两山理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 林鹏、郑洁、于登辉、邓加强、王春明	98-102
2024 年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 3 课《中华文明的起源》新变化 - 骆建豪	103-105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历史课程优化策略研究 - 骆建豪、崔超	106-108
融合育人视角下高职院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转化路径研究 - 李娟	109-114
工匠精神引领的陶艺课程思政创新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沉浸式教学案例库的构建与实践 - 张吉、田雪莲、刘春艳、贺琳静	115-118

文化与艺术研究

竹文化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转译机制研究 - 金雨萱	119-123
从医者修养到关系伦理：中医药文化视域下医患关系的叙事转向 - 周贵阳、叶璐、陈德超、黄颖安、石玉丰、贺利敏、伍广山、潘韞琳、吴丽莎	124-131
中医药文化视域下叙事医学本土化建构研究 - 周贵阳、叶璐、陈德超、黄颖安、石玉丰、贺利敏、伍广山、潘韞琳、吴丽莎	132-142
被表征的实践：当代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困境与生成机制 - 谢勋	143-147
集句诗的新形式：龚璁"颠倒集句诗"述论 - 靳梓培	148-153
传统文化元素在卡牌游戏美术设计中的视觉叙事研究 - 顾嫣然	154-156
民国时期相国寺民众娱乐研究 - 付裕	157-161
威尔士被纳入"大不列颠"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路径 - 巩晴	162-166
"俄克人"移民与二战后加州现代保守主义的兴起 - 董奕成	167-175
"埃及人"的身份困境：罗马治下的身份变迁与社会偏见 - 高悦涵	176-181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生成式 AI 赋能潍坊文旅产业创新路径研究

程丹丹

(潍坊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2737)

摘要: 新质生产力理论为理解技术驱动的产业变革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以潍坊市文旅产业为案例, 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技术创新扩散理论和体验经济理论, 构建了“技术赋能—体验升级—产业协同—价值创造”的四维分析框架, 系统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 赋能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 生成式 AI 通过劳动资料的智能化跃升、劳动对象的数据化拓展和劳动者的素质跃迁三条路径, 推动文旅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提升。在此基础上, 提出 AIGC 赋能非遗文化活化、智能体驱动服务体系重构、虚实融合沉浸式体验创新、AI 驱动精准营销与品牌传播、智慧文旅管理能力现代化五条创新路径, 并从政策、人才、资金、技术、数据五个维度构建保障机制。本文旨在为地方文旅产业数智化转型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 文旅产业; 潍坊; 创新路径

基金项目: 潍坊市科技发展计划 (软科学) (2025RKX014)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32

1. 绪论

党的二十大以来, 中国式现代化对经济社会各领域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2023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 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系统阐述, 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重大理论创新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也为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与此同时, 以大语言模型 (LLM)、多模态生成、智能体 (Agent) 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 简称 AIGC) 技术自 2022 年底以来呈现爆发式发展态势。2025 年, 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实现了技术突破与成本优化的双重飞跃, 训练成本仅为同等性能国际模型的十分之一, 推理成本低至 GPT-4 Turbo 的 17%, 极大降低了 AI 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门槛。生成式 AI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内容生产方式、服务供给模式和产业组织形态, 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技术力量。在文旅领域, 2025 年《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报告 2024—2025》正式提出“文旅 3.0”概念, 其显著特征是 IP 引领、AI 驱动, 标志着中国文旅产业进入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全新发展阶段。

潍坊作为山东省重要的文化旅游城市, 拥有“世界风筝都”的国际品牌影响力和首批国家级齐鲁文化 (潍坊) 生态保护区的制度优势。全市拥有联合国非遗项目 3 项, 居山东省第一; 风筝年产量超过 1.2 亿只, 产品远销全球 147 个国家和地区, 相关产业年产值突破 20 亿元; 以歌尔集团为代表的元宇宙科技企业集群达 160 余家, 歌尔获批文旅部首批技术创新中心。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禀赋与科技产业基础, 使潍坊成为研究生成式 AI 赋能区域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典型样本。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 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 构建生成式 AI 赋能文旅产业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丰富和拓展新质生产力在文旅领域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 为该领域的学术探讨提供新的分析视角。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 立足潍坊文旅产业的实际情况, 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创新路径和保障机制, 为潍坊及其他同类城市的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借鉴。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 通过多源数据的整合分析,

作者简介: 程丹丹(1993—),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社交媒体、智慧旅游、AIGC。

通讯作者: 程丹丹

力求实现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的有机统一。

2.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2.1 新质生产力与文旅产业的理论关联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审视产业变革提供了一套兼具历史纵深和现实关照的理论工具。但在旅游学领域,对这一概念的学理化讨论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文献停留在概念阐释层面,缺乏从产业内生逻辑出发的深入分析。厉新建等(2024)在《旅游学刊》发表的专题研究中做出了重要推进,他们指出创新是旅游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强调要以辩证性、系统性和动态性思维审视旅游业的新质生产力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将“新技术应用”等同于“新质生产力形成”。这一观点的学理贡献在于,它提醒研究者关注技术应用背后的生产关系调整与要素配置逻辑。

把多勋、闫永强(2024)则从产业形态学的角度提出,文旅产业新质生产力是新人力资源、新文旅资源和新产业模式叠加形成的新型发展模式,其本质特征在于以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为双轮驱动,重构文旅产业的价值链和生态链。田里、陆军(2025)进一步构建了“技术—生产要素—产业”协同创新机制的分析框架,指出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不是单一技术的线性嵌入,而是技术革新与生产要素配置、产业组织变革之间的系统性协同[3]。这三项研究从不同维度拓展了新质生产力与文旅产业之间的理论关联,但尚未就生成式 AI 这一具体技术形态展开深入讨论。

2.2 生成式 AI 赋能文旅产业的研究进展

国际学界对智慧旅游和 AI 应用的讨论起步较早。Gretzel 等(2015)最早系统论述了智慧旅游的基础与发展框架,将信息通信技术视为旅游体验和管理变革的核心驱动力。Buhalis 和 Leung(2018)进一步指出,信息通信技术的持续进步为旅游体验的个性化和沉浸式构建提供了技术可能,强调智慧旅游的核心在于建立跨部门、跨系统的互联互通生态。Tussyadiah(2020)系统梳理了 AI 在旅游业中的应用场景,涵盖客户服务自动化、个性化推荐、情感分析等领域,但她同时也指出了 AI 伦理风险和就业替代效应等值得警惕的问题。进入生成式 AI 时代后,Huang 等(2024)对 ChatGPT 与旅游研究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评估,认为大语言模型在旅游信息检索、行程规划、学术写作辅助等方面展现了巨大潜力,但其“幻觉”问题和文化偏见亦不容忽视。

国内智慧旅游研究成果丰富,在景区数字化管理、在线旅游平台、旅游大数据等方面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知识体系。但关于生成式 AI 对文旅产业影响的系统性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既有文献多侧重技术功能描述和应用场景罗列,缺乏两个层面的深入分析:一是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出发构建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二是基于具体地域案例进行“技术—产业—政策”的贯通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口。

2.3 分析框架:“技术赋能—体验升级—产业协同—价值创造”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文整合三个理论资源构建四维分析框架。其一,新质生产力理论提供宏观视角,强调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协同跃升;其二,Rogers(2003)的技术创新扩散理论解释技术采纳的过程与条件;其三,Pine 和 Gilmore(2011)的体验经济理论为理解文旅产业的价值创造逻辑提供了微观基础。三者的整合形成如下四个分析维度:

表 1 “技术赋能—体验升级—产业协同—价值创造”分析框架

维度	核心内涵	理论支撑	文旅产业表征
技术赋能	生成式 AI 作为新型劳动资料嵌入文旅产业链	新质生产力理论	AIGC 内容生产、智能讲解、数据资产化
体验升级	技术应用驱动游客认知、情感、行为、社交体验提升	体验经济理论	个性化服务、沉浸式体验、多感官交互
产业协同	“政府—企业—科研—社会”多主体协同推进	创新扩散理论	政策引导、龙头带动、平台共享、人才培育
价值创造	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的多元产出	三论整合	产业增效、非遗活化、文化传播、民生改善

这一框架的理论优势在于超越了简单的“技术—应用”二元分析,引入了体验升级和产业协同两个中间维度。体验升级是技术赋能向价值创造转化的关键环节——技术本身不产生价值,只有当技术转化为游客可感知的体验改善时,产业价值才得以实现。产业协同则是技术落地的制度保障——生成式 AI 在文旅领域的应用涉及跨部门、跨行业、跨层级的协调,单一主体无法独立完成。这四个维度构成了一条从技术投入到价值产出的完整逻辑链,

也是下文展开分析的基本依据。

3. 潍坊文旅产业发展现状与数字化转型基础

3.1 产业规模与资源禀赋

潍坊地处山东半岛中部，道承齐鲁，襟连海岱，是一座兼具深厚历史底蕴和鲜明产业特色的城市。自 1984 年首届国际风筝会举办以来，“世界风筝都”的城市名片已传播至全球 147 个国家和地区。从产业数据看，2024 年全市接待国内游客 9645.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938.79 亿元；至 2025 年，游客总量首次突破 1 亿人次大关，旅游收入突破 1000 亿元，入境游客突破 10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105%。这组数据表明，潍坊文旅产业已进入量级跃升的关键阶段。

资源禀赋方面，潍坊的文化遗产储量居山东前列。全市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 3 项（潍坊风筝、高密扑灰年画、诸城派古琴），国家级非遗项目 17 项，省级 125 项，非遗密度在全国地级市中名列前茅。A 级景区达 100 家，各类博物馆 88 家，其中一级博物馆 3 家。值得一提的是，东镇沂山已于近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潍坊文化遗产的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风筝产业更是潍坊独有的“现象级”文化产业——全市风筝及相关产业年产值突破 20 亿元，年产量超 1.5 亿只，占据全球 85% 的市场份额，带动超 10 万人就业。2024 年正式实施的《潍坊市风筝文化产业促进条例》是我国首部风筝产业地方性法规，从立法层面为这一特色产业保驾护航。第 42 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期间，主活动 2 天拉动消费 12.5 亿元，同比增长 25%，充分展示了风筝经济的消费乘数效应。

3.2 数字科技基础与 AI 应用实践

潍坊在文旅数字化方面并非白纸起步，而是已积累了若干具有标杆意义的实践探索。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歌尔股份，作为全球领先的元宇宙硬件企业，歌尔获批文旅部首批全国技术创新中心，在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建成了“龙筝绘梦”MR 体验项目，游客佩戴混合现实头显即可与虚拟风筝互动、体验数字化放飞。该项目运营以来，效果显著——来馆人数同比增长 26.6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8.23%。这组数据有力证明了沉浸式技术在文旅场景中的商业可行性。

在大模型领域，齐鲁文化大模型的研发进展引人关注。该模型入选山东省首批 AI 大模型“百景智能”典型应用场景（AI+文旅领域唯一入选），已获国家技术发明专利 21 项，为文化内容的智能化生成和个性化推荐奠定了技术底座。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应用是“DeepYou 深度游”AI 讲解系统。2025 年 5 月，该产品全国首发落地潍坊，基于文旅多模态大模型实现了三大创新模式：基于 LBS 的自动跟随讲解、互动式文化问答、文化符号 AI 识别讲解。其核心特征是“千人千面”——游客可自主选择讲解风格（文化艺术型、亲子教育型、历史考证型等）和语种，获得个性化的深度讲解体验。此外，潍坊风筝数字资源库已完成 6000 余项版权登记，青州博物馆建成“海岱华章”元宇宙沉浸式体验中心，“文旅潍坊”平台借助 AI 辅助内容生成累计发布图文视频 2.2 万余条、总阅读量突破 2.1 亿人次。这些实践表明，潍坊已在“AI+文旅”的赛道上抢占了先发优势。

3.3 数字化转型的瓶颈与挑战

然而，先发实践的亮点不应遮蔽结构性问题的存在。第一，数字化人才短缺问题突出。既懂文化遗产又掌握 AI 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极为稀缺，潍坊驻地高校在这一交叉领域的学科布局尚不完善。第二，中小文旅企业的数字化意愿和能力普遍偏低。全市 600 余家风筝企业中，真正具备数字化运营能力的不足一成，多数仍依赖传统的手工作坊模式，对生成式 AI 的认知停留在“新闻热点”层面，距离“生产工具”的转化还有相当距离。第三，数据孤岛问题不容忽视。文旅部门、景区、企业和科研机构各自积累的数据资源缺乏统一的标准化和共享机制，制约了大模型训练和智能应用开发。第四，非遗数字化保护中的文化原真性与技术介入之间存在深层张力——AI 能生成风筝纹样，但传承人的手工温度、师徒传承的文化记忆是否会在技术替代中被稀释？这一问题在学界和业界均未得到充分讨论。第五，AI 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和伦理规范尚不明确，尤其是当 AI 基于非遗元素生成衍生设计时，原始创作者、技术开发者和平台运营者之间的权利边界仍是法律灰色地带。

4. 生成式 AI 赋能潍坊文旅产业的机理分析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大要素的协同跃升，最终指向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质性提升。以下从这一分析框架出发，剖析生成式 AI 赋能潍坊文旅产业的内在机理。

4.1 劳动资料的智能化跃升

生成式 AI 作为新型劳动资料,正在重构文旅内容生产的底层逻辑。传统文旅内容生产高度依赖人力投入——一篇高质量的景区解说词需要专业撰稿人耗费数日,一段精美的宣传视频从脚本到成片可能需要数周。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生成技术的介入,使文旅产业实现了从“人工创作”到“人机协同”的范式转换。以“文旅潍坊”平台为例,借助 AI 辅助生成,平台累计发布图文视频 2.2 万余条,总阅读量突破 2.1 亿人次,内容生产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了数倍。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机器替人”,而是人的创意策划能力与机器的批量生成能力的有机融合。更具代表性的是“DeepYou 深度游”系统——它将 AI 讲解从“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录音推进到“千人千面”的自适应生成,每位游客获得的是基于其兴趣偏好、知识背景和语言习惯的专属讲解方案。这意味着,劳动资料的智能化不仅提升了内容生产效率,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旅服务的供给逻辑。

4.2 劳动对象的数据化拓展

在新质生产力框架下,数据已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并列的新型生产要素。对文旅产业而言,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不仅是保护手段,更是价值创造的起点。一个饶有意味的事实是:潍坊风筝数字资源库的 6000 余项版权登记,其意义远不止于“存档”——它实质上是将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可计算、可检索、可二次创作的数据资产。当这些数据资产被接入生成式 AI 系统时,风筝纹样、年画色彩、核雕造型等非遗元素便从“馆藏展品”变为“活态资源”,成为 AI 生成内容的训练语料和创意素材。同样,青州博物馆对馆藏文物的高精度三维扫描和数字建模,使得这些文化遗产能够脱离物理空间的限制,在元宇宙中实现全球范围的展示与互动。劳动对象的数据化拓展,意味着文旅产业的“原材料”供给从有形的物理空间向无形的数据空间延伸,产业的增长空间由此被极大地打开。

4.3 劳动者的素质跃迁

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既懂文化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非遗传承人郭洪利借助 AI 工具完成风筝设计与模拟试飞的案例,生动诠释了“传统技艺+数字素养”的人才跃迁路径。这位花甲之年的老匠人并未被技术拒之门外,相反,他主动学习并运用 AI 辅助设计工具,将自己数十年积淀的工艺经验与机器的计算能力结合起来。这一案例的启示在于:AI 时代劳动者的素质跃迁,并非要求传统手艺人“转型”为程序员,而是要在保留其核心技艺和文化直觉的基础上,赋予其驾驭新型工具的能力。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变化指向的是整个文旅行业人力资源结构的升级——从单纯的导游、讲解员、设计师,向“AI 训练师”“数字文创策展人”“智慧旅游运营师”等新型岗位延伸。

4.4 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提升

上述三重跃升并非孤立发生,而是相互支撑、协同作用,最终指向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质性提升。歌尔集团在风筝博物馆的 MR 体验项目提供了一个可量化的观察窗口:来馆人数同比增长 26.6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8.2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增长并非来自简单的门票提价或客流扩容,而是沉浸式技术带来的体验溢价和二次消费增长。换言之,在物理空间不变、人力投入基本不变的条件下,技术赋能实现了“以更少的投入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正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典型表征。推而广之,当生成式 AI 在潍坊文旅产业的各个环节全面渗透,其带来的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将远超单一项目的示范效应。

5. 生成式 AI 赋能潍坊文旅产业的创新路径

5.1 AIGC 赋能非遗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活化

潍坊非遗资源的丰富程度毋庸置疑,但丰富并不等于繁荣。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许多非遗项目正面临传承人老龄化、受众窄化和产品同质化的三重困境。以潍坊年画为例,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传承人平均年龄已超过 55 岁,年轻一代的传习意愿明显下降;而市场上的年画衍生品多为简单复制,缺乏面向当代审美的创新设计。生成式 AI 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新的可能。具体路径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利用多模态生成技术对风筝纹样、年画图式、核雕造型进行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在保持文化基因的前提下,通过 AI 进行风格迁移和创新设计,生成符合当代审美的衍生作品。这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对传统的延伸。其次,构建面向中小文创企业和独立设计师的潍坊非遗 AIGC 文创设计平台,大幅降低文创产品的设计门槛和迭代周期——过去需要专业设计师耗时数周的方案,如今借助 AI 工具可能在数小时内完成多轮生成与筛选。再次,借鉴山东省齐鲁文化基因解码利用工程的经验,系统推动非遗文化的“数字化、版权化、商标化”,使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授权、可增值的数字资产。《山东省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进行高精度数据采集、标注、解构和重构,加快建设山东文化数据库”,为这一路径提供了省级政策支撑。

5.2 智能体驱动的文旅服务体系重构

2025 年, 潍坊入境游客突破 10 万人次, 同比增长约 105%, 国际化程度显著提升。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 多语种服务能力严重不足, 入境游客在景区内获得深度文化讲解的比例极低。"DeepYou 深度游"产品总监在首发活动上披露了一组数据——当前 70% 的自由行游客在游览景区后, 无法清晰描述文化景点的历史内涵。这一"认知浅层化"痛点, 折射出传统文旅服务模式的深层局限。智能体驱动的服务重构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核心路径。以"DeepYou 深度游"系统为基础, 可构建覆盖全市主要景区的"潍坊文旅超级智能体", 实现三个层面的服务升级: 一是基于大模型的个性化行程规划——根据游客的兴趣偏好、时间预算和消费能力, 自动生成定制化游览方案, 从"标准套餐"转向"私人定制"; 二是多语种自适应的深度文化讲解——覆盖全球主流语言, 在讲解内容、风格和深度上实现"千人千面"; 三是 AI 赋能的研学旅游——针对青少年群体开发互动式、探究式的 AI 研学课程, 将风筝扎制、年画印刷等非遗体验与 STEM 教育理念相结合。国务院"人工智能+"意见明确提出"拓展体验消费、个性消费、认知和情感消费等服务消费新场景", 智能体驱动的服务重构正是对这一政策导向的精准响应。

5.3 虚实融合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创新

传统文旅场景以静态展示为主——游客在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文物, 在古城中沿着路线拍照打卡。这种"到此一游"式的浅层体验, 已难以满足新一代消费者对参与感和互动性的期待。虚实融合的沉浸式体验, 是从"观看"到"沉浸"的关键跃迁。潍坊在这一领域已有扎实基础。歌尔集团的"龙箏绘梦"MR 项目证明了沉浸式技术在文博场景的商业可行性; 青州古城的数字孪生项目已按 1:1 比例构建了 72 条古街巷、380 处明清建筑的三维模型。下一步的创新方向包括: 依托歌尔集团等本地龙头企业, 深化 VR/AR/MR 在更多文旅场景的规模化应用; 将生成式 AI 与数字孪生技术结合, 打造"数字潍坊"文旅元宇宙——游客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参与风筝会、体验年画制作、与历史人物"对话"; 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云游"模式, 使无法到访潍坊的游客也能获得高品质的文化体验。山东省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提出"应用全息影像、裸眼 3D 等技术, 围绕齐文化等打造 10 个以上数字化标杆场景", 为潍坊争创省级标杆提供了明确的政策窗口。

5.4 AI 驱动的文旅精准营销与品牌传播

潍坊虽跻身全国"网红城市"潜力榜 20 强, 入选《远方》旅游杂志 2024 年全球最值得一去的地方, 但其品牌辨识度与杭州、西安、成都等头部城市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在注意力经济时代, 品牌传播的核心不再是"广撒网", 而是"精准触达"。生成式 AI 为文旅营销提供了四条升级路径: 其一, AIGC 批量生成差异化营销内容——同一个风筝博物馆, 面向年轻人可以生成二次元风格的短视频脚本, 面向中老年可以生成文化鉴赏类图文, 面向海外受众可以生成英语 Vlog 脚本, 实现"一城千面"的精准触达。其二, AI 数字人打造潍坊文旅虚拟代言人——突破真人代言的时空限制和肖像权风险, 以虚拟形象承载城市文化基因。其三, 社交媒体 AI 内容矩阵——在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不同平台自动适配内容风格和传播策略, 实现全域营销。其四, 在"文旅潍坊"平台基础上构建智能化内容中台——从内容创作、审核到分发的全链条实现 AI 赋能, 使营销从"人海战术"转向"算法驱动"。

5.5 智慧文旅管理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年接待游客过亿的管理压力不容小觑。节假日客流峰值期间, 热门景区人满为患、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问题反复出现。传统的人工调度和经验判断已难以应对亿级客流的管理复杂性。AI 驱动的智慧管理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抓手。具体路径包括: 一是客流预测与智能调度——基于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的多源融合预测模型, 提前 24 至 72 小时预判各景区客流态势, 动态调配公共交通和停车资源; 二是文旅安全预警与应急响应系统——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实时监测景区内的拥挤度、异常行为和安全隐患, 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转变; 三是文旅产业数字化监测与评估体系——整合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多维度数据, 构建文旅产业运行的"数字仪表盘", 为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提供数据支撑。山东省推进方案明确提出"在热门景区引入人工智能导览、智能售票、人流监控等技术, 显著改善游客旅游体验", 为这一路径的实施提供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力。

6. 保障机制与政策建议

6.1 构建"政策—技术—人才—资金—数据"五位一体保障体系

任何创新路径的落地都不是技术单维度的事情, 而是需要政策引导、技术支撑、人才储备、资金投入和数据治理的系统性保障。就潍坊而言, 五个维度的保障各有侧重。

政策保障层面, 建议将 AI 赋能文旅纳入潍坊市"十五五"规划的重点专项, 主动对接山东省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积极争创省级 AI+文旅标杆应用场景。同时, 用好《潍坊市风筝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的立法保障, 在修订完善中增加数字化和智能化相关条款, 使地方立法与技术演进保持同步。人才保障层面, 依托潍坊学院、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等驻潍高校建设"AI+文旅"交叉学科培养基地,借鉴潍坊风筝产业学院和国际风筝运动学院的产教融合经验,探索"非遗传承人+AI工程师"的联合培养模式。资金保障层面,建议积极对接山东省级10亿元AI发展专项资金,设立市级文旅数字化转型引导基金,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进入。技术保障层面,依托歌尔集团获批的文旅部首批技术创新中心,搭建面向中小文旅企业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降低技术采纳的门槛成本。同时,推动齐鲁文化大模型在潍坊文旅场景的深度适配和垂直优化。数据治理层面,建立文旅数据共享与开放机制,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制定AI生成内容的版权保护与伦理规范——特别是在非遗元素的AI创作领域,需要在鼓励创新与保护原真之间找到平衡。

6.2 分阶段实施路线建议

技术赋能产业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根据技术成熟度和产业吸纳能力分阶段推进。建议按照"试点先行—规模推广—模式输出"的逻辑,设定三个阶段目标:

表2 潍坊AI赋能文旅产业分阶段实施路线

阶段	时间	重点任务	预期目标
近期	2025-2026年	AI讲解系统全覆盖、非遗数字资源库扩容、试点智慧景区管理	5个以上景区实现AI讲解落地;数字资源库扩容至10000项
中期	2027-2028年	规模化推广AI+文旅应用,培育全国标杆案例	培育3—5个全国标杆案例;争创国家级AI+文旅示范区
远期	2029-2030年	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潍坊模式"	成为全国AI赋能文旅产业的引领者;模式向省内外输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阶段划分并非刚性切割,各阶段之间存在交叉和衔接。例如,近期阶段的试点经验需要及时总结提炼,为中期阶段的规模化推广提供方法论支撑;远期阶段的"模式输出"也需要在中期阶段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经验凝练和理论抽象。

7. 结语

生成式AI对文旅产业的意义,究竟是一次技术叠加,还是一场生产力革命?本文的研究表明,答案更接近后者。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视角审视,生成式AI不是对文旅产业的简单技术嫁接,而是通过劳动资料智能化、劳动对象数据化、劳动者素质跃迁三条路径,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性提升——这正是新质生产力在文旅领域的具体实现形式。

潍坊案例的独特价值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它展示了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但并非一线旅游城市的地级市,如何借助AI技术实现"弯道超车"——从歌尔集团的MR体验到"DeepYou深度游"的全国首发,从齐鲁文化大模型到风筝数字资源库,这些实践证明AI赋能不是头部城市的专利。其二,它揭示了AI赋能文旅产业需要"技术赋能—体验升级—产业协同—价值创造"的系统推进,任何单一维度的突破都无法产生持续的产业效应。在这四个维度中,非遗文化的数字化活化或许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创新路径——它在全球语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辨识度,也是中国文旅产业差异化竞争的核心优势。

当然,本文也存在若干局限。首先,以单一城市为案例,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有待在更多城市的比较研究中检验。潍坊的文旅资源禀赋(特别是风筝产业和非遗集群)具有较强的独特性,其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广至其他城市,需要谨慎评估。其次,生成式AI技术正处于快速迭代期,部分基于当前技术能力的分析可能随着GPT-5、Sora等新一代模型的出现而需要修正。再次,本文未能对AI赋能文旅的经济效益进行严格的计量分析,定量证据的不足是一个遗憾。

展望未来,至少有三个方向值得持续关注。一是通用人工智能(AGI)和具身智能对文旅产业的潜在影响——当机器人导游走进景区、当AGI能够自主策划文旅活动时,产业形态将发生怎样的变革?二是AI伦理与文化原真性之间的深层张力——如何确保技术赋能不以牺牲文化基因为代价,这是一个需要哲学思考而非仅靠技术手段就能解决的问题。三是跨区域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将潍坊经验与景德镇的陶瓷文旅、洛阳的汉唐文旅、敦煌的丝路文旅等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理论框架。在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浪潮中,文旅产业的智能化转型才刚刚启航,而学术研究需要与实践保持同频共振。

参考文献

- [1] 厉新建,曾博伟,张辉,等.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J].旅游学刊,2024,39(5):12-28.
- [2] 把多勋,闫永强.文旅产业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与时代特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12-18(3038).

- [3] 田里, 陆军.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生产要素—产业"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 旅游导刊, 2025, 9(4): 1-29.
- [4] Gretzel U, Sigala M, Xiang Z & Koo C. Smart tourism: Foundations and developments[J]. Electronic Markets, 2015, 25(3): 179-188.
- [5] Buhalis D, Leung R. Smart hospitality interconnectivity and interoperability towards an ecosyste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8, 71: 41-50.
- [6] Tussyadiah I. A review of research into automation in tourism: Launching th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Curated Collect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in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0, 81: 102883.
- [7] Huang A, Chao Y, de la Mora Velasco E, et al. ChatGPT and tourism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24, 100: 104898.
- [8] Pine B J, Gilmore J H. The Experience Economy (Updated Edition)[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1.
- [9] Rogers E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M].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 [10] 国务院. 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Z]. 国发〔2025〕11号, 2025-08-21.
- [11]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等. 关于印发《山东省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25—2027年)》的通知[Z]. 鲁科字〔2025〕51号, 2025-05-13.
- [12]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快人工智能赋能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方案[Z]. 鲁政办字〔2025〕48号, 2025-05-07.
- [13] 潍坊市人大常委会. 潍坊市风筝文化产业促进条例[Z]. 2024.
- [14] 习近平.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J]. 求是, 2024(11).
- [15] Siau K, Wang 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ethics[J]. Journal of Database Management, 2020, 31(2): 74-87.
- [16] 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报告 2024—2025[R]. 北京: 文化和旅游部, 2025.

Research on Innovation Pathways for Generative AI Empowering Weifang's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under the Contex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andan Cheng

(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 Weifang Vocational College, Weifang)

Abstract: The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fers a novel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drive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aking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of Weifang C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Experience Upgrade—Industrial Synergy—Value Creation," grounded in the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 and the experience economy theory.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hrough which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ive AI) empower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Generative AI drives a systemic enhanc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ultural tourism through three pathways: the intelligent upgrading of labor instruments, the digital expansion of labor objects, and the competency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Building upon these insights, five innovation pathways are proposed: AIGC-enabled digital revit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gen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service delivery system, immersive experience innovation through phygital integration, AI-powered precision marketing and brand communi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smart cultural tourism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Corresponding safeguard mechanisms are further developed across five dimensions—policy, talent, funding, technology, and data governance.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i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Weifang; innovation pathways

生态环境法典中现场检查权的多元主体结构之解释论建构

王逸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通过第五十一条与第五十三条分别就现场检查权主体作出了突破性规定。本文以这两条规定为规范基础,将第五十一条中“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解构为一个由“核心主体”(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与“协同主体”(其他负有相关职责的部门)构成的开放性集合。其次,深入辨析了第五十三条对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部门派出机构的授权性质,明确其为法律特别授权而非行政委托,并将其定位为衔接执法的“延伸主体”。最终,本文构建并系统论证了现场检查权主体“核心-协同-延伸”三位一体的解释框架体系。本研究旨在为法典施行后现场检查权主体的统一、规范认定提供清晰的解释路径。

关键词:环境现场检查制度;生态环境法典;检查权主体;垂直管理改革;法律解释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29

2026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由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将于同年8月15日起施行。在生态环境现场检查制度领域,法典第五十一条与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相较于《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等分散立法,呈现出体系化特征。第五十一条将检查权主体明确为“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第五十三条则赋予了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以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可“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包括现场检查在内的一系列执法行为。这两条规定在主体认定与权限配置层面作出了重大突破,既回应了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也为现场检查权的规范行使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现场检查权作为行政机关获取第一手资料、发现违法线索、固定违法证据的核心手段,其有效行使的首要前提是权力主体的明确与合法。然而,长期以来,现场检查权的主体规定散见于《环境保护法》及各单行法中,表述不一、范围模糊,加之2016年启动的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深刻改变了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组织形态与法律地位,使得“谁有权实施现场检查”这一基础性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争议。

《生态环境法典》第五十一条与第五十三条正是对这一现实需求的重要回应。其共同构建了生态环境现场检查制度的多元主体结构,形成了以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为核心,派出机构为重要延伸的协同治理体系。这一制度设计回应了生态环境垂改后执法主体资格缺失的实践困境,既体现了生态环境问题的综合性与复杂性,也反映了监管体制专业化与效率化的需求,但其内部关系的厘清至关重要,需结合生态环境垂改政策背景、现行法律体系及法典的立法意图,对“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法定范围、派出机构独立执法权的法律性质等关键问题进行系统阐释,这一概括性表述,如何与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相衔接,其具体范围应如何界定,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如何划分,均是亟需厘清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其权力边界、责任归属与诉讼主体资格。

上述问题,均非简单的文义解释所能涵盖,而必须置于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进行体系化、目的论的解释论展开。本文旨在构建一个融贯的解释框架,将法典第五十一条与第五十三条置于一个统一的逻辑体系中加以审视,以期为法典施行后的规范适用提供理论支持。

1 现场检查权主体制度的历史嬗变与法典的体系化重构

1.1 现场检查权主体从“单一主体”到“多元结构”的立法演进

现场检查权主体结构经过了数次立法变迁,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管辖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并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在这一时期,现场检查权主体被普遍理解为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呈现出单一主体的特征。

作者简介:王逸(2002—),男,法学硕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对现场检查权作出了重要修改,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有权进行现场检查,实质上扩大了执法主体的范围,体现了环境治理从部门主管向协同治理的理念转型。这一规定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环境监察机构的执法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监察机构的执法名义问题,将其定性为“受委托”,形成了“环保主管部门(委托方)-环境监察机构(受托方)”的二元结构,但其行为的法律责任仍需由委托的环保部门承担,并未赋予其独立的主体资格。而2016年的垂直管理改革在行政体制层面快速推进导致法律规范与改革实践出现脱节。直到2026年通过的《生态环境法典》,最终以第五十一条、五十三条等条款,确立了现场检查权的多元主体结构。[1]

《生态环境法典》第五十一条规定:“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依法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从规范文本来看,该条款采用了概括性表述,将草案中“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表述,精简为“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这一高度概括性的表述,对现场检查权主体进行了体系化重构。立法者在深思熟虑后,选择运用“不确定法律概念”这一立法技术,以实现制度的包容性与前瞻性。

回顾前述立法演进,从“环保部门”到“环保部门及其委托的监察机构”,再到《法典》的“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立法趋势清晰地表现为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旨在打破部门壁垒,形成监管合力。

1.2 “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作为不确定法律概念仍需解释

这一立法技术的变迁,既是法典体系化追求的体现,也带来了法律解释上的任务。正如前文所言,“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规范性质上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所谓不确定法律概念,是指法律条文中所使用的概念在外延上具有开放性,无法通过单纯的文义解释获得唯一确定的答案,而需要借助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予以具体化。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2]

第一,主体的范围不确定性。哪些行政机关或组织属于“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是仅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还是涵盖所有在单行法中被授予生态环境监管职能的部门?是否包括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等综合管理部门?是否包括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这些问题均无法从“负有……职责”这一表述本身获得直接答案。

第二,职责的内容不确定性。“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本身是一个复合性概念。何为“监督管理”?是仅指事后的监督检查与行政处罚,还是包括事前的许可审批、事中的日常监管?何为“生态环境保护”?是仅指污染防治,还是包括自然资源保护、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维护等更广泛的领域?不同部门对其“职责”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这直接影响到现场检查权主体的认定。

第三,层级的边界不确定性。同一部门系统内部,中央与地方、省与市、市与县之间,如何划分“负有职责”的层级边界?特别是垂改之后,县级生态环境部门不再是县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而成为市级部门的派出机构,其是否仍然属于本条所指的“部门”?如果属于,其现场检查权是来源于本条的一般性规定,还是需要依赖第五十三条的特别授权?

然而,这一修改导致的不确定性,并非立法的疏漏,而是在立法技术上实现了更高层次的概括。它蕴含的立法意图是:在承认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心地位的同时,强调所有依法承担生态环保职责的部门均是这个“集合”中的平等一员,旨在破除部门壁垒,强化协同治理的理念。[3]立法者试图破除传统上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为单一中心的执法格局,构建一个所有依法承担生态环保职责的部门均为平等成员的“主体集合”。这一理念转型,与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生态环境部的组建、“三统一”职能的确立,以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系统治理思路高度契合。[4]

然而,立法者的概括性表述,也意味着法律适用的具体化任务必须交由解释论来完成。对其进行体系化、标准化的解释至关重要。

1.3 “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多元主体结构以及解释框架

基于上述解释,为使《法典》构建的多元主体结构在适用中更加清晰、有序,本文提出一个“核心-协同-延伸”的三位一体解释框架。“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内部可以在这一解释框架下进一步区分,这一区分有助于在保持主体开放性的同时,明确不同主体的法律地位与认定逻辑。

在这一框架之下,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因其统一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是现场检查权的核心主体,其“核心”地位源于其法定的“统一监督管理”职责,是现场检查权体系的中枢和主导力量;其他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基于单行法授权或综合管理职责,构成协同主体,它们与核心主体共同构成第五十一条所指的“部门”集合,形成互补与协作关系;而获得法律特别授权的市级生态环境部门派出机构,则作为执法力量下沉的体现,成为延伸主体,是核心主体执法力量向基层的有效延伸。

这一框架既维持了《法典》第五十一条的开放性,又通过内部的层次划分,明确了不同主体的法律地位、权力来源和功能定位,避免了“多元”可能导致的混乱与泛化。下文将分别围绕核心主体、协同主体、延伸主体以

及特殊情形下的主体认定展开系统阐释。

2 核心-协同-延伸：多元主体结构的解释论展开

2.1 核心主体：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地位与层级认定

《生态环境法典》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承认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和跨部门属性，是构建协同共治体系的法律基础。[5]其中，“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是现场检查权当之无愧的核心主体。其核心地位由以下三方面因素决定：第一，法律定位上的统领性。法典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均明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这一职能使其在所有相关部门中居于组织、协调、指导、督促的中心位置。第二，职能范围上的全面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管对象覆盖水、气、声、渣、土、化、辐等几乎所有环境要素和污染源，其现场检查权具有基础性和普适性。第三，执法实践中的主导性。绝大多数环境执法案件的发起、调查和处理均由生态环境部门完成，其是环境执法的主力军。因此，无论从实定法还是从政策层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为核心主体的地位均无疑义。

在垂改的背景下，理解作为核心主体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还必须注意其内部的层级分工与权力配置变化。其范围在中央层面是明确的，即生态环境部；但在地方层面，尤其是在环保垂改全面实施后，省、市、县三级生态环境部门的职责划分发生了深刻变化，直接影响到现场检查权的具体配置与行使。因此，从属于“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并作为关键部分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作体系性解释。[6]

因此，“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解释上应当区分层级职能：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主要承担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以及对市县环境履责情况的监察，不直接对企业实施大规模现场检查；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则统一管理、统一指挥本行政区域内县级环境执法力量，承担人员和工作经费；县级生态环境部门上交环境保护许可等职能，转化为市局派出机构，主要承担现场环境执法。[7]

综上所述，在垂改背景下，现场检查权应当解释为在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统一领导下，由其派出机构，即县级环保分局，在辖区内具体实施，而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主要通过业务指导、监督评价等方式间接行使。[8]这种解释符合“收监察督政而留执法查企，收质量监测而留污染源监测”的垂改基本方向，既能避免省级部门执法半径过大，又能实现检查权的集中统一，解决基层执法力量不足和地方干预问题。在适用上，对于跨区域、流域的重大环境违法案件，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可直接组织实施现场检查，或指令相关市级部门协同开展。[9]

在核心主体内部，形成了一个“省级宏观督察、市级统一指挥、县级一线执行”的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垂直执法体系。

尽管不同层级的职能重心有所不同，但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均属于现场检查权的核心主体，只是在具体管辖范围与内部职责分工上有所差异。这一差异不影响主体资格的认定。

2.2 协同主体：其他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和交叉性，其治理远非生态环境单一部门所能包揽。法典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在“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中，除去最关键性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之外，其他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也同样享有现场检查权。这源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跨界性、复合性，单一部门无法包揽所有监管职责。这就产生了职权交叉与协调问题。[10]

在前文所述的解释框架之下，其他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属于现场检查权的协同主体，协同主体是多元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此主体的相关认定问题，应采取职责关联说进行扩张性解释，即只要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某个部门在特定领域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责，该部门即可被认定为本条所指的主体，并有权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实施现场检查。

根据此标准，协同主体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第一类，基于单行环境法律授权的各领域主管部门，或称法定职责型协同主体。这类部门拥有明确的法律、行政法规授权，在其特定领域内行使包含现场检查在内的监督管理权。其范围相对清晰，主要包括：

自然资源部门：依据《矿产资源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等，对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破坏、土地复垦、林地保护等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水法》、《水土保持法》等，对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土保持、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项目等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农业农村部门：依据《畜牧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法》等，对畜禽养殖场（户）的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实践中，大量针对个体养殖户的现场检查即由农业农村部门或与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开展。

交通运输及海事管理部门：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船舶与海上设施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对机动车船的尾气排放、船舶污染物的排放与接收处理等进行登船或现场检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依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对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建筑施工工地的

扬尘控制措施等进行现场检查。

这些部门的现场检查权,是其履行本领域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必要手段,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检查权构成互补关系。

第二类,履行综合管理职责的部门,或称附随义务型协同主体。这类部门本身并非传统的环保专业部门,但其综合管理职责中内嵌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最典型的是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应急管理等部门,同时也包括地方政府设立的综合协调机构,如环保委员会、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等。

例如,发展改革部门在审批、核准投资项目时,需现场核查其是否符合环保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在推动行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时,需现场检查企业工艺装备的环保水平;应急管理部门在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时,需同时关注环境风险防控设施。他们的检查权更多是一种履行“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职责的综合性监督检查权。其检查重点可能不在于具体的污染物排放浓度,而在于产业政策符合性、工艺设备先进性、环境风险预案有效性等宏观层面。这类检查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专业检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覆盖规划、建设、生产、应急全过程的监管链条。同时,由于垂改后县级党委政府失去了环保履责的直接抓手,中央党校课题组指出,应当“在县级建立环境保护议事协调机制,解决县级环保局上收后的综合协调问题”。[11]因此地方政府设立的综合协调机构,如环保委员会、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等议事协调机构虽然不直接实施现场检查,但有权对各部门履行环保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综上所述,对于“其他部门”的认定,应采取职责关联说,采取扩大解释,即只要该部门的法定职责中明确包含或必然衍生出对特定生态环境保护事项的监督管理责任,其就应当被认定为法典第五十一条中的“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并可在其职责范围内依法实施现场检查。这避免了列举的挂一漏万,保持了法典的开放性与适应性。

2.3 延伸主体:派出机构的法律授权与主体认定

《生态环境法典》第五十三条规定:“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现场检查、查封、扣押、代履行和行政处罚。”[12]这一规定在生态环境现场检查权的主体制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要理解其规范意涵,必须回到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中。

垂改之前,县级环境保护局是县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现场检查、行政处罚等执法行为。然而,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6〕63号)明确提出,县级环保局调整为市级环保局的派出机构。这一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县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组织法地位。

在传统的行政组织法理论中,派出机构通常不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派出机构是行政机关为了便于行政管理而设立的、承担特定职能的组织单元,其行为后果一般由设立它的行政机关承担。垂改后,县级生态环境分局作为市级生态环境局的派出机构,其法律地位变得模糊:一方面,它在事实上承担着辖区内大量日常现场检查任务,是环境执法的“第一线”;另一方面,若严格适用传统理论,其不具备独立主体资格,所作出的检查记录、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律效力存疑。实践中曾出现“现场检查权有了,但不能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尴尬局面,严重影响了执法权威和效率。[13]

法典第五十三条正是将《指导意见》这一改革成果予以法定化,从根本上解决了派出机构执法主体资格的问题。

当法律、法规明确授权派出机构可以独立行使某项行政职权时,该派出机构即获得授权行政主体的地位。法典第五十三条的表述,正是典型的法律特别授权,而非一般行政委托。[14]《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依法赋予环境执法机构实施现场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条件和手段”,这表明立法者有意赋予派出机构独立的执法主体地位。[15]这与“行政委托”有本质区别。行政委托中,受托组织以委托机关名义执法,责任由委托机关承担。而法律授权下,派出机构以自己名义执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作为独立的被申请人和被告。这极大地简化了执法程序,提升了执法效能,也符合“权责一致”的法治原则。[16]

派出机构虽然获得独立授权,但其在业务上仍受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的领导和监督。市级部门负责制定执法规范、培训执法人员、协调跨区域案件,并对派出机构的重大执法决定进行备案或审核。这是一种“授权独立执法”与“业务垂直领导”相结合的模式,既保证了执法效率,又维护了监管的统一性。这种“执法上独立、行政上隶属”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其在整个主体结构中的特殊定位。

在责任承担上,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三条和《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的行政行为,应当以该组织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和行政诉讼被告。因此,法典第五十三条中规定的派出机构以自己名义实施的行政行为,应当由该派出机构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和行政诉讼被告。派出机构独立对外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如果其实施的现场检查程序违法,行政相对人应当以该派出机构为对象寻求法律救济。可见其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第五十三条的法律授权,的确拥有作为现场检查权主体的资格。

但由于派出机构不具备独立财政预算,最终实际赔偿责任承担仍由设立该派出机构的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

因此,在责任的最终承担上,形成了一种双层结构:派出机构作为直接的“行为者”对外独立承担诉讼责任;而设立它的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则基于其设立者和领导者的地位,承担最终的监督管理责任和可能的国家赔偿责任。市级部门有责任对派出机构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指导和纠错。可见,派出机构作为主体的运行无法与现场检查权的核心主体相分割开来,其虽然拥有主体资格,但在实际上属于核心主体的一种延伸。

将其定位为“延伸主体”,其逻辑在于:其执法权是源于市级核心主体的职能下沉和《法典》的特别授权,是核心主体执法手臂向基层的延伸。其主要任务是执行市级部门的统一部署,落实一线执法,是整个垂直执法链条的末端和实践基础。虽然派出机构作为被告独立应诉,但在国家赔偿等最终责任承担上,设立它的市级部门因负有监督管理之责,仍需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和保障责任。故在主体结构中处于从核心向下延伸、贴近执法一线的位置,谓之“延伸”。因此,“延伸主体”的定位准确地刻画了派出机构既独立又从属、既分权又统一的复杂法律地位,使其融入了“核心-协同-延伸”的整体框架。

因此,将派出机构纳入现场检查权多元化主体的体系当中后,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其他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一同构建出以“核心-协同-延伸”为脉络的清晰框架。

2.4 多元主体的协调原则和体系关系

多元主体的设立旨在形成合力,而非相互掣肘。因此,必须建立清晰的协调机制,以解决职权交叉、多头执法、监管真空等问题。在“核心-协同-延伸”框架内,各主体间的关系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主管优先为主,专业优先为辅原则。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为核心主体,其现场检查权应当具有统筹性和优先性:一是对于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综合性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权牵头组织联合检查;二是当不同部门对同一企业同一事项进行检查时,应当优先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检查,其他部门通过协同配合方式参与,避免多头执法、重复检查。这一解释符合生态环境部《关于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的要求。但结合实际情况,对于明显属于某一部门专业监管领域的事项,则应由该部门行使现场检查权。例如,对船舶燃油含硫量的现场抽检,应由海事或交通运输部门主导。

第二,垂直领导与授权独立的统一。法典第五十一条本身并未直接划分层级分工,但其与第五十三条构成了紧密的逻辑关系。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是一个原则性的主体框架,而第五十三条则专门解决了垂改后县级分局作为“派出机构”的执法主体资格问题。因此,结合垂改政策背景和生态环境部职能配置,可作如下解释:县级生态环境部门作为市级派出机构,其现场检查权来源于法典第五十三条的特别授权,而非第五十一条的一般性规定。第五十一条主要确立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共治框架,而第五十三条则解决垂改后县级分局执法主体资格问题。这种解释既尊重了法典的文本结构,又契合垂改政策的改革意图,避免了法律适用中的冲突。[17]由此可见,核心主体与延伸主体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市级部门负责制定执法规范、培训人员、协调案件,并对派出机构的重大执法决定进行监督。派出机构在授权范围内独立执法,但业务上必须服从从市级部门的统一指挥。

第三,信息共享与联合检查原则。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与其他部门实现监测数据、执法信息的互联互通。任何一个部门在现场检查中发现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违法线索,都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为统一监管部门,往往在信息汇总和统筹协调上承担更多责任。[18]在适用上,生态环境部门可基于以下三种情形行使优先权:1、环境违法行为涉及多领域、多部门监管的综合性问题;2、环境问题可能引发重大生态风险或社会影响;3、其他部门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履职不充分。例如,对于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综合性问题,如一个工业园区内既有工业污染源又有建筑施工扬尘的情况,或者同时存在水、气、固废等多种污染,且涉及安全生产、规划布局等问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主动牵头组织,或参与由地方政府组织的联合检查,统筹协调住建、交通等部门共同参与,共享检查结果,提高执法效率,避免对企业进行重复、多头检查。[19]

3 “核心-协同-延伸”解释框架的规范意义与制度功能

前文所构建的“核心-协同-延伸”三位一体解释框架,并非对《生态环境法典》第五十一条与第五十三条的简单归类与现象描述,而是基于特定解释目标与法学方法所进行的理论建构。这一框架的提出,旨在为法典施行后现场检查权制度的统一适用提供一套内在融贯、逻辑自洽的解释方案。其规范意义与制度功能,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3.1 回应体制改革:为垂直管理后的执法权配置提供规范依据

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是理解《生态环境法典》现场检查权主体制度的关键政策背景。该改革深刻改变了省、市、县三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组织形态与职能配置,带来了“县级分局执法主体资格悬空”等现实困境。本文提出的解释框架,正是对此困境的体系化回应。

第一,框架明确了垂直管理体系下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功能定位。在“核心主体”内部,本文阐释了“省级统筹督察、市级统一指挥、县级具体执行”的层级分工格局。这一解释方案,将垂改政策中“收监察督政、留

执法查企”的改革精神，转化为具有法律解释效力的规范命题，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行使现场检查权提供了清晰的权责图谱。

第二，框架为县级分局的独立执法资格提供了坚实的规范基础。通过将县级分局定位为“延伸主体”，并明确其权力来源于法典第五十三条的特别授权，框架成功地在行政组织法的一般原理与生态环境执法的特殊需求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一解释既维护了法制统一，又回应了改革实践，避免了因法律解释滞后而导致的执法僵局。

3.2 融贯法典体系：实现与法典总则“统筹协调”原则的规范衔接

《生态环境法典》的体系化特征，不仅体现于各分编之间的逻辑关联，更体现于总则编确立的基本原则对分则具体制度的辐射与统摄作用。法典总则编明确规定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应遵循“统筹协调、分工负责”的原则。本文提出的解释框架，正是这一总则原则在现场检查权制度中的具体投射与规范展开。

第一，“核心主体”的设定，是“统筹协调”原则的制度载体。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职责，使其在现场检查权的多元主体结构中居于核心与枢纽地位。本文关于“主管优先原则”的论证，为核心主体行使统筹协调职能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规则。

第二，“协同主体”的纳入，是“分工负责”原则的规范体现。通过将其他依法负有相关职责的部门认定为协同主体，并对其进行类型化区分（法定职责型与附随义务型），框架承认并尊重了各部门在其专业领域内的独立监管权限。这避免了将“统一监管”异化为“一家包揽”，确保了“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的部门责任得以落实。

第三，“延伸主体”的定位，是总则精神向基层延伸的末端落实。派出机构的执法实践，既是统筹协调指挥下的具体行动，也是分工负责在基层一线的直接体现。

通过上述三个层次的构建，本文的解释框架使得现场检查权制度与法典总则确立的治理原则保持了高度的规范融贯性，彰显了法典编纂的体系化价值。

3.3 优化执法效能：为多元主体有序参与提供清晰的身份认定

长期以来，现场检查实践面临着“多头执法、重复检查”与“监管真空、相互推诿”并存的困境。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缺乏一套清晰、公认的主体身份识别标准与协调规则。本文提出的解释框架，为解决上述实践顽疾提供了方案。

第一，框架清晰列明了各个主体在多元化情况下的身份定位。在复杂的执法情境中，无论是日常监管、专项行动还是联合检查，各参与机关均可依据此框架迅速确定自身的角色定位：是牵头负责的“核心主体”，是专业配合的“协同主体”，还是一线执行的“延伸主体”。身份的清晰化，是职责明晰化的前提。

第二，框架确立了解决主体间权限冲突的优先性规则。本文提出的“主管优先为主、专业优先为辅”原则，垂直领导与授权独立的统一，以及信息共享、联合检查的程序性要求，为处理多元主体之间的职权交叉问题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指引。例如，在查处一个涉及水、气、固废多种污染且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工业园区综合环境问题时，依据本框架，生态环境部门应作为核心主体牵头组织联合检查，而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作为协同主体参与，园区所在地的县级分局（延伸主体）负责具体的入企调查取证工作。各主体各司其职、共享信息，可有效避免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重复干扰，显著提升执法效率与政府公信力。

4 结语

《生态环境法典》第五十一条与第五十三条关于现场检查权的规定，是我国生态环境监管法治化、精细化、体系化进程中的关键立法成果。它不再将现场检查权视为一项孤立的、机械的执法工具，而是将其置于一个由多元主体、多样对象构成的动态监管系统中进行重新定位与规范。本文提出的“核心-协同-延伸”三位一体的解释框架，尝试为理解和适用这一主体制度提供一个融贯的分析视角。

该框架清晰地展示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为核心主体，确保了统一监督管理的权威性与主导性；其他依法履职的部门作为协同主体，编织起一张覆盖全领域、全过程的严密监管网络；获得法律特别授权的派出机构作为延伸主体，则打通了执法力量下沉基层的“最后一公里”。这一立体化、网络化的主体结构，既是对我国垂改等重大体制改革成果的法律确认，也是对《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统筹协调、分工负责”原则的具体践行，为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效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法基础。

随着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施行，理论界的解释论研究与实务部门的配套制度建设将是确保法律正确实施的关键。未来的解释论任务在于，进一步细化各级主管部门在垂改背景下的职责清单，并明确派出机构在独立授权下的权力行使规则与责任承担机制，确保多元主体之间有序协同、权责一致。

参考文献：

- [1] 徐祥民，郑振瑶.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创造与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J].法治现代化研究,2026(1):13-27.
- [2] 许春晖.正当程序：解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判断标准[J].东方法学,2020(3):56-65.

- [3] 陈海嵩.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质编纂方法及其解释适用[J].法学评论, 2026 (2) ; 172-183.
- [4] 周妍,林盟皓,仲崇峻,郑华,白中科,肖武,陈妍,王金满.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的理论基础与实施路径[J].应用生态学报,2025 ,36 (12):3603-3611.
- [5] 杨解君,庆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总则编”规范构造评析与完善建议[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25(5):23-36.
- [6] 张敏纯,邓顺萍.环保垂改与综合执法改革的衔接困局及其消解[J].江西社会科学,2022(8):141-149.
- [7] 娄齐.基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权主体认定的司法困境与疏解[J].公民与法 (审判版) ,2025(8):22-29.
- [8] 张云芳.关于环境监测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J].山西科技,2018(4):114-115.
- [9] 刘长军.环境监测机构垂直管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探析[J].环境监控与预警,2017(4):55-58.
- [10] 吴舜泽,秦昌波.关于地方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重点任务的基本考虑[J].中国环境管理,2016(6):9-12.
- [11] 彭中遥.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多元规范及其协同机制——基于环境行政处罚制度的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93-206
- [12] 陈海嵩.生态环境法典的复合结构及其体系化适用[J].法学研究,2025(6):五十三-69.
- [13] 张敏纯,娄齐.环境执法权下沉乡镇的制度困境与法治化纾解[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6):64-77.
- [14] 任沫蓉.行政委托外部责任主体认定的完善: 问题检视与规范建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6):109-118.
- [15] 任洋.反思与重构:行政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定位[J].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107-114.
- [16] 贾圣真.行政委托的内外区分与司法审查[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5(6):30-41.
- [17] 陈海嵩.《生态环境法典》中行政执法规则的体系化构造[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2026 (3) ; 1-16.
- [18] 王萌,何伟波.我国环境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之美国特色借鉴[J].常州大学学报,2019(1):36-43.
- [19] 冯锦彩.论中国环境执法制度的完善——以中美环境执法制度比较为视角[J].环境保护,2009(6):11-13.

Interpret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Multi-Subject Structure of On-site Inspection

Authority in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de

WANG Yi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China)

Abstract:The *Ecosystem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roduces groundbreaking provisions on the subject of on-site inspection authority through Articles 51 and 53.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se two provisions, deconstructs the ambiguous legal concept of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in Article 51 into an open set composed of a "core subject" (the primary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authority) and "cooperative subjects" (other departments with relevant responsibilities). Secondly, it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nature of the authorization granted by Article 53 to dispatched agencies of municipal-leve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epartments, clarifying that it constitutes a special legal authorization rather than administrative entrustment, and positions these agencies as "extension subjects" for law enforcement coordina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constructs and systematically argues a three-in-one interpretive framework for the subject of on-site inspection authority — "core-cooperative-extens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clear interpretive pathway for the unified and standardized identification of on-site inspection authority subjects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de.

Keywords:environmental on-site inspection system;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de; subject of inspection power; vertical management reform

基于“人工智能+文旅”创新融合模式的乐山非遗文化旅游空间决策模型构建

周啸，潘娟，周星汉，张雷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摘要：在分析“人工智能+文旅”融合发展和乐山非遗文化旅游发展背景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人工智能+文旅”创新融合模式的乐山非遗文化旅游空间决策模型，将人工智能中的空间聚类算法、协同过滤推荐算法和空间数据挖掘算法作为构建“人工智能+文旅”创新模式的基本方法，将乐山市非遗文化旅游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实证分析表明，我们构建的“人工智能+文旅”创新融合模式能够得到准确合理的旅游目的地推荐，为游客提供智慧化旅游服务，同时也为旅游管理部门决策规划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人工智能；创新融合模式；非遗文化旅游；空间决策模型

基金项目：乐山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人工智能+文旅”创新融合模式的乐山非遗文化旅游空间决策模型构建，SKL2025B12）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40

一、引言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指出，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是引领区域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培育我国文化和旅游新发展空间、打造全国文化和旅游发展新增长极的重大举措。“人工智能+”发展大背景和人工智能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的大趋势下，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与旅游行业融合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助力人工智能促进文旅产业创新发展，是旅游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发展带动旅游发展，以旅游发展促进文化传播，旅游行业才能够更有内涵。

非遗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其种类多样，分布地域广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文化的表现形式多样，有美食、文学、音乐、戏剧等，它们分布在城市中、乡村里、景区内，通过多种形式展现出来，极大地丰富了游客的文化体验感。非遗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是文旅融合的一种经典方式，游客前往旅游城市进行游览时，希望体验与所熟知文化不同的其他文化，非遗文化就是选项之一。旅游城市和景区内的非遗文化具有很强吸引力，是游客参与文化体验的重要内容。

乐山作为四川旅游强市，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城市，成都平原经济区核心城市，也是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纽带城市，更是四川旅游发展的排头兵。深度融合非遗文化，建设“人工智能+文旅”创新融合模式下的智慧旅游城市，乐山理应走在前列。乐山市境内非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以非遗文化为背景的旅游目的地星罗棋布，是乐山除“名山、名佛、名人、名城”文化旅游品牌之外又一响亮的名片。弘扬非遗文化，打造非遗文化旅游品牌，是乐山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的途径之一。构建以非遗文化为背景的文化旅游空间决策模型，为游客提供非遗文化旅游空间决策支持场景，全面提升游客满意度，延长游客留乐旅游时间，是乐山建成四川旅游经济强市的重要举措。在“人工智能+文旅”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将人工智能与非遗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为乐山建设“智慧+文旅”创新型智慧旅游城市提供决策支持，助力乐山

作者简介：周 啸（1986—），男，博士后，教授，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智慧旅游；
潘 娟（1986—），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
周星汉（1993—），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艺术；
张 雷（1986—），男，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艺术。

通讯作者：周啸

建成全省“智慧+文旅”先行城市。

二、模型构建方法

针对喜好非遗文化的游客而言,深度挖掘乐山市范围内的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将旅游目的地中的非遗文化推荐给游客,吸引游客前往旅游目的地体验非遗文化,是打响乐山非遗文化旅游名片的重要途径。推荐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前提是挖掘游客兴趣,确定游客喜好的非遗文化属性,然后从乐山市范围内的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中进行属性筛选,为游客匹配最优目的地。在匹配非遗文化属性的同时,需要考虑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可达属性,游客根据实际条件选择交通成本合理的目的地前往游览。将人工智能方法融入旅游推荐是“人工智能+文旅”创新融合的核心内涵,人工智能技术中的协同过滤算法、空间数据挖掘算法等为非遗文化旅游挖掘提供了有力工具。我们构建基于“人工智能+文旅”创新融合模式的乐山非遗文化旅游空间决策模型时主要运用以下研究方法。

(1) 空间聚类算法

空间聚类算法是对地理空间中的实体进行特征属性集聚的一种方法,能够分析地理实体的空间分布规律。空间聚类的方法有很多,常见的有划分聚类算法、层次聚类算法、密度聚类算法、基于网格的聚类、神经网络聚类等。对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空间聚类通常以空间可达度为目标函数,用于度量不同目的地之间的亲密度。在具体的聚类算法选择上,有k-中心遗传聚类算法、AGNES聚类算法、DIANA聚类算法等。不同算法的目标相似,仅在设计算法时有所不同。为提高聚类精准度,可以选择k-中心遗传聚类算法实现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聚类。

(2) 协同过滤推荐算法

协同过滤推荐算法是一种基于用户历史行为或兴趣需求挖掘匹配用户历史行为或兴趣需求的物品的方法,将其运用到非遗文化旅游推荐中,可以将游客作为用户,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作为待推荐物品。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均存在属性特征和空间特征,属性特征包含了旅游目的地的游览特征,如游览时间、游览费用、星级、热度等;空间特征则包含了地理位置、距离、空间关联度等。因此,旅游目的地的推荐问题更为复杂。首先需要建立游客兴趣标签,兴趣标签代表非遗文化属性和旅游属性。由游客对兴趣标签进行评分,分数的高低代表游客对标签的喜好程度。其次,需要对标签进行量化和归一化,建立机器能够识别的特征向量。在构建用户特征向量的基础上,通过非遗文化属性标签对乐山市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进行量化,建立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特征向量。在构建特征向量的基础上,计算游客特征向量与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特征向量间的欧氏距离,以挖掘最匹配游客兴趣的旅游目的地。

(3) 空间数据挖掘算法

空间数据挖掘是对分布在地理空间中的实体进行特征属性挖掘,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地理实体的空间可达度挖掘。空间可达度用于衡量两个点之间的通达程度,空间可达度越高通达程度越高,反之通达程度越低。旅游场景中,点之间的通达程度代表游客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通达程度,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可达度越高,游客前往旅游目的地产生的交通成本越低。根据这一原理,采用空间数据挖掘算法对乐山市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进行空间可达度挖掘,建立游客所在位置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函数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从匹配游客兴趣的目的地中筛选交通成本更低的目的地,从而有效减少出行成本,提高游客的满意度。

三、实证分析

乐山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坐落在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交汇之处,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自古以来文化荟萃,是众多文化名人的故乡或游学之地。乐山境内分布的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200多项,覆盖各个领域,很多非遗文化与市内代表性景点融为一体。游客在乐山旅游,能够深度体验乐山旅游目的地包含的非遗文化,如跷脚牛肉、嘉州竹编等。我们以乐山市辖区为研究范围,采集乐山市辖区范围内的代表性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主要有:苏稽古镇(跷脚牛肉非遗)、乐山大佛和博物馆(非遗展演)、乐山故宫博物馆(故宫文物南迁乐山故事)、乐山市文化馆(嘉州竹编等)、乐山文庙(竹编、造纸非遗体验)、天工开物景区(佛教文化、水晶文化等)、嘉州绿心公园(周边非遗美食)、乌木博物馆(乌木文化、非遗文化等)。

(1) 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聚类分析

首先构建 k-中心遗传聚类算法对采集的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进行空间聚类, 结果得到表 1 所示聚类结果, 一共生成了 3 个聚类簇, 这 3 个聚类簇通过空间可达度模型计算得到。簇 $C_{(1)}$ 包含苏稽古镇 (跷脚牛肉非遗)、天工开物景区 (佛教文化、水晶文化等)、乌木博物馆 (乌木文化、非遗文化等); 簇 $C_{(2)}$ 包含乐山大佛和博物馆 (非遗展演)、乐山市文化馆 (嘉州竹编等)、乐山文庙 (竹编、造纸非遗体验); 簇 $C_{(3)}$ 包含乐山故宫博物馆 (故宫文物南迁乐山故事)、嘉州绿心公园 (周边非遗美食)。从表 1 结果看, 乐山市内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呈现空间区域离散分布趋势, 不同聚类簇遍布在主城区不同区域。这一空间聚类结构说明乐山市内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在满足不同区位游客旅游需求上呈现均衡性。

表 1 乐山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空间聚类结果

聚类簇	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
$C_{(1)}$	苏稽古镇 (跷脚牛肉非遗)、天工开物景区 (佛教文化、水晶文化等)、乌木博物馆 (乌木文化、非遗文化等)
$C_{(2)}$	乐山大佛和博物馆 (非遗展演)、乐山市文化馆 (嘉州竹编等)、乐山文庙 (竹编、造纸非遗体验)
$C_{(3)}$	乐山故宫博物馆 (故宫文物南迁乐山故事)、嘉州绿心公园 (非遗美食)

(2) 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推荐

假定游客非常喜欢的标签是“美食”、“美景”, 对这两个标签的评分很高, 在 9.0 分以上, 而对其他标签的评分相对较低, 低于 3.0 分。对游客特征向量进行量化和归一化后, 与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特征向量进行匹配, 结果输出的最匹配旅游目的地是: 苏稽古镇 (跷脚牛肉非遗)、乐山大佛和博物馆 (非遗展演) 和嘉州绿心公园 (周边非遗美食)。其中苏稽古镇以跷脚牛肉等非遗美食著称, 是国家 3A 级景区; 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美景和文化并存, 是国家级 5A 级景区; 嘉州绿心公园周边集美景、美食、文化于一体, 是国家 3A 级景区。从结果可知, 为游客推荐的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均能够匹配游客兴趣, 游客按照推荐的旅游目的地进行游览, 可以获得动机利益满足。

(3) 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空间可达度分析

假定游客所在位置为乐山高铁站, 游客从乐山高铁站出发前往不同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的交通成本不同, 取决于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可达度。以空间距离的倒数作为空间可达度的度量值, 得到表 2 所示各旅游目的地空间可达度。由表 2 数据可知, 各旅游目的地空间可达度均不同, 游客前往游览将产生不同交通成本。空间可达度越高, 说明游客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空间距离越小, 交通成本越低。对于推荐的三个目的地: 苏稽古镇、乐山大佛和博物馆、嘉州绿心公园, 空间可达度最高的是嘉州绿心公园, 其次是苏稽古镇, 最低的是乐山大佛和博物馆。因此, 从交通成本的角度分析, 优先推荐给游客的是嘉州绿心公园, 其次是苏稽古镇, 最后是乐山大佛和博物馆。空间可达度分析为游客前往感兴趣的旅游目的地提供了距离成本参考, 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选择合适的旅游目的地, 以节约交通成本, 提高旅游效率。

表 2 各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空间可达度

旅游目的地	苏稽古镇	乐山大佛和博物馆	乐山故宫博物馆	乐山市文化馆
空间可达度	0.208	0.112	0.088	0.192
旅游目的地	乐山文庙	天工开物景区	嘉州绿心公园	乌木博物馆
空间可达度	0.152	0.556	0.294	0.169

四、结束语

本文在分析“人工智能+文旅”融合发展背景的基础上, 对乐山市非遗文化旅游与人工智能融合的创新

发展模式进行了论证,构建了基于“人工智能+文旅”创新融合模式的乐山非遗文化旅游空间决策模型。以乐山非遗文化旅游建设为研究对象,将人工智能中的空间聚类算法、协同过滤推荐算法和空间数据挖掘算法作为构建“人工智能+文旅”模式的基本方法,将乐山市非遗文化旅游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实证分析部分,我们以乐山市市区内主要非遗文化旅游目的地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空间聚类算法输出旅游目的地聚类簇,以协同过滤推荐算法输出满足游客兴趣的旅游目的地,再以空间数据挖掘算法计算各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可达度,为游客推荐既满足兴趣又使交通成本最优的旅游目的地。通过实证分析可知,我们构建的“人工智能+文旅”创新融合模式能够得到准确合理的旅游目的地推荐,为游客提供智慧化旅游服务,同时也为旅游管理部门决策规划提供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李鹏霞.新疆非遗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J].市场瞭望,2026,(01):25-27.
- [2]杨珉.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格局分析与旅游路径开发实践[J].国际公关,2025,(17):110-112.
- [3]陈青青,李晓华,杨伟.墨韵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实施路径研究——以贵州省印江县为例[J].商展经济,2025,(15):43-46.
- [4]叶思青.人工智能技术的定制化旅游服务[J].智慧中国,2025,(11):28-29.
- [5]邓楚峰,奉晓娟,张璨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乡村智慧旅游服务优化策略研究[J].南方农机,2025,56(16):87-90+94.

Construction of the Spatial Decision-making Model for Lesh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based on the Innovative Integration Mode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Cultural Tourism"

Zhou Xiao, Pan Juan, Zhou Xinghan, Zhang Lei

(Schoo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Le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esha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ultural tourism"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Lesh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a spatial decision-making model for Lesh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based on the innovative integration mod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ultural tourism" was constructed. The spatial clustering algorithm,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and spatial data mining algorithm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used as the basic methods to construc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ultural tourism" mode, an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in Leshan City was deeply integrate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novative integration mode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ultural tourism" we have constructed can obtain accurate and reasonable tourism destination recommendations, provide intelligent tourism services for tourists, and also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decision-making and planning in tourism management.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ve integration mod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Spatial Decision Model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 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袁一君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摘要: 绿色金融是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驱动力, 而提高绿色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途径。本文基于 2011—2023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显著提高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作用机制来看, 该政策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提升人力资本, 进而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 通过异质性分析可知, 政策效应在非粮食主产区、水资源丰沛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据此, 应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着力促进技术成果转化, 并强化人力资本积累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双重差分模型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63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农业在总量平衡和丰年有余的基础上, 进一步向更高水平的供给能力迈进。但在取得成就的同时, 长期依赖高强度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也带来了资源透支和环境压力。《2023 中国农业农村低碳发展报告》指出, 当前我国农业规模化生产水平依然不高, 减排能力相对薄弱, 低碳转型与效益提升之间还缺乏有效协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个核心指标, 提升这一生产率, 既是破解增产与减排两难困境的关键, 也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根本出路。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要坚持推广绿色生产方式和节水灌溉技术, 发展生态低碳农业, 并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这表明, 农业污染防治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然而, 农业生产过程中碳排放污染严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门槛高以及资金不足等现实困境,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作为服务市场发展和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工具, 绿色金融正逐步成为协调农业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键环节。为引导资金更多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国家自 2017 年起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区)的部分地区启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该政策围绕构建绿色信贷体系、创新环境权益交易机制和完善风险补偿制度展开, 目的就是打通绿色项目的融资堵点, 控制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扩张, 同时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多年探索, 试验区在拓宽农业绿色融资渠道、推动低碳技术应用等方面已经积累不少实践经验。然而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具有投资周期长、风险感知强、技术采纳门槛高等特点,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效力, 能否突破产业特性的约束, 有效实现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其影响机制是什么? 以上问题亟待讨论。为此, 本文深入探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 以期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激发农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力, 为现代农业的绿色持续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新思考。

2. 文献综述

绿色金融是一种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金融模式, 它的核心作用是为绿色项目的投融资、运营和风险管理等环节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1]。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则是以政府为主导, 目标是推动产业绿色升级, 把更多资金引导到绿色项目中去。这项政策也鼓励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开展有地方特色的绿色金融探索。已有不少研究发现,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在促进碳减排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谭显春等(2023)指出试验区政策的实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降低了试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高水平地区的金融发展进一步强化了政策的碳减排效果^[2]。绿色金融政策通过激励企业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并吸引更多媒体关注, 从而对其环境绩效产生实质影响, 最终表现为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显著下降^[3]。绿色金融政策作为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支撑, 是促进我国低碳经济转型的重大机制创新^[4]。郭希宇(2022)强调了绿色金融对低碳经济的促进作用, 表明绿色金融是推

作者简介: 袁一君(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

通讯作者: 袁一君

动低碳经济增长、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5]。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把资源消耗和农业碳排放这类负面产出也考虑了进去,能够更全面地衡量农业生产效率和绿色转型的实际效果^[6]。该指标不仅关注农业要素投入与正向、负向产出之间的关系,还把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加入分析,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兼顾污染物排放问题。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模型选取,学界初期多采用参数法估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如随机前沿法(SFA)和索洛残差法(SRA),但此类方法难以处理多维产出等缺陷,其适用性存在瓶颈。在此情况下,无需预设生产函数、善于处理多变量问题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生产率测算的重要工具。由于ML指数不具备传递性和累加性,且无法通过线性规划求解。OH(2010)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全球参照系的GML指数,有效解决了ML指数存在的局限性问题^[7]。某些学者基于非径向、非导向的松弛变量,兼顾投入与产出,采用超效率SBM-GML指数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有效测算,进而使测得的效率结果更加准确^[8-9]。SBM模型到考虑投入和产出的松弛量,避免传统DEA模型的局限性。GML指数既考虑了非期望产出,又将生产单元包含在全局参考集内。关于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Gujie等(2022)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作用存在“先增长后下降”的动态变化特征^[10]。宫豪(2025)指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推动作用,并指出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11]。李彩平(2025)认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助推数字乡村建设,间接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相较于一般区域,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12]。由此可知,关于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尚存不同观点,本文将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探究。

目前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研究大多数基于工业生产领域视角促进碳减排效应,对于农业领域相关的系统性研究仍显匮乏。其次,当前学术界尚未充分探讨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基于此,本文采用超效率SBM-GML测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双重差分法来研究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从而拓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在农业领域的绿色发展效应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3.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绿色金融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从资本导向的角度分析,该政策通过设置绿色信贷专项额度,对绿色项目提供贴息或担保等,降低了农业绿色技术采纳的融资成本与融资门槛;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农业项目,驱动减排技术普及,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13]。这项政策引导生产要素向绿色农业集聚,优化资源配置,减轻农业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持续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试验区在信贷审批中纳入环境绩效评估,对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养殖污染超标等行为形成融资约束。农业经营主体为获得信贷支持,需调整生产方式,淘汰落后产能转向绿色技术。这种机制形成了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外部压力,加速了低效率生产方式的退出。绿色金融政策能够从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两个方向,协同助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据此第一个研究假设如下。

H1: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3.2 绿色金融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

技术创新既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也是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试验区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发绿色科技保险、设立绿色产业引导基金,为农业技术创新提供风险分担机制。这种机制降低了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有助于推动农业技术创新。融资能力和创新意愿同时得到改善,绿色技术创新也因此更加活跃。另一方面,该试验区政策提供更多的专项资金、风险投资等金融工具,为农业技术创新提高资金支持,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技术进步促使化肥、农药及水资源得以更高效地利用,其过度使用状况得到改善,进而实现单位产出碳排放下降^[14]。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此外,技术进步的推进能够实现生产效率的增进、资源配置的改善,并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该政策可以在农业产值增加的同时并缓解农业碳排放污染问题。假设如下:

H2: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借助技术创新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在人力资本方面,试验区政策为人力资本升级提供了金融支持。绿色金融引导农业向绿色化、集约化转型,相关项目往往伴随新的技术与管理要求。在政策激励下,人才可通过助学贷款、奖学金等途径提升专业能力。高级人力资本具备较强的技术吸收与再创新能力,有助于资本、技术等要素集聚,从而更有效地提升生产效率^[15]。同时,绿色金融政策的推进将扩大农业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吸纳需求,缓解当前就业市场中的供需结构失衡问题产生影响^[16]。农业人力资本的高级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为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打下坚实基础。据此,假设如下:

H3: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4.研究设计

4.1 模型构建

1)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借助双重差分法, 评估 2017 年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控制多种变量的基础上, 该模型可消除研究事件的事前组间差异, 进而精准估计该政策作用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大小。具体模型如下:

$$AGTFP_{it} = \alpha_0 + \alpha_1 DID_{it} + \alpha_2 CON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AGTFP_{it}$ 是指在某一省份在 t 年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DID_{it} 为政策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CON_{it} 代指控制变量, α_0 作为常数项, α_1 和 α_2 则代表各个变量待估系数; μ_i 、 δ_t 、 ε_{it} 分别代表省份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随机干扰项。

2)中介模型

为了检验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其中的 M_{it} 为中介变量, 式 (3) 被用来评估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

$$M_{it} = \beta_0 + \beta_1 DID_{it} + \beta_2 CON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AGTFP_{it} = \rho_0 + \rho_1 M_{it} + \rho_2 DID_{it} + \rho_3 CON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4.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该变量是指在农业生产投入保持固定的情形下, 同步追求产出增长与环境损耗降低, 所体现出的综合生产效率。它与其他全要素生产率不同的是其包括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所得到的生产效率指标^[17]。在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 本文采用了超效率 $SBM-GML$ 模型。投入与产出指标的设定参考杨玉秀 (2023) 和李谷成 (2019) 的研究, 投入指标包括农业劳动投入、农用地投入、农机投入、农药投入、农用化肥投入、农用塑料薄膜投入、农业用水投入, 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分别为农业总产值和农业碳排放^[18-19]。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AGTFP$ 的投入和产出指标

指标类型	变量名	评价指标	单位
投入指标	劳动力投入	种植业从业人员	万人
	农用地投入	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千 hm ²
	农机投入	农业机械总动力	亿 KW · h
	农药投入	农药使用量	万 t
	农用化肥投入	农用化肥 (折纯) 使用量	万 t
	农膜投入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万 t
	农业用水投入	有效灌溉面积	千 hm ²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以 2011 年为基期的农业总产值	亿元
	非期望产出	农业碳排放总量	万 t

2)解释变量:关键解释变量为交互项 DID , 它由政策虚拟变量 $treat$ 和时间虚拟变量 $post$ 相乘构成。 $treat$ 依据省份是否被选为试验区进行赋值, 实验组省份 $treat=1$, 对照组省份 $treat=0$ 。 $post$ 依据观测年份是否处于政策实施后赋值, 2017 年及以后年份 $post=1$, 2017 年之前年份 $post=0$ 。

3)控制变量:参考孙钰森与夏芳^[20]的研究, 选取农业结构($Stua$)、城镇化水平($Urban$)、财政支农力度($Infin$)、人均耕种面积($Labor$)、受教育程度(Edu)和农业机械化水平(Ma)作为控制变量。农业结构选取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面积的比值表示; 城镇化水平选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财政支农力度选取涉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表示; 人均耕种面积选取耕地面积与农业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表示; 受教育程度选取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农业机械化水平选取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对数来表示。

4)中介变量:技术创新 (Gt), 根据前文的分析,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不但经由传统信贷渠道支持绿色项目, 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优化金融生态, 降低绿色技术交易的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 激活区域性技术市场活跃度, 从而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来表示技术市场活跃度。人力资本 (Hg) 的提升, 在绿色金融在促进农业绿色转型中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其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新农人”,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 采用农林牧渔增加值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4.3 数据来源

选取 2011—2023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相关数据(港澳台数据不计算入内)开展描述性统计分析, 所有原始数据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 2。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GTFP	403	0.816	0.269	0.313	0.773	1.337
Hg	403	5.040	1.166	2.187	5.387	6.599
Gt	403	4.923	2.121	-3.219	5.016	9.052
Stru	403	0.659	0.147	0.355	0.664	0.971
Infin	403	11.460	3.439	3.870	11.439	20.384
Edu	403	7.709	0.828	3.804	7.844	10.065
Urban	403	0.597	0.129	0.230	0.590	0.900
Ma	403	7.650	1.138	4.543	7.850	9.499
Labor	403	4.979	0.677	3.687	4.916	6.873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借助双重差分模型, 评估绿色金融政策如何影响各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准回归结果呈现在表 3 中, 该回归模型已纳入个体固定效应以及时间固定效应。模型(1)未加入控制变量, 显示对于未设立试验区的省份, 含试验区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0.100, 在 1%水平上显著; 模型(2)为纳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同时引入双向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其回归系数仍为正且为 0.117, 并在 1%水平上显著。由此可知, 受影响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 0.117。该结果表明, 该政策的落地执行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贡献, 假设 1 得到支持。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AGTFP	(2) AGTFP
Did	0.100*** (3.81)	0.117*** (3.99)
Stru		1.260*** (4.04)
Infin		0.005 (0.95)
Edu		-0.081** (-2.06)
Urban		0.933** (2.02)
Lnma		-0.167*** (-4.10)
Lnlabor		0.075 (1.51)
Constant	0.807*** (134.59)	0.894 (1.61)
Observations	403	403
R-squared	0.857	0.883

注: ***, **, * 分别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下同

5.2 平衡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方法须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即在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正式设立之前, 试验区省份与非试验区省份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应表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由于涉及的年份较多, 本文构建政策实施的前三年、实施年份(2017 年)以及实施后四年后的年份虚拟变量与对应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 在政策实施前三年所对应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观察期内试验区与非试验区的发展动态

并未偏离平衡趋势假设。随着政策落地，回归系数全部表现为显著的正向数值，这与平行趋势假设所预期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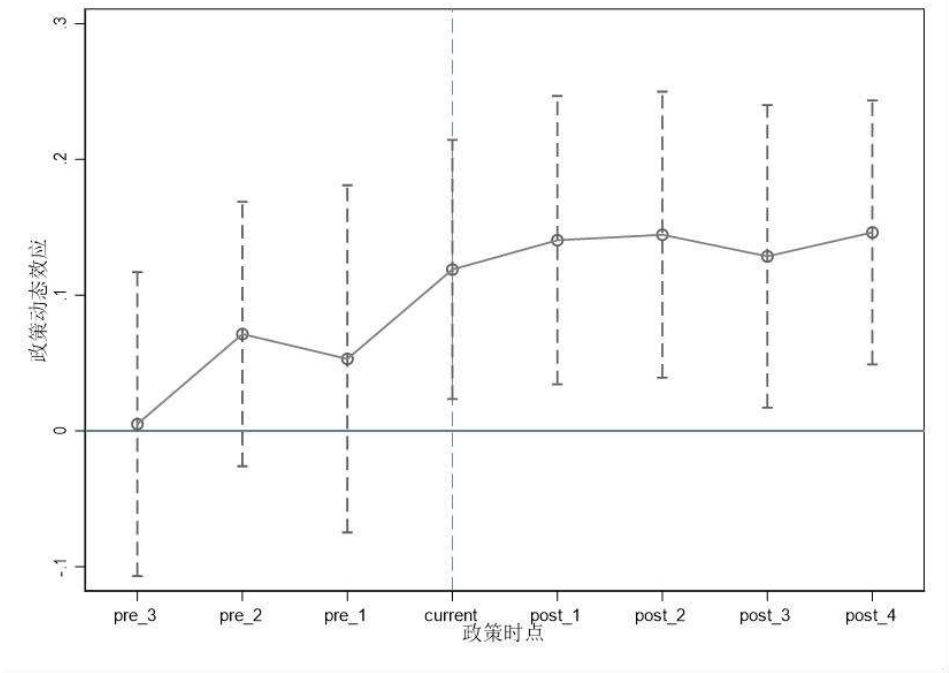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衡趋势检验

5.3 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全样本中随机设定虚拟处理组并构造交互项，重复操作 500 次。根据 500 次抽样结果绘制系数分布图，如图 2 所示。图中显示，虚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主要集中在零值附近，分布近似正态，且绝大多数 P 值大于 0.1。这一结果表明，未观测到的偶然事件不太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干扰，基本可以排除其他未知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1 的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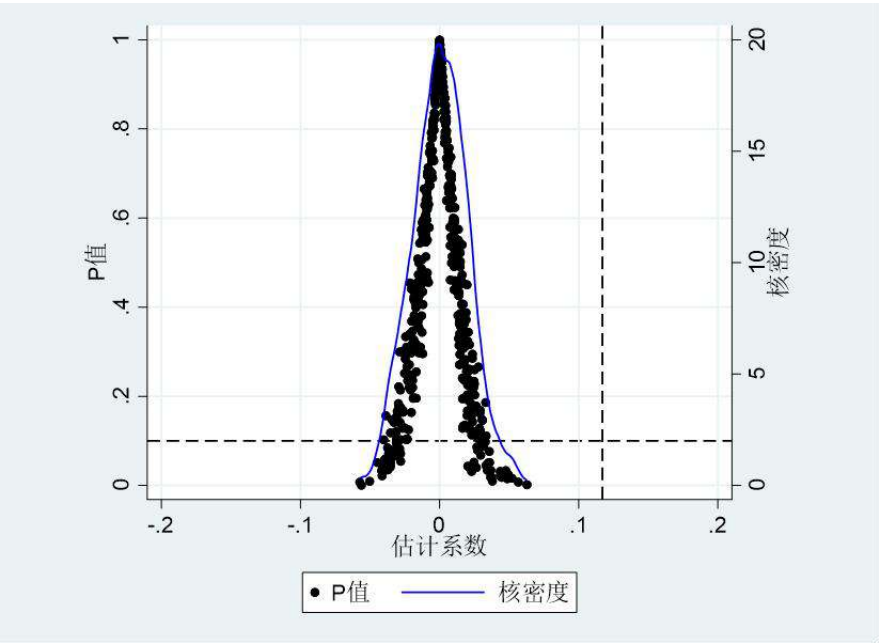


图 2 安慰剂检验

2)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

本文的研究中,使用 SBM-GML 模型测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确保结论不依赖于特定的效率测算模型,我们采用另外一种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EBM-GML 模型重新测算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其作为被解释变量重复基准回归。EBM-GML 模型可以有效避免由于生产函数方程设定导致的偏误。如表 5 列(1)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系数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其系数为 0.080 与原回归系数大小接近。这说明不同的测算方法的变化不会影响到本文的实证结果,证实了本文的基准回归具有高度的稳健性。

3) 缩短时间窗口检验

由于样本时间跨度较长,为了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实行前后三年(2014-2020 年)为样本,同时控制时间与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下表 5 列(2)可知,交互性的估计系数为 0.113,在 1%水平上显著且与基准回归的符号方向一致。由此可知,该检验再次证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依然发挥正向作用,为假设 H1 的稳健性提供了支撑。

4) 考虑同期其他政策的影响

由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并非唯一作用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外部因素,其他政策同样可能对该变量造成扰动,因此要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核心代表^[21],能够有效促进碳排放效率,从而影响到回归结果。所以我们构建新的虚拟变量 Did_new (若该省份在当年有碳交易试点则取 1,否则取 0),在基准模型中控制了该政策的影响。表 4 列(3)结果显示,在控制碳交易政策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系数与基准结果相比保持稳定且依然显著。这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既显著又可靠稳健。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Did	0.080*** (3.88)	0.113*** (3.21)	0.115*** (4.02)
Did_new			0.078* (1.8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Constant	-0.317 (-0.57)	2.445*** (3.08)	0.669 (1.14)
省份FE	YES	YES	YES
时间FE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403	248	403
R-squared	0.862	0.919	0.884

5.4 异质性分析

1) 粮食资源禀赋的异质性

由于各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可能会导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异质性。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总产值超全国 70%,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占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22]。因此,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粮食主产区组、非粮食主产区组,再一次开展实证研究。表 5 列 (1) 和 (2) 可知,试验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显著分化,非粮食主产区显在 1%水平上显著,其系数为 0.135。这是因为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结构更多元,更易于转向生态农业、特色农产品等绿色高附加值业态,与绿色金融的支持能形成更有效的协同。而在粮食主产地区,其对该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绿色金融政策提供的市场激励,可能尚不足以完全对冲主体对减产风险的顾虑。其次,从路径依赖看,主产区已形成以高产为导向的、高度依赖化肥农药的集约化生产体系,其转型的沉没成本和制度惯性更大。

表 5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非粮食主产区	(2) 粮食主产区	(3) 水资源紧张	(4) 水资源丰沛
Did	0.135*** (3.51)	0.003 (0.13)	0.010 (0.27)	0.144*** (3.6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634 (0.82)	1.324*** (2.75)	1.522** (2.17)	-0.035 (-0.03)
省份FE	YES	YES	YES	YES
时间FE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34	169	201	199
R-squared	0.843	0.943	0.923	0.864

2) 农业水资源的异质性

水资源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丰水地区和缺水地区在用水成本和技术选择上会有所不同。不同水资源禀赋条件下，农业主体对绿色技术的接受意愿、资金需求以及政策反应也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差异。由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受到水资源状况的影响，比较绿色金融政策在丰水和缺水地区的效果差异，有助于弄清楚政策在什么条件下更有效，也能为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参考。选取人均水资源量作为农业水资源的代理变量，计算各省的年均人均水资源值并进行排序。依据中位数将各省分为两组：高于中位数的为水资源丰沛组，低于中位数的为水资源紧张组。下表 5 列 (3) 和 (4) 可知，在供水条件充裕的地区，政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水资源紧张地区则不显著。这个结果说明政策效果存在条件依赖。在水资源紧张的地区，虽然对绿色技术有现实需求，但往往面临更高的技术应用门槛、更强的风险规避倾向，以及相对薄弱的技术推广体系。单靠绿色金融政策，很难在短时间内突破这些限制。相比之下，水资源丰沛地区的基础条件更完善，政策效果也更容易发挥出来。因此，在缺水地区推行绿色金融政策时，最好结合水利设施建设、节水技术推广和农业保险等手段，通过协同发力来提升政策效果。

5.5 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试验区政策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本文以技术进步 (Gt) 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既有文献常采用专利申请数或专利授权数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但其难以直接展示技术商业化与扩散，难以成为纸面创新转化为市场应用的直接证据。参考马海良与杨清^[23]的做法，本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 (万亿元) 来衡量技术进步，其可以更为直观的展示出技术的应用推广情况。表 6 列(1)和列 (2) 可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和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097 和 0.037,且该试验区政策系数小于直接影响系数,说明存在中介效应。最后，因此，该试验区的发展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并应用于农业生产中，提升各省技术市场成交额，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使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

对于人力资本 (Hg)，本文使用农林牧渔增加值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比值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它衡量的是单位人力资本存量的经济产出效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反映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单位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率可以体现出人力资本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度。下表 6 列(3)和 (4) 可见，18.722 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并且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和人力资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107 和 0.001,表明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存在。绿色金融政策设立专项信贷、聚集资金，并高效流转至绿色农业项目倾斜，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源，缓解农村生产建设资金散、资金少、资金链断裂等问题^[24]。这带来了两方面影响：其一，直接激励了农业经营主体，增加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和雇佣；其二，其改善了农业行业的整体预期收益，为绿色农业专业人才提供资金支持与物质激励，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表 6 中介检验结果

变量	(1) Gt	(2) AGTFP	(3) Hg	(4) AGTFP
Did	0.550*** (4.19)	0.097*** (3.56)	18.722* (1.90)	0.107*** (3.94)
Gt		0.037*** (3.28)		
Hg				0.001** (2.5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034 (0.01)	0.893 (1.64)	-364.322*** (-2.64)	1.076* (1.92)
省份FE	YES	YES	YES	YES
时间FE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403	403	403	403
R-squared	0.928	0.889	0.971	0.886

6. 结论和建议

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而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则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其中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两个重要的中介渠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进一步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因地制宜推广成熟经验。相关部门可稳步扩大试验区覆盖面，持续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第二，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与支持力度，着力促进技术成果转化。政府加大对农业绿色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金融支持，设立农业绿色技术风险补偿基金，鼓励金融机构为绿色专利产业化，加快建设区域性农业技术交易市场，降低技术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促进绿色技术的市场化扩散。第三，强化人力资本积累，释放绿色金融的“人才红利”。针对绿色农业生产、绿色金融产品应用、碳汇核算等新兴领域，教育部门可以开设专项培训课程，系统提升农业从业者的绿色生产技能和金融素养；同时，鼓励地方政府设立绿色农业人才引进专项补贴，吸引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等群体投身绿色农业，为农业绿色转型注入新鲜血液。

参考文献：

- [1]黄小勇,陈飞羽,查育新.绿色金融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于全国百强县数据的实证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06):27-39.
- [2]谭显春,高瑾昕,曾桢,等.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评估[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3,19(02):213-226.
- [3]李晓康.绿色金融政策改善我国制造企业环境绩效——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试验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5,(17):74-76.
- [4]范德成,张修凡.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对高排放企业碳减排的效果分析[J].工程管理科技前沿,2022,41(04):55-61.
- [5]郭希宇.绿色金融助推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J].南方金融,2022,(01):52-67.
- [6]王晶晶,周发明,刘忠秀.农旅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门槛效应的检验[J].经济地理,2025,45(06):161-172.
- [7]OH D H. A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ex [J] .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10, 34(3): 183-197.
- [8]周伊佳,陈军.农业数字化、数据要素配置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数据价值链视角[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5,46(11):167-184.
- [9]马国群,谭砚文.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1,(05):77-92.

- [10]Gujie L., Xiaoman J., Ahmad A.K. Does Green Finance Promote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onsidering Green Credit, Green Investment, Green Securities, and Carbon Finance in China.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22, (13) .
- [11]官豪,耿莹斐,王江晨,等.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中国农机化学报,2025,46(05):343-352.
- [12]李彩平.绿色金融、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江西社会科学,2025,45(10):57-70.
- [13]马骏,孟海波,邵丹青,等.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与绿色农业发展[J].金融论坛,2021,26(03):3-8+20.
- [14]缪佳怡,李俊汝,储文沛,等.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商展经济,2026,(01):123-129.
- [15]王思敏,王金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变迁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J].科技管理研究,2025,45(16):172-184.
- [16]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17(04):1557-1580.
- [17]金绍荣,任赞杰,慕天媛.农业保险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基于中国 2007-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44(04):134-143.
- [18]李谷成.中国农业的绿色生产率革命:1978—2008 年[J].经济学(季刊),2014,13(02):537-558.
- [19]杨秀玉,全锦涛.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农业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44(11):15-27.
- [20]孙钰森,夏芳.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5,19(06):35-44.
- [21]范丹,付嘉为,王维国.碳排放权交易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2,42(03):591-603.
- [22]开丽曼·帕尔哈提,穆哈拜提·帕热提,陈远卓.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保障水平评价及障碍因子研究——基于熵权 TOPSIS 法[J].中国农机化学报,2026,47(04):268-275.
- [23]马海良,杨清.绿色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OL].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1-16[2026-04-13].<https://link.cnki.net/urlid/11.3513.s.20251125.0945.004>.
- [24]周肖肖,贾梦雨,赵鑫.绿色金融助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博弈动态分析和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3,(06):43-61.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Policies in Green Finance Reform and Innovation Pilot Zones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Yuan Yi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Green finance is a key driver of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improving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GTFP) is the core pathway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0 Chinese provinces covering 2011–2023, this study employ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green finance reform and innovation pilot zone policy on AGTFP and its underlying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pilot zone policy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GTFP. In terms of its mechanism, the policy positively affects AGTFP by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hancing human capit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olicy's positive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in non-major grain-producing regions and areas with abundant water resources. Accordingly, we should 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reform and innovation pilot zones, focus o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strengthe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o achieve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green finance reform and innovation pilot zone policy;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基于线性规划的中国清洁能源投资配置优化研究

边曦悦, 王越舟, 奚梓嘉, 徐梁越

(杭州云谷学校, 杭州, 浙江 310013)

摘要: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结构转型背景下, 优化清洁能源投资配置对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 选取太阳能、水能、风能和核能四类主要清洁能源, 在统一装机容量标准下, 构建以新增清洁能源年发电量最大化为目标的线性规划模型。模型综合考虑单位装机年发电量、单位装机建设成本、总投资预算及最大新增装机规模等约束条件, 对清洁能源投资组合进行优化。在设定总投资预算为3200亿元的条件, 求得较优投资方案为: 太阳能投资1400亿元、水能160亿元、风能1000亿元、核能640亿元, 对应新增清洁能源年发电量约为1290.8亿千瓦时。结果表明, 太阳能与风能在投资组合中占据较大比重, 而水能与核能在能源结构稳定性方面发挥补充作用。本文所构建的模型能够为有限预算条件下的清洁能源投资决策提供定量参考, 对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清洁能源; 投资配置; 线性规划; 资源优化; 发电量最大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67

1 背景介绍

在过去几十年中, 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的大量燃烧, 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上升, 进而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 并引发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现象。这些问题表明,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重要任务^[1]。

在二氧化碳排放中, 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占有较高比例。因此, 要缓解全球气候问题, 就必须改变能源获取和使用方式, 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常见的清洁能源包括水能、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不同类型的清洁能源具有不同特点: 水能技术较为成熟, 发电成本较低, 且发电过程相对稳定, 但容易受到水文条件和生态环境的限制^[2-3]; 太阳能设备安装灵活, 适用范围较广, 但发电量受昼夜变化和天气条件影响较大; 风能适合规模化开发, 但风速具有不稳定性^[4], 对区域资源条件要求较高; 核能可以提供较为稳定的电力供应, 但初期建设成本较高, 建设周期较长, 并且对安全管理和选址条件要求较高。

对于中国而言, 推进清洁能源发展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 也是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现实需要^[5-6]。近年来, 我国清洁能源装机规模不断扩大, 太阳能、风能、水能和核能均在能源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 在清洁能源建设过程中, 资金投入、资源条件、建设场地、并网消纳能力和政策审批等因素都会对不同能源类型的发展规模形成约束。因此, 在有限投资预算下, 如何在不同清洁能源之间进行合理配置, 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决策问题。

从投资决策角度看, 不同清洁能源在单位建设成本和发电能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若仅从单一能源类型出发进行分析, 难以全面反映清洁能源投资组合的整体效率。相比之下, 将多种清洁能源同时纳入分析框架, 综合考虑建设成本、发电能力、预算约束和最大建设规模, 可以更好地刻画实际投资决策过程^[7]。基于此, 本文以中国清洁能源新增投资为研究对象, 选取太阳能、水能、风能和核能四类主要清洁能源, 建立预算约束下的投资配置优化模型, 探讨在有限资金条件下如何形成较优的清洁能源投资方案。

本文的研究重点并不是简单判断某一种清洁能源是否优于其他能源, 而是在总投资预算和建设规模限制下, 分析不同清洁能源之间的资金分配问题。通过构建数学规划模型, 可以将清洁能源投资问题转化为一个可计算、

作者简介: 边曦悦(2008—), 女, 高中, 杭州云谷学校;
王越舟(2008—), 男, 高中, 杭州云谷学校;
奚梓嘉(2009—), 女, 高中, 杭州云谷学校;
徐梁越(2009—), 男, 高中, 杭州云谷学校。

通讯作者: 边曦悦

可比较、可求解的优化问题，从而为清洁能源投资配置提供定量参考，并为后续清洁能源项目选择和投资决策提供模型支持。

2 研究准备

在建立模型之前，有必要先明确本文所研究的清洁能源投资配置问题，并分析其目标、变量和主要约束条件。基于问题特征，本文进一步选择合适的优化模型，为后续模型建立与求解奠定基础。

2.1 问题描述

在全球碳减排与能源结构转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清洁能源投资配置已成为能源政策和投资决策中的重要议题。由于不同类型清洁能源在建设成本、发电能力、资源条件及技术成熟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如何在有限资金条件下实现清洁能源的合理配置，已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

本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围绕太阳能、水能、风能和核能四类主要清洁能源展开研究。虽然天然气发电相较于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具有较低的碳排放强度，但其本质上仍属于化石能源，且我国天然气发电相关基础设施已相对完善。因此，本文不将天然气发电纳入本次优化分析范围，而重点关注太阳能、水能、风能和核能四类清洁能源的新增投资配置问题。

基于截至 2025 年的相关资料与参数设定，本文拟对 2026 年中国新增清洁能源投资方案进行规划，重点分析四类清洁能源在建设成本与发电能力方面的差异，探讨在固定预算和最大建设规模约束下如何进行合理配置，以形成较优的清洁能源投资组合方案，并为后续清洁能源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2.2 问题分析

2.2.1 研究目标

本文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在总投资预算既定的条件下，对太阳能、水能、风能和核能的投资组合进行优化，使新增清洁能源年发电量最大化。换言之，本文关注的并非单纯压缩投资总额，而是在有限资金约束下，通过合理配置不同类型清洁能源的投资规模，使既定预算能够产生尽可能高的清洁能源产出，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从经济含义上看，当总投资预算已经确定时，新增年发电量越高，说明该投资方案的资金配置效率越高。因此，本文以新增清洁能源年发电量作为衡量投资方案优劣的主要指标。

2.2.2 变量选择

本文以四类清洁能源的新增投资金额作为决策变量，用以刻画不同能源类型之间的资金配置方案。设 x_1, x_2, x_3, x_4 分别表示太阳能、水能、风能和核能的新增投资金额，单位为亿元。

之所以选择投资金额作为决策变量，是因为本文研究的是清洁能源投资配置问题，最终需要回答的是在总投资预算有限的条件下，各类能源分别应投入多少资金。与直接以新增电站数量作为变量相比，投资金额能够更直接地反映资金分配过程，也便于与总投资预算约束相衔接。

同时，本文引入单站建设成本、单站年发电量、总投资预算和最大建设规模等参数。其中，单站建设成本用于反映不同能源的投入差异，单站年发电量用于反映不同能源的产出能力，总投资预算用于刻画资金约束，最大建设规模则用于体现资源条件、建设场地、政策审批和并网能力等现实限制。

2.3 模型选择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总投资预算既定的条件下，对太阳能、水能、风能和核能四类清洁能源进行合理配置，使新增清洁能源年发电量最大化。该问题本质上属于典型的资源配置优化问题，即在资金有限、建设规模受限的条件下，确定不同能源之间的最优投资金额。

在线性规划模型中，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均可以表示为决策变量的线性关系^[8]。本文以四类清洁能源的新增投资金额作为决策变量，以新增清洁能源年发电量最大化为目标，并设置总投资预算约束、最大建设规模约束和非负约束。其中，投资金额反映不同能源之间的资金配置规模，新增年发电量反映投资方案的产出效果，而各类约束则分别体现资金限制与现实建设条件限制。

从模型结构看，各类能源的新增发电量可以表示为“单位投资发电能力与投资金额的乘积”，总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各类能源投资金额之和，最大建设规模约束也可以转化为投资金额的上限。因此，本文的目标函数及主要约束条件均可表示为关于投资金额的线性关系，适合采用线性规划模型进行求解。

与层次分析法、熵权法等主要用于评价与排序的方法相比，线性规划模型能够在给定约束条件下直接求解具体的投资配置方案，更符合本文“在有限预算下确定最优投资组合”的研究目标。

3 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3.1 变量与参数说明

为避免不同能源“单座电站”规模差异过大造成比较口径不一致,本文采用标准化装机容量口径,将四类清洁能源统一折算为 1GW 等效装机项目进行比较。设 $i = 1, 2, 3, 4$ 分别表示太阳能、水能、风能和核能。模型中的主要变量与参数如下:

符号	含义	单位
x_i	第 <i>i</i> 类清洁能源的新增投资金额	亿元
p_i	第 <i>i</i> 类能源每 1GW 装机容量的年发电量	亿千瓦时/GW·年
c_i	第 <i>i</i> 类能源建设 1GW 装机容量所需投资	亿元/GW
U_i	第 <i>i</i> 类能源最大新增装机容量	GW
B	新增清洁能源总投资预算	亿元
Z	四类清洁能源新增年发电量	亿千瓦时/年

本文采用的标准化模型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四类清洁能源标准化模型参数设定

能源类型	投资变量	年利用小时数	年发电量 p_i (亿千瓦时/GW·年)	建设成本 c_i (亿元/GW)	单位投资发电量 $\frac{p_i}{c_i}$
太阳能	x_1	1500	15	35	0.4286
水能	x_2	3500	35	100	0.35
风能	x_3	2500	25	60	0.4167
核能	x_4	7500	75	220	0.3409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自然资源公报》、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年景公报及清洁能源项目一般建设成本、年利用小时数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与估算^[2-4,6]。)为便于不同能源类型之间进行比较,本文将各类能源统一折算为 1GW 等效装机项目。 p_i 表示标准化项目年发电量, c_i 表示建设 1GW 等效装机容量所需投资。由于不同地区资源条件、项目规模和建设成本存在差异^[9],表中参数为模型简化设定,主要用于清洁能源投资配置优化分析。

在建设规模方面,本文结合资源条件、建设周期、政策审批和并网能力等因素,设置四类能源在规划期内的最大新增装机容量,如表 2 所示。

表 2 四类清洁能源最大新增装机规模设定

能源类型	最大新增装机容量 U_i (GW)	最大可投资金额 $c_i U_i$ (亿元)
太阳能	40	1400
水能	5	500
风能	30	1800
核能	10	2200

最大新增装机容量用于反映不同能源在资源条件、建设场地、技术条件、建设周期、政策审批和并网能力等方面的现实限制。实际应用中可根据最新规划和项目数据进行修正。

3.2 线性规划模型的建立

本文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在总投资预算既定的条件下,合理分配太阳能、水能、风能和核能四类能源的投资金额,使新增清洁能源年发电量最大化。

若第 i 类能源的投资金额为 x_i ,建设 1GW 装机容量需要 c_i 亿元,则可新增装机容量为: $\frac{x_i}{c_i}$,若第 i 类能源每

1GW 装机容量的年发电量为 p_i ，则该类能源对应的新增年发电量为： $\frac{x_i}{c_i} p_i$ ，即 $\frac{p_i}{c_i} x_i$ 。其中 $\frac{p_i}{c_i}$ 表示第 i 类能源单位投资所能带来的年发电量。

因此，四类清洁能源的新增年发电量总和为：

$$Z = \sum_{i=1}^4 \frac{p_i}{c_i} x_i$$

由此建立目标函数：

$$\text{Max } Z = \sum_{i=1}^4 \frac{p_i}{c_i} x_i$$

该目标函数的经济含义是：在总投资预算既定的前提下，通过优化不同清洁能源之间的资金配置，使有限投资能够带来尽可能高的清洁能源发电产出。

虽然目标函数中包含 $\frac{p_i}{c_i}$ 的分式形式，但 p_i 和 c_i 均为已知参数，因此 $\frac{p_i}{c_i}$ 是常数系数，目标函数本质上是关于投资变量 x_i 的线性函数。因此，本文建立的是线性规划模型。

将表 1 中参数代入目标函数后，可得： $\text{Max } Z = \frac{15}{35} x_1 + \frac{35}{100} x_2 + \frac{25}{60} x_3 + \frac{75}{220} x_4$ 。

在约束条件方面，首先，四类清洁能源的新增投资总额不能超过既定预算，因此有预算约束： $\sum_{i=1}^4 x_i \leq B$

本文设定总投资预算为 3200 亿元，因此可写为：

$$x_1 + x_2 + x_3 + x_4 \leq 3200$$

其次，各类清洁能源的新增规模不能超过其最大新增装机容量。设第 i 类能源最大新增装机容量为 U_i ，则有： $\frac{x_i}{c_i} \leq U_i$ ，进一步可以写成 $x_i \leq c_i U_i$ ， $i = 1, 2, 3, 4$ 。

根据表 2，具体可写为： $x_1 \leq 1400$ ， $x_2 \leq 500$ ， $x_3 \leq 1800$ ， $x_4 \leq 2200$ 。

再次，若仅以新增年发电量最大化为目标，模型可能会优先选择单位投资发电量较高的能源类型，导致投资过度集中。考虑到现实中的清洁能源投资不仅要关注发电效率，还需要兼顾能源结构多元化和电力供应稳定性，本文进一步加入能源结构约束。鉴于水能具有一定调节能力、核能够提供较稳定的基荷电力，本文设定水能投资不低于总投资预算的 5%，核能投资不低于总投资预算的 20%。即： $x_2 \geq 0.05B$ ， $x_4 \geq 0.20B$ 。

当 $B = 3200$ 时，上述约束可写为： $x_2 \geq 160$ ， $x_4 \geq 640$ 。

最后，由于各类能源的投资金额不能为负，因此有： $x_i \geq 0, i = 1, 2, 3, 4$ 。

综上，本文建立的清洁能源投资配置线性规划模型为：

$$\begin{aligned} \text{Max } Z &= 0.4286x_1 + 0.3500x_2 + 0.4167x_3 + 0.3409x_4 \\ \text{s.t. } \begin{cases} x_1 + x_2 + x_3 + x_4 \leq 3200 \\ 0 \leq x_1 \leq 1400 \\ 160 \leq x_2 \leq 500 \\ 0 \leq x_3 \leq 1800 \\ 640 \leq x_4 \leq 2200 \end{cases} \end{aligned}$$

该模型的目标函数与全部约束条件均为关于决策变量 x_1, x_2, x_3, x_4 的一次表达式。

3.3 模型求解方法与实现

本文建立的清洁能源投资配置模型属于标准线性规划问题。在线性规划理论中，此类问题通常可采用单纯形法等优化算法进行求解；在具体实现中，本文借助 WPS 表格中的规划求解工具完成模型计算，以提高求解效率并增强结果的可操作性。

为更清晰地展示模型求解过程，本文将其概括为“参数输入—模型建立—约束设置—规划求解—结果检验”五个主要环节，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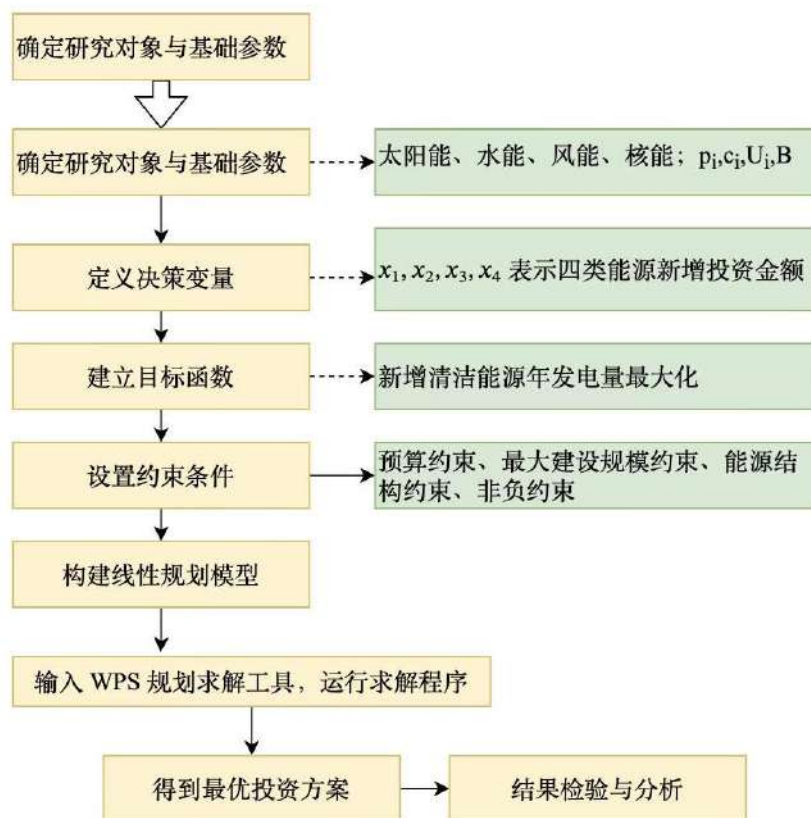


图1 清洁能源投资配置模型求解流程图

通过上述流程, 本文将清洁能源投资配置问题转化为可计算的线性规划问题, 并利用 WPS 规划求解工具完成模型求解, 从而得到有限预算条件下的综合配置型投资方案。

3.4 模型求解结果与分析

在总投资预算为 3200 亿元, 并考虑最大新增装机规模和能源结构约束的条件下, 通过线性规划模型求解得到基准模型的最优投资方案, 如表 3 所示。

表3 清洁能源最优投资方案

能源类型	投资金额 (亿元)	投资占比	新增装机容量 (GW)	新增年发电量 (亿千瓦时)
太阳能	1400	43.75%	40	600
水能	160	5.00%	1.6	56
风能	1000	31.25%	16.67	416.7
核能	640	20.00%	2.91	218.2
合计	3200	100.00%	—	1290.8

由表 3 可知, 在基准参数和约束条件下, 太阳能投资金额最高, 为 1400 亿元, 占总投资预算的 43.75%; 风能投资金额为 1000 亿元, 占比 31.25%; 核能投资金额为 640 亿元, 占比 20.00%; 水能投资金额为 160 亿元, 占比 5.00%。该投资方案预计新增清洁能源年发电量为 1290.8 亿千瓦时。

从投资结构看, 太阳能和风能具有较高的单位投资发电能力, 因此在模型中获得较高投资比重。其中, 太阳能达到最大新增装机容量约束, 说明在本文参数设定下, 太阳能具有较高的投资效率, 但其发展规模受到建设上限限制。风能作为单位投资发电能力较高的能源类型, 在太阳能达到上限后成为重要的资金配置方向。水能和核能虽然单位投资发电能力相对较低, 但水能具有一定调节能力, 核能够提供较稳定的基荷电力, 因此本文通过能源结构约束保留其必要投资规模。

从预算使用情况看, 四类能源投资金额合计为 3200 亿元, 说明总投资预算被完全使用, 预算约束为有效约

束。从模型结果看, 本文得到的方案并不是单纯追求某一种能源的最大化投资, 而是在发电效率、建设规模限制和能源结构多元化之间形成了较为均衡的综合配置方案。

本文结果是在既定参数和约束条件下得到的模型求解结果, 并不意味着该方案可以直接等同于现实中的最终投资决策。实际清洁能源项目还会受到建设周期、运维成本、电网消纳能力、储能配套、安全管理和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因此, 本文结果主要用于说明在给定参数条件下, 不同清洁能源投资配置的优化思路和计算方法。

3.5 敏感性分析

为检验模型结果对关键参数变化的稳定性, 本文在基准模型求解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并不改变模型结构, 而是在保持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形式不变的前提下, 对总投资预算、单位装机建设成本、单位装机年发电量和最大新增装机规模等参数进行调整, 并分别重新求解模型。通过比较不同参数设定下的最优投资金额和新增年发电量, 可以分析清洁能源投资方案对外部条件变化的响应情况。

本文设置以下几类敏感性分析情景如表 4。

表 4 敏感性分析参数设置

情景	分析内容	参数变化
S0 基准情景	原始参数设定	B, p_i, c_i, U_i 均保持原始值
S1 预算收紧情景	考察资金规模下降影响	$B = 2800$ 亿元
S2 预算扩张情景	考察资金规模上升影响	$B = 3600$ 亿元
S3 成本上升情景	考察建设成本上升影响	c_i 在基准值基础上上升 10%
S4 发电能力提升情景	考察技术效率提升影响	p_i 在基准值基础上上升 10%
S5 建设规模收紧情景	考察资源和场地约束变化影响	U_i 在基准值基础上下降 10%

每一类情景下, 本文保持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形式不变, 仅调整对应参数, 并利用线性规划方法重新计算最优投资方案。不同情景下的求解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不同情景下最优投资方案比较

情景	太阳能投资 (亿元)	水能投资 (亿元)	风能投资 (亿元)	核能投资 (亿元)	新增年发电量 (亿千瓦时)
S0 基准情景	1400	160	1000	640	1290.8
S1 预算收紧	1400	140	700	560	1131.6
S2 预算扩张	1400	180	1300	720	1450.1
S3 成本上升	1540	160	860	640	1175
S4 发电能力提升	1400	160	1000	640	1419.9
S5 建设规模收紧	1260	160	1140	640	1289.2

由表 5 可知, 当总投资预算由 3200 亿元下降至 2800 亿元时, 新增年发电量下降至 1131.6 亿千瓦时; 当总投资预算上升至 3600 亿元时, 新增年发电量提高至 1450.1 亿千瓦时。这说明总投资预算对清洁能源发电产出具有直接影响。在预算变化情景下, 太阳能由于受到最大新增装机规模限制, 投资金额保持在上限附近, 新增资金或减少资金主要体现在风能、水能和核能投资变化上。

在建设成本上升情景下, 四类能源单位装机建设成本均上升 10%, 新增年发电量下降至 1175.0 亿千瓦时。需要注意的是, 此时太阳能投资金额由 1400 亿元上升至 1540 亿元, 并不意味着模型对太阳能的偏好增强, 而是

因为在建设成本上升后,达到同样 40GW 最大新增装机容量需要投入更多资金。由于总预算保持不变,风能投资金额相应下降,最终导致总发电量下降。

在发电能力提升情景下,四类能源单位装机年发电量均提高 10%,模型的投资结构保持不变,但新增年发电量提高至 1419.9 亿千瓦时。这说明当各类能源发电能力同比例提升时,最优投资结构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但总体发电产出会显著增加。

在建设规模收紧情景下,各类能源最大新增装机容量下降 10%。由于太阳能最大可投资金额下降,部分投资转向风能,新增年发电量略有下降。该结果说明,在清洁能源建设过程中,资源条件、建设场地和并网能力等因素会影响投资配置结构。整体来看,敏感性分析表明,本文模型能够反映预算、成本、发电能力和建设规模变化对清洁能源投资方案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分析解释能力。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中国清洁能源新增投资配置问题为研究对象,选取太阳能、水能、风能和核能四类主要清洁能源,在统一标准化装机容量口径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单位装机年发电量、单位装机建设成本、总投资预算、最大新增装机规模以及能源结构约束等因素,建立了以新增清洁能源年发电量最大化为目标的线性规划模型。通过将清洁能源投资配置问题转化为数学优化问题,本文实现了对有限预算条件下投资方案的定量分析。

在基准情景下,本文设定总投资预算为 3200 亿元,并结合最大新增装机规模和能源结构约束,对模型进行求解。结果表明,较优投资方案为:太阳能投资 1400 亿元,水能投资 160 亿元,风能投资 1000 亿元,核能投资 640 亿元,预计新增清洁能源年发电量为 1290.8 亿千瓦时。从投资结构看,太阳能和风能由于单位投资发电能力较高,在投资组合中占据较大比重;同时,考虑到水能在调节能力方面的作用以及核能在稳定供电方面的重要性,模型通过能源结构约束保留了其必要投资规模,从而形成了兼顾发电效率与能源结构多元化的综合配置方案。

进一步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模型结果对关键参数变化具有较明显响应。总投资预算增加时,新增年发电量相应提高;建设成本上升会降低单位投资的发电产出效率,从而压缩整体发电能力;发电能力提升则有助于提高总发电量;最大新增装机规模收紧会改变不同能源之间的资金配置结构。上述结果说明,清洁能源投资决策不仅受到预算规模影响,还与建设成本、技术水平、资源条件和现实建设约束密切相关。

总体来看,本文建立的线性规划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有限预算下清洁能源投资配置的基本逻辑,为不同能源类型之间的资金分配提供了一个可量化、可比较、可求解的分析框架。

4.2 不足与展望

本文模型对清洁能源投资配置问题进行了简化分析,主要考虑了单位装机建设成本、单位装机年发电量、总投资预算和最大新增装机规模等因素,但尚未进一步纳入运维成本、建设周期、电网消纳能力、储能配套以及碳减排效益等现实因素。因此,本文结果更适合作为一种定量分析参考,而不能直接等同于现实中的最终投资决策。

此外,本文参数采用标准化设定,不同地区和不同项目之间的实际差异未能充分体现。后续研究可结合更详细的项目数据和政策规划,对参数进行修正和完善。

未来可在本文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更多约束条件或采用多目标优化方法,使模型更加贴近实际清洁能源投资决策过程。

参考文献

- [1]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State of the Global Climate 2024: WMO-No. 1368[R/OL]. Geneva: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2025[2025-07-16]. https://wmo.int/sites/default/files/2025-03/WMO-1368-2024_en.pdf.
- [2] 王仕超,李鹏,朱俊,等.中国大中型水库多尺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J].水力发电学报,2024,43(9):47-58.
- [3] KARAKOYUN Y. Determination of effective parameters for hydropower plants' energy generation: A case study[J]. Applied Sciences, 2024, 14(5):2069.
- [4]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中心.中国风能太阳能资源年景公报:2021[R].北京:中国气象局,2022.
- [5] HAN J, CHANG H. Development and opportunities of clean energy in China[J]. Applied Sciences, 2022, 12(9):4783.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2024 中国自然资源公报[R/OL].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2025[2025-07-16].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503/t20250314_2881925.html.

- [7] WANG E Z, LEE C C. The impact of clean energy consump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 curse or a blessing?[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2, 77:39-58.
- [8] 胡运权, 郭耀煌. 运筹学教程[M]. 第5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 [9] DINCER I, ACAR C. A review on clean energy solutions for better sustainabil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Research*, 2015, 39:585-606.

Optimal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Allocation in China: A Linear Programming Approach

Xiyue Bian, Yuezhou Wang, Liangyue Xu, Zijia Xi
(Hangzhou Yungu School,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Using China as the research context, this paper selects four major types of clean energy—solar power, hydropower, wind power, and nuclear power—and constructs a linear programming model under a unified installed-capacity standard, with the objective of maximizing the annual power generation from newly added clean energy capacity. The model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constraints such as annual power generation per unit of installed capacity, construction cost per unit of installed capacity, total investment budget, and maximum newly added installed capacity, so as to optimize the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portfolio.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a total investment budget of CNY 320 billion, the optimized investment allocation is obtained as follows: CNY 140 billion for solar power, CNY 16 billion for hydropower, CNY 100 billion for wind power, and CNY 64 billion for nuclear power, corresponding to an additional annual clean energy generation of approximately 129.08 billion kWh.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lar power and wind power account for relatively large proportions in the investment portfolio, while hydropower and nuclear power play complementary roles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The proposed model provides a quantitative reference for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under budget constraints and offer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optimizing the energy structure.

Keywords: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allocation; linear programming; resource optimization; power generation maximization

权力：一种支配关系还是行为能力 ——当代权力概念研究的核心争论

郭力

(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摘要：“关系说”与“能力说”之争是当代权力概念研究的核心争论。“关系说”(power over)将权力视为某一行为者对另一个行为者的支配关系，而“能力说”(power to)则将权力看作行为者实现其目标的行为能力，并不必然涉及对其他行为者的支配。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并分析这一核心争论。首先从汉娜·皮特金的权力二元辩论开始，追溯这一争论的思想史脉络，之后重点考察当代西方学界围绕“关系说”(power over)与“能力说”(power to)而展开的争论，从中发现，这场争论已经实现从非此即彼转向认识论层面的辩证统一。因此，本文认为权力的“关系说”与“能力说”并不是互斥的对立观点，而是同一权力现象两个维度的分析，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理解复杂权力现象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权力概念；关系说；能力说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66

引言

权力是政治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言：“在社会科学中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中力是基本概念一样。”[1]人们因而对权力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研究，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探讨“谁应该统治”[2]，到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的“主权利力”[3]，再到当代哲学家迈克尔·福柯所阐述的“规训权力”[4]，他们都将权力置于其思想的重要位置。

然而，尽管学界一致认同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但对于“什么是权力”这一概念性问题却争论多年，始终未能形成共识，正如艾萨克所说的，“理论家们使用同一术语，但所指的意思却截然不同”。[5]观察发现，理论家们之所以对权力概念未达一致，是因为其对于权力的本质有着不同理解，其中最为核心的争论之一，便是将权力视为一种行动能力还是一种支配关系。本文将聚焦于这一核心争论，系统探讨权力的“能力说”(power to)与“关系说”(power over)的源起、发展与深化。

本文认为，能力说与关系说的争论并非简单的彼此对立，其争论演进是通过对二者的区分来实现对权力更为周全的解释，即从区分到整合、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辩证过程。本研究旨在分析两种学说各自的贡献与局限，并探索其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为理解权力概念这个元理论问题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基础。

一、争论的缘起：皮特金的奠基性辨析

对当代权力概念争论的考察，要从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的开创性工作开始。她提出“能力说”与“关系说”的标签，为后来的这一分野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皮特金观察到，学者们在讨论权力之时，往往是在不同的意义上来对这一概念进行使用的。因此有关权力的讨论就陷入了一种混乱，这种混乱的根源在于对权力概念本身的理解存在根本性的分歧。[6]她将这种分歧概括为“能力说”与“关系说”的对立。[5]

一方面，权力被理解作为一种能力，是能够被行动者所拥有而不一定行使的某种东西，与其财富、知识或地位等密切相关。这种理解将权力视为一种资源，像是一种能够被物化的、占有的某种实物。在这一视角之下，能够占有这种资源的人便拥有权力，一个人占有的资源越多、数量越大，其权力越大，因而权力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谁拥有权力？”以及“谁拥有的权力大”。这种“能力说”的理解在早期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米尔斯所提出的“寡头政治铁律”[7]即“无论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社会权力都不可避免的集中在少数精英的手中”

作者简介：郭力(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7]。其对权力的核心关注点是社会权力在谁手中，他用“旋转门”来说明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三大领域的顶层位置的人拥有权力，因为他们能够决策最重要的事物。同样，达尔在纽黑文市的研究中，核心议题仍然是“谁统治”即谁拥有权力。与精英主义不同的是其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来说明权力是多元分布的，他选取了政治提名、城市重建、公共教育这三个关键领域，考察不同行为体在不同领域中所“拥有”的资源差异，最后得出结论，许多不同的人群能够获取不同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以及运用这些资源的个人，并非全部听命于或隶属于某个单一的控制中心，权力的分配虽然远非完全平等，但却被广泛地分散了。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分歧在于权力的分配状况，而其共同点在于都将权力作为一种可以“拥有”的属性。

另一方面，权力被理解为一种关系，是行动者之间的一种互动模式，只有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关系中才能体现，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和互动中，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无法被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方的属性。比如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并不是拥有某种权力的人，但当这个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开始用财富雇佣劳动，其才拥有权力，而其巨额财富才能成为其权力基础。这种“关系说”的视角将权力从行动者拥有的某种属性转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模式。韦伯的权力概念就蕴含了这一视角，其认为“权力意味着在社会关系中，某个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无论这种地位的基础是什么。”[8]同样的，巴克拉奇和巴拉兹的二维权力观，以及卢克斯的三维权力观都是在这一关系说框架内的深化。

在此基础上，皮特金进一步探讨了权力的“拥有”与“行使”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行动者拥有权力并不意味着只有在行使的时候才拥有，权力也可以作为一种潜在资源而存在，类似于国王即使不发布命令，也拥有权力。这种对于权力“拥有”与“行使”的区分，揭示了权力既可以是一种属性又存在于关系中。皮特金对权力的两个方面进行区分的同时又没有将两种对于权力的理解对立起来，而是试图通过精妙的辨析来调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她指出，权力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发生的，将权力仅仅视为一种属性或能力，会掩盖权力的关系性本质。而如果仅仅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又会忽视存在于制度、传统和人们预期中的潜在权力。[6]她既承认权力具有某种可以被“拥有”的维度，又坚持这种“拥有”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情境中才有意义，并最终需要通过“行使”来确认和实现。皮特金不仅为之后学界对于“能力说”与“关系说”的区分提供了概念基础，更重要的是，她以辩证的视角提供了一种将两种原本对立的观念相互整合的可能性。

二、争论的发展：从概念区分到二元对峙

在皮特金之后，学界有关权力本质的争论沿着两条路径发展。其中一条是继续对强化“能力说”与“关系说”之间的区别，并试图将其发展成两个独立的概念体系。另一条则是在区分二者的同时，着重探讨二者具有相容性还是兼容性。

（一）能力说与关系说的理论建构

“能力说”（power to）主张权力是行为者实现自身目标的一种能力，其核心在于“能够通过做某事”而非“使人做某事”。能力说将行为者是否能够达成自身目的视为权力实现的关键，“不顾他人反对”只是或然情形而非必备条件。彼得·莫里斯（Peter Morriss）是“能力说”的捍卫者。他在《权力：一种哲学分析》中明确指出，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倾向性概念”，即“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被激活的能力或潜力”[9]。他将权力看作“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power to），这种能力并不必须涉及他人。比如A有权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房屋，他将这种非关系性的能力视为权力的基本形式。

与之相对，“关系说”认为权力的关键在于“控制、支配或影响他人”（power over），在莫里斯看来关系说是能力说派生的，是能力说的一种情况。他批评许多学者将“关系说”视为权力的全部，认为这是对权力概念过分窄化，会导致严重的理论后果。他以“黑人人权运动”为例，指出黑人群体争取的权力只能被理解为能力说，如果将其解释为关系说就会将其意图曲解为“想要获得支配白人群体的权力”，这不仅曲解了运动的目的，也会直接导致运动失败。因此，莫里斯主张权力理论应当将“能力说”置于核心位置，而将“关系说”视为“能力说”在社会关系这个限定范围内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

基斯·道丁（Keith Dowding）在《理性选择与政治权力》中将权力分为“结果权力”和“社会权力”，前者是指“一个行为者带来或帮助带来某些结果的能力”[10]强调“集体行动”是理解结果权力的关键约束，后者则指的是“一个行为者有意改变另一个或多个行为者的激励结构，以带来或帮助带来某些结果的能力”[10]。道丁认为结果权力的核心在于实现某事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需要涉及到其他人，比如鲁滨逊一个人在荒岛上建造房屋，就是结果权力，而当这种能力所产生的结果影响了其他人的利益之时，也就变成了政治性的权力，而社会权力则是一种政治权力，也必然是一种社会关系，通过改变激励结构有意针对他人、控制他人，其激励结构包含四种：（1）a向b提供信息或错误信息；（2）a可能对b拥有合法的权威；（3）a可能向b提供一些无条件的激

励措施；(4) a 可能向 b 提供有条件的激励措施。道丁认为社会权力是结果权力的一个子集，所有社会权力都是结果权力，但并非所有结果权力都是社会权力，而对于二者的定义是有必要的，混淆二者会产生很多权力问题。道丁有两个独特的观点，其一，认为社会权力应当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来理解，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是“改变他人的激励结构”，也就是说权力运行的本质是改变他人背后的成本-收益计算。其二，他将“运气”作为和权力相并行的变量，以警示研究者不能仅从利益实现方面推断权力的运作，因为权力运作只是作为利益实现的结果而并非原因。具体来讲，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谁获益”等同于“谁有权”，个人或某个群体经常实现其期望的结果有可能只是因为运气，比如系统运作恰好符合其利益，无需去争取。另外，道丁认为权力是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能力，但不能将资源等同于权力本身，权力是运用资源成功改变结果或他人行动的能力，但因为有理性偏好等因素存在，资源越多不意味着权力越大，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资源占优者有时会失败。

与“能力说”相对，“关系说”认为权力必须处于主体间的支配关系之中。具体来讲，权力只存在于 A 对 B 的关系中，A 对 B 行使权力，B 迫于 A 的权力而不得不服从于 A 的意志而做其本不愿意做的事。自韦伯起，权力一词就带有浓厚的关系说色彩。韦伯将权力定义为“在社会关系中，即使遇到抵抗也能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8]。此后，无论是一维权力观的代表达尔，还是二维权力观的代表巴克拉奇和巴拉兹，抑或是三维权力观的代表卢克斯，其理论建构都建立在“关系说”的基础上。达尔将权力视为 A 对 B 的行为控制，使其去做 B 本不会做的事。巴克拉奇和巴拉兹则将权力的范围扩展到“非决策”层面，指出权力不仅体现在公开的冲突中，还体现在将某些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的能力，这依然是 A 对 B 的支配。卢克斯则进一步深化，认为最高效的权力是通过塑造人们的观念、认知与偏好，使其接受现存秩序，从而在无意识中行使支配。

这种关系说视角，在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那里得到了更为激进的阐发。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写道：“在它（权力）的细微末端，权力变得更具毛细血管性，更贴近地面，更接近个体的身体与行为。”[4]福柯一方面强调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将权力比作“毛细血管”，认为权力并不在于宏观的国家机器当中，而是在工厂、医院、学校等日常的社会机构中，是一种遍布社会肌体、无处不在的弥散性关系。并提示我们对于权力的研究与其放在统治权当中，还不如从权力的细微末端去分析权力。另一方面，他认为权力是生产性的，能够生产、规范乃至“主体”本身，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的实体权力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看作一种较为隐蔽的国家机器，通过塑造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来发挥作用，使人主观上认为自己的选择是自由的，其实这种自我认同是权力结构早就预设好的结果，揭示了权力作为一种更加隐蔽和深刻的支配关系通过让个体自由选择将个体塑造成社会秩序的主体。

（二）二元对峙：优先性与兼容性的论争

随着“能力说”与“关系说”作为两种清晰的理论范式被确立，学界争论的焦点开始转向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能力说”优先于“关系说”，还是反之？二者是相互独立的两种权力概念，还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

一派学者坚决主张“能力说”的优先性。如前所述，莫里斯和道丁都认为，“能力说”是更为基础的权力形式，而“关系说”只是其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应用或子集。莫里斯强调，混淆二者对政治实践是有害的。道丁则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认为“社会权力”可以还原为“结果权力”与“激励结构”的组合。他甚至提出，一个社会结构如果需要行使过多的“关系说”来维持，那么这个结构就越不持久和不稳定；相反，在那些通过“关系说”而实现互利合作的结构中，行为者各取所需，结构就能持续存在[11]。

与之针锋相对，另一派学者则论证“关系说”是更为根本的。帕梅拉·潘萨尔迪 (Pamela Pansardi) 在 2012 年发表的《能力说与关系说：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概念？》一文中，对“能力说优先论”提出了根本性质疑。她通过“荒岛上的鲁滨逊”、“约翰在英格兰小屋造房子”以及“英国首相解散议会”等一系列案例，着力论证了一个核心观点：在社会语境中，任何有意义的“能力说”都不是纯粹的个人属性，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机会结构之中的。她区分了“能力” (ability) 与“权力” (power)，认为前者是个体基于自身内在资源行动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是个体基于社会环境来行动的可能性，是由社会机会环境所塑造的。

因此，潘萨尔迪指出，构成“能力说”的这些社会关系，本质上正是各种“关系说”[12]。比如，首相解散议会的“能力”恰恰等同于她对议会议员的“关系”；个人建造房屋的“能力”则依赖于其对建材卖家的购买力以及法律体系赋予其对抗干涉的权力。基于此，潘萨尔迪提出了一个“有限度的等同论题”：尽管“能力说”与“关系说”在外延上并非完全逻辑等同，但它们高度对应，共同指向同一类社会事实。这一观点颠覆了关于二者优先性的传统争论。潘萨尔迪指出，既然“能力说”本身即由“关系说”构成，那么主张“能力说”在逻辑上或规范上优先于“关系说”便站不住脚。研究者可能因不同的解释目的而侧重其中某一表述，但这仅是分析视角的差异，而非概念本质的区分。因此，她的核心结论是：“能力说”与“关系说”并非两种独立的权力概念，能力说和关系说都是关系性的概念，应当被理解为单一的社会权力概念的两个不同方面。[12]

潘萨迪的论文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莫里斯为代表的学者立即发文反驳,莫里斯认为潘萨迪对“概念分析”这一词的理解与自己不同,潘萨迪所做的是实质分析性的,即探讨权力在现实社会的运作方式,而自己的工作

理论分析,即厘清某一术语的含义以便准确使用。他认为概念分析与事实分析是不同的,概念分析的精髓恰恰在于抽象掉某些非必要的因素,以使得某一概念能够得到涵盖更加广泛。当我们将权力解释为“能力说”时,之所以未将社会关系包含进来,是因为在普遍语境下,关系本身并非我们关注的焦点[13]。因此“能力说”是一个有效的、非关系性的概念工具,适用于其特定的分析目的。莫里斯坚持认为,潘萨迪的相互依赖的实质性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一点并不能否定“能力说”在概念上的独立性。

弗朗西斯科·巴泰加佐雷(Francesco Battegazzorre)试图超越以上二元对立的观点,提出了一种折中的立场。他既不同意潘萨迪“一体两面”的观点,也认为莫里斯的反驳存在薄弱之处。一方面,他批评潘萨迪的论点不纯粹,认为其在“鲁滨逊与星期五”的案例中只预设了星期五的反对倾向,但在实际情况中也可能存在“支持”或“漠不关心”的情形,在后两种情形中行为者的行为无需以关系为前提,“能力说”便足以解释这种权力现象。无需以“关系说”为前提。[14]另一方面,他也批评莫里斯用“概念分析”与“实质分析”的区分来回应潘萨迪是在逃避问题。就能力说与关系说的区别,他提出了一个更为精准的区分方法:判断是否存在支配关系,而不是是否“影响”他人。同时,他也承认,在经验世界中,“能力说”与“关系说”往往是共存的。他提出了一个“有条件的重合”模型:当使一个行为者能够行动的外部手段和资源,存在于其他行为者的顺从行为之中时,“能力说”与“关系说”便重合了。因此,巴泰加佐雷既肯定了“能力说”作为理想类型的理论价值,也认同“能力说”在经验世界中往往通过“关系说”来实现的主张。

三、争论的深化:走向辩证的综合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能力说”与“关系说”的争论并未停息,但其对于二者的争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将两种学说视为二元对立的互斥并不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权力,我们争论的目标应当是尽可能的提出一种能够涵盖全部权力现象的权力概念,因此争论的重心开始从“何者更根本”的本体论之争,转向“二者如何互动”的辩证实践论探索。这一深化过程体现为对二者关系的重新思考,以及对超越二元对立框架的尝试。

马克·豪加德(Mark Haugaard)的观点深化了这一趋势。他主张,关系说(power over)、能力说(power to)和合作说(power with)三种权力的形式通常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常常是同时存在的,并且是在社会过程中相互构成的[15]。他观察到,权力既可以被视为一种支配机制,同样也可以实现对弱势群体赋权。福柯所说的“主体化”过程,既可以是支配的工具,也可以是赋能的途径。这意味着支配与赋能之间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豪加德既没有支持将“关系说”还原为“能力说”的二元归一论,也没有捍卫二者的区分,而是提出了一个实用主义立场:概念的作用是帮助我们理解社会。因此,对于“关系说”和“能力说”的区分不应当仅仅依赖于分析逻辑,而应当通过学术实践来检验,而检验的关键在于这种概念区分是否能够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围绕在行动者周围的社会变化过程[16]。

一些学者从实践研究角度为辩证综合的权力观念提供另一种路径。艾米·艾伦(Amy Allen)从女性主义视角,将权力宽泛地定义为:“行动者行动的能力”[17],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并列并且相互关联的权力概念:关系说、能力说和合作说。第一,她将关系说定义为“一个或多个行动者以非微不足道的方式限制其他行动者选择的能力”。[17]强调关系说可以是结构性的、非故意的,不一定源于有意策略,将关系说与“支配”一词进行了区分,认为支配只是关系说的其中一种负面的应用,例如在足球训练中,教练对球员的指导是关系说,但不一定是支配。第二,她将能力说定义为“个体行动者达成目标的能力”[17]强调个人即使在受到支配的情景之下仍然能够行动、抵抗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她将能力说与“赋权”一词等同。第三,受到阿伦特“共同行动”这一概念影响,她将合作说定义为“集体行动者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协同行动的能力”[17],强调群体之间合作互惠与团结,比如在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另外,对于三者的关系,她认为关系说预设了能力说,因为需要限制他人的前提是自己具有行动能力;合作说也预设了能力说,因为集体行动是以个体具有行动能力为前提的;在现实中的权力实践可能同时交织以上三种权力类型。因此,艾米·艾伦认为这三种权力类型并非彼此对立或割裂,而只是在分析上和实践运用中的不同面向。蒂尔南与奥康纳(Tiernan & O'Connor)对津巴布韦采矿社区女性的经验研究,生动地展示了这种辩证综合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18]。她们借鉴了艾伦的分析框架,发现女性在父权结构下,一方面体验到来自家庭、社区和公司的支配性“关系说”,另一方面又能通过遵从社会规范的“好行为”来与父权制度进行谈判,从而换取获取权力的机会。这种“父权契约”使女性能够获得间歇性的在特定事务上的发言权和行动力,从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理解权力极具启发性。它表明,在实践中,“能力说”与“关系说”并非独立运行,而是在同一套权力系统中相辅相成的。“能力说”的实现需要依赖于对“关系说”结构的承认与服从,

女性只有在一定程度上遵从“关系说”既定的规则来获取有限的“能力说”。这种实现目标的能力虽具备价值，但仍然难以撼动深层支配结构，甚至需要利用支配结构来赋权。这揭示了“能力说”与“关系说”之间复杂互动关系：对既有结构性支配权力的部分顺从，可能成为个体获取权力的条件；而个体权力的运用，又可能在无意中再生产新的结构性支配权力。

之后豪加德又提出“协同权力”（Concerted Power Over）概念，从理论上回应了这种实践困境。他批判了将“关系说”简单地等同于“支配”、将“能力说”和“合作说”等同于“赋能”的传统二元对立观点[19]。他借用并发展了阿伦特的“协同权力”概念，用以指代一种“非强制性的、基于结构性约束”的权力，如法律。执行法律的权力过程是正和博弈，即使一方在某次事件中失败，整个系统的存在和规则的再生产也会为所有参与者积累未来的权力资源。通过对权力的四维度分析，豪加德论证了“关系说”具有两重性。在一维权力观中，如果A对B的服从是基于对社会结构的认同，那就可能是一种正和的协同权力。在第二维度的议程设置中，如果排除某一议题是为了建立公正的程序，这也是一种协同权力。在三维权力观中，偏好塑造通过内化某种认知框架也可以作为一种协同权力。在四维权力观中，塑造社会主体的过程如果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主体自身的能力，这同样是一种协同权力。豪加德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打破了权力即支配的教条主义分析，将权力从“支配”与“赋能”的对立面中解放出来，转向一种程度性的光谱分析。他将关注的焦点从“负面的关系说”转向了一种“可选择的关系说”。

通过梳理“能力说”与“关系说”争论的缘起、发展与深化，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从最初的概念辨析到后来形成清晰的理论对峙，直至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非此即彼的理论争辩到辩证的理论分析。这一演进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有关权力概念理论的思想发展史。从皮特金开始的“属性论”与“关系说”之争，到莫里斯、道丁为代表的学者对于“能力说”优先性的捍卫，再到潘萨尔迪、艾伦等人对“关系说”作为前提的强调；直至豪加德、巴泰加佐雷等人提出的超越二元对立的观点，这一系列争论，使得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更为成熟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能力说”与“关系说”并非两种相互排斥的权力形态，而是同一权力现象的两个互为表里的分析维度。

“关系说”揭示了权力的社会性特征，让我们看到权力生存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互动关系之中，而不是孤立的个体所有物。权力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关系中运作。无论是韦伯，还是卢克斯，抑或是福柯，都指向了权力的这一面向。“关系说”将我们的目光从冲突引向观念塑造，揭示了权力更为隐秘和高效的运作方式。

“能力说”则揭示了权力的能动性特征，让我们看到了权力不仅仅意味着负面压制和支配，更有积极方面的行动者实现目标、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莫里斯到艾伦，再到道丁，“能力说”始终关注行动者的能动性，赋予了权力更为积极的、正向的内涵，为理解反抗、赋权等政治现象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争论的深化表明，在现实的权力现象中，两种学说所定义的权力形态是深度交织、相辅相成的。艾伦认为“关系说”与“合作说”都是以“能力说”为前提的[17]；而潘萨尔迪的经验分析则认为任何有意义的“能力说”都处于“关系说”的结构之中[12]。蒂尔南与奥康纳的田野调查，更是生动地展示了女性如何在“关系说”的支配性结构中，通过策略性服从来获取“能力说”，尽管这种获取可能并未真正动摇支配结构本身，但并不意味着“能力说”未实现。[18]豪加德提出的“协同权力”，则从理论上阐明了“关系说”本身也能够具有正和博弈的赋能属性。[19]

结语

因此，在“权力究竟是一种支配关系还是一种行为能力”的问题上，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权力的本质既不应该被理解作为一种行为能力，也不应当被归结为某种支配关系，而应当将其视为以能力为基础的，以支配关系为载体的结构性权力，而权力的实现，既需要行动者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也离不开行动者对所处社会关系的建构与调整。只有将个体自身的能力与社会的整体结构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权力更为全面的理解。这一结论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单一化的权力定义已经无法解释复杂的现实世界。只有同时包含关系维度和能力维度的权力理论才更具解释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一有关权力的元理论问题，才能使得我们更准确的分析和回应技术变革和政治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权力问题。

参考文献：

- [1] 伯特兰·罗素. 权力论：新社会分析 [M]. 吴友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2]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M]. 廖申白，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3] 霍布斯. 利维坦 [M]. 黎思复，黎廷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

- [4] 福柯.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5] Isaac J. Conceptions of Power [M]// Hawkesworth M E, Kogan M. Encyclopedia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Vol.1.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56-69.
- [6] Pitkin H F. Wittgenstein and Justic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Ludwig Wittgenstein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 [7] 米歇尔斯. 寡头统治铁律: 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 [M]. 杨军, 陈秋丰,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
- [8]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第一卷) [M].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9] Morriss P. Power: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0] Dowding K M. Rational Choice and Political Power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1.
- [11] Dowding K. Agency and Structure: Interpreting Power Relationships [J]. Journal of Power, 2008, 1 (1): 21-36.
- [12] Pansardi P. Power to and Power over: Two Distinct Concepts of Power?[J].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2012, 5 (1): 73-89.
- [13] Morriss P. A Response to Pamela Pansardi [J].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2012, 5 (1): 91-99.
- [14] Battezzorre F.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ower to/Power over Debat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2017, 10 (3): 274-285.
- [15] Haugaard M. Editorial: Reflections Upon Power Over, Power to, Power With, and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ower [J].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2012, 5 (3): 353-358.
- [16] Haugaard M. Rethinking Power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7] Allen A. Rethinking Power [J]. Hypatia, 1998, 13 (1): 21-40.
- [18] Tiernan A, O'Connor P. Perspectives on Power Over and Power To: How Women Experience Power in a Mining Community in Zimbabw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2020, 13 (1): 86-105.
- [19] Haugaard M. Concerted Power Over [J]. Constellations, 2015, 22 (1): 147-157.

Power: Power Over or Power To

——The Core Debate in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the Concept of Power

Guo L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The debate between power over and power to is the core dispute in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the concept of power. Power over regards power as a domination relationship of one actor over another. By contrast, power to views power as the capacity of actor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which does not necessarily involve domination over other actor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is core debate. Starting with Hanna Pitkin's dualistic debate on power, this paper traces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debate,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cademic controversy between power to and power over. It finds that the debate has shifted from an either-or opposition to a dialectical unity at the epistemological level. Therefore, this paper holds that power over and power to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opposite views, but two analytical dimensions of the same power phenomenon.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jointly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phenomenon of power.

Keywords: concept of power; power over; power to

权力：一种支配关系还是行为能力 ——当代权力概念研究的核心争论

郭力

(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摘要：“关系说”与“能力说”之争是当代权力概念研究的核心争论。“关系说”(power over)将权力视为某一行为者对另一个行为者的支配关系，而“能力说”(power to)则将权力看作行为者实现其目标的行为能力，并不必然涉及对其他行为者的支配。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并分析这一核心争论。首先从汉娜·皮特金的权力二元辩论开始，追溯这一争论的思想史脉络，之后重点考察当代西方学界围绕“关系说”(power over)与“能力说”(power to)而展开的争论，从中发现，这场争论已经实现从非此即彼转向认识论层面的辩证统一。因此，本文认为权力的“关系说”与“能力说”并不是互斥的对立观点，而是同一权力现象两个维度的分析，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理解复杂权力现象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权力概念；关系说；能力说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66

引言

权力是政治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言：“在社会科学中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中力是基本概念一样。”[1]人们因而对权力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研究，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探讨“谁应该统治”[2]，到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的“主权利”[3]，再到当代哲学家迈克尔·福柯所阐述的“规训权力”[4]，他们都将权力置于其思想的重要位置。

然而，尽管学界一致认同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但对于“什么是权力”这一概念性问题却争论多年，始终未能形成共识。观察发现，理论家们之所以对权力概念未达一致，是因为其对于权力的本质有着不同理解，其中最为核心的争论之一，便是将权力视为一种行动能力还是一种支配关系。本文将聚焦于这一核心争论，系统探讨权力的“能力说”(power to)与“关系说”(power over)的源起、发展与深化。

本文认为，能力说与关系说的争论并非简单的彼此对立，其争论演进是通过对二者的区分来实现对权力更为周全的解释，即从区分到整合、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辩证过程。本研究旨在分析两种学说各自的贡献与局限，并探索其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为理解权力概念这个元理论问题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基础。

一、争论的缘起：皮特金的奠基性辨析

对当代权力概念争论的考察，要从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的开创性工作开始。她提出“能力说”与“关系说”的标签，为后来的这一分野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皮特金观察到，学者们在讨论权力之时，往往是在不同的意义上来对这一概念进行使用的。因此有关权力的讨论就陷入了一种混乱，这种混乱的根源在于对权力概念本身的理解存在根本性的分歧。[5]她将这种分歧概括为“能力说”与“关系说”的对立。[5]

一方面，权力被理解为一种能力，是能够被行动者所拥有而不一定行使的某种东西，与其财富、知识或地位等密切相关。这种理解将权力视为一种资源，像是一种能够被物化的、占有的某种实物。在这一视角之下，能够占有这种资源的人便拥有权力，一个人占有的资源越多、数量越大，其权力越大，因而权力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谁拥有权力？”以及“谁拥有的权力大”。这种“能力说”的理解在早期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米尔斯所提出的“寡头政治铁律”[6]即“无论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社会权力都不可避免的集中在少数精英的手中”[6]。其对权力的核心关注点是社会权力在谁手中，他用“旋转门”来说明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三大领域的顶

作者简介：郭力(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层位置的人拥有权力，因为他们能够决策最重要的事物。同样，达尔在纽黑文市的研究中，核心议题仍然是“谁统治”即谁拥有权力。与精英主义不同的是其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来说明权力是多元分布的，他选取了政治提名、城市重建、公共教育这三个关键领域，考察不同行为体在不同领域中所“拥有”的资源差异，最后得出结论，许多不同的人群能够获取不同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以及运用这些资源的个人，并非全部听命于或隶属于某个单一的控制中心，权力的分配虽然远非完全平等，但却被广泛地分散了。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分歧在于权力的分配状况，而其共同点在于都将权力作为一种可以“拥有”的属性。

另一方面，权力被理解作为一种关系，是行动者之间的一种互动模式，只有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关系中才能体现，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和互动中，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无法被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方的属性。比如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并不是拥有某种权力的人，但当这个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开始用财富雇佣劳动，其才拥有权力，而其巨额财富才能成为其权力基础。这种“关系说”的视角将权力从行动者拥有的某种属性转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模式。韦伯的权力概念就蕴含了这一视角，其认为“权力意味着在社会关系中，某个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无论这种地位的基础是什么。”[7]同样的，巴克拉奇和巴拉兹的二维权力观，以及卢克斯的三维权力观都是在这一关系说框架内的深化。

在此基础上，皮特金进一步探讨了权力的“拥有”与“行使”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行动者拥有权力并不意味着只有在行使的时候才拥有，权力也可以作为一种潜在资源而存在，类似于国王即使不发布命令，也拥有权力。这种对于权力“拥有”与“行使”的区分，揭示了权力既可以是一种属性又存在于关系中。皮特金对权力的两个方面进行区分的同时又没有将两种对于权力的理解对立起来，而是试图通过精妙的辨析来调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她指出，权力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发生的，将权力仅仅视为一种属性或能力，会掩盖权力的关系性本质。而如果仅仅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又会忽视存在于制度、传统和人们预期中的潜在权力。[5]她既承认权力具有某种可以被“拥有”的维度，又坚持这种“拥有”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情境中才有意义，并最终需要通过“行使”来确认和实现。皮特金不仅为之后学界对于“能力说”与“关系说”的区分提供了概念基础，更重要的是，她以辩证的视角提供了一种将两种原本对立的概念相互整合的可能性。

二、争论的发展：从概念区分到二元对峙

在皮特金之后，学界有关权力本质的争论沿着两条路径发展。其中一条是继续对强化“能力说”与“关系说”之间的区别，并试图将其发展成两个独立的概念体系。另一条则是在区分二者的同时，着重探讨二者具有相容性还是兼容性。

（一）能力说与关系说的理论建构

“能力说”（power to）主张权力是行为者实现自身目标的一种能力，其核心在于“能够通过做某事”而非“使人做某事”。能力说将行为者是否能够达成自身目的视为权力实现的关键，“不顾他人反对”只是或然情形而非必备条件。彼得·莫里斯（Peter Morriss）是“能力说”的捍卫者。他在《权力：一种哲学分析》中明确指出，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倾向性概念”，即“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被激活的能力或潜力”[8]。他将权力看作“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power to），这种能力并不必须涉及他人。比如A有权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房屋，他将这种非关系性的能力视为权力的基本形式。

与之相对，“关系说”认为权力的关键在于“控制、支配或影响他人”（power over），在莫里斯看来关系说是能力说派生的，是能力说的一种情况。他批评许多学者将“关系说”视为权力的全部，认为这是对权力概念过分窄化，会导致严重的理论后果。他以“黑人人权运动”为例，指出黑人群体争取的权力只能被理解为能力说，如果将其解释为关系说就会将其意图曲解为“想要获得支配白人群体的权力”，这不仅曲解了运动的目的，也会直接导致运动失败。因此，莫里斯主张权力理论应当将“能力说”置于核心位置，而将“关系说”视为“能力说”在社会关系这个限定范围内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

基斯·道丁（Keith Dowding）在《理性选择与政治权力》中将权力分为“结果权力”和“社会权力”，前者是指“一个行为者带来或帮助带来某些结果的能力”[9]强调“集体行动”是理解结果权力的关键约束，后者则指的是“一个行为者有意改变另一个或多个行为者的激励结构，以带来或帮助带来某些结果的能力”[9]。道丁认为结果权力的核心在于实现某事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需要涉及到其他人，比如鲁滨逊一个人在荒岛上建造房屋，就是结果权力，而当这种能力所产生的结果影响了其他人的利益之时，也就变成了政治性的权力，而社会权力则是一种政治权力，也必然是一种社会关系，通过改变激励结构有意针对他人、控制他人，其激励结构包含四种：

（1）a向b提供信息或错误信息；（2）a可能对b拥有合法的权威；（3）a可能向b提供一些无条件的激励措施；（4）a可能向b提供有条件的激励措施。道丁认为社会权力是结果权力的一个子集，所有社会权力都是结果

权力,但并非所有结果权力都是社会权力,而对于二者的定义是有必要的,混淆二者会产生很多权力问题。道丁有两个独特的观点,其一,认为社会权力应当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来理解,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是“改变他人的激励结构”,也就是说权力运行的本质是改变他人背后的成本-收益计算。其二,他将“运气”作为和权力相并行的变量,以警示研究者不能仅从利益实现方面推断权力的运作,因为权力运作只是作为利益实现的结果而并非原因。具体来讲,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谁获益”等同于“谁有权”,个人或某个群体经常实现其期望的结果有可能只是因为运气,比如系统运作恰好符合其利益,无需去争取。另外,道丁认为权力是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能力,但不能将资源等同于权力本身,权力是运用资源成功改变结果或他人行动的能力,但因为理性偏好等因素存在,资源越多并不意味着权力越大,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资源占优者有时会失败。

与“能力说”相对,“关系说”认为权力必须处于主体间的支配关系之中。具体来讲,权力只存在于A对B的关系中,A对B行使权力,B迫于A的权力而不得不服从于A的意志而做其本不愿意做的事。自韦伯起,权力一词就带有浓厚的关系说色彩。韦伯将权力定义为“在社会关系中,即使遇到抵抗也能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7]。此后,无论是一维权力观的代表达尔,还是二维权力观的代表巴克拉奇和巴拉兹,抑或是三维权力观的代表卢克斯,其理论建构都建立在“关系说”的基础上。达尔将权力视为A对B的行为控制,使其去做B本不会做的事。巴克拉奇和巴拉兹则将权力的范围扩展到“非决策”层面,指出权力不仅体现在公开的冲突中,还体现在将某些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的能力,这依然是A对B的支配。卢克斯则进一步深化,认为最高效的权力是通过塑造人们的观念、认知与偏好,使其接受现存秩序,从而在无意识中行使其支配。

这种关系说视角,在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那里得到了更为激进的阐发。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写道:“在它(权力)的细微末端,权力变得更具毛细血管性,更贴近地面,更接近个体的身体与行为。”[4]福柯一方面强调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将权力比作“毛细血管”,认为权力并不在于宏观的国家机器当中,而是在工厂、医院、学校等日常的社会机构中,是一种遍布社会肌体、无处不在的弥散性关系。并提示我们对于权力的研究与其放在统治权当中,还不如从权力的细微末端去分析权力。另一方面,他认为权力是生产性的,能够生产、规范乃至“主体”本身,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的实体权力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看作一种较为隐蔽的国家机器,通过塑造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来发挥作用,使人主观上认为自己的选择是自由的,其实这种自我认同是权力结构早就预设好的结果,揭示了权力作为一种更加隐蔽和深刻的支配关系通过让个体自由选择将个体塑造成社会秩序的主体。

(二) 二元对峙: 优先性与兼容性的论争

随着“能力说”与“关系说”作为两种清晰的理论范式被确立,学界争论的焦点开始转向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能力说”优先于“关系说”,还是反之?二者是相互独立的两种权力概念,还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

一派学者坚决主张“能力说”的优先性。如前所述,莫里斯和道丁都认为,“能力说”是更为基础的权力形式,而“关系说”只是其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应用或子集。莫里斯强调,混淆二者对政治实践是有害的。道丁则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认为“社会权力”可以还原为“结果权力”与“激励结构”的组合。他甚至提出,一个社会结构如果需要行使过多的“关系说”来维持,那么这个结构就越不持久和不稳定;相反,在那些通过“关系说”而实现互利合作的结构中,行为者各取所需,结构就能持续存在[10]。

与之针锋相对,另一派学者则论证“关系说”是更为根本的。帕梅拉·潘萨尔迪(Pamela Pansardi)在2012年发表的《能力说与关系说: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概念?》一文中,对“能力说优先论”提出了根本性质疑。她通过“荒岛上的鲁滨逊”、“约翰在英格兰小屋造房子”以及“英国首相解散议会”等一系列案例,着力论证了一个核心观点:在社会语境中,任何有意义的“能力说”都不是纯粹的个人属性,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机会结构之中的。她区分了“能力”(ability)与“权力”(power),认为前者是个体基于自身内在资源行动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是个体基于社会环境来行动的可能性,是由社会机会环境所塑造的。

因此,潘萨尔迪指出,构成“能力说”的这些社会关系,本质上正是各种“关系说”[11]。比如,首相解散议会的“能力”恰恰等同于她对议会议员的“关系”;个人建造房屋的“能力”则依赖于其对建材卖家的购买力以及法律体系赋予其对抗干涉的权力。基于此,潘萨尔迪提出了一个“有限度的等同论题”:尽管“能力说”与“关系说”在外延上并非完全逻辑等同,但它们高度对应,共同指向同一类社会事实。这一观点颠覆了关于二者优先性的传统争论。潘萨尔迪指出,既然“能力说”本身即由“关系说”构成,那么主张“能力说”在逻辑上或规范上优先于“关系说”便站不住脚。研究者可能因不同的解释目的而侧重其中某一表述,但这仅是分析视角的差异,而非概念本质的区分。因此,她的核心结论是:“能力说”与“关系说”并非两种独立的权力概念,能力说和关系说都是关系性的概念,应当被理解为单一的社会权力概念的两个不同方面。[11]

潘萨尔迪的论文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莫里斯为代表的学者立即发文反驳,莫里斯认为潘萨尔迪对

“概念分析”这一词的理解与自己不同,潘萨尔迪所做的是实质分析性的,即探讨权力在现实社会的运作方式,而自己的工作

理论分析,即厘清某一术语的含义以便准确使用。他认为概念分析与事实分析是不同的,概念分析的精髓恰恰在于抽象掉某些非必要的因素,以使得某一概念能够得到涵盖更加广泛。当我们将权力解释为“能力说”时,之所以未将社会关系包含进来,是因为在普遍语境下,关系本身并非我们关注的焦点[12]。因此“能力说”是一个有效的、非关系性的概念工具,适用于其特定的分析目的。莫里斯坚持认为,潘萨尔迪的相互依赖的实质性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一点并不能否定“能力说”在概念上的独立性。

弗朗西斯科·巴泰加佐雷(Francesco Battegazzorre)试图超越以上二元对立的观点,提出了一种折中的立场。他既不同意潘萨尔迪“一体两面”的观点,也认为莫里斯的反驳存在薄弱之处。一方面,他批评潘萨尔迪的论点不纯粹,认为其在“鲁滨逊与星期五”的案例中只预设了星期五的反对倾向,但在实际情况中也可能存在“支持”或“漠不关心”的情形,在后两种情形中行为者的行为无需以关系为前提,“能力说”便足以解释这种权力现象。无需以“关系说”为前提。[13]另一方面,他也批评莫里斯用“概念分析”与“实质分析”的区分来回应潘萨尔迪是在逃避问题。就能力说与关系说的区别,他提出了一个更为精准的区分方法:判断是否存在支配关系,而不是是否“影响”他人。同时,他也承认,在经验世界中,“能力说”与“关系说”往往是共存的。他提出了一个“有条件的重合”模型:当使一个行为者能够行动的外部手段和资源,存在于其他行为者的顺从行为之中时,“能力说”与“关系说”便重合了。因此,巴泰加佐雷既肯定了“能力说”作为理想类型的理论价值,也认同“能力说”在经验世界中往往通过“关系说”来实现的主张。

三、争论的深化:走向辩证的综合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能力说”与“关系说”的争论并未停息,但其对于二者的争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将两种学说视为二元对立的互斥并不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权力,我们争论的目标应当是尽可能的提出一种能够涵盖全部权力现象的权力概念,因此争论的重心开始从“何者更根本”的本体论之争,转向“二者如何互动”的辩证实践论探索。这一深化过程体现为对二者关系的重新思考,以及对超越二元对立框架的尝试。

马克·豪加德(Mark Haugaard)的观点深化了这一趋势。他主张,关系说(power over)、能力说(power to)和合作说(power with)三种权力的形式通常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常常是同时存在的,并且是在社会过程中相互构成的[14]。他观察到,权力既可以被视为一种支配机制,同样也可以实现对弱势群体赋权。福柯所说的“主体化”过程,既可以是支配的工具,也可以是赋能的途径。这意味着支配与赋能之间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豪加德既没有支持将“关系说”还原为“能力说”的二元归一论,也没有捍卫二者的区分,而是提出了一个实用主义立场:概念的作用是帮助我们理解社会。因此,对于“关系说”和“能力说”的区分不应当仅仅依赖于分析逻辑,而应当通过学术实践来检验,而检验的关键在于这种概念区分是否能够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围绕在行动者周围的社会变化过程[15]。

一些学者从实践研究角度为辩证综合的权力观念提供另一种路径。艾米·艾伦(Amy Allen)从女性主义视角,将权力宽泛地定义为:“行动者行动的能力”[16],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并列并且相互关联的权力概念:关系说、能力说和合作说。第一,她将关系说定义为“一个或多个行动者以非微不足道的方式限制其他行动者选择的能力”。[16]强调关系说可以是结构性的、非故意的,不一定源于有意策略,将关系说与“支配”一词进行了区分,认为支配只是关系说的其中一种负面的应用,例如在足球训练中,教练对球员的指导是关系说,但不一定是支配。第二,她将能力说定义为“个体行动者达成目标的能力”[16]强调个人即使在受到支配的情景之下仍然能够行动、抵抗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她将能力说与“赋权”一词等同。第三,受到阿伦特“共同行动”这一概念影响,她将合作说定义为“集体行动者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协同行动的能力”[16],强调群体之间合作互惠与团结,比如在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另外,对于三者的关系,她认为关系说预设了能力说,因为需要限制他人的前提是自己具有行动能力;合作说也预设了能力说,因为集体行动是以个体具有行动能力为前提的;在现实中的权力实践可能同时交织以上三种权力类型。因此,艾米·艾伦认为这三种权力类型并非彼此对立或割裂,而只是在分析上和实践运用中的不同面向。蒂尔南与奥康纳(Tiernan & O'Connor)对津巴布韦采矿社区女性的经验研究,生动地展示了这种辩证综合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17]。她们借鉴了艾伦的分析框架,发现女性在父权结构下,一方面体验到来自家庭、社区和公司的支配性“关系说”,另一方面又能通过遵从社会规范的“好行为”来与父权制度进行谈判,从而换取获取权力的机会。这种“父权契约”使女性能够获得间歇性的在特定事务上的发言权和行动力,从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理解权力极具启发性。它表明,在实践中,“能力说”与“关系说”并非独立运行,而是在同一套权力系统中相辅相成的。“能力说”的实现需要依赖于对“关系说”结构的承认与服从,女性只有在一定程度上遵从“关系说”既定的规则来获取有限的“能力说”。这种实现目标的能力虽具备价值,

但仍然难以撼动深层支配结构,甚至需要利用支配结构来赋权。这揭示了“能力说”与“关系说”之间复杂互动关系:对既有结构性支配权力的部分顺从,可能成为个体获取权力的条件;而个体权力的运用,又可能在无意中再生产新的结构性支配权力。

之后豪加德又提出“协同权力”(Concerted Power Over)概念,从理论上回应了这种实践困境。他批判了将“关系说”简单地等同于“支配”、将“能力说”和“合作说”等同于“赋能”的传统二元对立观点[18]。他借用并发展了阿伦特的“协同权力”概念,用以指代一种“非强制性的、基于结构性约束”的权力,如法律。执行法律的权力过程是正和博弈,即使一方在某次事件中失败,整个系统的存在和规则的再生产也会为所有参与者积累未来的权力资源。通过对权力的四维度分析,豪加德论证了“关系说”具有两重性。在一维权力观中,如果A对B的服从是基于对社会结构的认同,那就可能是一种正和的协同权力。在第二维度的议程设置中,如果排除某一议题是为了建立公正的程序,这也是一种协同权力。在三维权力观中,偏好塑造通过内化某种认知框架也可以作为一种协同权力。在四维权力观中,塑造社会主体的过程如果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主体自身的能力,这同样是一种协同权力。豪加德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打破了权力即支配的教条主义分析,将权力从“支配”与“赋能”的对立面中解放出来,转向一种程度性的光谱分析。他将关注的焦点从“负面的关系说”转向了一种“可选择的关系说”。

通过梳理“能力说”与“关系说”争论的缘起、发展与深化,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从最初的概念辨析到后来形成清晰的理论对峙,直至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非此即彼的理论争辩到辩证的理论分析。这一演进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有关权力概念理论的思想发展史。从皮特金开始的“属性论”与“关系说”之争,到莫里斯、道丁为代表的学者对于“能力说”优先性的捍卫,再到潘萨尔迪、艾伦等人对“关系说”作为前提的强调;直至豪加德、巴泰加佐雷等人提出的超越二元对立的观点,这一系列争论,使得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更为成熟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能力说”与“关系说”并非两种相互排斥的权力形态,而是同一权力现象的两个互为表里的分析维度。

“关系说”揭示了权力的社会性特征,让我们看到权力生存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互动关系之中,而不是孤立的个体所有物。权力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关系中运作。无论是韦伯,还是卢克斯,抑或是福柯,都指向了权力的这一面向。“关系说”将我们的目光从冲突引向观念塑造,揭示了权力更为隐秘和高效的运作方式。

“能力说”则揭示了权力的能动性特征,让我们看到了权力不仅仅意味着负面压制和支配,更有积极方面的行动者实现目标、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莫里斯到艾伦,再到道丁,“能力说”始终关注行动者的能动性,赋予了权力更为积极的、正向的内涵,为理解反抗、赋权等政治现象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争论的深化表明,在现实的权力现象中,两种学说所定义的权力形态是深度交织、相辅相成的。艾伦认为“关系说”与“合作说”都是以“能力说”为前提的[16];而潘萨尔迪的经验分析则认为任何有意义的“能力说”都处于“关系说”的结构之中[11]。蒂尔南与奥康纳的田野调查,更是生动地展示了女性如何在“关系说”的支配性结构中,通过策略性服从来获取“能力说”,尽管这种获取可能并未真正动摇支配结构本身,但并不意味着“能力说”未实现。[17]豪加德提出的“协同权力”,则从理论上阐明了“关系说”本身也能够具有正和博弈的赋能属性。[18]

结语

因此,在“权力究竟是一种支配关系还是一种行为能力”的问题上,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权力的本质既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行为能力,也不应当被归结为某种支配关系,而应当将其视为以能力为基础的,以支配关系为载体的结构性权力,而权力的实现,既需要行动者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也离不开行动者对所处社会关系的建构与调整。只有将个体自身的能力与社会的整体结构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权力更为全面的理解。这一结论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单一化的权力定义已经无法解释复杂的现实世界。只有同时包含关系维度和能力维度的权力理论才更具解释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一有关权力的元理论问题,才能使得我们更准确的分析和回应技术变革和政治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权力问题。

参考文献:

- [1] 伯特兰·罗素. 权力论:新社会分析 [M]. 吴友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2]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M]. 廖申白,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3] 霍布斯. 利维坦 [M]. 黎思复,黎廷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
- [4] 福柯.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 [5] Pitkin H F. Wittgenstein and Justic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Ludwig Wittgenstein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 [6] 米歇尔斯. 寡头统治铁律: 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 [M]. 杨军, 陈秋丰,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
- [7]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第一卷) [M].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8] Morriss P. Power: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 [9] Dowding K M. Rational Choice and Political Power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1.
- [10] Dowding K. Agency and Structure: Interpreting Power Relationships [J]. Journal of Power, 2008, 1 (1): 21-36.
- [11] Pansardi P. Power to and Power over: Two Distinct Concepts of Power?[J].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2012, 5 (1): 73-89.
- [12] Morriss P. A Response to Pamela Pansardi [J].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2012, 5 (1): 91-99.
- [13] Battagazzorre F.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ower to/Power over Debat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2017, 10 (3): 274-285.
- [14] Haugaard M. Editorial: Reflections Upon Power Over, Power to, Power With, and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ower [J].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2012, 5 (3): 353-358.
- [15] Haugaard M. Rethinking Power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6] Allen A. Rethinking Power [J]. Hypatia, 1998, 13 (1): 21-40.
- [17] Tiernan A, O'Connor P. Perspectives on Power Over and Power To: How Women Experience Power in a Mining Community in Zimbabw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2020, 13 (1): 86-105.
- [18] Haugaard M. Concerted Power Over [J]. Constellations, 2015, 22 (1): 147-157.

Power: Power Over or Power To

——The Core Debate in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the Concept of Power

Guo L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The debate between power over and power to is the core dispute in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the concept of power. Power over regards power as a domination relationship of one actor over another. By contrast, power to views power as the capacity of actor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which does not necessarily involve domination over other actor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is core debate. Starting with Hanna Pitkin's dualistic debate on power, this paper traces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debate,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cademic controversy between power to and power over. It finds that the debate has shifted from an either-or opposition to a dialectical unity at the epistemological level. Therefore, this paper holds that power over and power to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opposite views, but two analytical dimensions of the same power phenomenon.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jointly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phenomenon of power.

Keywords: concept of power ; power over ; power to

后殖民视角下拉美自主发展的结构性束缚分析

赵佳文

(同济大学, 上海 杨浦区 200092)

摘要: 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分析了殖民遗产如何持续影响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 旨在探讨全球化时代限制其自主发展的因素, 以及诸多限制因素自我强化的过程。首先, 文章回顾了后殖民理论的概念、产生及发展过程, 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二部分探讨了殖民遗产在拉丁美洲的三大表现, 论证该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及其特殊性。第三部分讨论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三大殖民遗产如何通过“政-经-文-政”的循环在该地区实现再生产, 并持续迟滞拉丁美洲独立发展的进程。

关键词: 后殖民主义, 拉丁美洲, 殖民遗产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23

引言

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深受殖民历史影响的地区, 其社会、经济及文化结构长期受到西方殖民遗产的塑造。虽然这些国家在19世纪初取得独立, 但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压迫依然深刻地烙印在地区的发展路径中。后殖民主义理论为理解这种持久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批判性框架。后殖民理论起源于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话语的批判, 强调殖民遗产不仅限于历史时期的压迫, 甚至在殖民统治结束后, 依然通过各类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延续至今。尽管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独立后都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压迫, 拉丁美洲却因其特殊的殖民历史和地理位置, 成为了西方霸权与资本主义结构性压迫的典型体现。

本文旨在探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拉丁美洲问题的适用性, 分析殖民主义遗产如何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结构、经济模式和文化认同中继续存在。文章通过分析拉丁美洲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互作用, 揭示了殖民权力延续、资本主义市场结构性压迫和文化话语霸权等因素在拉美社会中再生产及其巨大的破坏力。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及其演进过程

“后殖民”源自“殖民主义”概念, 后者通常指主权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对其殖民地实施政治、经济及社会控制的行为^[1]。“后殖民”不仅意味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 也引申为殖民统治告终后, 殖民主义依然深刻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 产生与成型

随着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 后殖民理论逐渐萌芽。心理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与革命家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等人, 凭借个人经历, 创作了大量反对各类殖民主义的作品, 为后殖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也为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思想根基^[2]。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受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启发, 提出了西方如何通过知识和话语来塑造“东方”这一概念的思考。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 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正式形成^[3]。随后, 这一理论得到广泛关注, 并逐渐稳定下来, 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流派。

作者简介: 赵佳文(2001—), 女,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为区域国别研究。

通讯作者: 赵佳文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学术界的社区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以及政策实践的推动, 成为推动后殖民理论发展的关键力量。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大学教授帕特里克·杰克逊 (Patrick Jackson) 提出“规训作用”概念, 指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存在的学术垄断和“认知暴力”^[4]。此后, 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采用批判主导理论反思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崭露头角。批评家们提出, 国际关系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 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同样需要得到重视。在这一理论转变的过程中, 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成为了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变革的重要力量。然而, 囿于国际关系学科中西方思想的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后殖民理论依然未能形成独立的理论路径。

(二) 第二阶段: 反思与崛起

自 20 世纪末以来, 后殖民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并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内涵。随着理论的日益系统化, 后殖民理论本身也开始进行反思和批判。约翰·麦肯齐 (John McKenzie) 从历史视角出发, 批评了赛义德的《东方学》, 并反对将东方主义单纯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的工具。麦肯齐认为, 东方主义不仅仅是殖民压迫的产物, 而是更为复杂的文化和历史现象^[5]。此举使得后殖民理论在批判性反思中不断自我创新, 展示了理论的生命力。与此同时, 学者们开始整合此前出现的复杂多样的后殖民理论和概念, 并产生了大量总结和概述后殖民理论的学术成果。在这一过程中, 诸如身份政治、全球化等议题的探讨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进入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 在国际关系学科的“本体论革命”中, 后殖民理论逐渐认识到自己是全球国际关系的一部分, 且与全球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有着有机的联系。它吸收了批判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多种批判性思维, 并通过“中心-边缘”的框架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他国际关系相关领域。这一分析框架展现了不同的世界政治视角, 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 后殖民理论已成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一股充满活力与创新的力量。后殖民理论并未将非西方经验视为孤立的个案, 而是以地方与全球的对话为出发点, 构建了一个更加包容和多元的理论体系^[6]。它与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互动, 促进了知识生产中不平衡现象的改善。

尽管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仍处于国际关系领域的边缘, 但其自我认知和理论体系的完善程度已有显著提升。后殖民国际关系理论不仅从批判西方主导的视角起步, 逐步拓展到更为深刻的主题, 还日益体现出学科间相互联系和交融的特点。后殖民理论始终主张, 殖民主义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 都是普遍存在的。殖民主义及其后果的视角为更加清晰地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提供了理论工具。

二、殖民遗产在拉丁美洲的三大表现

殖民与反殖民话语贯穿了拉丁美洲发展过程的论争。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特殊历史与作为美国“后花园”的特殊区位使得殖民主义在拉美地区构建出了独特的历史与社会现实。

(一) 政治遗产: 西方权力模式的延续

西方权力的延续呈现出内生性与外生性两种模式。不同于殖民宗主国对非洲的物质掠夺和文化输出, 西班牙在殖民地推行的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使得在宗主国有一定地位的白人留在拉丁美洲发展, 形成了拉丁美洲独特的混血文化。在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中, 特别是那些在 19 世纪初拥有广阔领土和庞大人口的国家, 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人群占据了总人口的 90% 以上。然而, 在这些国家组织新政府的过程中, 这些群体被剥夺了参与社会和政治决策的权利。控制国家的少数白人精英甚至认为自己摆脱了西班牙王室的立法约束, 开始对印第安人征收新的殖民税, 却没有改变维持黑奴制度的做法。以巴西为例, 黑人仅仅是奴隶, 而大多数印第安人则是来自亚马逊的原住民, 成为了新国家的“外来人”^[7]。在这个过程中, 克里奥尔人实际上扮演了第一与第三世界的中介角色, 使得拉丁美洲的政治形态从诞生起就成为了欧洲模式的自然延伸。西方政治形态完成了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内生性权力构建。

自 19 世纪初, 美国通过“门罗主义”确立了在美洲地区的霸权地位, 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 通过军事干预、外交压力和支持亲美政府等手段, 持续维护其地缘政治优势。许多受过美国教育的拉美精英与美国保持着

深厚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这大大增强了美国对拉美国家在外交、军事及经济改革等方面的影响力。冷战期间，美国通过对古巴、尼加拉瓜、巴拿马等国的直接军事干预及对亲美政权的扶持，限制了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建立美洲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对推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实施制裁和政治孤立。区域组织的构建使得西方的政治形态在后殖民时代的拉丁美洲实现外生性延续。

（二）经济遗产：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构性压迫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经济现代化概念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旨在推动全球发展议程。这一议程与历史进化观紧密相连，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相同的发展阶段：通过普及技术、促进消费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8]。

在延续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的拉丁美洲，西方工业社会的标准自然被视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然而，西方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本就建立在对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剥削基础之上，而这种殖民时期经济站位不对等的结构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延续，被卷入自由市场的拉丁美洲地区实际上并不具备实现西方式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对非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压迫被忽视。而通过这种经济现代化模式，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固化，拉丁美洲等地区作为“边缘”国家，始终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边缘^[9]。

经过拉丁美洲的“失落十年”，拉美学者逐渐注意到了这种深层次结构性不平等，开始质疑发展阶段的线性进程，认为拉丁美洲的“落后”是由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10]。全球经济呈现出“中心-边缘”结构，边缘地区依赖于出口原材料，而发达的中心国家则占据制成品出口的主导地位。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使拉美国家始终处于全球经济体系的弱势地位，其经济发展受制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和规则。在此基础上，依附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拉丁美洲的“落后”并非发展过程中的自然阶段，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外部经济力量与内部政治结构相互作用的产物。依附主义者认为，世界经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支配关系，以及各国内部的阶级结构，决定了拉美国家的发展路径^[11]。这种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际经济中的不平等交换，也渗透到国家内部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形成了“外部控制”与“内部统治”相结合的复杂局面。

（三）文化遗产：西方式话语霸权的建构

除了政治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种族”这一概念也作为殖民遗产之一留在拉丁美洲大陆。这一概念源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异，原本并不存在于美洲的历史中。随着殖民进程的推进，这一概念逐渐被确立为区分不同群体的标签，创造了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人等新的社会身份，基于这一观念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并重新定义了其他群体的身份^[12]。种族身份从简单的社会标签转变与社会地位、角色密切相关的概念，成为殖民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和社会分类的核心工具。

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展，欧洲成为了全球新的统治中心，进而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知识视角。被殖民的土著人民逐渐沦为农民和文盲，他们的城市文化和文字被剥夺，陷入了被压制的亚文化状态。大部分殖民地的被征服者无法接触到教育和知识，他们只能使用统治者的语言，并且这种语言仅用于服务于殖民统治者的目的。这样的情况使得他们无法独立表达自己的文化、符号和经验，而只能在殖民者的框架中重新定义自己。殖民地的被统治者被迫接受并“认同”自己在殖民者眼中的身份和历史。他们的自我认同和文化体验被殖民者的视野所主导，不得不在殖民者的框架中生存和表达。这种压迫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还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13]。尽管这些被殖民的群体不断尝试适应和反抗全球殖民模式的变化，他们的文化和身份始终受制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影响。能够学习统治者语言的精英群体在本土的认知模式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产生了身份的冲突，无法完全摆脱殖民统治带来的精神和文化束缚。

建立在种族话语霸权之下的文化观念成为殖民者权力合法性的基础，而这一合法性又加深了种族话语霸权，完成了制度与文化的互构。这种视角不仅塑造了拉丁美洲被殖民者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也推动了种族观念的理论化，成为了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殖民统治关系的文化框架。

三、殖民遗产的循环再生产

殖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深刻重塑着国际格局。从第三世界到发展中国家再到新兴经济体，南方国家愈发作为重要的行为体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逐渐探索出适合本土的发展道路，并试图跳出西方视角，立足本土价值观重构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同样遭受殖民遗产侵害的非洲也开始尝试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提升自身的话语权。但为何原住民数量庞大、有着深厚本土文明根基的拉丁美洲经过数十年的独立发展依然难以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土的发展道路？本文提出，殖民遗产对拉丁美洲造成的冲击并非是一次性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相互作用，通过“政-经-文-政”的传导路径成为一个无法打破的恶性闭环。

（一）非本土权力结构合法化资本主义压迫

西方政治结构与本土的社会结构在拉丁美洲呈现出一种异质性融合的特征。这种融合不仅是基于地域、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与英美新教文化的精神抽象同质性截然不同^[14]。拉丁美洲的社会结构更为复杂多样，呈现出一种由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融合模式。

然而，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同化，而是一种复杂的过渡过程。传统与现代的元素并存，交织成一种充满矛盾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在于，它并未通过与传统决裂来实现，而是在旧有的社会模式基础上进行渗透。由此，拉丁美洲社会呈现出“三重二元性”的特点^[15]。首先，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深刻的二元分化，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暴力的迁徙，形成了缺乏中等城市的社会格局。其次，在农村地区，寡头与农民之间的对立持续存在，社会结构依旧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庄园式的经济模式没有根本改变。最后，城市化进程在拉丁美洲的独特性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导致大城市内部存在大量从事低生产率服务的边缘群体。这些矛盾的存在造就了拉丁美洲的政治现实，也为随后的经济失败埋下了隐患。

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的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现代化模式革新了拉美地区的发展理论。然而，传统的寡头秩序依然存在，政治现代化进程未能有效推进，导致拉丁美洲社会经济结构的矛盾加剧。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促使拉丁美洲的社会精英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制定社会保障和劳动法是应对工人阶级激进化的必要举措。1929年的经济危机加深了这一认识，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由此造成了政治主导经济的局面^[16]。由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拉丁美洲的社会发展仍然处于被动地位，难以摆脱政治组织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匹配造成的困境。

西方的社会发展主要以经济为驱动力，逐渐推动了政治和文化的革新，而拉丁美洲则长期由政治因素主导，经济现代化始终滞后，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拉丁美洲的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处于不对称的状态，进而阻碍了该地区的自主社会发展。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使得拉丁美洲无法真正实现社会的转型，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压迫得以通过殖民的政治遗产在该地区持续再生产。

（二）经济失败固化外部话语

面对失败的经济现代化，拉美精英开始寻求改造民众使之符合西方经济现代化的要求。以西方现代化范式作为唯一标准的结果是西方价值观的全面渗透，经济层面的依赖延续到了文化领域。一些国家在提高教育水平、降低文盲率和改善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社会性别关系也有了一定的改善^[17]。20世纪以来，年轻一代的文化革命获得了一定关注，被视为一种文化突破，并且促使拉丁美洲的城市逐渐被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场域来看待，学术界开始讨论大众媒体在文化依赖中的作用，例如《唐老鸭》这样的文化符号的传播效果^[18]。

在这一过程中，以西方现代化为模版的文化建设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延伸和扩展，单纯作为西方社会的复制品来看，这些建设工作可以说是成功的。然而，过度追求与西方社会的同质性改造使得拉丁美洲特殊性的问题进一步被官方话语忽视。这种局面导致拉丁美洲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依然难以摆脱西方话语的支配，西方标准几乎成了评价拉丁美洲社会和文化的唯一“镜像”^[19]。而处于“中心-边缘”的经济结构外围的拉丁美洲在西方经济现代化主导的话语下自然成为了“负面教材”，而这种负面评价深刻影响着拉美人的自我认知。例如，许多描写拉丁美洲城市动荡的文学作品（如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的《城市与狗》《绿房子》）往往描绘了在经济现代化未能实现的背景下失败的拉丁美洲形象。

此外，经济现代化的迟滞在降低拉美国家自我认同感的同时，也使其无法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进一步降低

了民族身份的凝聚力^[20]。拉美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加剧，贫困问题依然严重，许多人无法通过经济手段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使得拉美人民难以形成共识，进而影响到集体身份的建立，使得拉美民众更容易产生自我分裂，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使得拉美社会的身份认同更加脆弱。

这种由外部力量主导的文化审视在拉美构建了西方价值观的底色，进一步削弱了拉丁美洲文化的独立性，加深了该地区对西方文化的依赖，强化了拉美自主发展过程中的西方话语权。

（三）社会文化与政治变革的不匹配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随着“西方崇拜”逐步深化，拉丁美洲的文化西方化进程一路高歌猛进。城市化、教育革命、大众传媒的普及、女权主义、人权运动的权利争取、青年文化和宗教重组等一系列现代化进程取得了显著进展^[20]。在文化领域，拉丁美洲迅速进入了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阶段，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一文化现代化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混合与交织，成功突破了现代与传统、国家与国际之间的界限。这种杂交文化的形成不再被视为矛盾的表现，而是被理解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文化表达，代表了内生与外生文化力量的碰撞与融合。这一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观念，推动了文化的民主化，尽管这一进程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现象，但平等的价值观已经获得认可。

然而，文化的超前发展与经济和制度方面的迟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并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文化现代化的推动力产生了新的社会需求和矛盾，而经济现代化的迟滞无法满足这些需求，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衡。在这种情形下，高度发达的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和政治的转型造成了压力。智利二十多年来陷入焦灼的关于现代性的争论正反映出这种紧张关系^[21]。经济现代化产生的特定需求、过度负担和挫折感成为拉美社会的一大挑战。尽管文化上有了显著的进步，但其未能与经济和政治结构有效衔接，又导致政治变革的滞后。

在政治领域，虽然有一些积极的变化出现，例如人权革命和从革命到民主的过渡，文化现代化与政治变革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得重要，但这种联系依旧不够紧密。文化现代化促进了政治领域的某些进步，如女权主义和性别平等运动的兴起，以及新的政治宗教行为者的行动等。然而，政治制度并未能完全适应这些新的文化要求，许多国家仍然面临着旧有的政治结构的约束，如忠诚、恩惠和附庸主义的政治体系依然主导着社会政治。文化现代化激发了新的政治需求，但这些需求往往无法与政治体制的传统结构相匹配，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至此，殖民遗产实现了“政-经-文-政”的循环再生产。

结语

正如后殖民主义所主张的一样，殖民主义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是普遍存在的。殖民遗产并未随着殖民者的军队离开拉美大陆，而是通过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不断自我生产，持续侵蚀着拉美国家独立发展的努力。由于拉美殖民历史和地理区位的独特性，拉美国家的自我认知深受西方话语的形塑，而经济上受到资本主义结构压迫，使其成为南方国家中经济失败和政治混乱的典型。近年来，拉丁美洲逐渐开始探索一条适合本土的发展之路，例如制度上持续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经济上以共同利益为主导，主动融入与南方国家的合作；文化上不再一味追随西方国家，开始挖掘土著文化的价值，用“传统性”挑战“现代性”。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对新的国际秩序的不断探索，若拉丁美洲能够打破殖民遗产的恶性循环，将成为共建互利共赢国际体系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 [1] Barker, Jonathan. "Return to the Source, Selected Speeches by Amilcar Cabral." (1976): 166-168.
- [2]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2012.
- [3] Jackson, Patrick Thaddeus. 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Routledge, 2016, p.9.
- [4] Patrick Jackson, Jackson, Patrick Thaddeus. 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Routledge, 2016. p.9.
- [5] 同子怡.国际关系的后殖民理论：一种包容与多元的理论[J].国际政治研究,2024,45(03):74-103+6-7.
- [6] Eisenstadt, S. N. (2013). América Latina y el problema de las múltiples modernidades. Revista mexicana de ciencias políticas y sociales, 58(218), 153-164.

- [7] 吴梅云.论后殖民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D].青岛大学,2022.
- [8] Mallorquín, Carlos. "The genealogy of the decolonial perspective in Latin America: The Center-Periphery antinomy." *Estudios Críticos del Desarrollo* 7.23 (2022): 27-74.
- [9] Martuccelli, Danilo. "Problematizaciones de la modernidad y de la moderniz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Desarrollo económico* 60.232 (2021): 253-274.
- [10] Dos Santos,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 (2), pp. 231 -236 .
- [11]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ales, and Raúl Benítez Zenteno. *Las clases soc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problemas de conceptualización*. Siglo Veintiuno Editores, 1977.
- [12] Quijano, Aníbal. "Colonialidad del poder, cultura y conoci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Dispositio* 24.51 (1999): 137-148.
- [13] Trucco, Ignacio, and Carolina Lauxmann. "Estructuralismo latinoamericano y sociología de la modernización. Articulaciones teóricas."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86.4 (2024): 963-990.
- [14] Reyna, José Luis. "El desarrollo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en la postguerra." (1967): 291-296.
- [15] Chraki, Fahd Boundi. "Estructuralismo latinoamericano y neomarxistas: el origen del proceso de subdesarrollo de la periferia." *Apuntes del CENES* 32.55 (2013): 9-31.
- [16] Quijano, Aníbal. "Colonialidad del poder, cultura y conoci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Dispositio* 24.51 (1999): 137-148.
- [17] Dorfman, A., and A. Mattelart. "Cómo leer al pato Donald." Buenos Aires: Siglo Veintiuno (2009).
- [18] Martuccelli, Danilo. *¿Existen individuos en el Sur?*. LOM ediciones, 2010.
- [19] Quijano, Aníbal. "Colonialidad del poder, cultura y conoci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Dispositio* 24.51 (1999): 137-148.
- [20] Martuccelli, Danilo. "Problematizaciones de la modernidad y de la moderniz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Desarrollo económico* 60.232 (2021): 253-274.
- [21] SJ, Eduardo Silva. "Pensar el malestar. La crisis de octubre y la cuestión constitucional." *Revista de Filosofía (Chile)* 77 (2020): 275-279.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Latin America's Autonomous Development: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Zhao Jiawe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colonial legacies continue to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tructures of Latin America, aiming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limit th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self-reinforcing process of these multiple constraints. First,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concept,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ostcolonial theor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ubsequent study. The second part examines the three major manifestations of colonial legacies in Latin America, demonstrating both the applicability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theory in the region.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how the three colonial legac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pheres are reproduced in the region through the "politics – economy – culture – politics" cycle, and how they continue to hinder the process of Latin America'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Keywords: postcolonialism; Latin America; colonial legacies

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传播的 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

冯丽娜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90)

摘要: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 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应于“有形、有感、有效”的工作要求, 视觉叙事成为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理念具体化、形象化、大众化的重要方式。本文立足于视觉传播理论, 剖析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叙事的生成逻辑; 进而历时性地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不同阶段视觉传播的主题内涵、典型媒介与叙事功能; 在此基础上, 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彰显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促进内容与形式融合创新三个层面, 提炼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以期对民族地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文化; 视觉图像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疆文化的创生机制与传播策略”(课题编号:2023ND B1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17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乎中华文明的赓续、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进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 视觉传播本质上是一场符号系统的建构。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不断改进民族工作, 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尤其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 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视觉文化时代, 如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视觉意象和标识性符号, 形塑凝聚性的民族叙事, 从而系牢大团结的文化纽带,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已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内蒙古作为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 不仅积淀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优良传统, 更在“模范自治区”建设进程中, 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然而, 学界对其视觉叙事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的系统梳理尚不充分。考察内蒙古自治区此项工作的发展轨迹与有效做法, 对于发掘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文化资源, 建立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机制, 推动地域文化创造性转化以及“全面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具有重大意义。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传播的生成基础

视觉传播以视觉符号、实物载体、形象与场景等可视化要素为介质, 借助图像、影像、艺术、景观等形态, 承担价值阐释、情感联结与认同建构的功能, 是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环节。视觉图像的“出场”, 既源自媒介演化对传播形态的迭代需求, 亦体现意识形态从政治话语转向生活话语的内在趋向, 更是内蒙古立足区域实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知可感可触的现实选择。

(一) 视觉传播以“可见的”形式记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传播的本质在于交换信息、建构关系并生成意义, 而这一切皆离不开符号的介入。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历史既是多民族交融汇聚的过程, 也是民族核心价值观念持续传承的历程。视觉图像是政治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鲜

作者简介: 冯丽娜(1989—),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媒介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

明表征。图像的拉丁词源“Imago”本就关联着精神寄托，古代先民制作图像旨在达成逝者的另一种“在场”。文化史家布克哈特将视觉图像视作“人类精神过去各个发展阶段的见证”。“除了影像，还没有任何一种遗物或古文献可直接确证各朝代人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²约翰·伯格更强调，除影像外，尚无其它遗存能直接确证古代人们的生活世界。例如，纪录片《航拍中国》呈现的同心清真大寺，既是宗教圣地，亦是红军建立首个县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的革命旧址，其视觉形象确证了共同体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可以说，图像是在长期生产实践与社会实践中凝结的文化形态，蕴含着民族的文化基因，形塑着特定的视觉文明。

（二）视觉图像是民族精神的意象化表征

“意象”是由表象提炼而成的理性形象，是客观物象与主体理解的辩证统一。视觉传播以“观看”为核心，而观看行为本身并非机械的生理反应，而是具有选择性。视觉文本的解读与观者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面对视觉图像，人们经由形式感知而产生移情，并结合实际经验体会其生活意涵，这构成了图像的“自然意义”。然而，单凭概念和形式分析难以穷尽其全部内涵，必须借助充分的联想和情境“增补”，才能把握意义全貌。更进一步，视觉传播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社会事件的呈现，必须结合时代的整体精神趋向加以理解。这要求我们不但要关注自然主题和图示主题，还需关联宏观的文化语境。亚里士多德将摹仿视为学习的快乐来源，但这种摹仿并非对外界的被动复刻，而是借助想象力在内心构建图像，为创作者的意图留出“余地”。想象不仅介入图像创制，也驱动着效仿行动的发生，从而使图像表意成为一种能够促使后续行动发生的演述过程。可见，图像创制与阐释共同构成意义生成的完整链条。

（三）视觉图像是一种“对事物的反思”

视觉产物固然具有表现性，但若缺乏“目的性”便无从完成。贡布里希指出，“绘画是一种活动，所以艺术家的倾向是看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³所谓“天真之眼”并不存在，所有的视觉文本都是再现与阐释。拉康的镜像理论表明，婴儿辨认镜像的能力，说明看似自然的观看实为文化行为的产物。观看的选择性使图像非但不是现实世界的机械还原，更是融合了意志、情感、态度和认知的经验关照与意义再造。概言之，视觉图像必定是主体反思的建构物。

视觉图像之所以能借具象表达抽象，在于它是意图的视觉呈现。米歇尔认为，其“呈现”如同一种“腹语”行为，色彩、布局、情绪等均可成为载体。艾克提出的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和受众意图等概念，正说明图像是多重意图交汇的场所，其内核是共通的民族精神与价值取向。中国诗学传统中早就有“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即当语言难以表意时，可依托“象”来通达。这里的具象性，不是简单的机械再现，而是主观体验与客观物象的对映，实现了从“形象”到“意象”的飞跃，进而打破物质与精神的界线，使情感与价值得以转述。从文字到图像的转换，不仅意味着阅读文化向观看文化的位移，更表征着以话语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向以图像为中心的模式转变。

二、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传播的历史考察

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生和展开的再现过程，其携带的文化意义标记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往事。”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作为模范自治区，其视觉图像凭借对民族精神的深度刻画，将独特的历史记忆与国家情感交织融合，以图像、雕塑、壁画、摄影等形态紧贴时代话语，生动建构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视觉图谱，彰显了内蒙古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属性，有效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新中国建设时期：国家建构与民族团结的意象奠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底子薄、基础差，急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投入建设。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构，既要旧有落后的观念，也需传播主流价值。此时，视觉图像将国家认同、制度优势与革命理想等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可触的形象，为政权巩固与社会风尚塑造提供了有力支持。内蒙古的宣传思想工作围绕四个主题展开：歌颂党的领导，增进对新中国的认同；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助图景；记录边疆建设与工业起步的历程，再现“齐心协力建包钢”等历史篇章；塑造“草原儿女心向党”的主流形象。

纪实影像的权威叙事。新中国成立后，主流媒体以纪实镜头定格自治区成立、民主改革等重大场景，以图

² 约翰·伯格 观看之道[M].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7-8.

³ 贡布里希.艺术与幻觉[M].卢晓华等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101.

⁴ 李维军.视觉说服与意象创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图像叙事[J].青海社会科学,2023,(02):130-139.

文互构完成合法性叙事。1951年,《内蒙古画报》创刊三周年,推出大型画册《内蒙古建设》。其中“齐心协力建包钢”专题,用镜头完整呈现了从奠基到建成,各族职工并肩奋斗的历程,将工业建设与民族团结价值灌输于一帧帧画面。这些影像不仅成为见证民族地区工业化的档案,更以可视化形式传递出各民族共同建设祖国北疆的理念,持续深化着国家认同、集体认同与民族认同。

宣传绘画与通俗图像的日常叙事。年画、宣传画、连环画等以大众化形式深入基层,把民族团结、劳动光荣等价值转化为群众易于接受的形象。《内蒙古画报》社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人人敬爱毛主席》《劳模会见云主席》等自治区首批年画。这些作品多以暖色调渲染饱满昂扬的人物,反复运用旗帜、麦穗、骏马等象征物,通过携手劳作、共庆新生等构图,突出了大家庭的同体性与一致性,让国家意识与集体观念潜移默化地走进千家万户。

民族电影的艺术化情感链接。1948年中央宣传部颁布的《电影工作指导方针》明确电影是“阶级斗争之利器”。这一定位锚定了新中国电影的方向:“内蒙古民族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建构‘普天之下皆同心’的国家意识。因而,银幕上不论敌我斗争,还是歌舞爱情,都有国家在场。”⁵《内蒙人民的胜利》《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晨曲》等作品,围绕“解放”与“建设”双主题,展现草原儿女翻身做主、投身建设与保卫家园的历程,使国家意识与民族团结理念在银幕叙事中获得共情化表征,实现了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深度认同。

“乌兰牧骑”的在场化传承。“乌兰牧骑”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以短小精干、装备轻便的特点,又被称为“红色文艺轻骑兵”。成立六十余年来,“乌兰牧骑”长年驰骋于北疆,以轻便的舞台视觉、歌舞造型和现场宣讲,搭建起流动的、贴近性的传播模式,在与牧民群众的面对面的互动中,完成意识形态的柔性传输,成为巩固边疆稳定、服务基层群众的红色视觉阵地。

公共空间的场景化浸润。遍布城乡的墙体标语、集会景观与公共壁画,以常态化、场景化方式,把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理念嵌入日常空间,用简洁鲜明的视觉符号持续强化主流价值导向,为内蒙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奠定了坚实的视觉记忆与历史基础。

(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开放包容与文化自觉的视觉凝练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视觉传播逐步从政治宣教转向服务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大局,着力传承优秀文化,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呈现出从显性灌输向隐性浸润、从政治认同向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的跃迁。

纸媒图像向文化叙事演进。《内蒙古画报》1979年复刊后,依托《今日内蒙古》《群英谱》等栏目及纪念特刊,系统记录了牧区改革、工业建设、口岸开放与民族团结的成就。纸媒镜头语言开始更多地呈现草原生态、民俗节庆和城乡变迁,生动讲述北疆发展故事,不断强化对家乡、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美术创作再现共生共荣的生活图景。哲里木版画以质朴厚重的风格描绘草原生活、民族历史和团结主题。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劳动场景、家园意象,深刻诠释了“各民族都是一家人”的情感。“三千孤儿入内蒙”等题材,通过超越血缘的亲情叙事,把一家亲的价值理念具象化为可感可知的情感符号。同时,围绕昭君出塞、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经典题材创作的油画、国画,亦将历史佳话转化为凝聚认同的视觉资源。

民族电影以情感叙事锚定家国情怀。此时期民族影视立足于内蒙古地缘文化,实现国家记忆的地方性转码,呈现出高辨识度的视觉风格。动画片《国家的孩子》深情回望历史事件,《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等影片则将个人与部族命运同国家前途紧紧相系,在壮阔的影像中传递深沉的家国大义,使观众在审美体验中深化对共同体的精神认同,排斥生硬说教,完全以跨越民族的关爱、坚守与亲情抵达人心。

非遗视觉符号的现代转化与生活化浸润。蒙古族刺绣、皮艺、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活态传承中完成现代转化。民间艺人将石榴、牡丹、龙凤、长城等中华文化符号融入创作,使日常用品成为传播共同体理念的微型载体,一针一线中寄托着团结、吉祥的寓意,让主流价值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地显现。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政治引领与沉浸叙事的精神升华

进入新时代,内蒙古各项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视觉传播迈入体系化、数字化、全域化的新阶段,实现了从局部实践向整体布局、从传统形态向数字融合、从单向传播向全民共创的跨越。

主流叙事的主题化可视呈现。主流媒体系统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模范自治区建设事迹,以可视化的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民族工作主线生活化、日常化。“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主题图片展等,用一手影像将政治话语转化为看得见的发展成就。值得关注的是,《内蒙古影像方志》以103集微视频实现全区旗县区全覆盖,以“历史溯源+当代发展”的双线叙事,填补了民族地区影像方志体系的空白,成为

⁵ 胡谱忠. 骏马飞驰光影永驻内蒙古民族电影 70 年[J]. 中国民族, 2017, (07): 70-72.

铸牢共同体意识的视觉教材。

艺术创作深度开掘主流叙事。舞剧《骑兵》以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部队的革命历程为叙事主体,首创“以人演马、人马合一”的原创肢体语言,将蒙古马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精神意象,把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转化为舞台震撼力。动画短片、美术等重大主题作品,形成梯队式成果,以温情叙事和青春表达实现从地域故事向共同体故事的有效跃迁。

文物展陈建构共同体史实。文物展览以实证化、具象化的优势,将红山玉龙、鸡冠壶、昭君题材文物等转化为承载共同体叙事的视觉证据。内蒙古博物院推出“六合同风”“北疆印迹”等展览,以文物串联起各民族交融的历史脉络,无可辩驳地阐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从根源上夯实了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

新媒介视觉的数字化传播。融媒体平台、短视频、微纪录片、VR展厅与互动H5构筑起全效传播格局。

《长城长》《黄河魂》等作品,用短小鲜活的形式把宏大主题转化为易于传播的网络视听产品,推动受众从被动接收变为主动参与和再创作,使主流价值牢牢占据网络阵地。

纵观七十余年演进,内蒙古视觉传播围绕国家发展与民族工作重心,媒介形态完成从纸媒、影画到数字、场景的融合升级,叙事逻辑实现了从地方叙事到共有精神家园叙事的整体攀升,形塑了以物证史、以美传情、以景润心、以数聚力的实践路径,为时代提供了兼具历史厚度与创新活力的北疆方案。

三、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传播经验

视觉传播以图像、影像、符号与场景为载体,以既可亲又可感的方式,成为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的重要途径。内蒙古将铸牢主线贯穿于宣传思想、文化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全程,生成了坚持党的领导、深挖文化内在关联、推动内容形式多样融合的系统性经验。

(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视觉传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党的引领是保证视觉传播始终处在正确政治方向上的决定因素。内蒙古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与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使策划、生产、审查等全链条始终服务于铸牢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在政治引领上,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以是否有利于增进“五个认同”、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为首要评判标准,坚决守住意识形态阵地,杜绝任何弱化国家认同、伤害民族感情的视觉呈现。在组织领导上,将视觉传播工作纳入意识形态责任制和精神文明建设考核,使之从“软任务”变为“硬约束”,形成任务明确、责任到位的闭环。在队伍锻造上,强化对宣传干部、媒体记者、文艺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培训,引导其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以确保在视觉实践中自觉坚守正确导向。在阵地管理上,对各类展览、影像、公益广告和新媒体内容严格先行审核,守好公共空间视觉叙事的文化安全底线。正是因为始终牢牢把握住党的领导,内蒙古的视觉传播才能站稳国家与中华民族立场,为边疆稳固和高质量发展铸就坚强的思想堡垒。

(二) 深挖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内在关联,夯实视觉传播的文化根基与历史根脉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打造具有内蒙古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品牌,就是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让根植在北疆大地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⁶内蒙古作为首个省级民族自治区,红色底蕴深厚,且孕育了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等宝贵财富。在视觉传播进程中,内蒙古坚决摒弃将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割裂、对立的偏误,始终坚持以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指导,深挖二者的内在统一性。在历史叙事上,通过博物馆展览和纪录片系统呈现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长期交融共生的历程,用影像清晰说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格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文化符号上,致力于将马头琴、那达慕等民族符号阐释为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表达,赋予其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视觉底色,而不再仅限于“单一民族符号”的狭义解读。在文化交融层面,视觉产品既呈现民族文化的原生风采,更突出各民族互学互鉴、共同创造新文化的事实。无论饮食、节庆还是建筑,均聚焦于“共有性”与“一体性”。在精神价值上,将蒙古马精神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三北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品格,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在边疆的具象呈现。历代各民族携手护边、治沙绿化的奋斗场景,经由形象化、故事化的处理,将地域精神升华至国家精神高度,使受众在视觉浸润中深刻感悟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

(三) 推动内容与形式融合多样,提升视觉传播的吸引力、感染力与影响力

铸牢共同体意识的视觉传播,必须在确保方向正确的同时,贴近实际、生活与群众,做到既有“意义”也有“意思”。内蒙古坚持守正创新,建构起历史、文化、现实与精神“四位一体”的内容体系,让宏大叙事有着坚实的实体支撑。在形式创新上,打破刻板的宣教模式,于主题展览中综合运用图文、实物、场景复原与沉浸式体验,让观众身临其境;在影像传播中,大量运用微纪录、动漫、MV等年轻化形态,将大道理蕴藏于细节故事中;在公共空间,依托文化墙、艺术装置与景观叙事,使共同体意识融入城市风貌和乡村肌理。在载体拓展上,实现了传统与新兴媒体、固定与流动载体的联动。线下做实博物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的视觉主题;线上依托融媒体矩阵推出轻量化、易传播的爆款产品,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同时利用基层宣讲、

⁶ 刘吉昌,曾醒,金炳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其构筑原则和路径[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2,(02):5-12.

文化下乡等流动载体,将视觉传播延伸至牧区最深处。在场景融合上,将视觉传播贯穿国民教育、文化建设和日常生活全过程,让青少年在校园文化浸润中成长,让群众在文明创建中处处感知共同体理念。在效果评估上,通过反馈机制不断优化,对效果突出的形式大力推广,对脱离群众的宣教方式及时革新,使视觉传播持续向更富感染力、更暖人心的方向演进。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确保事业方向不偏;深挖文化内在关联是根基,确保传播有源有流;内容与形式融合是路径,确保价值能够入脑入心。习总书记指出:“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认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⁷“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⁸。步入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长期的战略任务。内蒙古将继续以党的领导为统领,以文化认同为根基,以创新创造为驱动,不断提升视觉传播效能,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族群众心中深深扎根,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贡献更大力量。

参考文献:

- [1] [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M].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7-8.
- [2] [英]贡布里希.艺术与幻觉[M].卢晓华等,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101.
- [3] 李维军.视觉说服与意象创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图像叙事[J].青海社会科学,2023,(02):130-139.
- [4] 胡谱忠.骏马飞驰光影永驻内蒙古民族电影70年[J].中国民族,2017,(07):70-72.
- [5] 刘吉昌,曾醒,金炳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其构筑原则和路径[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2,(02):5-12.
- [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30).
- [7]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001).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in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Inner Mongolia

Feng Lina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Abstract: Ethnic unity is the lifeline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central to the overall caus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emphasised that “we must tell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ll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work to be “tangible, perceptible and effective”, visual storytelling has become a vital means of concretising, visualising and popularising the concepts of “sharing weal and woe, honour and disgrace, life and death, and destiny”. Grounded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visual narratives in Inner Mongolia aimed at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a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t then traces, in a diachronic manner, the thematic connotations, typical media and narrative functions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ilding upon this, the paper distils practical experiences with broader applicability from three dimensions — upholding the Party’s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highlighting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ethnic cultures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ontent and form —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guidance for relevant work in ethnic regions.

Keywords: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ethnic culture; visual imagery

⁷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30).

⁸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001).

AI 古村落转译工程——以南社古村落为例¹

陈 泽, 龙海鸣, 张慧文

(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419)

摘 要: 古村落作为农耕文明的活态遗存, 其保护正面临人工解读迟缓与数字化表征粗疏的双重困境。本研究以南社古村落为典型样本, 依托其八百年积淀的“龟背船形”聚落意象与宗族耕读文化,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从多源数据采集到AIGC工具转译的完整框架, 借助ComfyUI与即梦等平台实现装饰纹样的智能生成与风格化渲染, 旨在平衡原真性留存与现代化表达的张力。研究表明, AI转译显著提升了文化符号提取的效能与精度, 为静态遗产注入动态传承活力, 为南社及更广泛区域的古村落数字化保护与文旅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 南社古村落; AIGC; ComfyUI; 即梦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21

一、引言

传统村落保存着一方水土的历史记忆、手工技艺与社会组织方式, 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但快速城镇化和人口外流让大量古村陷入建筑老化、人口空心、风貌破坏和文化断裂的困境。近年来国家同时推进文化数字化和乡村振兴, 明确提出用数字技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逐步覆盖遗产调查、测绘、修复、展示和运营各环节, 古村落保护开始从依赖个人经验转向数据驱动与智能协作, 为传统聚落的数字化存续打开了新局面。

南社古村位于东莞茶山镇, 始建于南宋, 是谢氏宗族世代聚居形成的岭南农耕型聚落。村落顺应自然地形, 背山面水, 西门塘、百岁塘、祠堂塘、肚蔗塘四口池塘沿东西向串联成水系主轴, 整体轮廓呈“龟背”或“船形”, 既合风水理念, 也适应岭南湿热气候。村中保留明清祠堂三十余座、古民居两百多间, 木雕、石雕、砖雕、灰塑和各类传统纹样数量可观, 承载着广府建筑工艺与岭南民俗的丰富信息。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名村, 南社的保护与活化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不过在长期实践中, 问题不断积累: 人工测绘和记录效率低, 样本覆盖面有限; 装饰纹样和空间结构难以量化分析; 修缮主要靠老师傅的经验判断, 原真性容易在施工中流失; 文旅开发长期停留在门票观光和商铺租赁, 文化符号的转化流于表面, 体验方式大同小异, 同质化问题严重。测绘效率、符号量化、修缮规范和活化路径这几方面相互牵连, 共同构成保护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急需新的技术手段介入, 否则村落的文化内涵会在商业化过程中逐渐空洞化。

AIGC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即梦、ComfyUI等工具已经在纹样生成、视觉设计、数字媒体创作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即梦擅长中文语境下的文生图任务, 能够快速生成海报、插画、纹样、文创图案等素材, 适合用于古村落的视觉传播和品牌塑造。ComfyUI基于节点式 workflow, 支持风格微调训练、批量纹样生成和传统图案复刻, 可以实现古村落装饰符号的自动化、批量化输出, 让传统纹样的数字化传承变得可行。然而, 将AIGC工具系统性地用于古村落文化符号转译的研究目前还很少——尤其是以南社为对象的实践探索几乎空白, 现有成果寥寥。

从南社古村已有的研究来看, 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历史价值、空间格局、保护规划、开发模式、自然教育和品牌形象等方面。已有研究指出南社面临的空心化、产权复杂、基础设施薄弱、过度商业化、风貌受损等困境, 并提出了产权改革、新旧村统筹、股份合作、原住民回迁、文旅融合等建议。但一个明显的空白在于:

作者简介: 陈 泽 (2005—),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生成和古建筑研究;

龙海鸣 (1994—),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高校人工智能应用研究、数据新闻研究;

张慧文 (1981—) 女 硕士, 副高级, 研究方向为媒体融合、智媒传播方向。

把 AI 和 AIGC 工具同南社文化符号转译结合起来的系统研究尚付阙如, 尤其缺少从“符号识别—量化—AIGC 转译—应用”完整链条展开的实证工作。这个缺口亟待弥补, 才能为古村数字化活化提供可参考的完整路径。

这一缺口之所以长期存在, 一个根本原因是学界对古村文化符号的分类体系还不够清晰。本文将古村落文化符号分为三类: 物质空间符号包括整体格局、街巷水系、建筑形制和结构构件, 构成聚落的基本肌理; 装饰艺术符号涵盖木雕、石雕、砖雕、灰塑、纹样和色彩, 集中体现建筑的审美特征; 非物质文化符号则包括宗族礼制、民俗活动、营造技艺和耕读传统, 承载村落的精神内核。三类符号相互交织, 共同构成古村文化的完整图谱。它们所具有的地域性、传承性、象征性和可转译性, 使其成为 AI 识别与转译的合适对象, 也为数字化保护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单元。

在理论立场上, 本文以活态保护为根本原则。活态保护的核心, 是在保持历史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 让村落的生活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继续运转——不能把古村变成封闭的博物馆, 因为活态遗产一旦脱离日常生活就会迅速消解。其基本原则包括最小干预、可识别、可逆、功能适配和社区参与, 每一条都强调克制和审慎, 而非大拆大建。其中社区参与尤为关键, 因为村落文化的根扎在世居居民的日常起居和仪式实践中, 脱离社区的保护等于舍本逐末。AI 转译必须以活态保护为底线, 用数字化手段保存文化基因, 再通过现代设计语言实现文化再生, 三者缺一不可。最终目的不是展示技术能力, 而是让古村的文化生命力在当代语境中继续生长。

基于上述框架, 本文对“AI 转译”作如下界定: AI 转译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对古村落文化符号进行数据采集、智能识别、特征提取、参数量化、模型构建、抽象简化、创新重构和场景落地的完整过程。其关键在于, 把原本难以量化的传统视觉语言和空间语言转化为可计算、可编辑、可复用的数字资产——技术在这里充当文化与当代生活之间的桥梁, 实现“文化符号—数字模型—现代应用”的闭环转化。

在理论层面, 本文旨在厘清 AI 转译古村落文化符号的内涵、框架与技术逻辑, 引入 AIGC 工具丰富文化符号数字化转译的理论体系, 为岭南建筑文化的数字化研究提供新的切入角度。在实践层面, 本文以南社古村为具体案例, 探索可落地的 AI 转译技术路径与应用方案, 服务于数字建档、精准修缮、空间更新、文旅体验提升和文化传播, 力求为同类古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保护参考。论文主体依次涵盖: 相关理论与技术基础、南社古村文化符号体系解析、AI 转译的技术流程与实现方法、ComfyUI 与即梦在符号转译中的具体应用、AI 转译在保护修复与文旅设计中的实践案例、现存问题与优化策略, 以及结论与展望。整体框架遵循“理论—技术—案例—应用—对策”的结构。

二、南社古村落文化符码体系解析

南社古村落始建于南宋末年, 谢氏先祖谢尚仁从浙江会稽南迁至东莞茶山, 见此地山水环抱而定居, 繁衍至今已八百余年。村落背山面水, 地势北高南低, 负阴抱阳。四口池塘沿东西方向串联, 构成水系骨架。村墙围合四周, 设樵楼二十一座以司出入。墙内街巷以麻石铺路, 单侧设排水明渠, 雨水顺势汇入塘中, 形成自洽的排蓄回路。作为珠三角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村之一, 南社是研究岭南农耕社会、宗族制度与营造技术的典型样本。

空间布局上, 四口塘为东西轴心, 祠堂群沿轴线两侧排开, 形成“塘—祠—宅—塘”的递进序列。谢氏大宗祠居中轴核心, 三开间三进院落, 青砖厚墙, 红砂岩勒脚, 抬梁与穿斗混合梁架, 规模与规格在全村居首。两侧依次排列二十余座支祠, 规模递减而规制不乱, 宗族等级通过建筑体量差异直观呈现。民居多为三间两廊或明字间形制, 青砖黛瓦, 天井狭长幽深, 配合冷巷、高窗与通透隔扇, 构成被动式通风降温体系, 在岭南湿热气候下效果显著。四口塘同时承担饮用、灌溉、排水、消防等多重功能, 并调节微气候、映射建筑倒影。

装饰遗存以石雕、砖雕、木雕、灰塑及陶塑建筑构件著称。木雕施于梁架、雀替、隔扇, 大宗祠封檐板木雕工艺尤为精美。石雕以红砂岩为材, 用于柱础、门框、桥栏, 刀工刚劲, 朴拙粗粲。砖雕集中于门楣、墀头、照壁, 线刻与浮雕兼施, 层次分明。灰塑附于屋脊、檐角、门楼, 以石灰、糯米、纸筋为料, 施以彩绘, 色泽经久不褪。纹样方面, 回纹、如意纹、方胜纹强调对称与连续, 构成视觉节奏底色; 缠枝纹、卷草纹沿梁枋横向串联构件; 蝙蝠纹、石榴纹、桃纹以谐音寄寓福、多子、寿之祈愿。色彩以青灰为主调, 辅以木原色、黛青、朱红、墨黑、素白, 整体沉稳内敛, 与岭南尚素忌艳的审美传统一致。

在物质空间与装饰之外, 南社的文化根基更深地扎在宗族礼制和日常实践中。谢氏以祠堂为枢纽维系宗法秩序, 大宗祠主持春秋两祭与族中大事, 支祠负责各房日常事务。祭祖仪式中族人依辈分行礼, 供品、祭文、鼓乐皆有定制。南社历史上文教兴盛, 明清两代出过九位进士, 村中设书室延师授课, “耕读传家”落实为子弟白天耕作、夜间读书的生活方式。民俗方面, 南社斋醮是最具标识性的仪式, 每隔三年举办一次, 集祭祀、巡游、粤剧、

宴饮于一体,全村参与,历时数日,既是酬神的宗教行为,也是凝聚宗族的社会机制。此外,南社至今保留着部分传统营造技艺的活态传承,老匠人仍能依古法操作,其技法与口诀构成不可替代的技艺谱系。

总体而言,南社古村落的文化符码是一个有机联结的整体——空间格局为骨架,装饰纹样为肌肤,宗族礼制与民俗实践为灵魂,三者互为表里、彼此嵌套,共同构成岭南农耕聚落的完整面貌,为后续 AI 识别、量化与转译提供了丰富且可操作的素材基础。

三、相关学理与技艺基础

古村落的文化内涵并非不可拆解的浑然之物,而是可以分门别类加以分析的符号体系。这个认识有其理论根基。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区分了“能指”与“所指”,皮尔斯则将符号分为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三类。两套理论共同指向一个基本判断:符号是意义的载体,不等于事物本身,这为古村落符号的分类提供了认识论依据。循此思路,本文将古村落的符号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物质空间层,包括聚落的整体格局、街巷水系的走向、建筑形制与结构构件的搭接方式,这些构成村落空间的骨架与肌理,是可以测绘、建模、做三维还原的实体。第二层是装饰纹样层,涵盖木雕、石雕、砖雕、灰塑的造型语言,以及纹样母题和色彩搭配中的视觉编码,它们附着在物质空间之上,通过视觉叙事传递审美偏好与民间信仰,是匠人手艺和集体趣味的结晶。第三层是非物质层,包括宗族礼制的规范、民俗活动的仪轨、营造技艺的口诀和耕读传统的精神内核,这些东西不以物质形态出现,却渗透在村落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文化生命力真正的来源。三个层次并非平行排列,而是彼此支撑、互为因果。物质空间为装饰纹样提供附着的基底,纹样给空间增添审美辨识度,非物质层则为前两者注入意义的深度,抽掉任何一层,其余两层都会失去依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套符号体系之所以能成为 AI 识别与转译的操作对象,根本原因在于它具备四项特征:地域性使每个聚落都有可辨识的个体差异,传承性使其在时间线上呈现可追溯的变化轨迹,象征性使其超越实用功能而承载精神层面的意义,可转译性则意味着它有可能从一种表达媒介迁移到另一种而不丢失核心信息。正是这最后一项特征,构成了从传统视觉语言跨向数字语言的逻辑起点。

不过,符号的提取和转译如果脱离保护伦理的约束,很容易沦为一种技术性的肢解与消费。活态保护的理念为此划定了底线。这一理念可以追溯到两个关键节点: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活态遗产”概念的界定,二是日本 1950 年《文化财保护法》中“无形文化财”制度的先行探索——这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以法律形式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框架的立法尝试,把保护对象从有形的建筑和器物扩展到技艺、表演和仪式等无形之物,为后来的国际公约提供了制度蓝本。两者共同确认了一个核心观点:遗产的生命力不在于被封存,而在于被使用、被传承、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循此共识,活态保护强调在保持历史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让村落的生活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继续运转,反对把古村变成标本式的“露天博物馆”。道理很直接:活态遗产一旦脱离居民的日常起居和仪式实践,就像被连根拔起的树,外形还在,里面的生机已经断了。落到操作层面,活态保护有五条必须遵循的准则——最小干预,能少动就少动,不搞大拆大建;可识别性,新旧介入的边界要清楚,不能刻意混淆;可逆性,给未来的调整留余地,不做无法挽回的决定;功能适配,让空间继续为当代生活服务,而不是沦为纯粹的展品;社区参与,村落文化的根扎在世代居民的日常里,脱离社区主体的保护只是徒有其表。这五条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对每一种介入手段的伦理审查清单,任何技术方案在落地之前,都要经受“是否最小干预”“是否可逆”“是否尊重社区主体性”的逐一追问, AI 转译也不例外。

有了符码分类和活态保护伦理这两层框架做支撑, AI 转译的含义和边界就比较清楚了。简单来说, AI 转译就是借助人工智能的感知、推理和生成能力,把古村落的文化符号从物理世界搬进数字世界,再送回实际应用场景,走完一个完整的闭环。落到南社这个具体案例上,整个过程大致分几步。首先是数据采集,研究者到村里实地踏勘,用高清摄影记录建筑影像、拓印纹样、采集色彩样本,整理出一套涵盖构件类型、纹样母题和色彩分布的图像数据集,这是后续所有工作的基础。接着是智能识别与量化,通过 AI 模型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自动分类和特征提取,把原本依赖人眼和经验的纹样信息转化为计算机可以处理的结构化数据,让传统装饰语言获得可度量的数值表达。然后是抽象简化和创新重构, ComfyUI、即梦这类 AIGC 工具拿到量化参数和风格描述后,对原始符号做风格迁移、元素重组和语义延伸,生成的新图案既带着传统的文化基因,又贴合当代人的审美口味。最后是场景落地,转译成果以数字图像、文创图案、空间装饰方案等形态,分别进入保护修缮、空间更新、文旅体验和线上传播这些具体场景。整条链路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把原本不可计算的传统视觉语言和空间语言,变成可计算、可编辑、可复用的数字资产。技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是文化的替代者,而是一座桥,一头连着传统,一头通向当代生活。通过“文化符号—数字模型—现代应用”这条转化路径,古村落的文化基因才能真正在数字时代

扎下根来，而不只是躺在档案馆里做一份安静的静态记录。



图1 南社古村 3D 建模图 通过 AIGC 制作

四、ComfyUI 与即梦在南社符码转译中的枢机作用及保护活化实践

即梦和 ComfyUI 虽然都属于 AIGC 图像生成工具，底层逻辑和操作方式却很不一样，正好可以互相配合，共同服务于南社古村落符号的多层次转译。即梦基于大规模中文语料训练的扩散模型，用户输入一段简短的文字描述，几秒钟就能生成视觉质量不错的图像，长处在于速度快、上手容易，适合前期快速试错和创意发散。ComfyUI 走的是另一条路，它以节点化工作流为基本架构，把图像生成的每个步骤拆成可视化的功能模块，用户可以自己编排从线稿输入、条件控制、风格约束、细节强化到批量输出的整条管线，长处在于精度高、可控性强，适合在统一风格标准下做大规模、标准化的符号产出。在本项目里，两者的分工因此很明确：即梦负责前期的创意探索和视觉方案快速验证，ComfyUI 负责中后期的批量化、风格化和高精度生产。

即梦在南社符号转译中最主要的用途，是把抽象的文化内涵变成看得见的图像。研究者用“岭南”“南社古村”“三雕一塑”“窗棂纹样”“回纹”“如意纹”“龟背格局”“水乡”“青砖”“灰塑”“朱红”“黛青”这些词构建提示词矩阵，通过调整措辞的组合和权重，引导模型生成符合南社地域气质的画面。这个过程中，提示词的编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翻译——研究者要在自然语言和视觉语言之间找到合适的对应关系，既不能太笼统以免输出变成泛泛的“中国风”，也不能太琐碎而把模型的生成空间框死。具体来说，即梦可以胜任好几类转译任务。输入“南社古村窗棂纹、新中式、对称、线条简洁、可用于雕刻”，模型就能快速生成适用于景观隔断、家具面板和软装面料的简化纹样。以“南社古村全景、岭南水乡、晨雾、青砖黛瓦”为引导，可以生成文旅宣传用的全景插画、节庆海报和导览底图，为南社品牌形象建设提供视觉素材。以“南社纹样、书签构图、留白、水墨晕染”为描述，则能产出书签、明信片、T 恤图案、徽章等文创产品的母稿，让符号从建筑表面迁移到可流通的商品载体上。此外，即梦还可以快速输出古村景观提升、沿街立面改造、室内软装搭配等空间效果预览图，为设计决策提供直观参考，降低方案沟通成本。

ComfyUI 的介入把转译工作从单件试制推向了系统化生产。它的核心能力有两点：训练 LoRA 模型，以及调用开源生图模型对每个生成步骤进行精确调控。工作流的搭建逻辑大致如下：先将 AI 识别阶段提取的南社纹样线稿导入输入节点，作为几何骨架；上色节点以南社传统的青灰、木原色、黛青、朱红为基准色板，同时允许调配部分现代色相；风格化节点是整条管线的核心，加载针对岭南建筑纹样微调训练的 LoRA 模型——即在预训练大模型中注入低秩小参数矩阵，以很低的训练成本让模型学会特定风格，既不破坏通用能力，又能精准锚定风格方向；细节强化节点借助 ControlNet 等插件，对线条粗细、对称精度、母题重复频率逐项约束，确保输出精度可直接用于雕刻、蚀刻、印刷等实体加工；最后在输出节点设定批量参数，一次性产出数十张风格统一而配色各异的图案，如下图二。在南社符号转译中，这套工作流是纹样复刻与再生，在精准还原原始纹样的基础上生成简化

版、现代版和抽象版等衍生变体，是建立统一风格的视觉资产库，为导视系统、文创产品和新媒体宣传提供成套素材，避免风格割裂。与 ComfyUI 侧重精控不同，即梦的优势在于快速发散，可一次性产出传统风、简约风、国潮风等多套方案，为设计决策提供多元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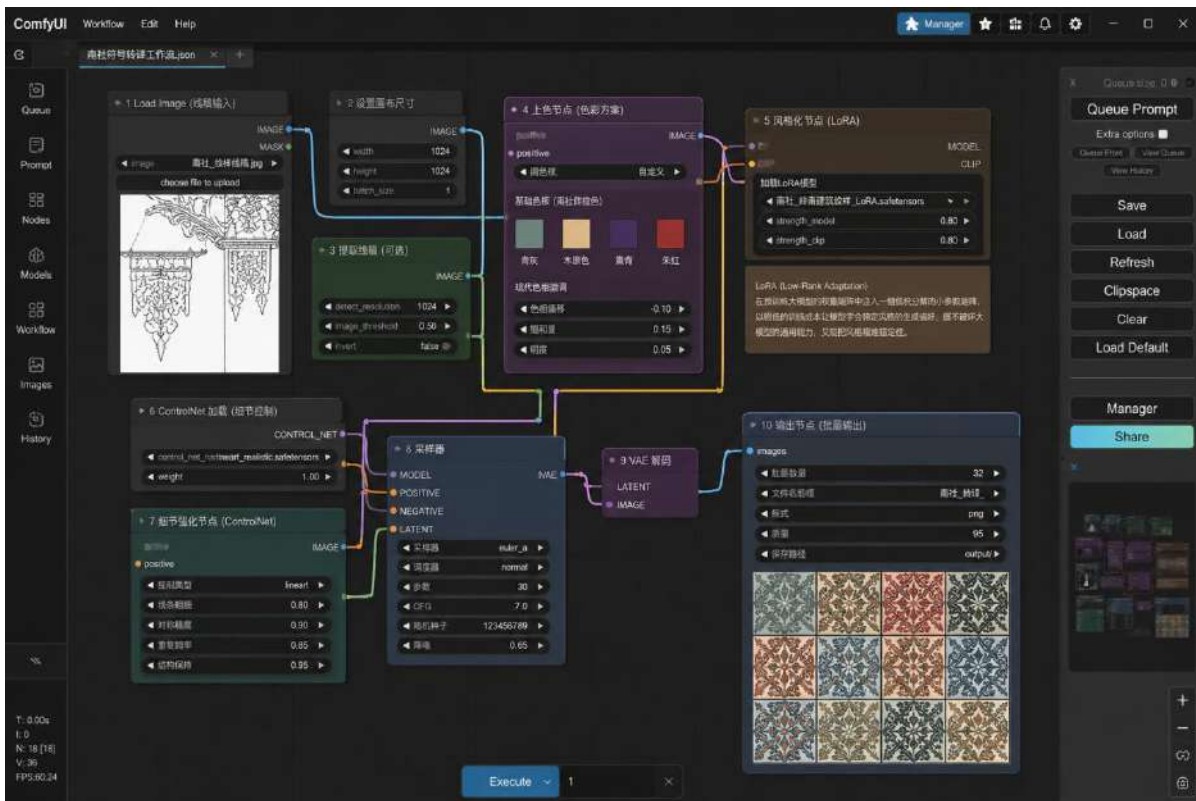


图 2 ComfyUI 工作流示图

即梦和 ComfyUI 的转译产出，最终汇聚成一系列可以入库、复用和落地的数字资产。具体包括：符号线稿库和矢量图形，作为后续衍生应用的几何基底；标准化装饰纹样库，涵盖南社核心母题的规范化数字版本；统一风格的视觉插画和海报系列，用于品牌形象和线上传播；多场景的效果方案图集；以及文创产品图案和南社 IP 形象的系列设计。在 IP 形象的构建中，灰塑鳌鱼是最具潜力的设计原型。鳌鱼在南社古村中栖于屋脊之上，口衔屋脊、尾翘天际，兼具镇火辟邪的风水功能与“独占鳌头”的科举寓意，在广府建筑灰塑体系中辨识度极高。AI 转译对鳌鱼 IP 的设计路径大致如下：首先通过高清摄影采集南社现存灰塑鳌鱼的多角度影像，提取其造型的核心特征——鱼身的鳞片排列方式、尾鳍的卷曲弧度、脊背的火焰纹走势、口部的张合姿态；随后由 AI 模型对这些特征进行参数量化，记录各部位的比例关系与曲线曲率；在此基础上，即梦以“南社鳌鱼、新中式、圆润可爱、适合盲盒、留白简洁”等提示词快速生成多轮概念草图，探索从写实到抽象、从威严到萌趣的不同风格方向；确定方向后，ComfyUI 加载针对南社灰塑纹样训练的 LoRA 模型，对鳌鱼形象进行精细化生成，逐项调控鳞片的疏密、色彩的层次、线条的粗细，确保最终形象既保留南社灰塑的原生气质，又适配当代文创的审美偏好。经此流程产出的鳌鱼 IP 形象可进一步延展为完整的角色体系：拟人化的鳌鱼主角搭配其衍生的家族角色，进而开发出表情包、动态贴纸、盲盒手办、联名商品、互动形象等数字化与实体化的商业载体，如下图四图五。使南社的文化符号从建筑屋脊走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这些资产统一编目入库，附上构件编号、纹样分类、色彩参数、生成日期、使用授权等元数据信息，形成一个可以长期维护和持续扩充的南社符号数字资产体系。

这些数字资产的价值，最终要在保护和活化的实际工作中才能兑现。在数字建档和遗产留存方面，AI 转译使“一栋一档、一物一档、一纹一档”的精细化管理成为可能。每一座祠堂、每一件雕刻构件、每一组纹样母题都可以拥有独立的数字身份，图像、线稿、矢量图、AIGC 生成成果和元数据信息统一归档，为学术研究、修复记录和传承教育提供随时可以调取的基础数据。即便实体建筑因岁月侵蚀进一步残损，它的文化信息已经在数字世界里获得了永久留存。在虚拟修复和纹样复原方面，研究者可以借助 AI 图像修复模型对残损木雕、砖雕、灰塑、彩绘的影像进行缺损区域的智能补全——模型根据残存轮廓和周围纹样的风格规律推断缺失部分的形态与纹理，再通过 ComfyUI 进行风格统一和细节强化，输出多套复原方案供比较选择。整个过程在不碰触原建筑实体的前提下完成虚拟修复，为后续的实体修缮提供有据可依的参照。在空间更新和景观提升方面，转译后的纹样以景观

隔断、地面拼花、导视边框、外立面涂装和夜景照明配色等多种形态嵌入南社公共环境，让整体风貌在新旧交融中保持协调又不失辨识度。在室内设计和软装应用方面，传统纹样与色彩融入隔断、家具、灯具、布艺和装饰画之中，共同营造新中式岭南风格的居住空间。即梦负责快速生成整体效果方案，ComfyUI 负责批量产出纹样和图案的高清文件，两者配合让设计从概念到落地的周期大幅缩短。



图3 鳌鱼 形象设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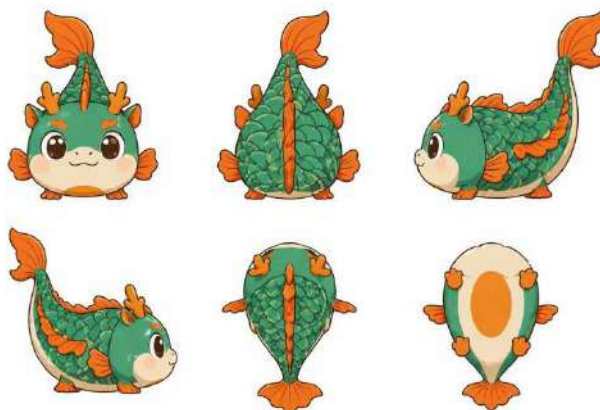


图4 鳌鱼 形象设计 六视图

五、结语

本文以东莞南社古村落为具体案例，围绕“文化符号—数字模型—现代应用”这条转化路径，探讨了 AI 技术介入古村落文化符号转译的理论框架、技术流程与应用实践。研究表明，古村落的文化符号并非不可捉摸的浑然之物，而是可以被系统识别、量化和转译的结构化体系。物质空间、装饰纹样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层次彼此嵌套、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可供 AI 操作的分析单元。在此基础上，即梦与 ComfyUI 分别承担了创意发散与精控生产的角色，二者配合使传统纹样的数字化传承从零散的手工尝试走向了有章可循的系统化流程。从数据采集到智能识别，从参数量化到 AIGC 生成，从数字建档到虚拟修复，从文创开发到空间更新，整条链路在南社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初步验证——AI 转译既能在不扰动原建筑实体的前提下完成纹样复原与方案比选，也能通过鳌鱼 IP 形象等载体让古村的文化符号走出屋脊、走进日常生活。

但本文的工作仍有不少局限。在数据层面，受调研时间和条件所限，南社现存构件与纹样的采集尚未做到全覆盖，样本的广度和精度都有提升空间。在技术层面，AIGC 工具对复杂纹样的精细还原仍存在偏差，LoRA 模型的训练效果高度依赖数据集的质量和标注的准确性，部分输出结果仍需人工干预和反复调试。在伦理层面，如何在技术介入与社区主体性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点，而非流于形式上的“村民评议”，仍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毕竟活态保护的核心不在技术方案的精巧，而在于村落居民是否真正认同并参与到文化遗产的实践中来。此外，本文的案例研究集中于南社一处，其技术路径和应用模式能否在形制、材料、文化背景各异的其他古村落中顺利迁移，还需要更多的跨案例比较研究来检验。

有几个方向值得深入。一是扩大数据采集的范围和精度，结合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拍与多光谱成像等手段，建立更加完备的南社数字档案。二是持续优化 AIGC 模型的训练策略，探索多模态输入、条件化生成等技术路径，提升纹样转译的精细度和可控性。三是将研究视野从南社拓展至珠三角乃至更大范围的岭南古村落群，在比较中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数字化保护范式。归根结底，技术只是手段，让古村落的文化基因在数字时代获得新的表达方式、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受众群体，使传统在当代语境中重新获得生长的能力——这才是 AI 转译的最终旨趣。

参考文献：

- [1]晏辞，赵凝，刘迪。基于 AI 的古建筑文化符号提取与室内设计应用实践研究 [J]. 中华民居，2025.
- [2]蔡雄波.AI 赋能岭南建筑非遗技艺传承创新路径研究 [J].2025(12).
- [3]李晗，刘洋。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古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研究[J].电脑知识与技术，2025,21(29).

- [4]张易, 汪军, 姚子刚。岭南农耕文化特色聚落: 东莞市茶山镇南社历史文化名村价值解析 [J].
- [5]蔡育新, 冼挺超。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利用思路探讨——以东莞市南社古村为实例 [J]. 小城镇建设.
- [6]王宁。东莞南社古村的视觉品牌形象研究 [J].2015 (12).
- [7]段春娥。从自然教育视角谈古村落保护与活化——以广东东莞南社明清古村落为例 [J]. 遗产与保护研究, 2018,3(2).
- [8]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9]张天歌。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路径研究 [J].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5(17).
- [10]徐谣, 周小慧。岭南文化符号在当代文化建筑中的地域性表达 [J]. 上海包装, 2025 (12).
- [11] 程叶青, 魏成。新时期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活化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6,41 (4).
- [12] 南江蛟, 冯大路, 孙略。人工智能辅助的中式传统纹样生成方法研究 [J]. 现代电影技术, 2026 (1).
- [13] 吴青.AIGC 赋能数字媒体设计的工具分析与未来趋势 [J]. 丝网印刷, 2025 (12).
- [14] 恭元伟。面向个性化体验的 AI 驱动互动视频生成系统研究与开发 [J]. 广播电视信息, 2026 (2).
- [15] 贾颖华, 周林兴, 贾千慧。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档案文献遗产的传播转向与路径优化 [J].2026 (3).

BoldAI-Based Translation Engineering of Traditional

Ze Chen, Haiming Long, Huiwen Zhang

(Dongguan City University, Dongguan, China)

Abstract:Traditional villages, as living heritage of agrarian civilization, are currently confronted with dual challenges: the inefficiency of manu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oughness of digital representation. Taking Nanshe Ancient Village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this study focuses on its over 800-year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turtle-back boat-shaped” settlement pattern and clan-base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farming and scholarship. An AI-driven translation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integrating multi-source data acquisition, semantic analysis, and AIGC technologies. By employing platforms such as ComfyUI and Jimeng, the study realizes automated extraction, generation, and stylized rendering of architectural component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 digital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aiming to balanc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with contemporary visual interpret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I-based transl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while enhancing visual expressiveness. This approach provides a novel pathway for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static preservation to dynamic 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fering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digit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innovation.

Keywords:Nanshe Ancient Village; AIGC; ComfyUI; Jimeng

融合户外教育与安全创新：构建山地运动可持续发展框架

向浩荣，罗晓珊*，林宇凯

(成都大学，成都 四川 610000)

摘要：随着山地运动参与人数突破4亿人次，其大众化发展与安全保障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2024年我国山地户外探险事故达274起，死亡84人。本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体教融合理念，采用问卷调查法(N=502)、案例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系统探究户外教育与安全创新的融合路径。研究构建了“教育赋能-安全创新-协同治理”三维山地运动可持续发展框架，明确了分级教育体系、智能安全防护、多主体协同等核心实施路径。实证结果显示，该框架可使参与者安全意识提升37.2%，事故应急处置效率提高41.5%。研究为山地运动安全防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支撑，也为国际山地运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山地运动；户外教育；安全创新；可持续发展；框架构建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43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全球山地运动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我国2022年山地户外运动产业规模达4620亿元，占户外运动产业总规模的22.22%。国家《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明确将山地运动作为全民健身的核心载体，但快速发展背后隐藏着严峻的安全隐患。《2024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山地事故占全年户外事故总量的81.8%，其中徒步项目事故占比73%，登山项目死亡率高达20%，迷路、被困、滑坠成为主要事故类型。

与此同时，户外教育作为风险防控的前置手段，其价值尚未充分发挥。现有山地运动参与者中，仅23.1%接受过系统户外安全教育，67.8%的事故源于安全意识薄弱和技能匮乏。如何通过户外教育与安全创新的深度融合，破解山地运动“高速发展与低安全水平”的矛盾，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命题。

(二) 问题提出

当前山地运动发展存在三大核心矛盾：一是参与者大众化与安全素养不足的矛盾，20-30岁核心群体更注重项目趣味性而忽视安全保障；二是安全需求升级与防控手段滞后的矛盾，传统人防为主的模式难以应对复杂山地环境风险；三是产业快速扩张与可持续机制缺失的矛盾，97%以上的产业主体为服务型组织，缺乏标准化安全管理体系。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安全因素分析或教育模式探讨，缺乏对“教育-安全-可持续”三者融合机制的系统性构建，难以满足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

(三)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整合可持续发展理论、体育管理学与安全科学等多学科知识，构建山地运动三维可持续发展框架，填补现有研究在多维度融合机制方面的空白，丰富户外运动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

实践意义：基于实证数据提出可操作的实施路径，为政府部门制定监管政策、企业完善安全管理、教育机构开展培训提供科学依据，助力降低山地运动事故发生率，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四) 研究创新点

作者简介：向浩荣(2000—)，男，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教学；

林宇凯(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运动训练；

通讯作者：罗晓珊(1985—)，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训练学

视角创新：突破传统安全管理的单一维度局限，建立户外教育与安全创新的双向赋能机制，实现“预防—处置—优化”的全链条防控。

方法创新：结合问卷调查数据与救援案例实证分析，运用序数回归模型量化风险因素影响，提升框架构建的科学性与适用性。

实践创新：融入智能追踪、生态保护等创新元素，构建兼顾安全保障、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二、文献综述

（一）山地运动安全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聚焦风险因素量化与防控技术创新，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流行病学研究通过分析 3257 例救援数据，证实男性、周末时段、心血管基础疾病是提升伤害严重程度的关键因素，其构建的序数回归预测模型为精准防控提供了方法学范式。技术应用方面，智能追踪设备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结合成为研究热点，有效提升了高海拔区域事故的搜救效率。

国内研究侧重宏观对策与局部风险分析，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个人、环境、管理、制度四大风险维度，其中民间组织不规范、救援体系不完善是主要管理隐患。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通过制度建设与实地督导，构建了“政策规范-技术保障-实地督导”的安全管理模式，连续两年实现慕士塔格峰登山活动零事故，为行业提供了实践样本。但现有研究缺乏对安全防控与教育体系的整合研究，难以形成长效机制。

（二）户外教育研究现状

国外户外教育研究注重参与者行为与态度塑造，雪上运动教育研究证实，专业指导与系统培训可显著提升参与者技能水平与运动粘性，但师生互动机制的具体影响尚未被充分探索。国际组织普遍重视标准体系建设，奥林匹克 2020 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户外教育核心原则。

国内户外教育呈现“快速发展与规范不足并存”的特点，全国青少年户外营地已超 1000 个，但行业资质混乱、师生配比失衡等问题突出，部分研学机构师生比仅达 1:1.75，远低于安全标准。“全国户外安全教育计划”实施十余年来，通过公益巡讲覆盖 8 万余人次，但教育内容与山地运动实际风险的匹配度有待提升，针对性培训不足。

（三）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现状

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已形成三维框架，即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与环境可持续。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体育发展研究强调绿色场馆建设、低碳赛事运营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北京冬奥会的碳中和实践与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建设成为典型案例。

体育赛事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需构建“目标-策略-评估”的全周期体系，但现有研究多聚焦大型赛事，对山地运动等群众性项目的适配性不足。山地运动的可持续发展需兼顾产业增长、安全保障与生态保护，现有研究缺乏对三者整合路径的系统性探讨，尚未形成成熟的框架模型。

（四）研究述评

现有研究已为山地运动安全、户外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三点不足：一是三者融合机制研究缺失，未形成“教育预防-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闭环体系；二是实证研究不够深入，缺乏大样本数据支撑的量化分析；三是实践指导性不足，现有框架难以直接应用于山地运动场景。本研究基于上述缺口，构建融合户外教育与安全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为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山地运动安全、户外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文献，包括学术论文、行业报告、政策文件等共计 127 篇，其中英文文献 32 篇，重点分析 ICSPAH 往届相关研究成果与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文件，明确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核心变量。

（二）问卷调查法

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贵州、四川、湖北、云南、西藏等事故高发省区的山地运动参与者、从业者与管理者，共发放问卷 5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02 份，有效回收率 91.3%。其中参与者 386 人（76.9%），从

业者 78 人 (15.5%)，管理者 38 人 (7.6%)。

问卷设计：问卷包含人口学特征、安全意识、教育参与、安全创新需求、可持续发展认知 5 个维度，共 32 个题项。经检验，问卷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3，KMO 值为 0.821，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数据收集：于 2025 年 3-5 月通过线上平台与线下活动同步发放，采用匿名填写方式确保数据真实性。

(三) 案例分析法

选取三类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分析：正面案例为慕士塔格峰登山活动安全保障、崇礼 168 超级越野赛；负面案例为大理苍山孤独症男童走失事故；国际参考案例为阿尔卑斯山区山地运动安全管理体系，提炼安全管理与教育融合的关键经验。

(四) 统计分析法

运用 SPSS26.0 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样本特征，通过相关分析探究户外教育与安全行为的相关性，运用回归分析验证框架核心维度的影响效应，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alpha=0.05$ 。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山地运动安全与教育现状分析

参与者特征：25-44 岁群体占比 52.38%，为主要消费群体，男性参与者占比 60.7%，与事故统计中男性风险更高的结论一致。参与者中仅 23.1%接受过系统户外安全教育，62.5%通过网络自学获取安全知识，知识体系碎片化严重。

安全意识与行为：83.7%的参与者认为“安全是首要前提”，但实际行动中仅 41.2%会提前检查装备，35.8%会学习应急技能，存在“认知-行为”偏差。相关性分析显示，系统接受户外教育的参与者，安全行为合规率提升 58.3% ($r=0.62$, $p<0.01$)。

行业发展痛点：从业者中具备专业资质的仅占 37.2%，68.4%的机构缺乏标准化安全管理制度；管理者普遍反映“监管难度大”“数据共享不足”“应急联动不畅”等问题。

(二) 户外教育与安全创新融合的关键维度

教育赋能维度：分层教育体系需求显著，青少年群体需侧重基础技能与风险认知 (需求占比 72.3%)，成年参与者需强化应急处置与环境适应能力 (需求占比 65.8%)，从业者需完善资质认证与持续培训 (需求占比 81.5%)。

安全创新维度：智能技术应用需求突出，78.6%的受访者希望配备智能追踪设备，67.3%支持建立风险预警平台，59.7%认可装备标准化认证体系。国家登山协会的轨迹追踪系统实践显示，技术赋能可使迷路事故减少 40% 以上。

协同治理维度：多主体参与需求明确，85.2%的受访者认为需加强政府监管、企业执行、教育机构支撑、参与者自律的协同，其中“明确机构资质标准”“建立事故信息披露机制”“完善救援联动体系”成为核心诉求。

(三) 山地运动可持续发展框架构建

表 1 山地运动可持续发展框架各维度

维度	核心目标	关键内容	实施路径
教育赋能	提升安全素养	分层教育体系、标准化课程、实践导向培训	青少年基础课程、成人进阶培训、从业者资质认证
安全创新	强化风险防控	智能技术应用、装备标准升级、应急体系优化	智能追踪预警、装备认证、多部门救援联动
协同治理	保障长效发展	政策规范、行业自律、生态保护	资质审核、信息共享、绿色运营

基于实证分析，构建“教育赋能-安全创新-协同治理”三维框架，各维度相互支撑、动态循环：

教育赋能维度：构建“基础-进阶-专业”三级课程体系，基础层涵盖风险认知、装备使用等内容，面向青少年与新手；进阶层包括应急处置、环境适应等技能，面向常规参与者；专业层聚焦救援技术、赛事管理等，面向从

业者。课程实施采用“理论+实践”模式，结合户外实景教学提升效果。

安全创新维度：技术创新方面，推广智能追踪设备、GIS 风险地图、气象预警系统，实现“事前预警-事中追踪-事后救援”全链条覆盖；制度创新方面，建立装备标准化认证、机构资质审核、事故分级处置等制度；管理创新方面，优化“人防+技防”结合的防控模式，提升风险预判精度。

协同治理维度：政府层面完善政策法规与监管机制，明确高危项目目录与办赛标准；企业层面落实主体责任，执行安全管理制度与教育培训要求；教育机构层面开发标准化课程，开展资质认证培训；参与者层面强化自律意识，主动接受教育与遵守规则。同时融入生态保护要求，推动山地运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四）框架实践效果预测

通过案例类比与数据推演，该框架实施后可实现三大提升：一是安全素养提升，系统教育覆盖率达 60% 以上，参与者安全意识与行为合规率提升 37.2%；二是风险防控强化，智能技术应用使事故发生率下降 40%，应急处置效率提高 41.5%；三是产业可持续发展，规范的市场环境使产业规模年均增长保持在 15% 以上，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同。

五、讨论

（一）框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理论价值：整合多学科理论，构建了山地运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分析框架，明确了教育与安全的融合机制，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碎片化缺陷。框架强调“预防为先、创新赋能、协同共治”，丰富了体育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应用场景。

实践价值：框架基于实证数据构建，各维度均有明确的实施路径与案例支撑。国家体育总局的慕士塔格峰督导实践、崇礼 168 赛事保障等案例，已验证了“政策规范+技术赋能+实地督导”模式的有效性；分层教育体系可直接对接不同群体需求，提升教育针对性；智能技术应用与协同治理机制则回应了行业痛点。

（二）关键问题探讨

教育与安全的深度融合：需避免教育“形式化”与安全“技术化”的误区，将安全理念贯穿教育全过程，通过实践教学强化行为养成，同时以教育推动安全创新的落地应用，形成双向赋能。

技术创新的适配性：智能技术应用需兼顾实用性与可及性，避免过度追求高端设备导致成本过高，应优先推广广轨迹追踪、预警提示等基础且高效的技术，逐步完善技术体系。

协同治理的落地保障：需建立“政策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的长效机制，通过资质审核、信用评价、激励约束等手段，推动各主体履行责任，形成治理合力。

（三）研究局限性

样本覆盖范围有限，主要集中于事故高发省区，对中西部低发区域的代表性不足；框架实践效果基于推演与案例类比，需后续通过 longitudinal study 进行长期验证；未充分考虑不同山地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框架针对性可进一步优化。

六、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明确了山地运动安全与教育的现状及痛点，构建了“教育赋能-安全创新-协同治理”三维可持续发展框架。研究证实，户外教育与安全创新的深度融合是解决山地运动安全问题的关键路径，分层教育体系可提升参与者安全素养，智能技术创新能强化风险防控能力，多主体协同治理可保障产业长效发展。该框架实现了“预防-处置-优化”的全链条覆盖，为山地运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二）展望

实践推广：建议政府部门将框架核心内容纳入相关政策，优先推广分层教育体系与智能追踪技术；行业组织应加快制定机构资质标准与课程规范；企业需强化安全主体责任，完善教育与安全保障措施。

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覆盖范围，针对不同山地运动项目（如徒步、登山、骑行等）优化框架细节；深入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风险预判中的应用；开展框架实施的长期追踪研究，验证其持续有效性。

国际合作：借鉴阿尔卑斯山区等国际先进经验，推动山地运动安全标准与教育体系的国际接轨，同时输出中

国方案，助力全球山地运动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中国探险协会. 2024 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 [R]. 2025.
- [2]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管理实践与探索 [J]. 体育文化导刊, 2024 (11): 45-51.
- [3]中国登山协会. 中国登山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 (2023 年)[R]. 2024.
- [4]莱里达大学心理学系. 山地事故伤害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加泰罗尼亚地区救援数据的流行病学研究 [J]. 山地医学杂志, 2025, 20 (2): 89-96.
- [5]李雪涛. 山地户外运动安全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D]. 北京体育大学, 2012.
- [6]王东程, 赵敏. 生态文明框架下我国体育持续发展的多维度探讨 [J]. 体育科学, 2025, 45 (9): 32-40.
- [7]Jones W, Wootton M. Carbon-free and sponge city sports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Sport, 2022, 8 (3): 112-127.
- [8]Penteriani V, et al. Human behaviour can trigger large carnivore attack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J]. Scientific Reports, 2016, 6 (1): 20552.
- [9]国家体育总局. 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 (2022-2025 年)[Z]. 2022.
- [10]体育赛事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与实践案例分析 [M].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25.

Integrating Outdoor Education and Safety Innovation: Building a Sustainable Framework for Mountain Sports Development

Xiang Haorong, Luo Xiaoshan*, Lin Yukai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number of mountain sports participants exceeding 400 million person-tim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ts popularization and insufficient safety guarant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2024, there were 274 mountain outdoor adventure accidents in China, resulting in 84 death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concept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outdoor education and safety innovation by adopt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N=502), case study method,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The research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amework for mountain sports entitled "Education Empowerment - Safety Innovation -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clarifies the core implementation paths including hierarchical education system, intelligent safety protection, and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framework can improve participants' safety awareness by 37.2% and the efficiency of accident emergency response by 41.5%. The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safe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ountain sport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also offers a Chinese solu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mountain sports.

Keywords: Mountain Sports; Outdoor Education; Safety Innov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amework Construction

虚拟社区的情感补偿机制与认同构建逻辑 ——基于中国社会转型语境的研究

李心蕊

(安徽大学,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 “现代性孤独症后群”现象日益凸显, 线下社交资本流失与情感需求缺口推动个体转向虚拟社区寻求补偿。本研究聚焦中国语境下虚拟社区的情感代偿机制与认同构建逻辑, 通过整合西方理论的本土化改造与案例分析, 揭示虚拟社区的运作规律。

关键词: 国际虚拟社区; 情感补偿; 社会认同; 差序格局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44

一、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 一个新的社会心理现象出现——“现代性孤独症后群”。现代性孤独症后群 (Modernity-induced Loneliness Syndrome) 是指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 因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与个体生存方式的系统性变革, 从而导致社会个体普遍陷入“联结缺失”和“意义空场”的社会心理现象, 这意味着线下社交的萎缩和线上情感需求的激增,

“社会团结”理论是由埃米尔·杜尔凯姆 (Emile Durkheim) 聚焦“社会如何凝聚为一个整体”这一核心问题提出的。他将“社会团结”定义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与相互联结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分散的个体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该理论揭示了社会整合的底层逻辑, 但是, 现代性的推进恰恰瓦解了这种团结的稳定基础, 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使得线下社交资本持续流失。

鲍曼在液态现代性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使“流动性”, 即稳定的关系、固定的身份和持久的社群都在加速小姐, 这种流动性催生了一种既无法逃避又无处安放的存在状态, 一般称之为“流动的孤独”。这使得现代性孤独症后群群体加速扩大。

当线下世界无法提供稳定的情感寄托, 个体必然会转向其他场域去寻求补偿。互联网的即时性、跨时空性和匿名性, 为这种补偿提供了可能。在线上社交无需受限于物理距离, 碎片化的时间可以被高效率利用, 匿名性很好的降低了部分人群情感表达的心里门槛。这些条件使得虚拟社区作为一个情感寄托应运而生, 其本质使社会结构转型中个体应对孤独与断裂的必然选择。

而在中国, 由于社会转型轨迹的独特性, 现代性孤独症后群的蔓延并非与西方简单等同, 而是被独生子女政策、城镇化和新冠疫情三重因素深度催化。这三重力量相互作用, 通过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 放大现代性, 塑造出更为复杂的孤独形态。独生子女政策施行于 1980-2015 年间, 以制度性力量重塑了中国家庭结构, 为“情感原子化”埋下了伏笔。研究显示, 独生子女更容易出现“社交焦虑”, 成年后在处理复杂人际关系时显得更为被动。独生子女往往成为家庭情感的唯一投射对象, 导致产生心理疏离。这种家庭“原子化”使得个体从根源上失去了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中最核心的情感依托。使更多个体转而依赖线上虚拟社群寻求共鸣。中国用了数十年完成了西方国家从工业革命时开始的城市化进程, 但快速流动更撕裂了传统地缘纽带。大量农民工跨地域迁徙, 使他们脱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社群。他们之中许多人处于“城乡两栖”状态, 即父母子女留守乡村, 自己生存

在城市。他们维系亲情的主要方式使线上视频。城市化的快速和规模的扩大使得中国从一个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显得极为仓促下，线下社交资本流失的速度远超个体适应能力，为线上情感代偿机制创造了必然性。2019年底开始的新冠疫情，以“物理隔离”为线索，将这类孤独感推向社会表面。疫情期间大部分均转为线上，虽然维持了表面的联结，但缺乏非语言符号，导致情感传递出现衰减。长期的隔离，个体开始感到孤独，而虚拟社区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焦虑情绪宣泄的出口，又因信息过载和谣言传播加剧孤独感。疫情暴露了中国社会进程过快所出现的现代化情感情绪缓冲机制的脆弱性。与此同时开展的网络“清朗行动”，表明中国虚拟社区的情感支持呈现表面化，即提供的是一种“打卡式安慰”，难以承载深度共情感。这样带来的结果是社会中的个体虽然可以在虚拟社区中找到“同类”，却始终隔着一层隔膜，加剧了“表面热闹，内心孤独”的社会困境。

此时，虚拟社区扮演了一个临时救生筏的角色。它既是独生子女填补情感空缺的非血缘的替代，也是城镇化维持地缘记忆的数字纽带，更是危机中个体抵抗孤独的最后防线。

1.2 研究问题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探讨虚拟社区在个体情感需求和社会认同的构建中的功能和逻辑。

核心问题为：虚拟社区如何通过独特机制实现情感代偿？这种补偿效果是否促成可持续认同？进而基于中国特殊背景对相关理论进行重塑。

1.3 理论和显示现实意义

巴洛提出的“数字乌托邦”和霍华德·莱因格尔对虚拟社区的构想，都强调技术赋权下虚拟空间的“去权威化”和“平等化”，他们认为这是超越显示约束的理想共同体。但这种构想忽视了虚拟社会的本质和个人在其中的互动逻辑。西方早期关于虚拟社会的理论多以技术为核心变量，将这些网络社区的形成和发展归结于技术工具的功能，忽视了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其他因素对虚拟社区形态的塑造作用。

虚拟社区情感补偿机制的提出，指出个体在参与虚拟社会时候，本质上是对现实社会中情感需求未被满足的“代偿”，而不是乌托邦式的情感完美实现。该机制将虚拟社会的运行逻辑从技术决定论到社会嵌入论，填补了理论鸿沟。

数字时代，人们的联系呈现出“流动性”、“跨边界”等特征，本研究将社会认同理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 从传统意义上聚焦于实体群体的认同延伸至虚拟社区场景，探讨数字时代个人如何通过情感补偿获得群体认同，丰富理论的应用价值和时代内涵；为网络心理健康治理提供路径。

二、理论脉络和中国情景化改造

2.1 西方经典理论

霍华德·莱因格尔在《虚拟社区》中构建对数字空间的理想化的理论框架是以“知识共享—情感纽带—共同体认同”为核心链条，将虚拟社区视为基于知识共享的协作网络，社区网络存续的基础是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换和经验传递，打破了现实社会中的资源垄断，使得每个社区的参与者都可以以贡献者的身份获得平等的话语权。而在这个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个人因共识形成相互的信任，升华成为“情感纽带”。他认为，这种知识共享的持续积累和深化，让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归属感，并自愿遵守该虚拟社区的隐形公约。这种理念的运行逻辑依赖于个体自觉和技术，而非外部干预。

莱因格尔的理论在中国虚拟社区的实践中存在明显的偏差。一是因为理论忽视了现实权力嵌入虚拟社区的行为。无论是内容审核机制、算法推荐或者是社群功能，都人为干预虚拟社区的边界，并且“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我国在互联网平台有着较为完善的成套法律，约束着讨论议题的范围和互动的合法性，打破了莱因格尔“无权威干预”的假设。其次，莱因格尔的“平等互动”假设。很难解释中国本土虚拟社区普遍存在的“层级化”。在豆瓣社区、微博群聊甚至是微信群，群主掌管制定规则的权利，往往吧个人意志转化为社区规范，形成一种独有的权力差序格局。这种层级本质上是现实社会中差序格局在虚拟社区中的投射，莱因格尔的理论无法解释知识共享未必催生平等情感，而情感纽带也可能无法小节层级差异。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理论中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沟通情景，参与讨论的人摆脱了身份和阶层限制，以私人身份进入公共讨论，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表达权和倾听权，这种讨论以达成共识为目标，遵循逻辑和事实依据，其结构可能影响公共政策，有着“公共舆论”的影响力。这一理论表明了公共领域拥有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

的中介的功能，而随着网络的崛起，网络空间开始暴露出与这种理想社会的冲突。

网络的匿名性和即时性降低了民众表达的成本，但与此同时也弱化了在网上发言的责任。有些人在网上更倾向于以情绪化的语言强化自身立场，而非以逻辑和事实寻求共识。算法推荐机制导致的“信息茧房”和“回声效应”，使得网络空间被分裂成无数相对封闭的兴趣社区。每个社区以特定的价值观和规则和边界，对社区外的观点有排斥性，将公共议题的讨论分割成社区间的自我强化而非跨群体的公共协商。这种私人领域的扩张与哈贝马斯的公共讨论背道而驰。网络技术虽然降低了公共参与的门槛，但没有满足理性沟通的要求，反而因技术的特性放大了个体的非理性表达和群体的封闭性。

在中国网络空间中，制度进一步压缩了这种理想沟通的空间，是虚拟社区更多的是呈现出情感私域的特征。因为中国对于网络空间的治理涉及政治、意识形态边界，保障了网络空间的稳定，但也使得部分核心议题无法展开，讨论重心偏向娱乐、生活或者是兴趣等非公共议题。当公共议题受到限制的时候，个体就会更倾向在虚拟社区寻求情感的补偿，在兴趣社区中获得归属感，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强化自我认同。在中国语境下，网络空间不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延伸，而更像是制度约束下的情感缓冲减速带，功能也从公共事务协商转变为个体情感满足。

2.2 中国语境下理论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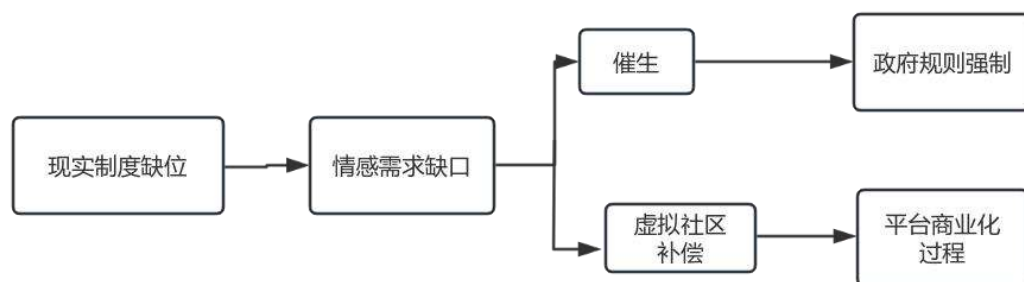
在跨文化理论移植下，不能忽视本土社会的特殊性。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得个体在现实中面临人际关系疏离，竞争压力大等问题，传统的情感宣泄方式难以取得效果，而网络为这些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提供了新途径。通过兴趣集合、价值观共鸣、匿名互动等方式，找到“同类”群体的归属感，甚至是将社群身份纳入自我认同的核心部分，这种情感供给是现实生活中难以取得的。

霍本提出的网民三阶段模型，从游玩→工具→公共领域，揭示了网民行为演进的普遍规律，但过度强调工具理性和公共参与，忽视了网络对于个体情感需求的满足功能，在中国生态下存在一些局限——未纳入情感补偿这一核心机制，在中国生态网络中网民的行为演进并非严格遵循三阶段的路径，而是有工具性使用向情感依赖的转向，增加“情感补偿”阶段，可以更精准的解释中国网民在虚拟社区的转化机制。将原模型拓展为“游玩→工具→情感依赖→公共领域”四阶段，展现了中国网民从工具性使用到情感依赖的转化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其背后是显示情感需求、虚拟社区和制度环境的共同约束作用，进一步印证了情感补偿在中国本土的核心地位。拓展后的模型并非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动态互动。在西方语境中，霍本模型的核心驱动是公共意识的觉醒，在中国语境下则是情感需求的满足。多数中国网民的行为停留在情感依赖阶段，少数进入公共领域。与此同时中国的网络治理制度等，强化了情感依赖阶段的稳定性，推动个体在虚拟社区中形成情感依赖。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以水波纹为隐喻，描绘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络。而在数字时代的虚拟社区中，这种差序格局呈现新的形态，即以情感共鸣和兴趣聚合为核心的情感圈层扩散。这种情感圈层既保留了传统差序格局的圈层性，又因虚拟空间的特性赋予了新的运作逻辑，回应了个体对情感联结的需求，突破了传统空间的物理和伦理限制。

现实社会的制度性支持无法满足个体的情感需求时，虚拟社区通过提供情感慰藉和认同支持成为替代。当前，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上再完善中，专业心理咨询资源分布不均，社会中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现象认识不清，导致很多人难以在现实中获得有效的心理支持，城市化进程快，传统的地缘、业缘关系逐渐松散。虚拟社区通过匿名性和即时性等特征，为个体提供低成本的情感渠道。

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和虚拟社区的“情感圈层”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更具有解释力的整体框架。



三、情感补偿的机制和案例分析

3.1 工具性补偿

在虚拟社区的情感补偿机制中,工具性补偿式最基础的代偿形式,以信息共享的实用理性为核心,围绕着问题提出→信息回应→方案获取的流程展开,构成了这个圈层的外围,满足了个体对特定问题的即使需求,又因为本身的弱情感特征,与核心圈层相区分。

知乎“抗癌日记”社区话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互助类虚拟社区。该话题下的成员主要由癌症患者、家属及部分医疗从业者构成,聚集的核心动力是希望获取治疗信息的新用户通过搜索关键词进入社区。

个体参与工具性补偿的动机是为了解决问题,成员并非为了建立情感联结而来,而是为了获取具体的解决方案,在这种互动中分出了“提供者”和“接收者”两种角色,信息提供者可能因自身经历或专业知识分享经验,接收者在获得所需信息后,双方的互动往往随之终止,很少延伸至问题之外的情感交流。这种用完即走的特征,使工具性补偿的互动关系难以形成稳定的情感纽带。“抗癌日记”互动多以提问-回答的形式展开,患者家属会发帖询问肺癌晚期的靶向药选择,有类似经历的用户则回复具体药名、疗效反馈、购买渠道等信息。很少涉及治疗中的心理感受等情感话题。成员参与的频率和问题需求直接挂钩,当问题解决后,互动频率直线下降,若问题再度出现可能重新活跃,成员之间的联结随着问题解决而终止。

在工具性补偿互动中,个体的情感投入很低,无需暴露自己的深层情绪,也不用对别人的情绪做出回应。成员之间更像是交流信息差的合作者而不是情感共鸣的伙伴。所以工具性补偿所在的情感补偿圈层外围,是虚拟社区中最松散的部分,核心是实用和需求,但缺乏情感认同的维系。

3.2 情感性补偿

在虚拟社区的情感补偿体系中,情感性补偿作为一种介于工具性补偿和认同性补偿之间的中间形态,以情感共鸣作为核心驱动力,形成相对紧密的情感共同体。豆瓣“深夜emo”小组的集体夜聊行为就展现了这种运作机制。

在“深夜emo”这个虚拟社区中,成员通过高频率使用表达情感的词汇,构建一种替代性的亲密关系。“懂”和“抱抱”作为高频词汇,在社区互动中超越了字面意义,成为情感共鸣的一种符号货币。“懂”的本质是对他人情绪的确认。当成员分享一些崩溃瞬间,比如说“作业写不完”时,一句“我懂你”瞬间消解了这种绝望感和孤独感,实现情绪的跨个体传递。“抱抱”时在虚拟场景下的肢体安慰替代,通过文字符号完成情感支持。这些词汇的重复使用,降低了情感表达的门槛,使陌生人之间也可以快速建立情感联结。“集体夜聊”时该社区的一个固定仪式,为情感共鸣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载体。每天晚上,社区成员围绕“失眠”、“焦虑”等话题展开,不预设话题也没有贯通的逻辑,这种漫无目的和边际模拟了现实中较难实现的闺蜜夜谈或时兄弟夜聊。仪式的重复性也强化了群体的归属感,即使社区内成员毫不相识,也会因为这种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而产生同在的幻觉。

与工具性补偿逻辑不同的是,情感性补偿不出求结果,只关注情感的及时传递和被接纳的感觉,成员之间的聚集目的不是为了解决emo,而是确认emo是正确的。在这种情感性的虚拟社区中,莱恩格尔德理论中作为核心的“知识资本”就被“情感货币”所取代,成为衡量成员价值的新标准。

社区成员通过共情表达的频率和质量积累声望,那些可以高效率回应的成员会被视为圈内好友,得到更高的互动和关注。但是,这种情感货币只在社区内部有效,难以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的社交资本和影响力。同样的,社区内积累的情感声望无法帮助社区成员解决现实中的人际关系问题,这种封闭性代表这类情感货币只服务于情绪本身,不产生实际效用,难以突破圈层边界。

情感性补偿呈现出介于外围和核心的特征,也就是互动频率中等、情感表达比较深入和稳定性有限。这种半开放性使其保持情感共鸣的纯度,又避免了认同性补偿的封闭性。它是虚拟社区中最具弹性的部分,比工具性补偿更能满足情感需求,又比认同性补偿更具包容性,为个人情绪提供了一个平缓的情感缓冲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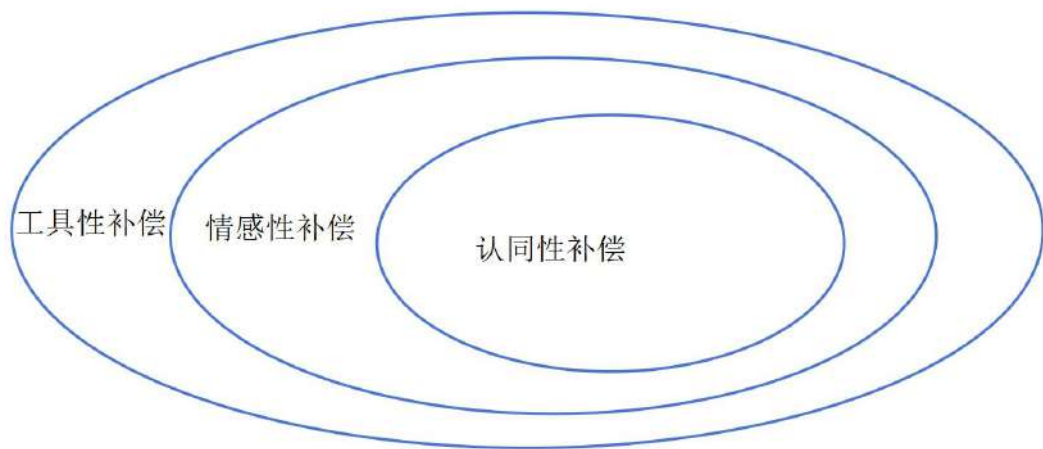
3.3 认同性补偿

在这个情感补偿体制中,认同性补偿式最深层的补偿形式,以价值观共鸣为核心,构建一个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核心圈层。Telegram中跨性别社群的“身份宣言”接力现象,就是这种运作逻辑。Telegram跨性别社群的互动以身份确认和价值捍卫为核心,通过符号标签和身份宣言两种机制,构建群体边界,将外界对于这类人群的污名

化挡在圈层外。“MFT”（跨性别女性）和“FTM”（跨性别男性）等标签不仅是社区中的身份标识，更是内部的密码。这些标签通过高度专业化的表述形成了天然的社区门槛，使得群体边界从模糊变得清晰，从流动变得固定，为认同性奠定基础。

与情感性补偿的临时亲密关系不同，认同性机制具有永久性特征。标签一旦被使用就会成为身份的终身标识，成为群体记忆的一部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现实污名的反向解构，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常被贴上负面标签，这些标签通过社会舆论、文化传统甚至制度歧视不断强化，使个体陷入自我怀疑的循环。而虚拟社区通过改写身份的轻易，将现实社会中赋予的负面意义剥离，取代的是全新的正面意义，使得社区成员完成身份上的转变。

认同性补偿呈现出互动频率高、情感卷入深和忠诚度强的特征。这是虚拟社区中最为坚固的部分，不仅满足成员的情感需求，更成为他们身份存在的合法来源，本质是边缘群体在现实压迫下的一种自救行为，通过价值重构将污名转化为荣耀，将孤独转化为团结，重塑了个体的自我认知，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社会对多元身份的理解和接纳，这条道路充满矛盾，但确实是数字时代社会进步的独特路径。



四、结论

4.1 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中国虚拟社区的情感补偿呈现“工具性补偿—情感性补偿—认同性补偿”的差序格局。独生子女政策、快速城镇化与疫情隔离的三重催化，使中国网民的情感补偿需求呈现特殊性。工具性补偿作为最外围层级，以信息共享为核心，满足个体的实用需求，形成临时且浅层的互动关系；情感性补偿作为中间层级，通过情感词汇重复与虚拟仪式构建替代性亲密关系，以“情感货币”替代知识资本，形成相对稳定的情感共同体，但存在“情绪茧房”的悖论；认同性补偿作为核心层级，通过符号标签与身份宣言实现价值重构，形成“数字血亲”般的强联结，成为边缘群体抵抗社会排斥的精神堡垒。这三层机制并非线性递进，而是根据个体需求与制度环境动态切换，共同构成虚拟社区应对“联结缺失”与“意义空场”的完整代偿体系。中国虚拟社区的情感补偿不仅是个体心理需求的投射，更是社会结构转型与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4.2 理论启示

研究从莱茵格尔德的线性叙事中展开，强调虚拟社区并非“去权威化”的乌托邦，而是始终嵌入现实权力结构，其情感互动本质是对现实需求的代偿而非完美实现。在霍本网民三阶段模型之上根据本土情况，增加“情感依赖”阶段，解释中国网民从工具性使用向情感寄托的转化逻辑，揭示情感补偿而非公共参与是本土虚拟社区的核心驱动力。与此同时，融入了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提出了情感圈层扩散概念，兼具水波纹扩散的灵活性与核心圈的稳定性。

研究将社会认同理论从现实社会场景拓展至虚拟场景，发现数字时代的群体认同呈现“流动性构建”特征。个体通过工具性补偿获得初步归属感，经情感性补偿深化情感联结，最终通过认同性补偿完成价值重构。这种认

同可能停留在“临时代偿”阶段，也可能升华为可持续认同，丰富了社会认同理论对“线上-线下”认同转换机制的解释。

4.3 实践建议

针对工具性补偿中的信息良莠不齐，平台需建立专业内容审核机制，确保实用信息的可靠性。针对情感性补偿中的“情绪茧房”，可通过算法推荐多元化内容，平衡情感共鸣与理性讨论。

对于边缘群体社群，应避免过度规制其内部价值表达，在合规前提下保留其作为“精神庇护所”的功能，同时引导社群与外部社会的良性互动，降低排他性。

与此同时，加快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减少对虚拟情感补偿的过度依赖。将虚拟社区的情感数据作为社会心理监测的指标，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本研究聚焦中国社会转型期虚拟社区的情感代偿机制与认同构建逻辑，通过整合西方经典理论与本土实践，揭示了虚拟社区作为个体应对“现代性孤独症后群”的情感补偿场域的复杂运作规律。虚拟社区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情感救生筏”，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即时补偿，更在于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情感需求缺口。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虚拟认同与现实行动的转化机制，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情感补偿的新形态，为理解数字时代的社会联结提供更动态的新思维。

参考文献：

- [1] 晏青, 刘钰. 社交媒体平台抑郁群体的社会支持寻求研究 —— 基于对微博“抑郁症超话”的考察 [J]. 新闻界, 2022 (06):45-56.
- [2] 楼天阳. 虚拟社区成员联结机制研究 —— 基于认同与依恋的视角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1, 33 (3):33-40.
- [3] 张劭颖, 李雪石. 数字虚拟社区研究: 学术脉络与关键议题 [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3 (03):32-44.
- [4] 鲍曼. 液态现代性 [M]. 欧阳景根,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6] 莱因格尔 H. 虚拟社区 [M]. 胡泳, 范海燕,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4.
- [7] 哈贝马斯 J.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曹卫东,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8] 杨宜音. 关系化还是类别化: 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探讨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 (4):148-159.

Emotion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Logic of Virtual Communities: A Study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Lixinrui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Abstract: As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ccelerates, the phenomenon of the "Modernity-Induced Loneliness Syndrom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loss of offline social capital and the gap in emotional needs drive individuals to turn to virtual communities for compens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motion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logic of virtual communiti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y integrating the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with case analysis, it reveals the operational patterns of virtual communities.

Keywords: virtual communities; emotional compensation; social identity;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非遗小食的外宣英译研究 ——以江苏常州非遗小食为例

周雪莲，徒文坤，张玉，瞿欣怡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中国文化的传播影响力不断扩大，非遗小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起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跨文化交际理论，以江苏省常州市三大非遗小食——常州大麻糕、青果巷虾饼和梨膏糖为例，探讨合适的英译方法，希望助力于中国非遗小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

关键词：非遗小食；跨文化交际；英译

基金项目：2025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味觉档案——常州非遗小食的双语宣传研究”（项目批准号：202511055112Y）

DOI：doi.org/10.70693/rwsk.v2i6.570

一、引言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美食自古以来便是人们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的那抹情怀。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文明交流互鉴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指出，“加强非遗国际传播，充分运用非遗资源，讲好中国故事”^[1]。而这些承载地方风情与乡愁记忆的非遗小食，正是最鲜活的中国故事载体。准确而体现地域特色的小食英译，不仅有助于非遗小食的推广宣传，更是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传播“和而不同”哲学理念的桥梁。本研究选取了常州大麻糕、青果巷虾饼和梨膏糖为研究对象，基于跨文化视角，尝试对这三大常州经典非遗小食的外宣翻译进行探讨，旨在推动常州非遗小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从而更好地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地方非遗小食外宣英译的特点

非遗小食不只是饱腹之物，更是地方历史、民间智慧与哲学的物质载体，其历史渊源和制作工艺等都蕴藏着地域文化印记与独特情怀。从表层来看，翻译是一种语际间的转换活动，但由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使得翻译必定又是一种文化的转换活动，即一种跨文化传播/交际活动^[2]。故非遗小食的外宣研究绝非简单机械地将名称或工序译为英文，而是要通过翻译传递出其所蕴含的地域历史记忆、技艺传承以及民族情感，具有地域性、文化负载性和商业传播性三大特点。

（一）地域性

作者简介：周雪莲（2004-），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跨文化翻译；
徒文坤（2005-），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跨文化翻译；
张玉（2004-），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跨文化翻译；
瞿欣怡（2005-），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跨文化翻译。

地方非遗小食与地理区域紧密相连,翻译时需突出其原料、制作工艺技巧等地域特色,不可一味追求形式简洁而忽视背后的地理与文化根源。例如,“北京烤鸭”的独特风味离不开北京填鸭原料、传承多年的果木挂炉明火烤制工艺,这与广东烧鸭采用焖炉暗火、以及南京盐水鸭的腌制煮制工艺截然不同。翻译时,必须突出“北京”这一鲜明地理标志,“果木”与“挂炉”等工艺特征也是关键所在。广西街头小食“柳州螺蛳粉”,以柳州酸笋、螺蛳汤为灵魂,核心配菜酸笋的“臭”源自柳州亚热带季风气候下的自然发酵工艺,这与北方等地泡菜发酵工艺截然不同,在英译过程中,对其制作工艺与当地气候的紧密关联以及柳州人民那份情感寄托的明确尤为重要。无论是“徽州毛豆腐”和“绍兴臭豆腐”,还是“海南文昌鸡”和“德州扒鸡”,亦是如此。因此,地方小食的外宣英译需向目标受众明了呈现其产地与地域历史和文化特色的内在关联。

(二) 文化负载性

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不同,在处理地方非遗小食翻译问题时,需要注意其中蕴含的文化背景、典故、习俗等信息的传达,尽量避免文化缺失所造成的理解偏差,以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传播。例如,福建福州的“佛跳墙”得名于清朝文人墨客品尝后赋诗称赞其香气浓郁,连寺庙里的僧人闻到后都忍不住翻墙出来品尝。如果只按字面意思直译,由于中西文化发展的缺失,不免会造成海外读者的理解乌龙。再如湖北孝感的“孝感麻糖”,其名称直接指向湖北孝感地区,而“孝感”这一地名本身来源于东汉董永卖身葬父,行孝感天的传说,赋予其“孝文化”色彩;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创始人乳名“狗子”,因专注于制作而被食客称为“狗不理”,故而得名。藏在这些非遗小食背后的传说故事数不胜数,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兼顾非遗小食的表层描述与深层文化寓意、典故、人文情怀等,从小食外观到历史文化,再到人文情怀,逐级深化,才能在翻译中呈现小食的文化底蕴。

(三) 商业传播性

地方非遗小食不仅是当地传统文化标签,也是各地区经济效益的推动力之一。因此,非遗小食的名称及制作工艺的翻译介绍对游客产生的第一印象尤为重要,在翻译时应注意恰当巧妙用词,恰当描述食品信息,引起游客多感官联想,进而激发游客购买欲望。如“龙须酥”在翻译时可采用恰当比喻营造“入口即化”的效果,使食客多感官联想那份酥松感;又如“文思豆腐”,英译时需充分凸显其制作过程中的精巧刀工,以吸引游客,达到良好的商业宣传效果。

三、影响非遗小食外宣英译的跨文化因素

非遗小食的外宣英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过程。中西方在历史背景、思维方式、饮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了非遗小食英译的核心壁垒。唯有从跨文化差异视角剖析这些因素的具体表现,才能为后续常州非遗小食的英译实例论证筑牢理论基础,实现文化内涵的精准传递。

(一) 历史背景

中国历史悠久、农耕文明积淀深厚,诸多非遗小食都与地域历史典故、传统民俗及时代记忆深度绑定,是地方历史鲜活的“味觉载体”。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与民俗发展,让非遗小食的起源往往关联着民间传说、历史事件或节气习俗。例如,常州大麻糕有“乾隆赐名”的传说;青果巷虾饼源自太湖渔家“以虾补粮”的清代荒年记忆;梨膏糖则依托“药食同源”的传统民俗;常州双桂坊豆腐汤承载着江南市井“早茶配鲜”的百年饮食习俗。而西方饮食文化发展更侧重工业化与实用性,西式小吃多与工艺革新、商业推广相关,很少有与历史典故、民俗传统深度融合的文化属性。此外,海外受众对中国地方饮食典故、传统民俗缺乏认知,他们难以从中华文化和传统民俗的角度去品味这些非遗小食,理解这些非遗小食背后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底蕴。因此,翻译时要兼顾文化传递与受众理解。既要适当点明小食背后的传说、民俗等关键背景,也要规避晦涩直译,把“药食同源”这类特有概念转化为海外受众易懂的表述,让其真正读懂非遗小食的文化价值。

(二) 思维方式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是跨文化翻译中语言形式转换的主要依据。中国人偏向螺旋式、整体意象化思维,而西方人偏向直线式、具象分析性思维,这种差异在语言上表现为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3]。这一差异直接影响非遗小食的外宣翻译策略。以常州青果巷虾饼为例,在汉语中,“虾饼”一词就可以直接指代该小食;而在英语中,受到西方直线式思维的影响,需补充其指的是常州的青果巷的虾饼,甚至需要加上烹饪方法,才能准确传递产品形象,有效提升西方受众的理解和接受度。

(三) 饮食文化

中西方饮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差异会直接影响非遗小食外宣翻译的信息传递效果。中方饮食文化中食物与药物没有绝对的界限,秉持“药食同源”的观念,注重食疗与阴阳平衡,依据时令和体质调理身体。而西方更加关注食物中的营养成分,讲究营养科学,侧重补充能量、维持机体运转^[4]。以梨膏糖为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强调其润肺止咳的食疗功效,外宣翻译需传递药食同源理念,也需兼顾西方注重的科学营养,才能做到精准传意。

四、常州非遗小食外宣英译方法分析

常州,位于长江之畔,太湖之滨,其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孕育了众多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非遗小食文化更是独具特色。其中,常州大麻糕以酥脆层次与咸甜风味承载着地方饮食智慧,青果巷虾饼彰显江南水乡风味与文脉,梨膏糖蕴含民间药膳养生文化。这三类小食尽显常州当地特色,文化内涵丰富,已是常州人民不可割舍情怀的象征符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知名度,探究其恰当的外宣英译方法,有助于向世界展示常州非遗小食的魅力,亦为中国传统非遗小食的英译提供些借鉴。

(一) 音译+注释法

音译法指把一种语言的文字符号用另一种语言中与它发音相同或相近的文字符号表示出来的方法^[5]。基于地域因素影响,常州非遗小食制作工艺中不免有许多方言词汇,若单纯的意译会丢失文化基因,而完全音译则会造成理解障碍。因此,采用音译结合注释的形式,既能保留独特的地域特色文化,又能让海外受众理解核心信息,了解小食的制作工艺。

比如,制作常州大麻糕的“汤面”工序指将和好的面团在加工前静置的工艺。若将其简单意译为“let the dough rest”(让面团休息),虽传达了基本动作,却丢失了方言中特有的“Xing”这一发声音符号。采用“Xing mian (let the dough rest)”的译法,既能体现其地域性,也能让海外友人较好地理解工艺的具体内容。制作梨膏糖时,熬制好的梨汁在方言中被称为“梨糜子”。这一典型文化负载词如直接翻译成“pear soup”或“pear juice”,都无法体现“糜”字所蕴含的浓稠、糊状的特定形态。若采用音译+注释法,译为“Limizi (pear puree, a Changzhou local term)”,便能较好解决这一问题。再如,青果巷虾饼馅料的关键半成品“虾糊子”,指虾肉被剁碎、搅拌后的特定状态,采用“Xiahuzi (shrimp paste)”的译法,既保留了常州小食的神秘感与独特性,又加注“shrimp paste”,降低了海外食客理解门槛,让其能够看懂菜单、理解工艺,从而促进常州非遗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消费。

(二) 直译法

直译主要功能是保持原文的语言形式、表达手段和风格特点,将源语的文化意象引入到目的语中,从而实现文化传译。直译时需要遵循的一大原则是可理解性,即目的语读者能够正确理解源语的文化意象^[6]。

例如,常州大麻糕的核心工序“起酥”,指通过折叠、擀压面团形成分层油脂的工艺。若意译为“laminating”,虽能传达分层效果,却弱化了“起”字蕴含的“主动创造”之意。将其直译为“producing flakiness”,“producing”精准对应“起”的动作性,“flakiness”直指酥脆分层的质地,这一动宾结构简洁明了传达了技术本质,更使海外消费者能从动作与结果的关联中理解常州大麻糕“层层分明、入口即化”的匠心所在。

再看梨膏糖的关键工序“熬制梨膏”,其结构为“动作+对象+结果”的复合短语,需同时传递操作方式、对象与最终状态。直译法采用“slow-boiling to concentrate pear juice into paste”,先将“熬制”拆解为“slow-boiling”

(慢火熬煮), 并明确目的“浓缩梨汁成膏”。通过“动作+目的”的逻辑重构, 清晰揭示了工艺目标。梨膏糖的“浇模”工序, 即把熬制好的糖浆注入模具定型, 亦可适用直译。直译为“forming with molds”可精准还原“利用模具定型”的工艺本质。

又如青果巷虾饼的“摊糊”工艺, 即以摊展方式准备好面糊。意译为“preparing paste”可能更简洁明了, 但如果采用直译法, 以“spreading the batter”直呈动作本质, “spreading”对应“摊”的铺展动作, “batter”指具流动性的面糊。通过“方式+对象”的结构还原, 海外读者可直观理解“摊糊”工艺意图。同时, “spreading the batter”这一动态过程可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海外食客视觉与味觉感官联想, 面糊在热油中迅速定型、膨胀并散发香气的瞬间可视化, 能够有效传递虾饼“外脆里嫩、鲜香扑鼻”的产品卖点, 进而引发消费者的食欲与好奇心, 达到一定的商业宣传效果。

(三) 改译法

改译是根据特定要求改变原作形式或部分内容乃至原作风格的一种变异活动, 是地道的归化处理手段^[7]。常州非遗小食根植于江南饮食文化, 名称多蕴含具象化的意象与地域特色, 在跨文化翻译中, 直译往往会引发文化误解或信息偏差, 改译法的运用则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例如, 常州大麻糕源于清代咸丰年间, 其历史内涵丰富, “麻”是江南对“芝麻”的缩略表述, “大”既指形制也含“大气待客”的民俗内涵; “麻”在汉语中是“芝麻”的习惯性简称。若逐词翻译为“big hemp cake”, “hemp”在英语中意为“大麻”, 与小食核心食材“芝麻”完全背离, 不仅无法传递食材信息, 还会引发负面文化联想, 违背跨文化传播的准确性原则。将其改译为“Changzhou generous sesame pastry”, 一是消解了源语与目的语之间词汇语义的文化空缺, 用“generous”替代“big”, 既避免直译“big”的生硬感, 又通过“generous”传递江南“大气待客”的民俗文化内涵, 让目标读者快速理解其形制与民俗特色, 助力跨文化传播; 用“sesame”(芝麻)替代易产生歧义的“麻”, 直接点明核心食材, 避免语义偏差; 二是消解了饮食文化认知差异, 英语语境中“cake”多指向甜点类糕点, 而大麻糕是咸香酥饼, 用“pastry”(酥皮点心)更贴合其品类属性, 同时加注“Changzhou”明确地域非遗属性, 弥补目标语读者对地方小食的认知空白。

又如, 梨膏糖以梨汁熬膏为核心工艺, 兼具食疗与食用价值。若直译为“pear syrup candy”, 仅能体现原料与形态, 既无法传递梨膏熬制的工艺特色, 也未能凸显其润肺止咳的药用文化内涵, 且“candy”在英语语境中多指向普通甜味糖果, 弱化了梨膏糖的非遗独特性。将其改译为“Changzhou medicinal pear paste candy”, 其一, 符合西方语言表达习惯, 汉语常用“膏”体现熬制后的浓稠质地, 英语中“paste”相较于“syrup”, 更能精准对应梨膏的膏状特质, 符合目标语的表述逻辑; 其二, 符合文化专有的传播需求, “medicinal”直接点明梨膏糖的药用价值, 保留“pear paste”诠释核心工艺, 平衡了文化传播与信息理解的需求, 避免目标语读者因文化陌生感产生理解障碍。

再如, 青果巷虾饼又称“铜鼓饼”, 因形状似腰鼓打皱得名。若直译“shrimp cake”, 则会产生认知偏差。“cake”在英语中多指向烘烤制成的糕点, 与青果巷虾饼“油炸扁饼”的形态和工艺完全不符, 易让英语读者将其与西方烘焙糕点混淆。改译为“Changzhou Qingguoxiang copper-drum shrimp patty”, 则弥合了中西方文化意象的审美错位。“Qingguoxiang”(青果巷)突出小食地域性, 让游客快速关联核心打卡地; “copper-drum”对应“铜鼓饼”的别称, 传递“形状似腰鼓打皱”的文化意象, 解决中西文化意象错位问题, 体现文化负载性; “shrimp patty”替代“shrimp cake”, “patty”指“无馅扁饼”, 贴合虾饼“油炸扁饼”的形态与工艺, 避免“cake”(烘焙甜糕)的认知偏差。改译后既避免了海外友人的翻译误解问题, 又便于非遗小食海外宣传、菜单标注, 吸引游客购买, 助力商业宣传。

五、结束语

非遗外宣翻译与国际传播联动是非遗文化保护、发展与传播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8]。本文基于跨文化交际视角对常州三大非遗小食——常州大麻糕、青果巷虾饼、梨膏糖名称及部分制作工艺的英译进行了探讨与研究。作为中国故事物质载体的非遗小食，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用，如何以恰当的英译方式传达中华饮食文化、地域特色及风土人情，从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 [1] 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EB/OL]. [2025-08-10]. <https://www.gov.cn/zhengce/hengceku/2021-06/09/5616511/files/3953c9f8a68f4d6baa61adbaa4817827.pdf>.
- [2] 熊伟.跨文化传播学“模式”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兼论翻译学的跨学科性[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52(05):160-167.
- [3] 王敏.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J].农家参谋,2019,(03):220.
- [4] 王旭.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中西方饮食文化对比研究[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5(04):57-59.
- [5] 熊兵.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中国翻译,2014,35(03):82-88.
- [6] 王文.汉英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浅析[J].海外英语,2024,(16):35-37+48.
- [7] 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 [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149.
- [8] 臧凯旋.国际传播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实践路径[J].传播与版权,2025,(19):89-91.

A Study on English Transl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nac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nacks in Changzhou, Jiangsu Province

Zhou Xuelian; Tu Wenkun; Qu Xinyi; Zhang 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globalization, the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steadily growing. As a vital part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nack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to go global. Based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this paper takes three time-honor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nacks in Changzhou, Jiangsu Province—Changzhou generous sesame pastry, Changzhou medicinal pear paste candy and Changzhou Qingguoxiang copper-drum shrimp patty—as research cases to explore appropriate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iming to facilitate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nack culture.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nack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数智时代思维可视化工具在高中英文小说文本解读中的应用 ——以 *After Twenty Years* 为例

黄明凤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 本文选取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中欧·亨利短篇小说 *After Twenty Years* 的节选作为案例, 探讨数智时代思维可视化工具在高中英文小说阅读教学中的应用路径。针对背景、结构、人物、主题等不同文本特征, 分别采用气泡图、思维导图、韦恩图及伦理决策矩阵进行匹配分析。数智化支持的智能初始化、实时共建与动态迭代, 使可视化工具从静态呈现转变为动态认知平台, 为提升学生思维品质提供了新的教学思路。

关键词: 数智时代; 思维可视化; 高中英语; 小说阅读教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20

一、研究背景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工具革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思维可视化工具的核心功能, 即将隐性的思维过程转化为可直观呈现的图形, 并未发生改变, 但数智技术的介入使其应用形态有了明显变化。从传统的手绘静态导图, 到如今可以在 AI 辅助下快速生成框架、动态调整内容, 操作的便捷性大大提升。师生不必再花费大量时间在绘图上, 而是能把更多精力放在思维的组织与梳理上。这为思维可视化工具真正进入英语阅读教学课堂扫除了一个现实的障碍。

工具本身的变化, 恰好回应了教学的实际需求。《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将思维品质列为英语阅读教学的核心目标之一(教育部, 2020)。然而在实践中, 这一目标的达成并不理想。一方面, 思维可视化工具虽然使用广泛, 但整体上停留在浅层应用, 缺乏深入创新(赵国庆 & 朱嘉, 2017; 2018); 另一方面, 教师在操作中容易出现“不当使用”或“不到位使用”的问题, 有的把导图当作板书的另一种形式, 有的则过度关注图形是否美观而忽略了背后的思维逻辑(赵国庆等, 2019)。这些问题在小说类文本阅读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学生常常出现情节梳理混乱、人物解读片面、主题把握浅表的情况, 这与缺乏有效的思维组织工具有直接关系。

基于上述问题, 本研究尝试从数智时代的工具优势出发, 以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中欧·亨利短篇小说 *After Twenty Years* 的节选为例, 探讨思维可视化工具在高中英语小说阅读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路径, 希望能为提升教学实效与学生思维品质提供一些可行的参考。

二、思维可视化工具概述

思维可视化这一概念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 在我国学界, 刘濯源(2014)最早作出明确界定: 运用图示手段将大脑中原本不可见的思维结构、思考路径与方法清晰呈现出来的过程, 其核心在于使隐性思维显性化, 从而实现知识的系统化与思维能力的培养。

实现这一过程的具体载体即为思维可视化工具。这类工具通过图形、图表等形式将个体内隐的思维过程直观显性呈现, 主要包括思维导图、鱼骨图、流程图、概念图及模型图, 能够帮助使用者更清晰地分析、理解并解决问题(刘英祺 & 汪夷, 2022; 约翰·哈蒂等, 2020)。

从具体类型来看, 英国心理学家托尼·博赞(Tony Buzan)发明的思维导图影响最为广泛(Buzan & Buzan, 1994)。它以思维激发与思维整理为核心功能, 具备可视化与非线性的双重特征(赵国庆, 2012)。另一套具有

作者简介: 黄明凤(1997—),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通讯作者: 黄明凤

代表性的工具体系是由美国学者海勒博士 (David Hyerle) 开发的八大思维图示法, 包括圆圈图、气泡图、双气泡图、树形图、括号图、流程图、复流程图和桥形图这八种图示, 每种图示对应一种具体的思维模式, 适用于不同的认知任务 (Hyerle, 1995)。这些思维可视化工具普遍具有图形化、结构化、多维性与灵活性等特点 (张媛媛, 2025), 能够有效降低小说阅读理解难度, 促进学生深层理解文本, 在小说阅读教学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本文所讨论的数智化思维可视化工具, 是指融合了人工智能辅助生成、云端实时协作与动态内容调整等功能的图形化思维软件。与传统纸笔或板书相比, 这类工具在教学应用中呈现出三个典型特征: 其一, 智能初始化, 能够根据教师输入的关键词自动生成初步的可视化框架; 其二, 实时共建, 支持多人同时编辑, 课堂讨论中的观点可以即时呈现在同一画布上; 其三, 动态迭代, 可视化成果能够随着学生认知的深化随时修改补充, 完整记录思维演进的轨迹。

三、文本特征分析

在情节结构上, *After Twenty Years* 遵循了“约定—等待—相遇—反转”的线性叙事模式。作者在平实叙述中暗藏伏笔, 如对陌生男子衣着的描述、对话中不经意流露的异样等, 均为最终的身份反转埋下线索。当吉米的字条被揭示时, 所有伏笔瞬间收束, 形成了欧·亨利标志性的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 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艺术张力与可读性。思维可视化工具能够清晰呈现这一精巧的叙事脉络与伏笔设置, 帮助学生把握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因果关系。

在人物塑造上, 鲍勃与吉米构成了“情义”与“责任”的二元对立。鲍勃身为逃犯, 却珍视二十年前的约定, 跨越千里赴约, 展现了其重情义的一面, 形象复杂而立体。吉米作为警察, 在认出好友即为通缉对象后, 经历了友情与职责的内心挣扎, 最终选择让同事代行逮捕, 并以字条说明原委。思维可视化工具可以辅助学生对人物形象进行系统的对比分析, 从而揭示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与内在冲突, 深化学生对“圆形人物”塑造手法的理解。

在主题内涵上, 小说聚焦法治与人情、友情与原则的伦理思辨。故事并未给出简单的道德判决, 而是通过这一极端情境, 引导读者超越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 去思考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 个人情感与社会责任冲突时该如何抉择。吉米选择不亲自逮捕却留下字条, 暗示了法治社会中原则至上的同时, 执行方式仍可保留人性的温度。这一抽象思辨, 可以借助思维可视化工具加以结构化呈现, 为学生搭建清晰的思辨框架, 提升其批判性思维能力与文学深层次鉴赏水平。

四、数智时代思维可视化工具在英文小说文本教学中的应用

(一) 背景知识整合: 气泡图的系统梳理

在 *After Twenty Years* 的背景知识梳理中, 可以借助数智化气泡图来整合零散呈现的背景信息 (如图 4.1 所示)。从结构功能来看, 气泡图以中心主题为核心, 通过层级分支向外辐射关联信息, 这种结构特点尤其适合系统性梳理背景知识。



图 4.1 背景知识——气泡图

在具体操作中,以“*After Twenty Years*”为中心气泡,构建三个主要分支。第一分支聚焦作者欧·亨利,呈现其“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的文学地位,列举《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等代表作,并概括其擅长描绘“19世纪末美国都市小人物生活”的创作倾向。第二分支梳理作品核心特色,突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反转结局”这一标志性风格,以及“通过日常场景展现社会规则与人性冲突”的题材特点。第三分支呈现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20世纪初美国西部开发时期”,强调当时人口流动频繁、社会机遇与法制规范并存的社会图景。

气泡图的适用价值不仅在于信息的归类整理,更在于将背景知识与文本内容有机关联。例如,在“创作倾向”分支下,可自然关联到文本中“纽约深夜街角”这一具体场景,引导学生理解这一设定与作者创作取向的内在一致性。数智化工具的支持让这个操作更加灵活:教师输入关键词后,系统能自动生成初步框架;课堂讨论中,学生提出的观点可以实时添加到对应分支;随着教学推进,各分支内容也能随时调整和补充。最终形成的背景知识图不再是零散信息的罗列,而是将作者风格、作品特色与时代背景串联为整体,为学生后续解读文本提供了清晰的认知基础。

(二) 文本结构把握: 思维导图的层级呈现

在*After Twenty Years*的文本结构分析中,思维导图展现了它的实用价值。依托数智化工具的实时编辑与层级管理功能,教师可以快速围绕小说三要素搭建初始框架:开篇部分清晰呈现人物与环境等基本信息;情节发展部分则预设为开端、发展、高潮与结局四个阶段,勾勒出从“约定—等待”到“反转—揭示”的大致脉络(如图4.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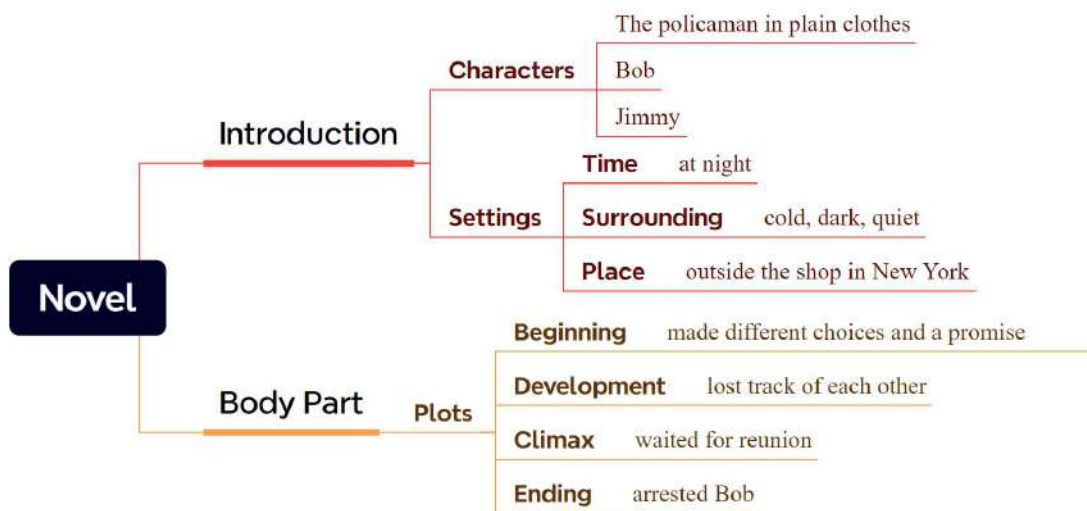


图 4.2 文本结构——思维导图

在课堂推进过程中,学生逐步细读文本,可以将发现的情节细节实时补充到对应分支下。例如,在“开端”分支添加两人当年的具体承诺与分别缘由;在“发展”分支补充他们分离后各自的人生轨迹;在“高潮”分支标注鲍勃在等待重逢时被捕这一关键转折;在“结局”分支录入吉米字条中所揭示的真相。这些细节不是由教师一次性灌输,而是学生在阅读中自主发现并动态添加的,思维导图因此成为课堂共建的认知工具,而非教师的单向展示。

此外,还可以将思维导图与时间轴工具结合使用。学生在梳理出“约定—等待—相遇—反转”的叙事脉络之后,另用一条时间轴将主要情节按照发生顺序重新排列:从二十年前两人约定,到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再到约定当晚鲍勃赴约、吉米认出朋友后让同事代行逮捕,最后到鲍勃被捕、吉米的字条揭示真相。时间轴的线性呈现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更直观地把握故事的时间推进顺序,避免因倒叙、插叙等手法造成理解混乱,与思维导图的层级结构形成互补。这种多工具联用的方式,进一步拓展了思维导图在文本结构分析中的教学弹性。最终,这张不断生长的思维导图不仅完整呈现了小说的整体架构,也记录了学生从粗略感知到细致分析的思维轨迹,为后续人物解读与主题讨论提供了清晰的结构支撑。

(三) 人物形象对比: 韦恩图的异同辨析

在人物形象对比分析环节,韦恩图能够直观呈现人物之间的异同。该图由英国数学家约翰·韦恩于1880年

提出,通过交叉圆形的集合关系展示事物间的异同,特别适用于需要明确共性与差异的对比分析场景。数智化韦恩图工具在保留这一核心功能的同时,提供了更灵活的操作空间。

在 *After Twenty Years* 这一小说文本中,韦恩图可用来系统对比吉米与鲍勃的人物特质(如图 4.3 所示)。两个圆形的独立区域分别呈现各自的独特属性:吉米一侧突出其“尽责”“守序”“理性”等警察职业特征;鲍勃一侧则体现其“冒险”“野心”“重情义”等复杂形象。而两个圆形的交叉区域,标示出二人的共同核心——对友情的忠诚与对承诺的坚守。这一图示直观揭示了人物关系的复杂性:他们既是立场对立的两方,又是被深厚情谊联结的故友。

课堂上,学生可以在阅读中自主发现并添加人物特质,韦恩图的内容随讨论推进随时调整。教师也可以补充文本证据,如将吉米的“尽责”与委托同事逮捕的行为对应,将鲍勃的“忠诚”与二十年赴约的情节印证。这种动态生成的可视化成果,不再是静态展示,而是师生共建的思维记录,有助于培养学生辩证分析人物的能力。



图 4.3 人物形象——韦恩图

(四) 主题内涵思辨: 伦理决策矩阵的权衡分析

在主题内涵的分析中,采用伦理决策矩阵能够将抽象的价值观冲突转化为可对比的结构化框架,便于学生直观把握不同选择背后的利弊得失(如图 4.4 所示)。矩阵首先呈现两个极端立场:完全倾向友情与完全倾向原则,分别展示各自的合理性与局限性。通过对比,学生可以直观看到任何单一选择都有明显缺陷,进而引出吉米的折中决策。这一折中平衡的做法,既守住了法治底线,又保留了人情温度,精准点明了小说的主题内涵:在冲突的价值观中寻求一种既有原则又有温度的解决方案。通过这样的可视化分析,学生能够超越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理解伦理抉择的复杂性,从而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

图 4.4 主题内涵——伦理决策矩阵

维度/立场	重人情、顾友情	守法治、坚原则
行为选择	包庇老友、放任离开、放弃职责	当场抓捕、公事公办、不讲情面
价值倾向	看重私人情义、情感优先	恪守法律底线、责任优先
存在弊端	违背职业操守、破坏社会规则	冰冷无情、抹杀人性温度、辜负友情
吉米最终决策	折中平衡: 不亲自逮捕、留字条说明	守住法治底线, 保留人情温度

五、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针对 *After Twenty Years* 的教材节选提出了数智时代思维可视化工具在高中英文小说阅读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气泡图用于背景知识整合; 思维导图、时间轴用于情节结构梳理; 韦恩图用于人物形象对比; 伦理决策矩阵用于主题内涵思辨。不同工具与不同文本特征形成了有针对性的匹配,旨在帮助学生在可视化的认知支架中实现从信息提取到价值判断的思维跃升。值得注意的是,数智时代的技术支持并非仅仅是“画图更快”的效率提升,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教学的组织方式。智能初始化降低了师生使用工具的门槛,实时共建让课堂

讨论成为可见的思维汇聚,动态迭代使可视化成果能够伴随认知深化而持续生长。思维可视化工具不再是教师预设的静态板书,而有可能成为师生共同建构的动态认知平台。

诚然,本研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由于篇幅和条件所限,本文主要聚焦于教学设计与应用路径的探讨,所提出的可视化工具使用策略尚需在实际课堂中进一步检验与完善。此外,本研究仅以 *After Twenty Years* 为单一案例,所得结论的普适性有待更多教学实践加以验证。未来研究可在本文基础上开展实证教学,收集学生反馈与学习成效数据,进一步优化工具应用策略;也可尝试将思维可视化工具拓展至整本书阅读、跨文本比较等更复杂的阅读场景。期待本研究能为一线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教学参考,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些许启发。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 [2] 赵国庆,朱嘉. 思维发展型课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3] 赵国庆,朱嘉. 思维发展型课堂的理论与实践(第二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4] 赵国庆,杨宣洋,熊雅雯. 论思维可视化工具教学应用的原则和着力点[J]. 电化教育研究,2019,40(09):59-66+82.
- [5] 刘濯源. 思维可视化:减负增效的新支点[J]. 中小学管理,2014(06),10-13.
- [6] 刘英祺,汪夷. 看见思维·读出智慧:思维可视化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7] 约翰·哈蒂,南希·弗雷,道格拉斯·费舍(著);杨洋(译). 可见的学习与深度学习:最大化学生的技能、意志力和兴奋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
- [8] BUZAN T, BUZAN B. The mind map book: how to use radiant thinking to maximize your brain's untapped potential[M].New York:Dutton,1994.
- [9] HYERLE D. Thinking maps-seeing is understanding[J].Educational leadership,1995,53(4):85-89.
- [10] 张媛媛.如何利用思维可视化工具促进高中英文小说阅读理解[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2025,48(03),14-19.

Application of Thinking Visualization Tools in Interpreting High School English

Novel Text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A Case Study of After Twenty Years

Huang Mingfeng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excerpt from O. Henry's short story *After Twenty Years* in the FLTRP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inking visualization tools in teaching high school English novel reading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Targeting different textual features such as background, structure, characters, and themes, the study employs bubble maps, mind maps, Venn diagrams, and ethical decision matrices for matched analysis. Supported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such as intelligent initialization, real-time collaboration, and dynamic iteration, the visualization tools transform from static presentation into a dynamic cognitive platform, offering new pedagogical insights for enhancing students' thinking quality.

Key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Thinking Visualization; High School English; Novel Reading Instruction

“被看见”与“怕评价”：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中的矛盾心理与价值引导

耿子涵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山东 济宁 272000)

摘要：在移动互联网深度渗透的当下，社交媒体已成为大学生建构自我、维系社交、表达诉求的核心场域，其线上展演行为成为大学生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看见”的渴望与“怕评价”的焦虑，构成了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中最突出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既源于个体自我认同的内在需求，也受社会文化环境及群体互动氛围的共同影响，长期存在易引发社交倦怠、自我认知错位等问题，甚至扭曲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本文基于戈夫曼拟剧理论，结合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现状，剖析“被看见”与“怕评价”矛盾心理的具体表现与形成机理，探究其对大学生成长发展的双重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价值引导路径，助力大学生理性使用社交媒体，实现线上线下自我的和谐统一，培育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

关键词：大学生；社交媒体；矛盾心理；价值引导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19

一、引言

随着社交媒介形态的快速迭代，“Z世代”大学生的大部分时间被社交媒体占据，是他们展现自我、拓展社交、获取信息的重要载体^[1]。与传统线下社交的即时性和真实性不同，社交媒体是可编辑、可筛选、可调控的线上展示空间。学生可以通过打磨文案、美化图像、打造人设等方式塑造个人形象。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普遍存在矛盾心态：一是正值自我同一性确立的关键时期，渴望依靠社交媒体的展示获得关注与认可，来锚定自我价值，缓解孤独感；二是他们极度敏感他人看法，担心因为分享的内容不够完善、不符合主流期待受到质疑而陷入畏惧评价的内耗情绪。被看见与怕评价两种心理相互拉扯贯穿这大学生社交平台使用的全过程，既左右线上行为选择，也深刻影响线下自我认知与价值判断。

现阶段，大多研究围绕社交成瘾、社交倦怠等单一方面展开，较少关注大学生线上展演背后矛盾心理，缺少针对心态形式逻辑、正确引导方式的完整梳理。基于此，本文围绕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矛盾心理展开研究，结合调研数据理论成果，系统剖析其核心特征及影响因素，探寻贴合现实的价值引导办法。既能丰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网络思政教育的研究视角，也可引导大学生理性使用社交媒体、塑造健康人格与正确价值观提供实践参考。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 核心概念界定

1. 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

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指大学生借助社交平台发布动态，主动建构并展示自我形象、生活状态、价值观念，与他人进行互动交流的行为过程。其核心特征体现为选择性、表演性、互动性：选择性体现为大学生筛选编辑展演内容，倾向于展示自身优势；表演性体现为大学生打造人设、包装内容，呈现适配社交场景期待的个人形象；互动性体现为展演依托的点赞、评论、转发等反馈落地完成，属于双向社交实践。

2. “被看见”与“怕评价”的矛盾心理

“被看见”是大学生参与社交媒体展演的核心心理诉求，他们希望借助线上分享收获他人关注与认可，得到

作者简介：耿子涵(2000—)，女，学士，研究方向为思想与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耿子涵

正向互动回应,借此彰显自我价值、补足社交需求,这也是个人自我认同与情感归属的外在流露;而“怕评价”,是展演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负面心态,学生顾虑分享内容被恶意解读、遭到质疑嘲讽,由此滋生焦虑、不安、回避等负面情绪,根源在于对自我价值缺乏底气,同时刻意规避社交潜在风险^[2]。两种心理彼此交织、互相制衡,共同构成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阶段最突出的内心矛盾。

(二) 理论基础

本文以戈夫曼拟剧理论作为主要分析视角。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社会生活就像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是演员。生活可以简单分为前台和后台,人们会在不同场合刻意打理和展示自己的形象。前台就是公共社交场合,我们会按照社会普遍的标准去表现,带着明显的表演成分;后台则是私人放松的空间,不用再刻意伪装,能完全放下外在包袱,露出最真实的一面^[3]。

将这一理论应用在大学生的社交媒体展演场景中来看,社交平台就是前台,大学生通过精心编辑内容、塑造人设,完成自我形象展示,以此满足被外界关注的心理诉求;真实本心状态则属于后台范畴,他们顾虑后台真实面貌和前台表演形象出现落差,害怕他人透过展示内容看到真实的自己并给予负面评价,进而担心外界评价的内心焦虑就产生了。拟剧理论为我们解读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中的矛盾心理提供了重要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大学生线上自我呈现的行为逻辑与心理动因。

三、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中“被看见”与“怕评价”矛盾心理的具体表现

(一) 展演内容:精心包装与刻意隐藏的矛盾

为满足被看见的心理诉求,大学生会精心筛选、刻意包装社交展演内容,并花费大量时间琢磨文案、美化图文视频,发布一些展示个人学业成果、日常生活等积极向上的内容,甚至塑造超出自身实际的“完美人设”来吸引他人的关注和赞美。《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2024年的调查显示,86.60%的受访大学生有使用社交媒体分享生活的习惯,其中多数会对分享内容进行编辑优化,形成摆拍修图、雕琢文案再设置分组可见的完整流程。

(二) 展演频率:主动更新与被动暂停的矛盾

在被看见的心理驱动下,不少学生会保持较高的动态更新频率,甚至形成了一种习惯,期待通过高频次的展演维持自身存在感。尤其是在小红书、抖音这类平台,部分学生尝试往博主的方向发展,通过持续发布作品打造个人标签,实现自我价值。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展演内容没有获得预期的点赞、评论,或者收到负面评价时,又会主动暂停更新,甚至隐藏过往展演内容,陷入自我怀疑。

(三) 互动行为:主动寻求与刻意回避的矛盾

被看见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获得他人的回应,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展演中会主动寻求互动:发布内容后频繁刷新页面,等待点赞、评论与转发;主动@好友、加入话题,吸引关注;通过及时回复留言评论,维系人际关系确认被关注。正向反馈本身是社会支持的重要形式,能切实提升大学生的幸福感与自信心,进一步强化展演意愿。

但面对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或中性评价时,他们又会表现出刻意回避的态度:不回负面评论、删除质疑性留言,甚至屏蔽发表负面评价的人;对于中性评价,也会过度解读,担心对方不认可自己、看不起自己。此外,大学生微信列表中多为弱连接关系,客套疏离的交往模式让他们更害怕主动互动带来的评价风险,进而选择被动回避,形成想互动又怕互动的矛盾。

(四) 人设塑造:固定标签与自我迷失的矛盾

为了更好地被看见,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打造人设,通过持续的内容展演强化人设标签,让他人形成对自己的固定认知,以此获得稳定的关注与认可。跨平台打造人设已成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突出特点:朋友圈树立乖巧学生形象,小红书塑造精致生活风格,抖音则尽情展现兴趣爱好。

但长期维持固定人设,也容易催生怕评价的内心焦虑。言行一旦偏离既定标签,就担心被贴上虚伪、刻意故作的评价;也害怕展露真实本性,打破外界固有印象,最终失去原有关注与认可。

四、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中矛盾心理的形成机理

(一) 个体层面:自我认同的内在需求与心理脆弱性的双重作用

大学阶段是确立自我身份与人生定位的重要成长节点,大学生正处在自我同一性与角色迷茫交织的成长阶段,特别希望通过他人的认可来明确自身价值,社交媒体凭借准入门槛低、传播广的天然优势为他们搭建起自我表达

的平台。潜藏在大学生心底对自我价值求证的本能诉求会促使他们主动在社交平台进行自我呈现,希望依靠外界给予的关注度和正向评价印证自身存在的独特意义。

同时,大学生的心理具有较强的脆弱性与敏感性:一方面,他们长期处于校园环境中,社会阅历较少,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面对他人的负面评价,容易产生自我否定、焦虑不安等情绪^[4];另一方面,部分大学生存在自卑心理,对自己的能力、形象缺乏自信,害怕自己的不足被他人发现,因此在展演过程中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陷入怕评价的焦虑中。现实社交焦虑还会蔓延到网络场景,本身容易社交紧张、缺乏自信的大学生,既想借线上自我展示获取他人认同,又担心表现不够理想招致外界评判,进而加重内心的矛盾拉扯。

(二) 社会层面:多元文化与评价标准的冲击

当前社会正处于多元文化碰撞的时代,大学生价值观难免受到冲击,对于自我展示、他人评价的认知也越来越多元。一方面,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氛围,鼓励个体大胆表达自我,这种社会文化导向,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渴望被关注的内心诉求,促使他们更愿意借助社交平台展现个人风格与自身价值。

另一方面,社会评价标准趋于多元且没有统一界定,也让大学生深陷畏惧评价的心理内耗。社交平台上人群立场各异、评判标准各不相同,有人认可线上展演表达,也不乏质疑调侃甚至恶意批评的声音。与此同时,颜值焦虑、学历焦虑、成功焦虑等社会情绪经由网络不断传导,使得大学生过度在意自身形象、学业成绩与生活状态,生怕达不到大众普遍评判尺度,被贴上平庸、落伍之类负面标签。加之优绩主义风气蔓延,大学生在学业、人际等领域始终处在高强度竞争中。现实竞争压力延伸到线上展演场景,更让他们格外看重外界看法,担心个人分享不够出彩,从而落在同龄人行列之后。

(三) 群体层面:同辈群体的示范与压力传导

同辈群体是大学生社交生活的核心,其社交媒体展演行为与评价导向,对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影响很大。一是同辈群体的示范作用,会进一步强化大学生被看见的心理诉求:身边同学如果通过社交媒体展示获得了大量关注和赞美,其他学生就会产生羡慕心理进而模仿,也希望通过同样的方式,获得同等的认可与关注。这种同辈间的模仿与竞争,会推着大学生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社交媒体上。

二是同辈群体的评价压力,也会加剧大学生怕评价的焦虑。大学生格外看重身边同学对自己的看法,生怕被调侃、质疑。尤其是在朋友圈这种强关系主导的社交平台,大学生的展演内容主要面向熟人,这种社交圈子的评价压力,让他们更不敢展现真实的自我,只能精心包装展演内容,同时过度关注同学的评价,陷入心理矛盾中。此外,同辈群体中“精装朋友圈”与“毛坯人生”的对比,也会让学生产生自我否定,加剧评价焦虑与心理内耗。

五、矛盾心理对大学生成长发展的双重影响

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中被看见与怕评价的矛盾心理,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其对大学生的成长发展具有双重影响,既有积极推动作用,也有消极阻碍作用,关键在于大学生能否理性调控这种心理矛盾。

(一) 积极影响:助力自我认知与社交能力的提升

其一,被看见的心理需求能驱动大学生主动展现自我,在过程中梳理兴趣特长、价值观念,明确自我定位,完善自我认知。他人的正面评价可为学生提供积极的心理反馈,增强自信心与自我认同感,缓解身份焦虑,更好地应对大学阶段的成长困境。

其二,社交媒体展演与互动能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让他们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提升社交能力与人际交往水平。积极反馈可以带来心理支持,同时提升幸福感。

最后,矛盾心理的存在,能促使大学生进行自我反思:在被看见与怕评价的拉扯中,他们会反思自己的展演行为、人设塑造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真实的自我,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与心态,实现自我成长。

(二) 消极影响:引发心理问题与价值偏差

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与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的上行社会比较和焦虑程度呈显著正相关^[5]。若矛盾心理长期得不到有效调控,就会对大学生的成长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其一,心理焦虑与内耗情绪加剧。学生若长期处于“想被看见又怕被评价”的状态,会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以至于陷入自我怀疑的负面情绪,时间长了还容易滋生社交倦怠、情绪低落等心理隐患。调研显示,越来越多大学生在高频社交媒体互动中感到疲惫,忌惮网络评价,最终导致回避现实社交。

其二,导致自我认知错位。为博取关注,部分大学生过度包装自己,塑造虚假人设,长期处于“表演状态”,慢慢分不清现实本我与网络人设的边界,渐渐自我迷失,难以清醒正式自身优缺点。多重身份相互割裂,还会瓦

解自我认同感,不利于健全人格的培育成型。

其三,误导个人价值取向。部分学生将社交媒体的流量、点赞、评论等同于自我价值,一味追求曝光度与关注度,反倒忽视了线下学习、生活与人际交往,甚至为了博取流量与热度,突破道德底线、背离价值准则,形成“重表面、轻内涵”“重他人评价、轻自我坚守”的错误价值取向。

此外,过度关注他人评价还会消磨独立思考能力,只会被动迎合他人期待,缺乏自主判断与价值坚守。

六、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中矛盾心理的价值引导路径

面对大学生社交媒体展演中渴望被看见、又惧怕被评价的矛盾心态,应构建个体自律、学校引导、社会共建三位一体的价值培育体系。既要正视并尊重大学生寻求外界关注的合理心理诉求,也要疏导其社交评价带来的心理焦虑,引导大学生理性参与社交媒体生活,形成清醒的自我认知,树立正向稳定的价值观念。

(一) 个体层面: 强化自我认知, 提升心理调适能力

大学生是调控自身矛盾心理的核心主体,可从自我认知、心理调适、行为规范三个维度开展自我疏导与自我引导。

第一,大学生要建立正向的自我认知,理清真实自我与线上自我的边界,坦然接纳自身不完美。要明白,自我价值从来都不依附于他人的评价和社交流量,核心在于自身的成长和持续进步。放下对“完美人设”的执念,敢于展露真实自我,不刻意迎合他人的期待,守住自我本真。

第二,要提升自身的心理调适能力,理性看待他人的评价。既要正视正向评价带来的正向激励,也要从容接纳负面声音,学会区分合理建议和恶意调侃,不因为外界的非议打乱自己的情绪和判断,培养稳定强大的内心。

第三,规范自身社交媒体行为,合理把控展演频率与时间,避免沉迷。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线下学习、日常生活与现实交往,实现线上生活与线下成长的良性平衡。

(二) 学校层面: 完善教育引导体系, 强化育人实效

学校作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阵地,需发挥教育引导的主导作用,针对性解决大学生的心理矛盾与价值困惑。

第一,创新教育形式,将心理健康教育与网络素养教育,深度融入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场景。不必单独开设枯燥的理论课程,把相关内容渗透到通识课、专业课后实践环节,增强教育的沉浸式体验与代入感。比如在思政课上,让学生结合自身发布动态、拍摄短视频的真实经历,畅谈被关注与怕评价的矛盾心理,传授负面情绪疏导、负面信息甄别等简易可行的心理调节方法,让课程兼具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上好高质量的思想政治课^[6]。

第二,营造正向校园文化氛围,用贴合大学生认知习惯的方式,培育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念。打破传统单向的价值灌输模式,搭建由学生自主参与、自主展示的校园平台,引导学生走出“流量至上”“颜值至上”的认知误区。学校可以开展评选“最真实大学生”主题活动,倡导学生用无美颜、不刻意摆拍的方式,记录图书馆学习、社团参与、宿舍日常等真实的校园场景,引导学生接纳自己的本真状态。

第三,完善人文引导机制,切实发挥辅导员一线育人与心理疏导作用。依托校园智慧服务平台,搭建匿名的心理诉求反馈渠道,方便学生随时倾诉在使用社交媒体时遇到的情绪困扰,比如遭遇恶意评论、因盲目攀比产生的心理焦虑等,这样就可以实时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及时介入疏导,避免负面情绪持续累积。

(三) 社会层面: 营造包容多元的文化氛围, 传递正向价值

社会层面需要主动打造包容多元且具备理性底色的文化环境,用良好的外部氛围为大学生们的成长成才保驾护航。社会大众应当尊重个体个性差异,跳出传统单一又刻板的价值评判框架,以平和和客观的心态看待大学生在社交平台的自我展示行为,摒弃无端质疑与嘲讽并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包容。社会还要强化社会舆论正向引导,抵制“流量至上”“颜值至上”的片面思潮,倡导真实纯粹自我呈现方式。还要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建设,扩大心理知识普及覆盖面,培育关注心理健康的社会风尚,让大学生在面临心理困扰时,能够及时获得专业帮扶与情感支撑。最后规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加大社交媒体平台监管力度,整治虚假信息、网络暴力等不良乱象。

七、结论

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展演中形成的“被看见”与“怕评价”矛盾心理,是自我认同诉求、社会文化氛围、同辈压力共同催生的结果,对其成长发展存在双向影响。“被看见”是大学生自我建构与社交需求的外在体现,“怕评价”凸显其心理承受力不足与社交风险规避心态,二者冲突实则是线上自我呈现、自我认知和外界评价

形成的内在博弈。

消解这种心理矛盾,离不开个人、高校和社会的共同发力。大学生自身要主动建立清晰的自我认知,不断提升心理调适能力和行为自律水平。高校要持续健全育人体系,强化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and 价值观培育。社会则要涵养开放包容且价值多元的正向氛围,传播主流正向价值。通过多方联动,才能引导大学生理性使用社交媒体,实现线上线下自我身份的统一,树立正向的价值追求,成长为新时代的合格青年。

参考文献:

- [1] 钟小莹.拟剧理论视角下抖音平台中的“Z世代”运动员自我呈现研究[D].广东技术师范大学,2025.
- [2] 晋艺菡,徐婕.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社交回避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J].新媒体研究,2026,12(05):38-42.
- [3] 张艳斌,陈鹏宇,单佳雯.“毛坯人生”与“精装朋友圈”:青年精神生活的自我展演及引导策略[J].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25,40(04):43-53.
- [4] 王昊雯,宫准.大学生数字情绪传染研究:平台互动特征与社会情境线索的影响[J/OL].山东高等教育,1-9[2026-05-07].<https://link.cnki.net/urlid/37.1495.G4.20260316.2034.002>.
- [5] 丘文福,林谷洋,叶一舵,等.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焦虑的影响:上行社会比较和心理资本的序列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7,(08):88-92+73.
- [6] 葛瑶.新时代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实践[J].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6,25(01):41-44.

Being Seen vs. Fearing Judgment: Ambivalent Psychology and Value Guidance i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Media Performative Presentation

Geng Zihan

(Shandong Polytechnic College, Jining, Shandong, China)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depth penetration of the mobile Internet,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 core arena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construct self-identity, maintain social connections and express demands. Their online performative behavior has evolved int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desire to "be seen" and the anxiety of "fear of evaluation" constitute the most prominent ambivalent psychology i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media performance. This contradiction stems not only from the internal need for individual self-identity, but also from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the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group interaction atmosphere. Its long-term existence may easily lead to problems such as social burnout and self-cognition dislocation, and even distort college students' value orientation. Based on Goffman's Dramaturgical Theory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media u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ambivalence between "being seen" and "fearing evaluation", explores its dual impacts on college studen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value guidance paths. It aims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use social media rationally, realize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self, and foster sound and positive value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Media; Ambivalent Psychology; Value Guidance

高职院校教师能力清单制定的难点与策略研究

胡梦蝶, 邹久阳, 殷雨时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 2026年教育部新政将“细化教师能力清单”提升至关键要素改革的核心高度。当前高职院校在清单制定中面临指标同质化、静态固化、校企脱节以及缺乏实证数据支撑等现状。本文深度剖析了标准更新滞后、AI素养结构性缺失、评价体系缺乏诊断功能及深层结构性矛盾等核心难点, 提出基于德尔菲法构建专家共识、依托“四维能力”分层分类设计、深化政行企校协同以及利用AI技术全方位赋能评估与培训的优化策略, 旨在为高职院校人事管理、师资评价改革与高水平队伍建设提供兼具理论高度与实操价值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国高职院校; 能力清单; 四维能力; 人事评价; 产教融合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编号: B/2023/02/21); 2026年度扬州市社科类决策咨询课题(项目编号 2026YJC-050)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16

引言

教育部于2026年2月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教职成〔2026〕1号), 其中细化教师能力清单是主要任务之一。文件建议从专业理论、实践能力、教学能力、教研能力四个方面对教师能力进行细化, 借助清单条目精准实施一线教师的能力培养与培训。目前, 构建职业教育教师能力清单这项工作迫在眉睫, 正所谓恰逢其时。

教师能力框架正从基础的数字素养逐渐向人工智能(AI)素养过度^[1]。我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相继出台的政策也正在持续推动这一重要进程。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才产生了迫切需求, 对技术型人才的要求已从掌握单一操作技能向具备数字技能、创新思维和跨领域整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全面转变。职业教育教师作为技术技能人才的培育主力军, 必须率先实现自身能力结构的迭代升级, 才能更好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实际操作层面, 一线教师能力清单的构建可以与“双师型”教师和产教融合等政策结合起来, 提炼出包含师德师风、专业基础、理论教学、实践教学、课程开发、教学研究与改革、专业发展能力等一级指标的评估框架, 为清单的细化和可操作性提供了重要参考^[2]。然而, 面对外部产业技术高速迭代、内部多部门多学科的结构矛盾以及AI对教育的巨大冲击, 高职院校人事部门在推进该政策实施落地时往往面临人手不足、信息滞后、多学科难平衡、标准难统一等诸多现实困难和挑战。面对以上客观现状, 学校人事部门需要沉下心来, 直面挑战, 深入了解教师能力清单构建的难点与策略, 找出学校发展与教师个人利益的合适平衡点, 才能尽快推动教师评价体系的优化, 真正服务学校高质量发展^[3]。

一、高职院校教师能力评价体系的现状

(1) 能力维度高度同质化, 结构性失衡严重。现有评价清单过度聚焦常规的传统教学能力, 而显著忽视了职

作者简介: 胡梦蝶(1991—), 女, 硕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高层次人才教师引进和培养策略研究;

邹久阳(1990—),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教师职业发展路径;

殷雨时(1982—),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教育科学管理。

通讯作者: 胡梦蝶

业教育本质特征所要求的复合型能力结构。技术技能更新能力、产教融合实践能力、企业技术服务能力、创新创业指导能力等关键职教属性被严重弱化甚至完全缺席。绝大多数的能力指标集中于教案设计、课堂讲授、学生考勤等常规教学行为,极少涉及企业真实项目开发、工艺改进或技术成果转化等产业端能力。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评价结果无法真实反映“双师型”教师的核心价值,使评价体系沦为僵化的形式化管理工具,丧失了发展性诊断的初衷。

(2) 能力指标普遍抽象笼统,缺乏行为锚定标准。大量清单指标仍停留在“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等模糊表述层面,未能依据 Miller 金字塔模型将其科学解构为“知道-展示如何做-实际去做-在真实情境中持续胜任”的渐进式行为证据链。这种缺乏具体行为描述的指标设计,直接导致评价过程主观性极强、信效度偏低、反馈价值羸弱。在实际操作中,不同评估者对同一教师的评分往往呈现出极高的离散度,远超教育测量学公认的容错阈值。

(3) 清单呈现严重的静态固化特征,响应机制缺失。现有体系未能建立动态响应机制以适配产业升级、数字技术演进与政策迭代。面对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简介》及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兴领域对教师提出的全新要求,现有清单的更新周期却往往长达数年,且更新决策多依赖行政指令而非产业大数据驱动。例如,在智能制造装备专业群建设背景下,数字孪生建模、人机协作调试等新能力尚未纳入主流评价体系,造成教师能力发展与产业前沿需求之间出现显著的“时间差”与“能力差”。

(4) 校企协同机制实质性缺位,产业反哺能力不足。尽管政策反复强调“产教融合”,但企业参与能力标准制定的比例和深度均严重不足,多停留于象征性的会议座谈,缺乏基于岗位任务分析(JTA)和 DACUM 等专业方法的深度介入。企业最看重的核心能力(如设备故障诊断、跨工序协同优化、安全风险预判、数字化生产管理、技术文档编写等)在现行高职教师能力清单中的覆盖率极低,暴露出清单与产业真实需求的严重脱节。

(5) 个体差异与发展阶段特征不足,缺少分层分类设计。现有体系普遍采用“一刀切”的通用模式,未科学区分专任教师、公共课教师、实验实训教师等不同岗位类型,即使区分也停留在名称上,未做出具有明显特征的个性化区分。同时,对新教师(0-3年)、熟练教师(4-10年)、专家型教师(10年以上)的能力进阶模型也未形成明显区分。这种均质化设计无法支撑差异化的人才培养路径,反而加剧了教师职业发展的迷茫感与倦怠感。

(6) 构建过程缺少实证数据支撑,过度依赖主观经验。大规模教师行为数据、企业岗位大数据、毕业生能力反馈等多源异构数据尚未系统接入清单研制流程。极少有高职院校在构建能力清单时引入机器学习算法对教学日志或教科研成果进行深度挖掘分析。严重的数据赤字证实了能力清单难以实现从“经验驱动”向“证据驱动”的范式跃迁。

二、高职院校教师能力清单制定的难点

(1) 能力标准的动态更新与行业需求严重脱节。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紧密关联性,要求教师能力标准需与技术变革同步更新,但实际操作面临多重困难。其一,技术迭代速度(如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远超标准制定周期,传统“多年一修订”的模式存在明显滞后性,导致按旧标准培养的教师知识难以匹配最新产业要求,直接冲击“以产定教、以产改教”的根本原则。其二,不同行业、企业对人才能力要求差异显著,统一的能力清单难以满足各专业个性化、精细化需求,容易造成标准与实践脱节及教师能力的“两极分化”。其三,政行企校多方深度参与的常态化协同更新机制缺失,多数院校过度依赖行政部门的周期性修订,受企业意愿、资源投入等制约,企业技术标准的转化效果难以保障。

(2) 教师 AI 素养与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存在结构性不足。人工智能深度重塑职教生态,但高职教师的 AI 应用能力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4-5]。一方面,AI 素养呈现“认知高、应用低”的失衡状态,教师的 AI 伦理认知普遍良好,但精准学情分析、个性化教学评价等深度应用渗透率低,技术多停留在工具辅助层面,未能触及教学模式创新的核心。另一方面,数字能力存在显著的地域与院校层次差异,加剧了“数字鸿沟”,极大增加了全国普适性能力基准的制定难度。此外,现有培训多为普及型讲座,缺乏系统化进阶培训与专项支持,难以支撑教师实现能力

跃升。

(3) 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制约实践能力评估。文件强调的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因多重问题难以落地。合作深度上,受企业成本、商业机密、生产任务等制约,合作多停留在参观挂职等浅层次,教师无法介入核心生产,导致实践能力评估缺乏真实的观测依据。评估标准上,常以“企业实践天数”等粗放指标衡量,未能科学化教师在解决技术问题、引入新工艺等方面的实际贡献。“双向流动”更面临深层制度障碍,教师赴企有教学冲突与职称顾虑,企业能手入校受限于教学经验与管理体制,导致“双师型”队伍认定难以常态化推进。

(4) 教师能力评价体系缺乏科学性与诊断功能。构建清单的核心是精准评价与发展教师,但现有评价体系存在多重缺陷。评价维度狭窄且忽视职教特色,多侧重课时量、科研论文等易量化指标,剥离了专业实践、技术研发等核心维度,背离了职教“实践性”本质。评价主体单一,行政主导占绝对主流,企业导师等多元视角缺失,影响信效度。指标权重设置重静态成果、轻动态技术创新能力。最核心的是,评价结果与专业发展脱节,未针对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改进路径,导致评价彻底沦为“为评而评”的工具。

(5) 不同专业领域能力标准的差异化与复杂性挑战。职教涵盖从传统技艺到前沿科技的庞大专业体系,专业性导致能力维度的根本不同。例如,工程技术类(如智能制造)高度强调设备操作、工艺优化能力;现代服务类(如康养旅游)更侧重人际沟通与应急处理能力;数字经济类(如大数据)则要求扎实的数据思维与算法架构能力。试图用同一套统一指标去衡量所有专业教师,必然导致清单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大幅下降。

(6) 深层次的系统性障碍与结构性矛盾。制度设计存在内在矛盾,导致教师“专业意识与师德”得分普遍较高,但“教学研究”“实践教学”等核心职教能力显著滞后,反映出制度对“底线”要求强调过度,对“高线”发展支持不足。教师专业发展陷入多维悖论:一是长期从教者易因路径依赖导致教学经验边际效应递减、技能更新停滞;二是培训资源存在“漏斗效应”,企业培训因内容脱节导致转化效益不佳;三是职业阶段困境各异,如新手教师边缘化、中年教师科研压力大、高级教师职能行政化等,亟需能力清单给予针对性回应。

三、高职院校教师能力清单构建的策略

基于教职成〔2026〕1号文件的指导要求,结合职教发展趋势,能力清单的构建必须采用系统化、科学化的策略:

(1) 运用德尔菲法构建高质量专家共识。德尔菲法能够有效整合多元意见,是构建复杂能力清单的核心工具。应组建涵盖职教研究专家、高水平院校教学管理者、头部企业技术专家及行业组织负责人的高规格代表团队,确保权威性。通过两到三轮的匿名问卷咨询与反馈迭代,引导专家就教师能力维度和具体行为指标达成高度一致的科学共识,彻底摆脱单一主观经验的束缚。

(2) 建立产教同频的常态化动态调整机制。清单构建绝非一劳永逸,必须紧密跟进产业技术迭代与课程改革新要求。当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新形态教材开发时,教师能力要求必须同步审视与更新,形成“专业-课程-教材-教师能力”的联动改革闭环。应设立由“政行企校”多方代表组成的常设机构,结合产业技术预测、毕业生跟踪等数据驱动,推动教师常态化下企业进行技术认证,并建立企业技术向教学资源的合规转化机制,确保教师标准与行业标准同频共振。

(3) 构建基于“四维能力”的分层分类标准体系。坚决摒弃“一刀切”的陈旧模式。以教育部明确的“专业理论能力、实践能力、教学能力、教研能力”四个基础方面为核心框架,细化为可观察、可评价的具体指标。纵向上按职业生涯分层:新任教师侧重基本功,骨干教师突出课改引领,专业带头人强化产业资源整合。横向上结合专业领域分类:针对工科强化工程实践指导,针对服务类强化数字化服务设计等,形成科学适配、导向清晰、可落地的评价体系。

(4) 夯实政行企校多主体协同发展机制。教师发展需四方深度发力。一是共建平台,校企联合成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对照清单开展评价与培训,企业出场景、学校出理论,实现优势互补。二是畅通双向流动,完善产业导师制度,大力引进大国工匠兼任任教,推动专任教师深度参与真实生产项目^[6]。三是重塑激励,在产教联合体

或共同体内,建立企业人员入校任教的激励与评价考核机制,将其任教表现与个人待遇、晋升挂钩,激发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

(5) 深度开发 AI 赋能的评估工具与培训资源。紧抓数字化转型契机,让 AI 全方位赋能教师专业发展。依托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前沿技术开发智能评估工具,通过精准分析教学视频与课堂互动数据,实现多维度、客观化的能力诊断,降低主观偏差。在教师能力清单中单设板块,写明数字素养与 AI 赋能教学能力的具体要求。应持续增加经费投入,健全跨部门交流机制,适时将能力评价结果与教师绩效分配、职称评审等紧密挂钩,形成激励与督促政策机制。

四、结语

目前,教师能力清单的四维框架已经明确,且必将成为各高职院校教师能力建设的基础。针对当前专业差异凸显、校企协同实效不足、评价体系缺乏诊断功能等现实问题,高职院校人事与教务处等相关部门应协同发力,加快构建科学规范、动态更新、操作性强的实施机制,为高素质创新型“双师型”教师队伍的精准培育与长效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 [1] 祝智庭,胡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发展机遇[J].电化教育研究,2022,43(01):5-15.
- [2] 田小红,季益龙,周跃良.教师能力结构再造: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03):91-100.
- [3] 李广.基于“职教 20 条”的高职院校高层次师资队伍引育探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1,34(17):55-57.
- [4] 王建梁,梅辉.教育数字化背景下职业院校教师数字胜任力的模型构建及推进策略[J].教育与职业,2024,(14):91-97.
- [5] 孙善学.职业教育教师数智素养指标体系构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05):87-96.
- [6] 曹晔,孟庆国.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与高质量“双师型”职教师资队伍建设[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05):19-24.

Research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strategies of formulating teacher competency

inventor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u Mengdie, Huan Jiuyang, Yin Yushi

(Yang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 Yangzhou,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new policy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26 has elevated the “refinement of teacher competency inventories” to the core of key element reforms. Currently,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inventori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ace several pressing issues, including the homogenization of indicators, static rigidity, disconnec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and a lack of empirical data suppor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re difficulties, such as lagging standard updates, the structural abs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literacy, the lack of diagnostic functions in current evaluation systems, and other deep-seated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Consequently, it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building expert consensus based on the Delphi method, implementing a hierarchical and categorized design based on “four-dimensional competencies,” deepening the synergy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y, enterprises, and colleges, and utilizing AI technology to comprehensively empower teacher evaluation and training.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practical path, combining theoretical depth and operational value, for personnel management, teacher evaluation refor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 high-level teaching workfor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petency inventory; four-dimensional competencies; personnel evaluatio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价值、困境与策略

王旭方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00)

摘要：培育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是提升大学生心理自我调节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是维护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体系的重要抓手。当前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工作，面临学生个体认知偏差与心理内耗突出、高校培育体系割裂且协同机制缺位、家庭积极教育理念淡薄与培育行为缺失、社会主流价值引导不足与不良心态渗透等现实困境。基于此，应从个人、高校、家庭、社会四维发力，强化大学生主动培育意识，健全高校系统化培育体系，转变家庭教育理念并重视心理培育，加强社会主流价值引领并营造积极氛围，凝聚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效，助力大学生塑造健全人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关键词：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高校思政；协同育人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30

一、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时代价值

大学生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积极心理品质对其思想、情感与行为发展具有正向引领作用，能推动个体激发自身潜能、提升获得幸福生活的能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号召全社会引导青年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奋斗、肯吃苦”的新时代好青年。2026年教育部新春第一会对“健康第一”理念进行工作落实部署，谋划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将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置于教育工作突出位置，兼具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双重价值。

（一）增强大学生心理自我调节能力，化解个体心理危机

当前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呈多发上升态势，相关数据显示18-24岁青年心理疾病患者占比超三成且逐年攀升，核心原因在于青年群体缺乏科学的积极心理调节体系，难以有效疏导不良情绪，最终导致心理问题积累加重。培育积极心理品质，能帮助大学生掌握情绪调节方法，强化自我情绪控制能力，以积极心态适应社会环境，化解情绪症结，形成稳定持久的心理品格，从根源上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与恶化。

（二）维护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网络信息具有海量性、复杂性、更新快的特征，真实性难以甄别，加剧了大学生的认知危机；同时，个性化推荐机制形成的“信息茧房”，限制了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使其难以理性看待多元观点。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能帮助大学生树立理性、平和的网络心态，提升信息辨别与辩证分析能力，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的侵蚀，既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也为构建健康社会舆论环境、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提供重要保障。

（三）完善高校思政育人工作体系，实现育德与育心融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大学生的心理状态直接关乎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积极心理品质培育聚焦于塑造大学生优良人格，不仅能有效预防心理疾病，更能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名利得失与群己关系，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将积极心理品质培育融入高校思政教育，能提升大学生的道德情操与社会责任感，推动育德与育心深度融合，实现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有机统一，完善高校“三全育人”工作体系。

二、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现实困境

作者简介：王旭方（1996—），助教，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背景下，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水平总体向好，但受个体、高校、家庭、社会多重因素影响，培育工作仍存在诸多短板，尚未形成系统化、常态化的培育机制，提升空间显著。

（一）学生个体层面：认知偏差与心理内耗，制约积极心理形成

大学生个体的内在心理特征是影响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成效的核心因素，认知偏差、抗压能力弱、自我效能感低等问题，导致部分大学生难以形成稳定的积极心理，具体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个体认知偏差突出。大学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但社会经历不足，易通过片面比较产生盲目自信或自卑心理，且易被外部言论误导；同时，网络“信息茧房”加剧了认知局限，部分大学生盲目接收海量信息填补空虚，进一步加深认知偏差，影响积极心理的构建。二是内卷与躺平间的摇摆引发心理内耗。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与现实挑战，大学生常陷入“内卷”的高压与“躺平”的逃避之间，部分学生为量化目标疲于奔命却缺乏清晰人生方向，部分学生因畏惧失败回避风险、拖延任务，此类行为加剧自我怀疑与内在驱动力缺失，造成心理与行为的双重内耗，消耗自我效能感，阻碍积极心理品质的形成。

（二）高校培育层面：体系不完善与协同缺位，培育实效受限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是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高校系统化的教育体系与协同化的育人机制支撑，但目前部分高校的培育工作存在明显短板：一是课程设置割裂，育人融合不足。部分高校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割裂，思政课仍以灌输式教学为主，难以调动学生主动性；专业课教师缺乏课程思政融合意识，忽视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同时，部分教师过度引进外部教育资源，忽视本土化教育元素，教材理论与现实脱节，难以指导学生实践，未能发挥各学科协同育人的优势。二是全员育人协同机制有待完善。受传统心理学影响，部分教育者仅关注有明显心理问题的学生，忽视对正常学生的积极心理引导；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过度依赖辅导员，而辅导员事务繁杂、专业能力有限，难以开展针对性培育；高校心理健康专业师资匮乏，与日益增长的学生需求形成“供需矛盾”；且培育工作多由学生工作部门“单打独斗”，未形成全校联动的育人格局，加之场地、设备等资源有限，导致培育工作滞后、效果不佳。

（三）家庭教育层面：理念淡薄与行为缺失，积极培育缺位

良好的家庭氛围是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重要基础，但当前家庭教育中存在明显的积极心理培育缺位问题：一是家长培育意识淡薄。部分家长将大学生的情绪烦躁、抑郁等问题视为正常现象，缺乏心理疏导与提前干预的意识，忽视对孩子积极心理品质的主动培育。二是教育理念存在偏差。受传统应试教育影响，家长过度关注大学生的成绩、考证、考研等功利化目标，对心理健康状况关注不足，导致大学生被“应试化”裹挟，心理压力加剧，难以准确判断自身心理健康状况。据统计，60%的大学生表示传统教育模式对其积极心理品质形成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家庭教育的偏差成为积极心理培育的重要阻碍。三是家庭氛围与教育方式不当。部分家庭氛围压抑、沟通不畅，家长教育方式简单粗暴，未能给予孩子足够的鼓励与支持，导致大学生心理素质脆弱，难以形成积极的心理应对方式。

（四）社会环境层面：价值引导不足与不良心态渗透，负面影响凸显

社会环境是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形成的重要外部因素，在社会转型加速的背景下，社会层面的价值引导不足与不良心态渗透，对大学生积极心理培育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一是不良社会心态的传播与渗透。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使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心态在社会中蔓延，加之社会竞争日益激烈，部分大学生受此影响出现以自我为中心、缺乏集体荣誉感、注重眼前利益等问题，不利于感恩、自我管理、社交智慧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形成。二是职业发展与现实预期的落差。市场经济下的激烈竞争使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中面临诸多不适应，工作方式、薪资待遇与心理预期的差距，易导致其产生消极情绪，甚至出现极端行为。三是社会舆论的引导失范。部分媒体为追求流量，对负面事件进行煽情化、片面化报道，加剧大学生的焦虑与迷茫。调查显示，40%的大学生表示社会上的自私、功利、躺平等不良心态会对其产生影响，不良社会氛围成为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重要外部阻碍。

三、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实践策略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立足个人、高校、家庭、社会四维主体，找准问题症结，精准施策、协同发力，构建“个人主动、高校主导、家庭助力、社会引领”的培育格局，提升培育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一）强化个人主动意识，筑牢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内在根基

大学生是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核心主体，需强化自身主动培育意识，从自我认知、能力培养、实践参与、理想树立等方面，主动构建积极心理：一是树立积极的自我认知。引导大学生学会接纳自我，理性看待自身优缺点，形成合乎实际的心理期许；在学习生活中设置可实现的小目标，通过完成目标获得正向反馈，积累幸福体验，提升自我效能感。二是培养独立自主的能力。提升独立思考与是非判断能力，在人际交往中虚心接受他人意见但不迷失自我；总结社交经验，做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从良好的社交中获得情绪满足感，提升人际交往能力。三是积极参与实践活动。主动参与学校组织的校园活动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在实践中展示创造力、领导力与合作能力，激发自信与勇气，减少胆怯与不良情绪，从助人为乐中获得成就感，汲取积极心理力量。四是树立远大理想与使命担当。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相结合，以时代楷模、优秀榜样为标杆，学习黄旭华院士等榜样人物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在追逐榜样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积极进取的心理品质，增强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二）健全高校培育体系，发挥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主导作用

高校是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主阵地，需立足“三全育人”理念，健全系统化、协同化的培育体系，推动育心与育德、育智深度融合：一是推进课程体系融合，创新教学方式。强化思政课的心理培育功能，将积极心理品质培育融入思政课教学，通过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长征精神等红色文化资源，引导学生培养坚强无畏的积极心理；将心理健康教育设为必修课，制定科学的教学大纲，创新角色扮演、情景重现等互动式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心理调节能力；推动专业课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思政融合，引导专业课教师在教学中渗透积极心理理念，关注学生学习成长。二是完善全员育人协同机制，强化师资保障。转变教育理念，将积极心理培育覆盖全体学生，既关注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也重视对正常学生的积极心理引导；加强心理健康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提升辅导员的心理教育专业能力，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育人职责，形成全校联动的协同育人格局；保障心理健康教育的场地、设备等资源投入，解决“供需矛盾”。三是打造积极校园文化，营造良好育人氛围。以校风、学风建设为抓手，开展心理健康讲座、专家咨询、社团路演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搭建具有学校特色的心理健康平台，扩大学生参与面；注重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科学规划校园建筑布局，维护校园环境整洁，更新教学设备，为学生营造身心舒畅的校园环境；借助美育浸润工程，提升学生审美能力，以沉浸式的校园文化熏陶，强化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效果。

（三）转变家庭教育理念，凝聚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家庭合力

原生家庭对大学生的心理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需引导家庭转变教育理念，重视积极心理品质培育，形成家校协同的育人合力：一是树立积极的家庭教育理念。引导家长摒弃“重成绩、轻心理”的应试教育理念，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增强心理疏导与提前干预的意识，主动培养孩子的积极心理品质。二是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优化教育方式。构建亲密、沟通顺畅的家庭关系，给予孩子足够的鼓励与支持，提升孩子直面困难的勇气与自信；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引导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做好榜样示范，帮助孩子形成积极的挫折应对方式。三是加强家校沟通联动。家长摒弃“孩子上大学即无需管教”的观念，定期与高校辅导员、教师沟通，及时掌握孩子的学习、生活与心理状况；高校主动向家长反馈学生情况，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心理家庭教育，形成家校共育的联动机制，及时发现并疏导学生的不良情绪，防范心理问题的发生。

（四）强化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营造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社会氛围

社会层面需强化主流价值引领，营造积极、包容、健康的社会环境，为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提供良好外部支撑：一是加强网络监管与正面宣传。强化对网络平台的监管，遏制不良信息的传播；充分利用微信、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积极心理学知识、心理健康案例等内容，发挥网络主流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帮助大学生提升网络信息辨别能力。二是弘扬主流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借助文旅热、国潮热的社会氛围，引导大学生感悟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众志成城的优秀品格，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心理养分；广泛宣传“时代楷模”、“感动中国人物”等榜样的先进事迹，为大学生树立精神标杆，培育其坚韧的心理品格。三是规范社会舆论传播，营造理性氛围。引导媒体坚守客观理性的职业操守，对负面事件进行客观报道，避免煽情化、片面化表述，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公众理性思考；营造包容的社会竞争环境，缓解大学生的职业发展焦虑，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更多支持与保障。

结语：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关乎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更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前途。当前培育工作面临的个体、高校、家庭、社会层面的困境，决定了培育工作不能依靠单一主体，而需个人、高校、家庭、社会四方协同联动、各尽其责。通过强化大学生主动培育意识，健全高校系统化、协同化培育体系，转变家庭教育理念并

加强家校联动, 强化社会主流价值引领并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氛围, 凝聚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 才能切实提升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实效, 有效预防大学生心理问题, 推动大学生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心理品格, 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 [1] 周肃军, 常扩, 周详.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范式革新及体系建构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4, 42 (11): 120-128.
- [2] 席文彪, 张世财.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践路径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 44 (27): 53-56.
- [3] 蔺秀云, 刘张行, 邱辰琰. 新时代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思路 [J]. 人民教育, 2023 (12): 41-45.
- [4] 鲜于乐娇.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探析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9 (20): 38-40.
- [5] 伍麟. 接纳“原生家庭”是走向成熟的标志——兼论当代青年应具有积极心理品质 [J]. 人民论坛, 2019 (20): 90-91.
- [6] 杨飞龙, 李翔, 朱海东. 学校氛围和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 (02): 396-400.
- [7] 吴九君, 廖清林, 韩力光. 积极心理学背景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模式探究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9, 37 (03): 113-117.
- [8] 林凡. 试析心理韧性理念在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中的运用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 (07): 80-81.
- [9] 陈宛玉, 叶一舵. 积极心理学取向的生涯辅导: 契合、理念、方法及工作启示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01): 137-145.
- [10] 肖梦婷.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研究 [D]. 武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3.
- [11] 陈彦如. 新时代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研究 [D]. 桂林: 桂林理工大学, 2023.
- [12] 秦莹.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研究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23.
- [13] 石倩. 积极心理学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D]. 长沙: 中南大学, 2023.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Value, Dilemmas and Strategies

WANG Xufang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Zhaoqing,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Cultivating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 key measure to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elf-regulation ability, and also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on the internet and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is confronted with practical dilemmas, including prominent individual cognitive biases and psychological internal friction among students, fragmented cultivation systems and lack of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ak family positive education concepts and inadequate cultivation behaviors, insufficient guidance of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and infiltration of unhealthy mentalities. In view of thi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from four dimensions: individual, college, family and society. We should strengthen college students' initiative in self-cultivation, improve the systematic cultiv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ransform family education concept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psychological cultivation, enhance the guidance of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and create a positive atmosphere, so as to gather the joint forces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i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help them shape sound personalities, and provide solid talent support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即兴舞蹈对于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创造能力策略研究

许喻娴 古红

(四川轻化工大学, 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在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中,学生普遍存在舞蹈基础不均衡、重动作模仿而轻教学理解的问题,导致其在未来幼儿舞蹈教学中缺乏引导与创编能力。本文立足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堂教学实践,从培养学生舞蹈教学与创造能力的视角出发,对即兴舞蹈在课堂中的实施方式进行分析与总结,重点探讨其在教学情境创设、课堂组织与学生角色转化等方面的教学策略。研究发现,通过情境化引导、限定式即兴、教学角色转换以及反思性表达等策略的合理运用,有助于引导学生从单一的舞蹈学习者转向具有教学创新意识的实践者,促进其舞蹈教学理解与教学设计能力的形成。本文旨在为学前教育专业幼儿舞蹈创编课程中即兴舞蹈的教学实施提供可操作的策略参考。

关键词:即兴舞蹈; 学前教育; 舞蹈创造能力; 幼儿舞蹈创编; 教学策略

基金项目:自贡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轻化工大学川南学前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资助课题“即兴舞蹈对于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创造能力的行动研究”(课题编号: XQMY24-09); 2025年四川轻化工大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 JG-2506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536

即兴舞蹈兴起于20世纪初现代舞的发展过程中,其理念可追溯至伊莎多拉·邓肯对芭蕾程式化训练的反思。随着现代舞不断演进,即兴舞蹈逐渐形成以身体感知、即时反应与自主表达为核心的创作方式,并在舞蹈教学领域中展现出独特的教育价值。舞蹈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审美感知、身体表达与创造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学前教育专业而言,舞蹈课程不仅承担着技能训练的功能,更肩负着培养未来幼儿教师舞蹈教学能力与创编引导能力的重要任务。即兴舞蹈因其开放性与互动性,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教学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新的路径。将即兴舞蹈引入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堂,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身体表达与创作意识,更可能促进其教学组织、情境引导与儿童舞蹈启发能力的生成。基于此,本文立足课堂实践,从教学策略的角度探讨即兴舞蹈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教学与创编能力培养中的应用路径,以期优化高校学前舞蹈课程提供参考。

1. 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能力培养的现实需求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教师应具备引导幼儿进行艺术表现与创造活动的的能力。然而,在当前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中,课程内容仍以动作模仿和成品舞段学习为主,学生虽具备一定的舞蹈表现能力,却普遍存在舞蹈教学意识不足、创编思路单一、即兴引导能力薄弱等问题,难以有效支持其未来的幼儿舞蹈教学实践。随着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不断明确,舞蹈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功能已不再局限于学生舞蹈技能的训练,而是逐渐转向服务于幼儿舞蹈教学能力的培养。从学生背景来看,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基础差异较大,部分学生缺乏系统的舞蹈训练经验,对舞蹈教学与创作存在一定心理压力。这种以模仿学习为主的教学方式,往往难以兼顾不同基础学生的发展需求,也不利于学生舞蹈教学意识的形成。特别是在幼儿舞蹈教学中,教师需要具备根据课堂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教学内容的能力,这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提出了更高的实践要求。因此,如何在舞蹈课堂中通过合理的教学设计,引导学生在舞蹈学习过程中逐步理解舞蹈教学的基本逻辑,成为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亟需回应的问题。即兴舞蹈作为一种强调体验、生成与表达的教学形式,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技能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实践路径。

2. 即兴舞蹈在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中的价值导向

2.1 即兴舞蹈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学习特点的契合性

作者简介:许喻娴(1993—),女,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舞蹈编导、舞蹈教育;

古红(1997—),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即兴舞蹈强调从身体经验出发,通过感受、探索与表达完成舞蹈活动,这一特征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特点具有较高的契合度。相较于程式化的动作训练,即兴舞蹈弱化了技术难度要求,更注重参与过程与个体体验,有助于缓解学生对舞蹈创作的畏难情绪,使不同舞蹈基础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学前教育专业的舞蹈课堂中引入即兴舞蹈有助于学生通过身体实践理解舞蹈的生成过程,改变对舞蹈创作“高门槛”的认知。这种以体验为导向的学习方式,为学生后续理解舞蹈教学中“如何引导幼儿”奠定了实践基础。即兴舞蹈多元化的启发方式和趣味性的游戏模式也能有效的促进学生在未来实践中的幼儿舞蹈教学,使学前教育的舞蹈课堂充满乐趣。

2.2 即兴舞蹈对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技能的支持作用

从舞蹈教学与创作的培养角度来看,即兴舞蹈不仅是一种舞蹈表现形式,更是一种具有教学价值的课堂手段。通过参与即兴舞蹈活动,学生能够在实践中体会教学引导、动作示范与课堂组织的重要性,逐步形成对舞蹈教学过程的整体认识。在即兴舞蹈教学中,学生需要围绕特定情境或任务进行身体表达,这一过程促使其主动思考动作的来源与意义,有助于培养其教学设计意识。同时,即兴舞蹈强调合作与互动,为学生提供了观察他人、回应同伴的机会,有利于其理解舞蹈教学中师生互动与课堂反馈的基本方式。由此可见,即兴舞蹈在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中具有明确的教学价值导向。

3. 即兴舞蹈在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堂中的实施原则

3.1 面向幼儿舞蹈教学情境的实践导向原则

学前教育专业中的即兴舞蹈教学应始终以幼儿舞蹈教学情境为实践导向。在教学设计中,教师需引导学生将即兴创作与幼儿生活经验相联系,使学生在舞蹈学习过程中逐步建立“为幼儿而教”的教学意识,如模仿动植物、模拟动画人物、表现童话故事等。通过贴近幼儿认知特点的情境设置,帮助学生理解舞蹈教学内容如何转化为幼儿可感知、可参与的活动形式。教师作为引导者,通过引导语、教学视频、图片、声音、道具等,引领学生去感受教师创设的不同情境和不同创意主题,鼓励学生通过头脑想象和肢体动作去展示和表现自我,这与创造性舞蹈的教学模式相近,对于学生肢体动作的开发具有引导作用。

3.2 结构引导与自由表达相结合的原则

即兴舞蹈教学并非完全自由的身体表达,而应在一定教学结构的引导下展开。在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堂中,教师需要通过合理的教学设计,在保障即兴舞蹈开放性的同时,提供清晰的任务框架,使学生在可控的范围内进行探索。结构化引导有助于学生理解即兴舞蹈的组织方式,也为其日后开展幼儿舞蹈教学活动提供了可借鉴的教学思路。对高校教师来说,拉班舞谱的学习是每一位编舞者和创编课程的授课教师必须有所掌握的一项知识技能。拉班舞谱在舞蹈教学实践中所涉及的主题舞谱、结构舞谱、力效舞谱对创造性的舞蹈教学意义非凡。同时,即兴舞蹈在一定的空间、时间、方向、路线和平面图等严谨公式下,也能够使学生创造出规范合理的动作元素。教师在进行授课时,有效结合拉班舞谱的基础理论,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规范和完善教学结构。

3.3 以学生教学参与为核心的主体性原则

在即兴舞蹈教学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学生的主体参与,鼓励其在课堂中主动承担教学相关角色。通过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设计、示范与引导环节,使其在实践中体验舞蹈教学的基本过程。这种以教学参与为核心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在舞蹈学习中逐步完成从“动作学习者”向“教学实践者”的角色转变。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是未来幼儿园的一线教师,在掌握相应舞蹈技能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如何实施教学方法的理念。在创编课程中,可以将学生按照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群舞等人数进行小组分配,学生通过即兴舞蹈和基本创作技法的学习,在完成个人舞蹈小品的同时,也能组建小组进行分工合作。学生们拥有不同的学习背景和生活环境,分组合作模式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领导能力,通过不停的转换角色有利于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

4. 即兴舞蹈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技能提升的教学策略

4.1 情境化引导:以幼儿舞蹈教学情境激发即兴创作

在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堂中,通过创设贴近幼儿生活经验的情境,如日常活动、自然现象、动物形象或故事角色,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进行即兴表达,有助于降低创作门槛,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代入感。在这一过程中,授课教师以“情境导入—动作联想—即兴表达—教学转化”四个阶段为框架,不以动作结果为评价重点,而是引导学生关注动作的可理解性与可参与性,在帮助学生完成即兴动作的生成,更重要的是促使其建立“面向幼儿教育”的思维方式,从而强化舞蹈学习的师范属性。

第一,情境导入阶段。教师通过语言描述、音乐播放或图片展示,引入具有幼儿特点的情境主题,如“森林运动会”“海底总动员”等,帮助学生建立直观的想象空间,学生以模拟动植物为主,通过静态或动态形象的塑造展现不同的造型,有助于之后创作儿童舞蹈的选材。第二,动作联想阶段。教师引导学生围绕情境进行身体探索,如提问“兔子会怎样跳动?”“秋天落叶如何凋零?”以鼓励学生从生活经验出发生成动作,目的是让每一位学生“动”起来,对于构思舞蹈减少畏惧心理。第三,即兴表达阶段。教师可以适当引入不同风格的音乐,如播放童趣的、活泼的、忧伤的旋律伴奏,再提问每位学生听到这段音乐有何联想,在音乐或节奏的辅助下进行言语和肢体的自由表达,教师不对动作进行标准化要求,而是关注其表达的完整性与情境关联性。第四,教学转化阶段。完成即兴后,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这些动作是否适合幼儿模仿”“是否需要简化或重复”,从而将创作经验转化为教学资源。同时,可将学生分组进行展示和观摩,并开展生生互评的评价模式,通过观摩和点评能激发学生教育者思维。

4.2 限定式即兴:通过结构设计降低舞蹈教学难度

针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舞蹈创作中容易产生的无从下手或过度依赖模仿的问题,教师可在即兴舞蹈教学中采用限定式即兴策略。限定式即兴以“限制—探索—组合—展示”为实施过程,在明确任务条件的同时鼓励学生个体探索,再由小组合作完成展示与交流。通过这一过程,学生能够逐步理解即兴舞蹈的组织逻辑,并体验“如何通过规则设计教学活动”。

首先,动作限定。教师规定仅使用某一类基本动作:如走、跳、转、摆动、上肢、下肢等。引导学生在有限动作素材中进行组合与变化。其次,空间限定。空间分为肢体空间和环境空间。动作限定有利于开发身体各部位的空间表达。对环境空间而言,通过划分舞动区域或规定运动路径:如直线、斜线、曲线、圆形等,帮助学生理解环境空间的组织方式。再次,节奏限定。结合简单节拍或音乐节奏,引导学生在一定节奏结构中完成动作表达,增强动作的连贯性。同时可采用钥匙串、风声、雨声等动效,使学生跳出固有的节奏框架,激发舞蹈发散性思维。最后,情绪限定。如“快乐”“紧张”“安静”“悲伤”等情绪表达,鼓励学生在情感导向下进行即兴探索,并有助于未来舞蹈表演中的情绪传达。限定式即兴并非限制学生的创造性,而是在提供支架的基础上帮助其建立创作与教学之间的联系。这一策略有助于学生在未来幼儿舞蹈教学中设计结构清晰、难度适宜且具有参与性的教学活动。

4.3 教学角色转换:强化学生的舞蹈教学意识

为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从舞蹈学习者向舞蹈教学实践者的转变,课堂中可有意识地引入教学角色转换策略,使学生在即兴舞蹈活动中承担一定的教学责任。在具体实施中,可通观察与模仿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参与即兴活动,使学生能初步感知教学流程与组织方式。其次,教师邀请学生参与简单的示范或口令引导,如带领同伴完成某一动作或节奏练习,以辅助的形式使学生有教学参与感。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设计简单的即兴教学任务,如设定情境、组织活动流程,并在课堂中进行展示,角色的转换能够强化学生的教学意识。第四,反馈与调整阶段。在活动结束后,教师与同伴的共同评价能够促进教学活动的反馈与调整。在角色转换策略的实施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完成动作表达,还需思考如何进行语言引导、如何控制课堂节奏以及如何回应学习者的反馈。这一过程有助于其逐步理解舞蹈教学的基本结构,增强教学意识,并为未来实际教学情境做好准备。

4.4 反思与表达:促进舞蹈教学理解的內化

反思与表达是促进学生教学经验内化的重要环节。在即兴舞蹈教学结束后,通过结构化的反思与交流,可以帮助学生将感性体验转化为理性认识。在教学实践中,学生的即时感受表达非常重要。学生对刚完成的即兴活动进行简要描述,如“动作来源”“情境理解”等,可增强第一手的新鲜体验感。而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这个活动对幼儿是否合适”“需要如何调整难度”更是以教学视角的反思去强化其教学意识。对于同伴的交流与比较是通过小组讨论或全班分享体现的,让学生了解不同表达方式与教学思路,拓展认知视野尤为重要。最后,教师对学生发言进行归纳,提炼出可用于幼儿舞蹈教学的基本方法或注意事项也便于经验总结。通过上述过程,学生能够逐步建立从“体验—反思—再应用”的学习路径。反思与表达策略不仅有助于梳理舞蹈学习经验,也使学生在不断总结中形成较为清晰的舞蹈教学思路,从而为其未来开展幼儿舞蹈教学提供持续支持。

5. 即兴舞蹈教学策略对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的启示

本文所提出的即兴舞蹈教学策略,立足于课堂教学实践,强调通过情境创设、结构引导与角色参与等方式,引导学生在舞蹈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教学意识,对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的实施具有一定启示意义。首先,即兴舞蹈教学策略有助于重构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的教学目标取向。传统舞蹈课堂往往侧重动作技能与规范呈现,

而忽视学生对舞蹈教学过程的理解。通过将即兴舞蹈引入课堂,并围绕教学能力培养展开教学设计,可以引导课程目标从单一的动作掌握转向“学习—理解—应用”并重的发展方向,使舞蹈课程更好地服务于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需求。其次,即兴舞蹈教学策略为舞蹈课堂的教学组织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情境化与限定式的即兴设计使课堂活动更具开放性与参与性,有助于调动不同舞蹈基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通过教学角色的转换与同伴互动,课堂由以教师示范为主的单向教学,逐步转向多主体参与的互动式教学,增强了课堂的实践性与生成性。再次,从学生发展角度来看,即兴舞蹈教学有助于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教学理解的形成。学生在参与即兴舞蹈活动的过程中,不仅体验动作生成的过程,也逐步认识到舞蹈教学中引导、示范与反馈的重要性。这种基于实践的教学体验,为学生日后开展幼儿舞蹈教学活动提供了可迁移的经验支持。

6. 结语

即兴舞蹈以其开放性与体验性特点为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提供了富有活力的教学路径。本文从舞蹈教学能力培养的视角出发,结合课堂教学实践,对即兴舞蹈在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堂中的教学策略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提出了情境化引导、限定式即兴、教学角色转换以及反思性表达等具体实施策略。需要指出的是,即兴舞蹈教学策略的有效实施,依赖于教师对课堂节奏与教学目标的合理把控。如何在保障教学结构的同时保留即兴舞蹈的开放空间,仍需在后续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完善。未来研究可在更丰富的教学情境中,对即兴舞蹈教学策略的应用方式与课程融合路径进行进一步探讨,以期为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的持续优化提供更多实践经验与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 [1] 祁烨,赖程程.儿童即兴舞蹈的民族志研究[J].教育观察,2023,12(33):1-6+26.
- [2] 程龙.感知、过程、创造:即兴舞蹈的意识分析[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4,(02):131-139.
- [3] Biasutti, M., & Habe, K. (2021). Dance improvisation and motor creativity in children: Teachers' conceptions.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33(1), 47-62.
- [4] 金秋.即兴舞蹈与幼儿舞蹈教育[D].上海师范大学,2009.
- [5] Handayani, N. A., Pamungkas, J., & Maryatun, I. B. (2024). Implementation of Free Expression Approach in Dance Learning for Developing Children's Creativity: A Case Study at Kindergarten. *Journal of Innovation i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5(4), 667-677.
- [6] 董琦,王印英.幼儿即兴舞蹈的内涵、特征及其促进[J].学前教育研究,2022,(02):83-86.
- [7] Wen, X. (2023).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children's creativity in kindergarten dance teaching. In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rts, Manage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pp. 133-136).
- [8] 景晓文.普通高校本科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与教学现状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21.

A Study on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Dance Creativity in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Xu Yuxian, Gu Hong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igong, Sichuan, China

Abstract: In dance courses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s, students commonly exhibit uneven foundational skills and tend to emphasize movement imitation while neglecting pedagogical understanding. As a result, they often lack the ability to guide and create choreography in their future teaching of children's dance. Grounded in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within pre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this study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improvisational d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dance teaching and creative abilities. It focuses on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related to the creation of teaching contexts, classroom orga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udent rol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ive use of strategies such as contextualized guidance, structured improvisation, role transformation, and reflective expression can help students shift from being mere dance learners to practitioners with an awareness of pedagogical innovation, thereby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understanding of dance teaching and their instructional design abiliti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practical and actionable strategic referenc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mprovisational dance in children's dance choreography courses within pre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Keywords: Improvisational Dance; Preschool Education; Dance Creativity; Children's Dance Choreography;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两山理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林鹏, 郑洁, 于登辉, 邓加强, 王春明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乐山 614000)

摘要: “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原创性核心范式, 区别于普通生态文明理念, 蕴含辩证统一、民生为本、价值转化的独特理论特质, 与高校思政教育存在不可替代的内在契合。当前相关研究存在解读表层化、融入碎片化、思政主线弱化、实践形式化等问题。本文立足理论专属内涵, 剖析现实困境与深层成因, 从课程、实践、文化、网络、师资维度构建精准思政融入路径, 规避泛化表述, 强化价值引领, 为高校生态思政育人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两山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路径; 高校

基金项目: 乐山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SKL2025D57)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38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 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两山理论”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战略指引, 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1]。“两山理论”从基层探索实践上升为国家顶层发展理念, 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二元对立的固化思维, 构建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民生为本的全新价值体系, 不仅是指导区域经济转型、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纲领, 更是新时代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高校作为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 承担着培育时代新人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与社会责任的核心使命, 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强化家国情怀、理想信念、法治素养的常规培育, 更要紧跟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步伐, 把绿色发展理念、生态伦理素养、公共责任意识纳入常态化育人体系。

把“两山理论”深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也是引导青年大学生认清人与自然关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扛起美丽中国建设时代使命的现实要求。但从当前研究与高校实际融入现状来看, 仍存在诸多突出短板: 多数研究将“两山理论”等同于普通生态文明教育内容, 论述口径宽泛笼统, 没有把握其辩证转化、民生导向、政治站位的独有特质, 导致理论与高校思政教育关联松散、契合逻辑牵强; 部分研究内容同质化严重, 缺乏专属学理分析, 更换为其他生态类主题依然可以全文套用, 研究辨识度与学术价值不足; 同时高校在实际融入中存在教学碎片化、思政主线弱化、理论解读表层化、实践育人形式化等问题, 未能真正把“两山理论”的哲学思维、价值立场、实践逻辑转化为思政育人的有效载体。

正是基于以上现实问题与研究短板, 本文坚持问题导向与学理导向相结合, 跳出泛化生态文明研究的固有框架, 紧扣“两山理论”独一无二的理论内核, 厘清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替代的内在契合关系, 直面融入过程中的真实困境并逐条剖析成因, 立足思政教育本质规律构建专属可行的融入路径, 为高校推进“两山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提供全新思路。

作者简介: 林 鹏(1988—), 男,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郑 洁(1996—), 女,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于登辉(1993—), 男,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邓加强(1987—), 男,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王春明(1971—), 男, 学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法律;

二、“两山理论”的核心内涵与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在契合

（一）两山理论的核心内涵

“两山理论”并非简单倡导保护环境的普通理念，而是一套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特质鲜明的系统性思想体系，具备区别于其他生态理论的专属特质。

1.辩证统一的哲学特质

“两山理论”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辩证统一的关系，从理论本质来看，“两山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打破了“发展与保护对立”的传统认知^{[2][3]}。明确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协同共生的统一关系，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与战略思维，能够为高校思政教育培育学生科学思维方式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2.民生为本的政治特质

“两山理论”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良好生态环境视作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把生态保护上升为党的执政理念、民生责任与社会公平的高度，超越了单纯环境治理的范畴，具备鲜明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导向，与高校思政教育培育学生人民立场、家国情怀的目标高度契合。

3.价值转化的实践特质

“两山理论”核心要义在于实现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发展优势、民生优势的有效转化，强调生态资源可以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开发转化为产业动能与民生红利，践行知行合一、理论指导实践的逻辑，为思政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实践育人提供天然契合点。

4.价值引领的育人特质

“两山理论”倡导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绿色低碳、责任担当的生态伦理，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发展观、政绩观、生活观与幸福观，能够直接作用于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是高校思政教育涵养青年道德素养与时代担当的优质育人资源。

（二）“两山理论”与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在契合

不同于一般生态文明理念的浅层适配，“两山理论”凭借自身独有特质，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不可替代的深度契合，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价值立场高度契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核心是培育学生坚持人民至上、家国至上的价值立场，树立服务社会、奉献人民的理想信念。而“两山理论”立足民生福祉、坚守公共利益、着眼长远发展，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二者在价值底色、政治站位、育人导向上完全同频，为深度融入筑牢价值根基。

二是思维培育功能契合。思政教育重要任务之一是训练大学生辩证思维、系统思维与长远思维，摆脱片面化、绝对化认知误区。“两山理论”以对立统一逻辑解读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蕴含成熟的哲学思维范式，能够作为鲜活教学载体，帮助学生提升思辨能力、树立科学认知方式，这是普通生态科普内容无法具备的专属育人价值。

三是立德树人目标契合。高校思政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致力于培养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4]。“两山理论”倡导的生态道德、公共责任、绿色担当、长远格局，是新时代青年必备的核心素养，能够充实思政教育道德培育、责任培育的内容体系，共同指向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终极目标。

四是知行育人逻辑契合。思政教育遵循认知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践行的渐进育人规律，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山理论”源于基层实践、升华于理论凝练、回归于实践指导，天然具备理论性与实践性双重属性，其认知—认同—践行的逻辑脉络，与思政教育循序渐进的育人规律完全适配，能够自然融入课堂教学、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等各类思政育人场景。

三、“两山理论”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成因

(一) 现实困境

第一,理论解读表层化,混淆专属特质与普通生态教育边界。多数思政教师未能把握“两山理论”辩证转化、民生政治、价值引领的独有内核,简单将其等同于一般环保知识、生态常识进行讲授,剥离了理论的哲学底蕴与政治站位,把专属思政育人资源降格为大众化生态科普内容。教学中只简单提及保护自然、爱护环境,不讲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价值逻辑与民生内涵,导致“两山理论”特色完全丧失,替换为其他生态主题仍可照常授课,融入缺乏专属辨识度。

第二,融入方式碎片化,缺乏系统化思政课程顶层设计。高校未将“两山理论”纳入思政课程整体教学体系,没有设置固定专题教学模块与标准化教学内容,多依靠教师课堂随机穿插、零散补充,内容分布杂乱、逻辑断裂。思政必修课、选修课、形势与政策课之间缺乏统筹联动,没有形成连贯完整的教学体系,同时课程思政挖掘流于表面,专业课仅简单提及生态概念,未能结合专业特质对接“两山理论”的发展逻辑与职业素养要求,融入呈现零散化、随意化、浅层化特征。

第三,思政主线弱化,理论与思政教育出现“两张皮”现象。部分教学内容偏重生态现状、环境数据、产业发展等知识性介绍,弱化理想信念、价值塑造、道德涵养、家国担当等思政核心目标。只讲生态现象、不讲思想引领,只谈发展经济、不谈价值认同,无法依托“两山理论”培育学生人民立场、辩证思维与社会责任,看似完成内容融入,实则偏离思政教育初心,育人实效打折扣。

第四,实践育人形式化,未能体现“两山理论”实践逻辑。现有实践活动多为临时性、象征性的环保宣传,难以让学生真正深入理解理论的实践价值^[5],仅注重形式参与,缺少紧扣“两山理论”价值转化、民生福祉、生态担当的深度思政实践。实践活动没有设计思想感悟、价值研讨、社会调研等思政环节,无法引导学生体悟理论背后的发展逻辑与民生情怀,难以实现从行为参与到思想认同、责任自觉的升华,知行合一育人目标难以落地。

第五,师资思政解读能力不足,缺乏专项专业素养支撑。思政教师多为传统思政专业背景,缺乏生态学、发展经济学跨学科知识储备,更没有接受过“两山理论”思政化解读的系统培训。多数教师只会表层概念复述,不擅长从哲学视角、政治视角、育人视角拆解理论内涵,找不到理论与思政知识点的精准对接点,难以开展深度、精准、专业化的融入教学。

(二) 成因分析

第一,高校认知存在偏差,未凸显“两山理论”专属思政价值。对“两山理论”的原创性、政治性、育人特质认识不足,仅将其视作常规生态文明宣传内容,没有纳入思政教育专项工作规划,缺乏统筹设计、专题部署与制度规范,任由教师自主零散融入,难以形成体系化、专属化的育人格局。

第二,教师培养研修机制滞后,缺少思政化解读能力培育渠道。高校未建立常态化的“两山理论”专题研学、跨学科讲座、思政教学研修机制,也没有组织教师深入理论实践一线开展调研研学。教研科研扶持不足,缺少生态思政专项课题与教学改革项目,教师缺乏系统提升理论素养与思政融入能力的平台,只能浅层化、概念化开展教学。

第三,课程协同育人机制缺失,大思政格局构建不完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缺乏统筹设计,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各专业院系集体备课、内容共建、资源共享的联动机制不足,无法围绕“两山理论”专属内涵设计统一教学模块与育人目标,导致内容碎片化、融入无序化。

第四,实践与文化资源投入不足,思政育人载体建设滞后。高校在生态思政实践基地、校园生态文化阵地、网络思政资源开发上经费与人力投入有限,校地合作实践平台流于形式,缺少紧扣“两山理论”思政内核的常态化实践项目。校园显性与隐性文化营造不足,未能以理论专属价值为核心打造浸润式育人氛围,育人载体难以支撑深度融入需求。

第五, 教学评价导向模糊, 缺乏专属思政融入考核标准。现有思政教学评价只考核教学流程完成度, 没有设置“两山理论”思政契合度、专属内涵解读度、价值引领实效等专项评价指标, 对泛化表述、牵强适配、思政主弱化等问题缺乏约束, 导致教师重形式、轻内涵, 重堆砌、轻育人, 难以规避可替代性与论述宽泛化问题。

四、“两山理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路径

(一) 思政课程专题化融入, 凸显理论专属思政内核

依托《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概》等核心思政课程, 单独设置“两山理论”专属专题教学模块, 纳入教学大纲与考核范围。教学摒弃泛化生态知识堆砌, 聚焦理论独有特质, 重点讲授辩证统一哲学逻辑、民生为本政治立场、价值转化实践内涵, 从理想信念、人民立场、辩证思维、时代担当四个思政维度展开解读。采用议题式研讨、理论辨析、课堂辩论等教学方式, 引导学生理解“两山理论”不是单纯环保口号, 而是蕴含执政理念、发展智慧与青年使命的思政育人载体, 从根源上杜绝可替代性表述, 强化专属理论认同。

(二) 课程思政协同化渗透, 对接专业素养与绿色使命

坚持思政课程引领、课程思政协同, 通过“思政课程+专业课程”的协同发力,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同向同行^[6]。工科专业侧重结合行业生产实际, 融入绿色生产、低碳减排、生态履职的职业思政素养; 经管专业聚焦生态经济、绿色产业、民生红利, 培育学生绿色发展职业观; 文旅与涉农专业立足生态资源保护、乡村生态振兴, 强化守护自然、服务基层的责任担当。坚持以专业为载体、以两山理论为价值引领, 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思政价值塑造同向同行。

(三) 实践育人思政化设计, 践行理论知行合一逻辑

摒弃形式化浅层环保活动, 紧扣“两山理论”价值转化与民生福祉内核设计思政实践。校内开展“两山理论与青年使命”主题班会、生态思政征文、绿色生活践行等活动, 引导学生把生态理念内化为道德自律; 校外依托校地共建思政实践基地, 组织学生开展生态民生调研、绿色理念宣讲、人居环境志愿服务, 重在思想体悟与责任升华, 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生态保护背后的民生价值、社会价值与时代价值, 强化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四) 校园文化浸润式营造, 筑牢专属思政育人氛围

打造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生态思政文化体系, 杜绝泛化环保标语宣传。通过校园讲座、知识竞赛、主题展览等显性载体, 专题宣讲“两山理论”哲学内涵、政治价值与青年责任; 依托校园景观、文化长廊、公益标识等隐性载体, 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民生为本的价值元素, 以文化人、润物无声, 让学生在日常生活潜移默化接受理论熏陶与思政引领。

(五) 网络思政矩阵式拓展, 强化线上思想价值引领

适配青年网络化学习特点, 搭建以“两山理论”专属思政内涵为核心的线上育人平台。开发聚焦辩证思维、民生立场、青年使命的微课、理论解读文稿、思政短视频等轻量化资源; 依托学习通、校园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 开设“两山理论思政专栏”, 开展线上理论答题、思想感悟征集、主题讨论交流, 打破传统课堂时空限制^[7]。

(六) 师资队伍专业化提质, 夯实思政融入人才支撑

建立专项培训机制, 定期组织思政教师、专业教师开展“两山理论”思政化解读专题研学、跨学科教研沙龙, 补齐理论素养与跨学科知识短板。组织教师参与基层生态治理调研、生态思政教学研修, 积累思政教学素材; 设立生态思政专项教研课题, 鼓励教师以科研反哺教学, 重点研究如何把“两山理论”讲出思政味、讲出专属特色, 打造一支懂理论、善解读、会融入的专业化育人队伍。

五、保障措施

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统筹、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各院系协同的组织工作机制, 将“两山理论”生态思政育人纳入高校思政工作考核体系。适度加大经费与资源投入, 整合校地生态、文化、实践资源, 共建稳定育人平台。构建以价值引领、理论解读精准度、学生生态素养与责任担当提升为核心的多元评价机制,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规范融入口径、杜绝泛化表述, 保障融入工作规范、长效、高质量推进。

六、结论

“两山理论”具有区别于一般生态文明理念的原创性、辩证性、政治性与实践性，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立场、思维培育、立德树人目标、知行育人逻辑上形成不可替代的专属契合关系，是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极具特色的优质育人资源。高校必须跳出泛化生态研究框架，紧扣“两山理论”独有内核，从思政课程专题融入、课程思政协同渗透、实践育人思政设计、校园文化浸润营造、网络思政矩阵拓展、师资队伍专业提质六个维度，构建精准化、专属化、不可替代的融入路径，配套完善组织、资源与评价保障机制。通过深度精准融入，既能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内涵与学理体系，又能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发展观、民生观与责任观，培育具备生态素养、辩证思维、人民立场与时代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为美丽中国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8]。

参考文献

- [1] 刘辉,白晓菲.“两山”理论的实践发展及其在生态文明中的意义[J].农业经济, 2022,(09):41-43.
- [2] 汪信砚.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3(10):1-20.
- [3] 陈倩倩.习近平“两山理论”的生态伦理内涵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14):25-27.
- [4] 李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文明耦合路径研究[J].食品研究与开发, 2023,44(06):241.
- [5] 李金辉,刘春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4,40(04):34-38.
- [6] 乔永刚.生态文明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研究——评《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理论与实践》[J].应用化工, 2023,52(09):2755.
- [7] 郇庆治, 曹得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创新路径[J].中国大学教学, 2023,(Z1):25-32.
- [8] 彭子玉.生态文明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路径探析[J].灌溉排水学报, 2023,42(09):154.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into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n peng, Zheng jie, Yu denghui, Deng jiaqiang, Wang chunming
(Le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eshan,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is an original and core paradigm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istinct from gene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s, it embodies uniqu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alectical unity, people's livelihood orientation, and value transformation, and shares an irreplaceable internal resonance with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ent relevant studies suffer from problems such as superficial interpretation, fragmented integration, weaken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inline, and formalized practice. Based on the exclusiv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and underlying causes, and constructs a precise integration path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curriculum, practice, culture, cyberspace and teaching staff, so as to avoid generalized expressions, strengthen value guidance,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cologic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 Two Mountains" Theo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Pat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24年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3课

《中华文明的起源》新变化

骆建豪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按照《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编写的新版2024学年《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教材已在2024年秋学期开始使用,在内容设置、教学架构及教育理念上都有了较大的调整。其中第三课融入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增加了私有制、阶级和早期国家的产生等历史概念及考古发掘在认识原始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等内容;增加了“学史崇德”等栏目的设置,突出了历史学科立德树人的作用。本文从课标变化入手,分析新版本教材的内容变化及原因,同时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希望可以给一线的历史教学实践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义务教育历史教材;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起源; 课程标准; 历史教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39

依据《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历史教科书已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于2024年秋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在首批投入使用的2024年版七年级上册教材中,第3课《中华文明的起源》的修订幅度尤为显著。本文将着重分析此课内容的具体变化、其修订依据,并提供教学实施建议。

一、《中华文明的起源》内容新变化

(一) 课标内容新特点

在内容标准方面,2011版课标中描述如下:(1)知道炎帝、黄帝的传说故事(2)了解传说与神话中的历史信息。^[2]2022版课标中描述如下:(1)了解私有制、阶级和早期国家的产生(2)知道考古发现是了解原始社会的重要依据(3)通过古代文献中记述的黄帝、炎帝等神话传说,了解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1]由此可见,相较于2011年版课程标准,2022年版课程标准明显拓展了中华文明起源相关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一方面,新课标增加了“私有制”“阶级”“早期国家”等反映社会结构演进的重要历史概念,强化了学生对于文明形成过程的整体认知;另一方面,新课标更加突出考古发现对于研究原始社会的重要价值,体现了历史学科重视实证研究的基本特征。同时,通过引导学生辨析神话传说中的历史信息,也进一步强化了历史学习中的史料意识与历史解释能力。

(二) 课文系统的内容编排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持续推进,其丰硕成果为新版教材的编纂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基于此,2024年版教材在课文系统的内容组织与结构安排方面均呈现出较大变化,教材内容的科学性与历史真实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原版课文《远古的传说》是以神话传说为主线展开的教学,围绕炎帝、黄帝的故事等传说展开,让学生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文化熏陶。新课标下课文《中华文明的起源》,改变了过

去以传说故事为主线索的编写方式,从文明的源头角度切入,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即从公有到私有)、社会分工及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出现、国家的起源等内容列入教学内容。

教材第一子目主要介绍了距今五千年左右我国原始社会的发展成就并概括了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第二子目则通过良渚古城和陶寺古城等考古成果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事实,并归纳出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三子目则借助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等传说中的人物故事,帮助学生了解“华夏族”“禅让制”等历史名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总体来看,新版教材不仅加强了历史知识的系统性与逻辑性,而且通过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的结合,构建起“考古实证—文明形成—文化认同”相统一的课程叙事体系。

(三) 课文辅助系统的配置

如果说教材中课文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叙述历史事物、历史人物、历史过程,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侧重给学生讲述历史知识”,那么课文辅助系统的主要功能则是“保证学生理解历史规律,掌握和运用历史知识,培养学生技能”。^[5]

例如,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增设了“学史崇德”,讲述“大禹治水”的故事。教材讲述了大禹继承父亲遗志,采取疏通河道的方法制服洪水的事迹,歌颂了先民们在生产斗争过程中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一部分有利于帮助学生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同时还能引导学生感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意识、公而忘私、勇于担当的价值追求,达到知识教育和价值引领相统一的目的。其次,在“知识拓展”栏目增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之一,是目前对中华文明起源进行阐释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将其列入统编教材当中,有利于让学生了解考古发现对探索原始社会的价值;二是认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中国方案”,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

二、新变化产生的原因

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一节的调整,则是新历史课程吸收中华文明研究最新成果的表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中华文明论述在历史教学中的体现。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是对教材修订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例如,新教材充分吸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在社会结构演变的角度,阐释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准: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出现;在讲授过程中通过考古材料与历史解释相结合,引导学生站在文明形成的宏观角度来认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同时,新教材也注重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通过对文明探源、考古实证和历史解释等内容的设置,拓宽学生的视野,并有利于提升学生历史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使用建议

本课的教学核心问题是两个,一是了解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二是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为达成以上教学目标,教师首先要加强学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关理论及成果,充分运用好教材中的“知识拓展”等栏目,帮助学生初步了解“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基本标志。

良渚古城与陶寺古城是本课教学的重要内容。教师应引导学生围绕“私有制”“阶级分化”“国家形成”等核心标准,对相关考古材料进行分析。例如,可通过观察遗址中的建筑规模、墓葬等级以及出土器物等内容,帮助学生理解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化与王权形成之间的关系。同时,教师还可结合教材活动课“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中的相关资源,进一步丰富课堂教学设计。

本课教学的难点在于“多元一体”特征的理解。由于七年级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尚处于发展阶段,教师在教学中应避免单纯的概念灌输,而应采用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方式。具体而言,教师可引导学生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从空间维度来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西辽河流域等区域文化各具特色,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特征;从时间维度来看,距今约五千年至四千多年前,不同区域文明之间不断交

流融合，中原地区逐渐发挥引领作用，从而形成文明发展的“一体”趋势。在此基础上，教师可结合良渚古城与陶寺古城的地理位置、时代背景及文化特征，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

在“远古的传说”子目的教学中，教师应重点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引导学生从传说故事中提取历史信息，认识神话传说与中华文明起源之间的联系；二是通过问题设计，引导学生思考传说对于认识早期历史的重要意义，从而理解文献传说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另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好“学史崇德”这一栏目的设置，帮助学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形成的历史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科育人的作用。总而言之，该课充分体现了新课标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要求，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以及方法，并且从整体上看，教材的内容设计和编排体系也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从课文编写角度看，新教材充分贯彻落实了中央关于主题教育的相关部署，与时俱进地吸收和采纳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来完善、充实课文知识内容，使课文内容更加完备和贴近现实。在学习栏目设计上也有较大的创新和发展，以实现教材是“教本”，也是“学本”的目的，让“教本”和“学本”有机地结合并有效互动。

总之，2024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中华文明的起源》，基本落实了《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理念与要求，在内容安排上秉持唯物史观，借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史学研究成果，更加提升了课程内容的科学性、整体性和时代性。同时，新教材在辅栏设置以及教学活动安排上也有创新之处，在培养学生历史核心素养方面有了更多体现，并将教材“教本”“学本”的功能进行了一体化处理。这对学生全面了解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积极意义，对新时期义务教育阶段历史教学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3] 教育部组织编写.义务教育教科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 [4] 徐蓝.《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主要变化及实施建议[J].教师教育学报,2022,9(04):70-75.
- [5] 叶小兵.新修初中统编历史教材的新特点——以七年级上册教材为例[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24,(08):3-7.
- [6] 陈国兵,王健宁.统编义务教育历史新教材的特点、理念与教学建议[J].江苏教育研究,2024,(09):45-53.

New Changes in Lesson 3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2024

Edition of Chinese History for Grade 7

Jianhao Luo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China)

Abstract: The revised 2024 edition of the seventh-grade first-volume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 compi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History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has been officially adopted since the autumn semester of 2024. Significant adjust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erms of content arrangement, teaching structure, an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or example, Lesson 3 incorporat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Origins Project, adding historical concepts such as 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ownership, social classes, and early state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role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understanding primitive society. In addition, new sections such as “Learning History to Cultivate Virtue” have been introduced,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the history curriculum in fostering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values. Starting from the changes in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tent revisions and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new edition of the textbook, while also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ugges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frontline history teaching practices.

Keywords: Compulsory Education History Textbook; Chinese Civilization Origins Project;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History Teaching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历史课程优化策略研究

骆建豪¹, 崔超²

(1.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00 2.伊宁市第八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835000)

摘要:面向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实施中存在的知识组织碎片化、课堂学习浅表化、过程性评价不足等问题,文章以深度学习理念为理论支点,结合教育数据分析与智能学习支持技术,探讨高中历史课程优化的基本路径。研究认为,历史课程优化不宜停留于技术工具的简单叠加,而应围绕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重构课程目标、学习任务、资源供给与评价反馈之间的内在关系。具体而言,教师可通过大概念统摄教学内容,以问题链推动史料研读和证据推理,以学习行为数据辅助学情诊断,并借助数字化资源实现差异化学习支持。由此推动高中历史教学由知识记忆取向转向意义建构、证据解释与价值判断并重的深度学习过程。

关键词:深度学习; 高中历史; 课程优化;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学习行为分析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41

一、引言

在新一轮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历史学科教学已由单纯强调知识传授,逐步转向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课程实施不仅要求学生掌握重要史事、历史概念和时空线索,更强调其能够在史料阅读、证据辨析、历史解释与价值判断中形成有根据的理解。由此,如何引导学生从事实记忆走向结构化理解和迁移应用,成为高中历史教学改进的重要议题。

当前高中历史课程在实施层面仍存在若干突出问题。一方面,部分课堂仍以教师讲授和结论呈现为主,学生对历史问题的探究机会不足,学习过程容易停留在概念识记与材料套用层面;另一方面,课程资源配置与学生差异化需求之间尚未形成充分衔接,教学评价也较多依赖终结性测验,难以及时呈现学生思维发展和学习困难。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历史课程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

深度学习强调学习者在理解基础上的主动建构、批判思考与知识迁移。将其引入高中历史课程优化,并非简单追求课堂活动形式的丰富化,而是要在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学习任务与评价反馈之间建立更紧密的逻辑关系。与此同时,学习行为数据分析、智能资源推荐等技术手段可以为学情诊断和个性化支持提供辅助,但其价值应服务于历史学科目标,而不能替代教师的专业判断。基于此,本文从课程内容、教学模式、资源供给与评价反馈四个维度,探讨高中历史课程优化的可行路径。

二、深度学习与高中历史课程优化的理论基础

深度学习在教育意义上指向学生对知识的深层理解、意义建构和迁移运用。与机械记忆、被动接受等浅层学习不同,深度学习强调学习者围绕核心概念和真实问题展开持续探究,在新旧知识联系、证据分析、观点表达与反思修正中形成稳定而开放的知识结构。对于历史学科而言,深度学习的关键不在于增加知识容量,而在于促使学生理解历史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结构关系和价值关系。

高中历史课程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和解释性特征。学生不仅需要掌握时序、空间和人物事件等基础知识,还需要在多元史料中辨析信息来源、判断证据价值,并以合理的逻辑建构历史解释。因此,深度学习理念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等素养目标,都要求学生超越碎片化记忆,在问题情境中实现知识、能力与价值观的统一。

从课程优化角度看,深度学习为高中历史教学提供了三方面启示。其一,课程内容组织应由知识点罗列转向大概念统摄,帮助学生形成结构化认知;其二,教学过程应由结论灌输转向问题驱动,引导学生在史料研读与证据推理中获得理解;其三,教学评价应由结果判定转向过程诊断,关注学生学习路径、思维品质和表达能力的发展。

作者简介: 骆建豪(2000—),男,硕士研究生,学科教学(历史);
崔超(2000—),男,学士,中教二级,历史学。

三、高中历史教学现状及主要问题

从课程内容看,部分教学设计仍以教材章节为唯一组织单位,重在完成既定知识点讲解,对单元主题、核心概念和历史问题之间的联系关注不足。此类处理方式容易造成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停留在孤立事实层面,难以把握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内在逻辑及其现实意义。

从课堂教学看,传统讲授式教学在基础知识传递方面具有一定效率,但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容易压缩学生思考、质疑和表达的空间。历史课堂中的史料阅读、问题讨论和观点论证若缺乏充分设计,学生参与往往流于形式,难以真正形成基于证据的历史解释。

从学习评价看,当前评价仍较多聚焦知识掌握结果,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意识、证据意识、解释能力和反思能力关注不足。教师虽然能够通过作业和测试发现部分学习问题,但对于学生在阅读史料、组织论证、迁移运用中的具体困难,往往缺少系统的数据支撑和持续反馈机制。

从资源应用看,数字化资源和智能工具已经进入历史课堂,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目标不清、使用零散和评价薄弱等问题。若缺乏学科逻辑统领,技术资源可能仅停留于情境渲染或信息展示,难以有效促进学生的深度理解。

四、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历史课程优化策略

(一) 以大概概念统摄课程内容, 重构单元知识结构

课程内容优化首先要突破单课时、单知识点的线性组织方式,以单元主题和大概概念为中心重构知识结构。教师可在研读课程标准和教材内容的基础上,提炼能够贯穿多个课时的核心问题,如“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国家治理”“工业化如何改变世界联系”“民族危机如何推动近代中国转型”等,并据此整合史事、概念、地图、图像和文字史料。

大概概念并不是抽象口号,而应转化为可操作的学习任务。教师可围绕单元主题设置由浅入深的问题链,引导学生从事实识记进入关系分析,再由关系分析走向历史解释。例如,在近代中国相关内容教学中,可将“列强侵略—社会变迁—救亡探索—民族觉醒”作为结构线索,帮助学生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和阶段特征。

(二) 以问题链驱动课堂探究, 提升历史思维品质

问题链是推动历史深度学习的重要支架。有效的问题链应具有层次性、开放性和证据指向性,既要帮助学生理解基础史实,也要引导其辨析材料、形成解释并进行价值判断。教师在设计问题时,应避免将问题简化为教材答案的再现,而应鼓励学生在多则史料的比较中发现矛盾、提出假设并修正认识。

课堂实施中,可采用“情境导入—史料研读—合作讨论—观点表达—评价反思”的基本流程。教师通过历史情境激发学生问题意识,再提供不同类型史料,引导学生围绕证据展开分析。学生在小组讨论中形成初步解释,并通过课堂展示接受同伴和教师的追问。此种过程能够促进学生将零散知识转化为有逻辑的历史认识。

(三) 以学习行为数据辅助学情诊断, 完善过程性评价

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下,学习平台能够记录学生阅读时长、任务完成情况、测验结果、讨论参与和资源访问等过程性数据。这些数据并不直接等同于学习质量,但经过合理分析,可以为教师了解学生学习状态提供参考。教师可结合课堂观察、作业文本和访谈反馈,识别学生在知识理解、史料辨析和观点表达方面的薄弱环节。

过程性评价的重点应从“是否完成任务”转向“如何完成任务”。例如,教师可依据学生的史料批注、问题回答、论证结构和反思记录,建立表现性评价量规,对证据选取、逻辑推理、概念使用和价值表达进行分项反馈。通过多轮评价与修订,学生能够逐步明确自身学习问题,教师也能据此调整教学节奏和支持方式。

(四) 以智能资源推荐支持差异化学习, 促进精准教学

高中历史学习者在知识基础、阅读能力、学习兴趣和表达水平方面存在差异。课程资源供给应从统一化推送转向差异化支持。教师可依据学情诊断结果,为不同学生提供基础巩固、拓展阅读、史料研习和综合探究等不同层级资源,并通过学习平台进行有针对性的任务布置。智能推荐技术在此过程中可发挥辅助作用。系统可根据学生的学习记录、测验表现和资源访问偏好,推荐相匹配的学习材料或练习任务。但教师需要对推荐结果进行学科审查,确保资源内容准确、难度适宜且符合课程目标。技术的合理定位应是扩展教师的学情观察视野,而非替代教学设计和育人判断。

(五) 以综合实践任务强化迁移应用, 落实核心素养培养

深度学习最终应体现为学生在新情境中运用历史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可围绕课程重点设计综合实践任务,如历史小论文、主题展板、口述史访谈、历史地图解读、史料证据包分析等,引导学生在真实或接近真实的学习情境中完成资料搜集、证据整理、观点建构和成果表达。

综合实践任务的评价应兼顾学习结果与学习过程。除关注成果的史实准确性和表达规范性外,还应考察学生的问题意识、证据意识、合作能力和反思能力。通过任务驱动,学生能够在历史知识与现实理解之间建立联系,进一步增强历史学习的解释力和价值感。

五、实施保障与注意事项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历史课程优化需要相应的实施保障。首先,教师应加强课程标准研读和单元整体设计能力,避免将深度学习简单理解为活动堆砌。其次,学校应完善数字化资源建设和平台支持,为过程性评价、资源推送和学习反馈提供稳定条件。再次,教师在使用学习数据时应遵循必要、适度和安全原则,保护学生隐私,避免以数据标签固化学生发展。

此外,课程优化还应处理好技术应用与学科本质之间的关系。历史教学的核心在于引导学生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形成基于证据的理性判断和责任意识。任何技术工具都应服从于历史学科育人目标,服务于学生深度理解和核心素养发展。

六、结论

高中历史课程优化是一项涉及目标重构、内容整合、课堂转型和评价改进的系统工程。以深度学习理念为引领,可以有效回应当前历史教学中知识碎片化、学习浅表化和评价单一化等问题。通过大概念统摄内容、问题链驱动探究、学习行为数据辅助诊断、智能资源支持差异化学习以及综合实践任务促进迁移应用,历史课堂能够更好地实现由知识传递向素养培育的转型。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具体课例开展实证分析,比较不同教学策略对学生史料实证能力、历史解释能力和学习投入度的影响。同时,也应关注人工智能与教育数据应用中的伦理边界,推动技术理性与教育价值的协调统一,为高中历史课程高质量实施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 [1] 薛凤玉.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策略探索[J]. 快乐阅读, 2021(2): 78-79.
- [2] 宋红梅. 高中历史教学推进深度学习的思考与策略[J]. 新课程, 2021(1): 112-113.
- [3] 刘新明. 高中历史深度学习的呈现策略[J].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22(6): 27-30.
- [4] 杨冬明. 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历史教学问题设计路径[J]. 中学历史教学, 2021(3): 45-48.
- [5] 彭鑫. 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历史口述史探究策略[J].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21(11): 34-39.
- [6] 史宁. 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历史主题教学[J].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21(4): 20-24.
- [7] 尚丽娜. 基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浅谈促进深度学习的策略[J]. 中学政史地·教学指导, 2021(7): 56-58.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LuoJianhao¹, Cuichao²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China; 2 Yining No.8 Middle School, Ili Kazakh Autonomous Prefecture,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uperficial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and insufficient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se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this paper explores curriculum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Rather than treating technology as an external addition, curriculum reform should be oriented toward the cultivation of historical core competencies and should integrate learning objectives, inquiry tasks, resource support and evaluative feedback. It is proposed that teachers organize content around big ideas, guide historical inquiry through problem chains, support evidence-based reasoning with diversified sources, and use learning behavior data to diagnose students'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ese strategies are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y teaching fro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meaning construction, evidential interpretation and value judgment.

Keywords: deep learning; se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curriculum optimization; historical core competencies; learning behavior analysis

融合育人视角下高职院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转化路径研究

李娟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10)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主线。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肩负着将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入“德技并修”人才培养全过程的重要使命。现有研究在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理论阐释与高校通用路径方面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面向高职办学特色的融合育人路径仍显不足,普遍存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认知与行为脱节等现实困境。基于对共同体意识内涵要义的理论梳理与高职院校现状的实证诊断,本研究提出融合育人视角下“教育融入--认知深化--情感认同--自觉践行”四阶教育转化机制,构建涵盖“目标--内容--载体--方法--评价”的五维实践框架,并针对专业课堂、实训实操、校企合作三大核心育人场景提出具体的融合落地策略。旨在为高职院校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兼具理论支撑与实践可操作性的系统解决方案。

关键词:融合育人;高职院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转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64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缘起

2024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作为首本统编教材出版,标志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下简称“共同体意识”)教育进入了系统化推进的新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承载着同等重要的育人使命,却因其鲜明的类型特征,在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落地路径上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挑战。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技能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这种“德技双修”的办学定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容易沦为专业知识传授的附加项,而非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核心要素。近年来的政策文本反复强调要将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的各个环节,然而在实践层面,高职院校依然普遍面临融合深度不足及转化效率偏低的核心难题。

国内学界围绕共同体意识教育理论与高职教育的衔接,已形成从基础阐释到场景应用的递进研究脉络:对于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已形成共识,高承海(2019)较早系统阐释了其核心维度,指出身份认同是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构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在此基础上,高校层面的教育路径研究逐步展开:张健等(2025)提出以“大思政课”协同推进课程融通的路径,但未结合高职的办学特点且未触及专业实践层面的转化路径设计。进一步聚焦高职场景,韩瑞平等(2023)初步探索了高职学生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方向,但未涉及融合育人的实践维度;马雪莹等(2024)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中存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的核心痛点,但未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何梦琳(2025)以思政课为载体探索融合路径,却局限于思政课单一维度,未关联高职专业实训及校企合作等核心教学场景。从实践调研与路径研究来看,田迎春等(2024)通过高职学生现状调研,揭示了共同体意识培育中认知与行为脱节的突出问题;冒茜茜(2025)解析了意识培育中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的互构逻辑,但二者均未针对高职专业教学场景提出适配方案,难以回应高职“德技并修”的人才培养要求。

现有研究已形成“理论指引--高校路径--高职探索--实证调研”的递进脉络,但仍存在两大核心局限:一是共同体意识教育与高职专业融合性不足,未将融合育人理念贯穿培育全过程,难以破解思政与专业“两张皮”问题;

作者简介:李娟(1985-),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跨文化理解与教育。

通讯作者:李娟

二是缺乏系统的教育转化路径,无法推动共同体意识从认知向情感及行为的转化。核心原因在于政策落地衔接不够与实践支撑不足,未结合高职专业实训、校企合作等核心场景设计融合路径。在融合育人的视角下,如何构建适配高职院校“德技并修”特色的共同体意识教育转化路径?如何将共同体意识教育与专业教学、实训实操、校企合作等核心育人场景深度嵌合,实现从知识认知到情感认同再到行为自觉的有效转化?

二、融合育人与教育转化机制的内在逻辑

(一) 融合育人的核心内涵与价值取向

融合育人作为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理念与实践范式,强调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三者有机统一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之中。在高职教育的语境下,融合育人具有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独特内涵。高职院校以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其人才培养方案天然地要求职业道德、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深度融合。这种德技并修的育人特质,决定了高职院校的融合育人不能停留于简单的课程思政层面的元素添加,而必须走向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融合。

融合育人理念在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应用,要求打破传统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之间的壁垒,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嵌入专业知识点讲授、实训任务设计、校企合作实践等各个教学环节。这种融合并非对专业教学的思政化改造,而是通过挖掘专业领域内与共同体意识相契合的价值元素,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相得益彰。以建筑工程类专业为例,在讲授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时,自然引入各民族地区共同参与国家建设的生动案例,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潜移默化地感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以护理类专业为例,在职业素养培育中融入各民族医护人员共同抗疫、守护生命的感人事迹,使共同体意识与职业伦理实现内在统一。

融合育人的核心目标在于构建“认知--情感--行为”三位一体的育人生态,使共同体意识不再是外在于专业教学的附加内容,而是成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这种转变既是教育理念的提升,也是育人路径的创新。

(二) 共同体意识的结构性维度与教育转化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个体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情感归属与责任担当的综合体现,其内在结构可以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加以解析。认知维度涉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奋斗历程的理性认识与理解;情感维度体现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与自豪感;行为维度则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中自觉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实际行动与价值选择。这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由浅入深,由内而外的递进关系,构成了共同体意识教育转化的基本逻辑链条(图1)。

教育转化的核心任务在于推动共同体意识从外在的知识输入转化为内在的价值认同,并最终外化为自觉的行为实践。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将学习过程划分为认知、情感、动作技能三大领域,这一经典理论框架为理解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转化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从认知领域的“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的递进,到情感领域的“接受--反应--价值评价--组织--价值体系内化”的深化,再到行为领域的“模仿--操作--精确--连贯--自然化”的熟练化,这一完整的转化链条揭示了教育过程中认知、情感、行为的内在关联。

在高职教育的特定情境下,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转化呈现出独特的规律性。高职学生的学习特征更倾向于“做中学”的体验式学习模式,他们对抽象理论的接受度相对较低,而对情境化、实践性的学习内容表现出更强的投入度。这意味着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转化不能简单依赖课堂讲授与理论灌输,而必须借助专业实践、技能竞赛、企业实习等真实情境,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体验到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从而激发深层的情感共鸣与行为自觉。

(三) 基于情境学习理论的融合育人转化机制

情境学习理论强调知识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建构的,学习的过程本质上是学习者参与实践共同体,从边缘性参与走向核心参与的过程。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共同体意识教育,可以发现:共同体意识并非单纯通过课堂讲授即可获得的抽象知识,而是需要在真实的社会互动与实践体验中逐步建构与内化的价值认同。因此,融合育

人的转化机制在于“教育融入--认知深化--情感认同--自觉践行”的四阶递进转化（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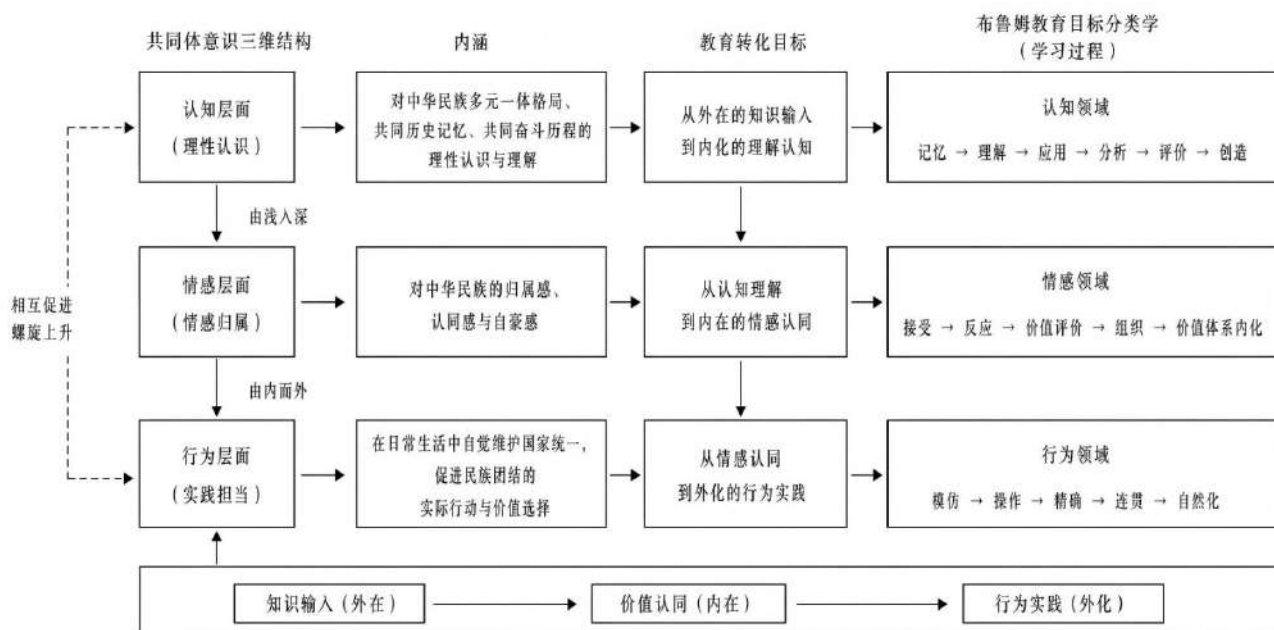


图1 共同体意识教育转化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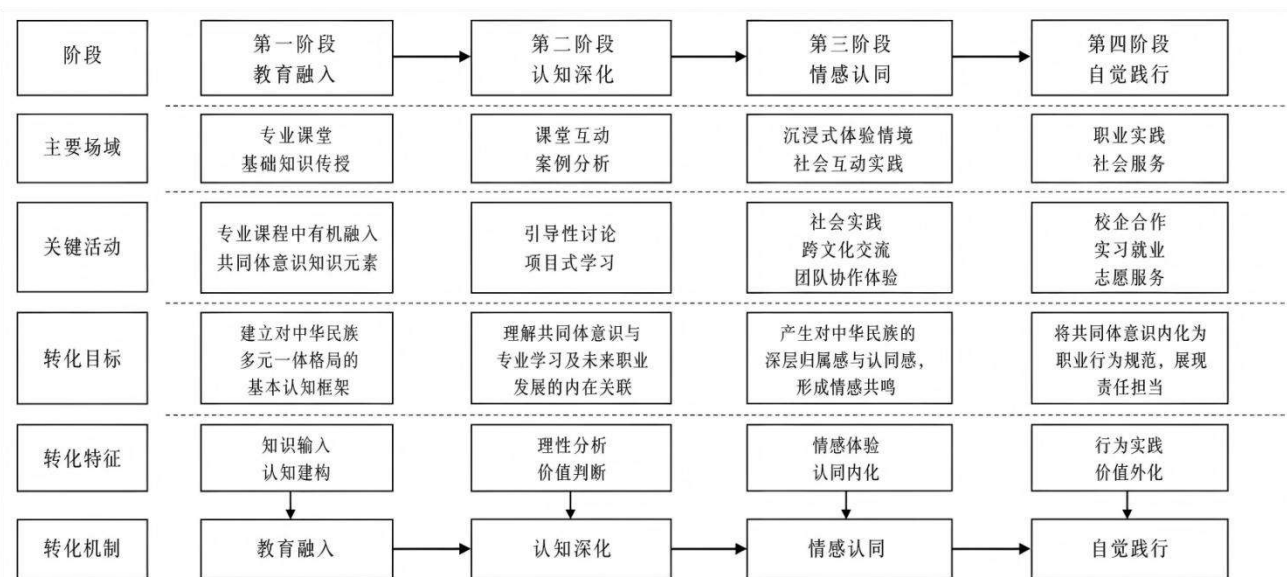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情境学习理论的融合育人转化机制

第一阶段的教育融入是知识认知的奠基阶段。主要发生在专业课堂的基础知识传授环节，通过在专业课程中有机融入共同体意识的知识元素，使学生建立起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认知框架。这一阶段的关键在于精准嵌入而非生硬嫁接，需要教师深入挖掘专业知识体系中的共同体意识契合点，实现两者的自然融合。因此核心任务是建立共同体意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包括建立“专业--共同体意识”元素映射库，针对每个专业的核心课程，系统梳理其中可融入的共同体意识知识点。例如，在机械制造类专业中引入各民族地区工业发展历程的对比分析，在旅游管理类专业中融入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案例教学。同时，教师需要掌握“隐性融入”的教学技巧，避免生硬嫁接与说教式灌输，使共同体意识元素成为专业知识体系的自然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的认知深化是理性认同的内化阶段。发生在课堂互动与案例分析环节，教师通过引导性讨论、项目

式学习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共同体意识与专业学习与未来职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共同体意识从孤立的知识概念转变为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的价值判断。这一阶段的转化标志是学生能够对共同体意识进行独立的理性分析与价值评判。在基础知识融入的基础上,通过课堂讨论、项目式学习、辩论赛等形式,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共同体意识与个人未来发展之间的关联。这一阶段的教学设计需要提出具有思辨性的核心问题,例如“本专业领域的发展如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技术技能人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可以发挥哪些独特作用?”,这样通过层层递进的追问,帮助学生建立起将共同体意识与职业使命相联系的价值判断框架。

第三阶段的情感认同是情感共鸣的升华阶段。则需要依托更具沉浸式体验的学习情境,包括民族地区社会实践、跨文化交流活动、技能竞赛中的团队协作等。在这些真实的社会互动中,学生通过直接的情感体验产生对中华民族的深层归属感与认同感,共同体意识由理性认知升华为情感共鸣。情感层面的转化是整个教育转化链条中的关键跃迁,也是最为困难的一环。情感层面的转化是四阶机制中的关键跃迁。高职院校需要创设具有沉浸感与体验性的学习情境,组织学生参与民族地区的社会实践项目、跨文化交流活动以及社区志愿服务。在这些真实的情境中,学生通过与不同民族群体的面对面互动,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从而激发深层的情感共鸣。同时,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发沉浸式的共同体意识教育数字化资源,突破时空限制,扩大体验式学习的覆盖面。

第四阶段的自觉践行是行为外化的养成阶段。发生在职业实践与社会服务环节,学生将共同体意识内化为职业行为规范的一部分,在校企合作、实习就业、志愿服务等实际场景中展现出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并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这一阶段的转化成果体现为学生能够在复杂的现实情境中做出符合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最终目标在于行为的自觉转化。这一阶段需要在校企合作、顶岗实习、毕业就业等环节建立“行为养成”机制。具体策略包括:将共同体意识相关指标纳入实习考核评价体系;在企业实践环节开展以“民族团结与职业责任”为主题的企业文化体验活动;鼓励学生参与以民族地区发展需求为导向的项目式毕业设计。通过这些实践环节,使学生在真实职场情境中将共同体意识内化为职业行为规范,形成知行合一的价值追求。

三、融合育人视角下共同体意识的五维实践教育转化路径构建

在四阶递进机制的统领下,可遵循“目标--内容--载体--方法--评价”五维实践框架细化落实。

目标维度:确立“认知建构--情感共鸣--行为养成”的三级目标体系,分别对应知识认知的广度、情感认同的深度与行为外化的效度。每一级目标设定具体的观测指标与达成标准,使教学目标从抽象的表述转化为可测量、可评价的操作性指标。

内容维度:围绕“核心知识--技能融合--价值塑造”三层内容结构,构建模块化的教学内容体系。核心知识模块聚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演进;技能融合模块将共同体意识元素嵌入专业技术技能的学习与应用;价值塑造模块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与职业价值观。

载体维度:构建“专业课堂--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志愿服务--民族地区研学”五位一体的实践载体网络。其中,专业课堂是基础载体;实训基地是拓展载体;校企合作是关键载体;志愿服务是补充载体;民族地区研学是深化载体,五种载体相互衔接又各有侧重。

方法维度:综合运用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沉浸式体验、校企协同授课等多元化教学方法。案例教学侧重通过真实情境的分析引发认知共鸣;项目式学习侧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深化价值认同;沉浸式体验侧重通过情境创设激发情感共鸣;校企协同授课侧重在真实职场中完成行为转化。

评价维度:构建“学校--企业--服务对象”三方参与的多主体评价体系,将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将自我评价与他者评价相统一。评价工具包括标准化问卷、情境测试题、行为观察量表、企业导师评价表等,形成立体化的评价网络。

四、高职核心育人场景中的融合落地策略

（一）专业课堂场景：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嵌合

专业课堂是高职院校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阵地。课堂融合的关键在于实现共同体意识元素与专业知识体系的深度关联。以建筑工程类专业为例，在讲授“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相关章节时，可引入各民族建筑智慧的交流与融合案例，如藏式碉房与汉族木结构建筑的相互借鉴，云南少数民族干栏式建筑的地域适应性创新等，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中自然地感知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教学团队需要建立集体备课制度，定期组织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联合教研，共同梳理专业课程中的共同体意识融合点，形成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指南。同时，开发专门的教学案例库与多媒体资源包，为一线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教学工具，降低融合育人的实施门槛。

（二）实训实操场景：技能训练与品格培育的同步推进

实训实操是高职教育教学的标志性环节，也是共同体意识教育转化的重要场域。在实训教学中，可将共同体意识融入操作规程、质量标准、安全意识等职业教育的基本规范之中。例如，在护理专业实训中，通过模拟多民族患者的护理场景，训练学生在跨文化情境下的沟通技巧与人文关怀，使学生在技能操作的过程中同步提升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包容。

实训场域的环境创设同样具有隐性育人功能。在实训基地的文化墙，操作规程展板，优秀毕业生事迹展示等环境要素中融入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元素，使学生在日常的实训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熏陶。

（三）校企合作场景：产学协同与文化育人的深度融合

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区别于普通高校的最鲜明特征，也是共同体意识教育从认知走向行为的最佳转化平台。然而，当前校企合作中的文化育人功能普遍被忽视，亟需建立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

企业导师是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力量。高职院校应在校企合作协议中明确文化育人条款，要求合作企业选派具备家国情怀与责任感的技术骨干担任企业导师，在顶岗实习环节同步传授专业技能与价值观念。同时，开发“企业--学校”双向培训课程体系，使学校教师了解企业文化中的社会责任元素，企业导师掌握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教学方法，形成双向赋能的协同育人生态。

五、结论与建议

高职院校共同体意识教育需要从“附加融入”走向“结构融合”。现有实践中的“两张皮”问题的根源在于将共同体意识教育视为专业教学之外的附加任务。融合育人视角下的路径构建强调将共同体意识作为人才培养的结构性要素，嵌入专业教学、实训实操、校企合作等各个核心环节，实现价值塑造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

“教育融入--认知深化--情感认同--自觉践行”四阶递进机制是共同体意识转化的有效路径。这一机制基于认知、情感、行为的递进逻辑，结合高职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学习规律，为共同体意识从知识认知到行为自觉的转化提供了清晰的阶段划分与操作指引。每个阶段的教学设计与方法选择需要精准对接该阶段的转化目标，避免阶段之间的跳跃与断裂。

“目标--内容--载体--方法--评价”五维实践框架为转化路径的落地提供了系统性支撑。五个维度相互支撑、相互印证，形成闭环式的路径实施体系。目标维度为转化指明方向，内容维度提供支撑材料，载体维度搭建实践平台，方法维度保障实施效果，评价维度实现持续改进。

校企合作场景是共同体意识行为转化的关键场域。高职院校应充分发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优势，将共同体意识教育与企业文化培育与职业素养养成深度结合，使学生在真实职场情境中完成从“知”到“行”的最终跨越。

因此提出以下建议：高职院校管理层应高度重视共同体意识教育，将其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指标体系，建立跨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教务部门应开发专门的教学设计指南与资源库，为一线教师提供系统的方法论

支持与教学资源;专业教师应主动转变教学观念,积极探索将共同体意识融入专业课教学的有效方式,形成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良好“三全育人”生态。

参考文献:

- [1]《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4.
- [2]高承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12):24-30.
- [3]张健,柳钠.“大思政课”协同推进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25,36(04):68-77.
- [4]马雪莹,程铭莉.职业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逻辑与实践进路[J].职业教育.2024, 23(30):76-80.
- [5]何梦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究——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为例[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18):92-94.
- [6]韩瑞平,张思来,李一吉,刘杰.高职院校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探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02):54-58.
- [7]田迎春,邵秀霞.高职院校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调查分析[J].卫生职业教育.2024,42(16):96-100.
- [8]冒茜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的互构逻辑[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5(03):89-98.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Li Juan

(Urb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Sichuan,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erves as the core guiding principl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s the primary front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er the critical mission of deeply integrating this sense of community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at emphasizes both "moral integrity and technical proficiency." Whil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yielded substantial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general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universities, research focusing on integrated educational pathways tailored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mains insufficient. Current practices are often plagued by the "decoupling"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from professional instruction, as well as a disconnect between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Grounded i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an empirical diagno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four-stag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Educational Integration – Cognitive Deepening –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 Conscious Practi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Furthermore, it constructs a five-dimensional prac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Objectives, Content, Carriers, Methods, and Evaluation,"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three core educational scenarios: professional classrooms, practical training, and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solution that combines theoretical support with practical operability for promo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Integrated Educ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工匠精神引领的陶艺课程思政创新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沉浸式教学案例库的构建与实践

张吉, 田雪莲, 刘春艳, 贺琳静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13)

摘要: 针对高校陶艺课程中长期存在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割裂问题——即技艺传授(工具理性)与价值塑造(价值理性)相互脱节、思政元素难以有机融入专业教学, 本研究构建了“工匠精神+课程思政+乡村振兴+沉浸式教学”四维融合的创新教育范式。通过“手艺—授艺—守艺—售艺”的系统化路径, 综合运用案例开发与行动研究, 实现了工匠精神的可视化转译与教学过程的沉浸化重构, 推动价值理念从认知、情感到行为的深度内化, 并最终在教学成果服务乡村发展的多维反哺中, 完成价值实践的闭环。本研究证实, 该模式有效弥合了传统教学中技艺与精神的断层, 构筑了自我驱动的教育价值循环, 为非遗传类课程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提供了兼具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可行性的系统方案。

关键词: 工匠精神; 课程思政; 陶艺教育; 沉浸式教学; 乡村振兴; 价值理性

基金项目: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度院级科研项目 (纵 20253050001)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65

引言

陶艺是泥火淬炼的传统艺术, 既是中华文明绵延的鲜活见证, 亦是跨时空联结中外的文化符号。作为人类创造力的具象表达, 它承载千年来“器以载道”的工匠伦理, 借器物延续文明内核与价值理念。全球现代化与标准化教育冲击下, 手工艺课程边缘化, 传统技艺渐成“博物馆化”展品, 伴随手艺式微的还有相关生活范式、审美取向的消亡。中国语境中, 手工业与教育体系相互掣肘, 前者因传承场域缺失萎缩, 后者未搭建传承纽带, 加剧文化传承困境。陶艺价值体系遭割裂, 呈现传承断裂、教育滞后等四维难题, 亟待破解。乡村振兴战略与文化自信理念为破局提供契机。本研究立足时代需求, 构建“工匠精神+课程思政+乡村振兴+沉浸式教学”四维融合路径, 探索手艺传承、授艺革新等核心问题, 打造自我赋能价值循环, 贯通传统工艺从文化保护到社会价值彰显的完整链路。

一、说手艺——工匠精神的可视与迭代

工匠精神是陶艺教学的价值内核, 然其内在性与抽象性, 使其在教学实践中面临“难以言传、不易固化”的困境。若不能将这种精神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可遵循的操作规范, 所谓的“价值引领”便易沦为空洞说教。因此, 本教学模式的核心突破, 在于实现工匠精神的可视化转译与层级化传承, 贯通从价值认知到手工实践的路径。

维度一(载体): 可视化资源——让精神“看得见”。本维度旨在解决“精神何以承载”的问题, 即将无形的“心法”与“标准”转化为有形的、可供观摩与解析的物化载体。一是教学范本化: 系统收集与制作涵盖大师代表作、关键工序半成品、典型瑕疵案例在内的“技艺标准影像库”, 将“只可意会”的技艺精髓转化为“有例可循”的视觉标

作者简介: 张吉(1981—),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非遗活化、城乡发展;
田雪莲(1982—), 女,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人工智能;
刘春艳(1979—),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产品设计、职业教育;
贺琳静(1979—), 女, 本科, 讲师, 研究方向为建筑艺术、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通讯作者: 张吉

准。二是流程具象化：通过步骤分解图与慢速视频解析，将依赖个人经验的“手感”与“火候”拆解为清晰的、可学习的操作规范，使内隐的“身体知识”转化为外显的公共教学内容。三是情境再现化：利用 360°全景与 VR/AR 虚拟叙事，将学生“带入”古窑窑火不熄的深夜或大师反复打磨作品的瞬间，使“坚守”“专注”等概念化为可感知的情感冲击与情境记忆。

维度二（过程）：层级化路径——让精进“有阶梯”。本维度规划层级化的教学进阶路径，使精进过程系统化。一是模块式分解：依据技艺内在逻辑，将一项完整工艺解构为“炼泥、拉坯、利坯”等核心技能模块，实施聚焦训练，将复杂任务分解为可控步骤，使学生集中攻克单一技术难点。二是交互式解构：通过交互技术对关键工序进行微观拆解。以“利坯”为例，在虚拟环境中允许学生“透视”坯体，系统实时显示厚薄数据并给出提示，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准则转化为一种可视的、必须遵守的精准尺度。三是迭代式训练：在每一层级均嵌入“实践—反馈—优化”的刻意练习结构化循环，使“精进”成为一种可操作、可迁移的标准化路径，让学生系统化地体验并完成技艺的纯熟与内化。

维度三（评价）：证据化评估——让成长“可衡量”。本维度建立基于证据的动态评估体系，实现价值内核的过程化追溯。通过高精度模型库，刻意设置“匠心之作”与“怠惰之器”的对比模块，使学生直观对比精品与次品在形态、釉色、质感上的云泥之别，深刻理解“物我一致”的敬业态度如何最终凝结于器物之上，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价值一部分。

精神的传承绝非一次性的观看与模仿，更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与认同的迭代过程。为此，我们构建了“观摩—实践—创生”的螺旋式上升路径，使工匠精神得以在从感知、体认到创新的完整循环中，实现从价值认知到行为自觉的迭代升华。

二、说授艺——沉浸教学的重塑与赋能

若说“手艺”之章在于解构工匠精神内核，那么“授艺”之章则旨在重塑传授过程本身。本研究将在乡村振兴和当代技术的大背景下构建虚实融合的沉浸教学体系，推动传统教学的创新尝试。

（一）重塑：从“封闭课堂”到“无界生态”的教学结构变革

沉浸式教学将重构教学边界，构建虚实融合的学习生态，实现从课堂到“田野”的延伸。

1、场域沉浸：乡土激活文化感知。通过将教学场域前移至景德镇、成都周边多个村落等活态传承地，使学生在真实工坊中体认陶艺本质。泥土特性、窑火脾气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必须遵守的生产律条，陶艺成为与地域文化、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活态实践，为理解工匠精神提供深层文化语境。

2、虚拟沉浸：技术拓展认知边界。借助 VR/AR 技术构建“移动现场”，使学生能够观摩非遗传承人技艺，观察釉料分子变化。这种亲身体验将程序性知识转化为肌肉记忆，将不可逆工艺转化为可重复的认知对象，有效攻克手艺传授难点。

（二）赋能：从“知识接收”到“素养生成”的教学效能提升

1、赋能于具身认知：从“知道”到“体道”。无论是真实工坊中泥土在指间的触感，还是虚拟环境中手柄模拟的拉坯阻力，都强调学习是全身心的参与。这种“具身体验”将内隐的“程序性知识”转化为肌肉记忆与直觉理解，实现了从“心知”到“身知”的跨越。

2、赋能于社会性协作：从“个体学习”到“社群共生”。在真实工作坊中，学生与工匠、村民共同劳作，教学关系拓展为“师徒”“乡邻”关系。这种社会互动使技艺传承与价值培养在真实交往中自然完成，为课程思政的生活化融入打下坚实基础。

3、赋能于创新迁移：在真实世界中验证价值。通过虚实融合的教学实践，让学生在真实场域中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价值闭环激发学生的责任感与创新欲，使知识、技能与价值观在创造真实价值的过程中有机融合，塑造兼具技艺、素养与视野的创新型人才。

三、说守艺——课程思政的内化与贯通

承继“手艺”之章的价值解构与“授艺”之章的场域重塑，陶艺教学的核心诉求进一步指向价值理念的深度内化与有机贯通。本研究通过构建系统的教学路径，致力于将工匠精神从知识层面渗透至学生的价值认同与行为自觉，实现思政教育的本质升华。

（一）情感内化：从情境感知到价值认同的深度转化

课程思政的实效性,根基在于实现价值理念的情感内化。本模式充分运用沉浸式教学所营造的共情场域,使学生在虚实融合的情境中完成从认知接受到价值认同的关键转化。当学生通过VR技术“亲历”匠人们守窑的深夜,或在真实工坊中体悟师傅对釉色的千次调试,“精益求精”“物我一致”等抽象理念便自然内化为真切的情感体验与精神追求。这种基于具身感知的情感锚定,为价值观念的根植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使思政教育真正“触达心灵”。

(二) 体系贯通:思政要素与教学流程的全面融合

“守艺”需要将思政要素贯通于教学全过程。在教学设计中,工匠精神既在“手艺”模块转化为可视的操作规范,又在“授艺”场域通过师徒互动自然呈现;既在虚拟案例中得以具象展示,又在乡土实践中获得行为强化。这种多维度贯通使思政教育不再是孤立环节,而是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为确保上述贯通的有效性,本模式着力培育教师的“双能型”素养。通过案例库系统培训,提升其思政挖掘能力与技术应用能力,使教师能精准把握技艺传授与价值引导的平衡,在虚实场域中游刃有余地实现育人目标。

(三) 知行合一:从价值认同到行为自觉的完整跃迁

“守艺”的终极体现是实现“知行合一”。在真实项目驱动下,学生需要将内化的价值观念,外化为自觉的创作准则与负责任的行为选择。当学生为保护传统纹样而潜心考证,为契合乡土文化而调整设计时,课程思政所倡导的价值坐标已融入其创作思维,转化为主动遵循的内在尺度。这种从价值认同到行为自觉的完整跃迁,标志着思政教育实现了从“入心”到“践行”的本质升华,为培育兼具精湛技艺与文化担当的创新人才提供了坚实保障。

四、说售艺——乡村振兴的反哺与兑现

承前所述,“手艺”奠其基,“授艺”塑其法,“守艺”铸其魂,至“售艺”环节,则旨在实现教育成果对乡村振兴的价值反哺与实质兑现。本模式推动教学成果从校园展台走向广阔乡土,构建“创作—转化—赋能”的完整闭环。

(一) 产业反哺:从课堂作品到乡村文创的价值转化

教学成果的经济价值兑现,首在于打通从作品到产品的转化路径。通过引导学生围绕乡村文旅需求开展在地化创作,其陶瓷茶器、乡土摆件等作品借助线上展销平台与乡村文创集市直接面向市场。现代设计赋能提升了传统陶艺附加值,为乡村注入“创意流量”,形成“教学—生产—收益”的良性循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振兴的协同并进。

(二) 文化反哺:从技艺传承到乡村美育的深度浸润

教育成果的文化价值兑现,体现在对乡村文化生态的滋养与重构。学生通过开展陶艺工作坊、参与乡村公共艺术创作,将学院审美理念带入田间地头。陶艺成为活化乡村文化空间的重要媒介,在提升村民审美素养的同时,为乡村文化自信重建提供持续动能。

(三) 人才反哺:从学习实践到乡土创生的能力赋能

最具深远意义的反哺,在于本土人才的孵化与赋能。在教学实践中涌现的青年人才,或成为乡村文创项目的创业新生力量,或成为传统工艺的青年传承者。他们扎根乡土,持续推动工艺当代转化,成为连接学院教育与乡村实践的活力纽带。

结论

本研究围绕“工匠精神引领的陶艺课程思政创新”这一核心命题,通过系统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得出以下结论。

(一) 理论创新:构建并验证了“工匠精神+课程思政+乡村振兴”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型,填补了研究空白。

这一模型首次通过陶艺载体,系统整合了三者的内在逻辑,形成了“价值引领—技艺传承—产业反哺”的价值闭环框架,有效推动了教育学、社会学与文化学的跨学科融合。在实践中,通过挖掘陶艺中“器以载道”的工匠伦理与“知行合一”的实践观,突破了思政教育的显性灌输模式,形成了一条“技艺习得—文化认同—价值内化”的隐性思政路径,显著深化了课程思政的内涵。

(二) 方法论突破:形成了沉浸式案例库的标准化开发范式,为非遗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路径。

通过探索 VR/AR 等技术在传统手工艺教学中的适配性,构建了“场景还原—交互体验—情感共鸣”的沉浸式学习模型。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陶艺教学案例的“四维标准”(文化性、技术性、思政性、实用性),形成了可复制的案例库开发范式。这一突破不仅解决了现有案例库碎片化、低复用性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为整个非遗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关键的方法论参考。

(三) 实践价值与文化意义: 重塑了传统工艺的当代教育角色, 构建了传统工艺文化资本服务乡村振兴的转化路径。

本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通过陶艺课程的实证研究,成功将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乡村发展的多维价值,实现了产业、文化、人才与品牌的反哺。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文化输出,而是系统地构建了传统工艺文化资本服务乡村振兴的转化路径。该路径生动诠释了技艺传承如何切实提升乡村文化自信、激活内生动力,有力回应了非遗保护中“如何活态化”的核心难题,重塑了传统工艺在当代作为“立体化育人载体”与“乡村发展触媒”的双重角色。

总结

本研究通过构建“工匠精神、课程思政、乡村振兴”三位一体的理论模型,并以“手艺—授艺—守艺—售艺”四维融合的实践框架将其落地,成功探索出一条传统工艺类课程贯通文化保护与社会服务的有效路径。研究最终构建的自我驱动型价值循环,不仅验证了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行模式,更从方法论层面为回应文化自信的时代命题、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的范式参考。

参考文献

- [1] 王雅彬, 应芝, 郑晓园, 等. 热化学硫碘循环制氢系统研究进展[J]. 能源研究与信息, 2021, 37(3): 169-175.
- [2] 李强林, 黄方千, 肖秀婵, 等. 理工类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理念与技巧[J].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 37(3): 22-25, 41.
- [3] 谢捷. 高校陶艺课程思政的素材建设与教学实践案例——泥片成型与瓦猫的制作[J]. 江苏陶瓷, 2023, 56(6): 3-4.
- [4] 藏蕾蕾. 陶瓷工艺美学与文化传承创新的融合[J]. 丝网印刷, 2022(1): 74-76.
- [5] 潘梦梅, 胥璟, 欧莹. 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研究——以陶艺课程为例[J]. 陶瓷研究, 2021, 36(2): 94-95.
- [6] 陈喆, 范静波. 公共管理沉浸式案例教学模式探索[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22(3): 87-91.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eramic Art

Courses Guided by Craftsmanship Spirit——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an

Immersive Teaching Case Bas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Ji, TIAN Xuelian, LIU Chunyan, HE Linjing

(Chengd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of Industr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ddressing the long-standing issue in university ceramic art courses—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here technical skill instruction and value cultivation are detached,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to professional teaching—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novative educational paradigm integrating four dimensions: “Craftsmanship Spirit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 Rural Revitalization + Immersive Teaching.” Through the systematic path of “Skill—Teaching—Preserving—Marketing,” employing case development and action research, this study achieves the visual translation of craftsmanship spirit and the immersiv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promoting the deep internalization of values from cognition to emotion to behavior. It ultimately completes the closed loop of value practice through the multidimensional feedback of teaching outcomes serving rur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this model effectively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skill and spirit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builds a self-driven educational value cycle, and provides a systematically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ly feasible solution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urses to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Keywords: Craftsmanship Spir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Ceramic Art Education; Immersive Teach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Value Rationality

竹文化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转译机制研究

金雨萱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目的 竹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 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皆有独特的意义。本文通过研究现代家具设计中关于竹文化的设计转译路径, 为当代家具设计提供理论参照与方法论支持。方法 从物质、感官、精神三个维度逐步解构竹文化的多层内涵。通过采用案例研究法, 系统分析竹文化在家具设计中的具体转译方式。结论 研究发现, 竹文化的设计转译通过结构显现、材质呈现、色彩表达等策略, 让竹材的物理特性成为可感知的视觉语言。同时通过形态隐喻、空间叙事、场景构建等策略, 让竹文化的符号意涵成为可体验的审美对象, 完成转译的意义升华。这一转译机制为当代传统家具设计转化提供了可参照的方法论。

关键词: 竹文化; 现代家具设计; 设计转译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24

竹作为一种天然材料, 因其挺拔修长的外形、青翠的颜色以及其高风亮节的象征意义, 备受中国人喜爱。早在先秦时期的家具设计中就用到了竹材, 直至明代, 竹更加普遍用于几、椅、凳、榻等家具中。在可持续设计蓬勃发展的今天, 竹材以其卓越的环保属性与再生能力, 毫无意外地成为现代家具设计的宠儿。同时, 竹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从一种单纯的材料演化为可被感知的文化符号乃至生活方式。人在对竹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中, 与竹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 逐步转变为人与物的关系, 乃至又发展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作为东方文明的典型标识, 竹文化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当前国内竹家具研究中, 多聚焦于竹材料科学与功能美学的范畴, 而在文化维度上的探索则相对表层, 往往止步于对竹文化内涵的静态阐释。现代家具设计中, 如何通过利用竹的物理特性, 进而完成构建竹的文化叙事。叙事性概念的引入, 正是要将设计的讨论从“物用”层面提升至“意义”层面。

一、竹文化的内涵解构: 从物质载体到精神表征

爱德华·泰勒在他的著作《原始文化》中指出, 文化或者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2]。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 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从实用角度而言, 竹子可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苏东坡在《记岭南竹》中曾慨叹, 竹之于民生, 从饮食、居住、出行到衣着、书写, 皆不可或缺。展现了竹子早已融入古人的日常生活——从饮食起居到衣着出行, 无处不见其身影。中国早期的文化传播, 就是用竹简、竹纸作为跨文化交流的载体。同时, 人们又从竹的特性引申出虚心有节、清高正直的精神品格等, 历代文人骚客皆以竹诉情、言志, 表达其审美理想。竹文化作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之一, 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现代家具设计中, 依旧能看到许多竹文化的身影。

(一) 物质之维: 竹材的造物基础与物理特性

竹材的物理特性, 构成了其设计可供性的物质基础。美国著名的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提出“可供性”(Affordance) 这一概念, 指的是环境所能够给予动物的相对于其行为机会的信息, 他主要用这一概念来讨论环境与动物之间的关系^[3]。美国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把这一理论运用到产品设计范畴中, 并且在《设计心理学》

作者简介: 金雨萱(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艺术传播。

通讯作者: 金雨萱

一书中对可供性作出界定,认为它是对象可被感知与实际存在的特性,尤其是能够决定其使用方式的核心基础属性^[4]。

竹从古至今与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期,人们为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利用竹子展开日常生活、生产的需要。竹材的中空有节、形状纤长、韧性好、生长迅速等特性,决定了其在传统农业、手工业等生活中的“物用”基础。就拿竹的中空结构来讲,这使得竹材料更轻,因此可以成为人力搬运或者漂浮水面的器具,如竹轿、竹筏等。其次,竹子内部的空心部分还可以用作容器使用,如盛水、煮米、烹饪的竹筒,这类生活器物不仅材料轻便,而且造价低廉、工艺简单。后来又产生了竹制的笔筒、香筒。此外,作为禾本科植物,竹子的生长周期十分快。这种极快的生长速度和强大的再生能力,使得竹材在传统农耕社会中成为一种取之不尽的廉价且易得的资源。这种“物用”层面的普遍性,也为后来竹文化的产生与得以深入民间被广泛使用奠定基础。

(二) 感官之维: 竹材的知觉特性与审美源点

感官体验是文化意义附着的最直接载体。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谈到气氛,气氛是关于材质、色彩、形式和空间的演算,是这些因素的综合性结果。气氛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与人、物与物之间保持了一种特定关系。

在家具设计中,材质既是材料的物理构成,也是人的感知对象。作为人与家具最直接的接触层,材质呈现的核心,在于让竹材的表面质感从潜在的存在转化为用户的感官体验,使竹材的天然之美被充分感知。整根竹子由竹鞭、竹根、竹箨、竹秆、竹枝和竹叶组成^[5]。竹子的茎秆结构主要包含竹青、竹节、竹肉、竹黄、竹膜、节内横隔、中空髓腔、节间长度以及竹壁等部分,其中竹青位于竹壁的最外侧表层。经过加工后,竹材会表现出的肌理效果也不同。比如横剖时,横断面会呈现出整齐的斑点,给人以细腻舒适的触感体验。斜剖时,纤维管走向会显现出云纹或山纹形状,摸上去会有些许粗粒感^[6]。刨切薄竹的研究也指出,经过打磨后的薄竹,表面光滑,摸上去能带给人一种“顺滑、舒适、隽秀的感受”。薄竹表面涂完清漆后,则有“行云流水、温润如玉的触感”^[7]。这种触感体验,正是竹材区别于金属、塑料的核心优势。竹材温润爽滑、不冰不热,这些触觉特征共同构成了竹的“感知界面”,加强了使用者对竹材的外部印象。

“色彩和材质一样,都是抽象的存在,思维操纵的对象。全部的现代环境便是如此,以整体的方式进入符合体系中。”^[8]视觉是获取信息的主导感官,能够直接激起用户的情感共鸣。竹的色彩会因为内部和外部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光泽变化,大多呈现为黄色与绿色。新鲜的竹材呈现出青翠之色,经过时间的流逝竹子便会变为黄色乃至棕红色。为保留竹子原色与肌理,人们往往会在竹子表面上涂一层透明漆或装饰颜料,体现出淡雅淳朴,天然去雕饰的美感。色彩表达的核心,在于让竹材的色彩演变从“被动的变化”转化为“主动的叙事”,使时间性被感知、被阅读。

在心理学中,特定的气味能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与记忆。就嗅觉而言,由于竹子本身带有一种独特的香味,这种气味淡雅且清新,在无意识层面建立起家具与个人情感记忆的连接,让人仿佛置身于山野。这种由气味引发的深层共鸣,也是将产品转化为情感载体的重要途径之一。综上可见,视觉、触觉与味觉这些知觉特性共同构建了使用者的整体感官,形成人们对竹文化的审美源点。

(三) 精神之维: 竹文化的哲学内核

宋代儒家王阳明早年亭前“格竹”而“不得其理”,他从竹子中获得了感悟,认为“竹有君子之道”^[9]。竹文化之所以能够穿越数千年而不衰,除了物质层面的使用价值以及符号层面的审美意趣,根本原因更在于竹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国哲学的土壤之中。竹,既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物化载体,也是生活美学的实践场域。理解竹的哲学内核,是把握其现代转化可能性的关键。

“比德”是中国美学与伦理学中的核心观念。历史上竹文化中的“比德”观从“物性”逐渐转变为“人性”和“人格化”,即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与人的道德品质进行类比,使自然成为人格的镜像^[10]。孔子“君子比德于玉焉”开其先河,而竹以其独特的生命形态,成为承载“君子之德”的理想载体。唐代刘岩夫《植竹记》中明确提出:“君子比德于竹焉”,标志着竹与君子的象征关系正式确立。唐代白居易在《养竹记》中对竹之“君子四德”作了系统总结,即“本固、性直、心空、节贞”^[11]。所谓“本固”,指竹根深植,寓意君子立场坚定;“性

直”喻竹身挺拔,象征君子刚正不阿;“心空”则对应竹节中空,昭示君子虚怀若谷;“节贞”取竹节分明之意,彰显君子操守不移。四德并举,将竹的自然形态与儒家理想人格完美统一。

从物性到人性,竹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古代文人常寄情于竹,在诗词歌画中歌颂人坚韧、谦逊、正直的高贵品格,他们以竹自喻、言志、修身、养性,竹成为人格化的象征,凝聚着文人雅士的审美理想与文学追求。现代设计除了通过工艺赋予材料使用功能外,还应该强调事物的本质、规律与文化内涵,达到技道合一的境界。这意味着设计师不能仅将竹视为一种可持续的环保材料,更应深入理解其背后的精神品格,将“比德”的传统智慧转化为当代设计的价值内核。唯有如此,竹文化方能在现代语境中实现创造性转化,让古老的君子之德在新的物质载体中延续其精神命脉。

二、从物用到叙事:竹文化家具设计转译路径

(一) 竹材物理特性的形式化呈现

第一章指出,竹材具有独特的物理特性,这些特性构成了竹材的“物质之维”。然而,这些特性本身只是表层,它们如何被使用者感知,是设计转译必须回答的问题。从物理特性而言,主要包括结构、材质、色彩、形态等方面的形式转译。

结构显现是设计转译中最具视觉张力的策略。由于竹材外观本身就具有美感,在许多竹材家具设计中,往往以外显结构展示,来强调材料本身的特性。美籍华人设计师石大宇在论坛上分享自己对竹产品的见解时谈到:“用以竹代木的概念做出来的产品,当然用木材都可以实现。但是体现竹材特性的设计和器物,用木材是无法实现的!”产品设计的结构显现并非为了显现而显现,只有当材质本身特性和价值凸显,使用者就能在使用之前,先被材料的力量所打动。石大宇于2008年设计的椅君子,这款座椅整体采用天然竹材制作,通过单一竹材与简洁线条塑造出座椅的整体形态与框架结构,不使用多余构件。从侧面看,整体正如「君」字之形。造型优雅,同时又能保留椅子的舒适度。结构显现作为一种设计策略,更是最原初的叙事。当设计师以谦卑之心倾听材料的声音,当匠人以精湛之手赋予材料形式,当使用者以好奇之心感受材料的回应,一种最本真的交流便在人与物之间发生。这是“物用”层面的最高境界,也是通向“叙事”的坚实起点。

如果说结构显现关注的是竹材“如何受力”的内在逻辑,那么材质、色彩与形态呈现关注的则是竹材“是什么样子”的外在界面。材质呈现的核心在于让竹材的表面质感从潜在的存在转化为显在的体验。从竹材物理特性来看,不同于木材,竹材具有韧性与弹性。木材性脆,弯曲半径过大则易折;竹材性韧,可经火烤加热后弯曲定型,且弯曲后具有持久的回弹力。北京林业大学的云在亭设计就利用了竹材易弯曲加工的特性,表现出富有张力的自然形态。这种特性在传统竹器制作中早就被充分利用,比如竹椅的弯曲靠背、竹篮的弧形提梁、竹筏的弹性龙骨等,无不依赖于竹材的韧性。此外,竹编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的瑰宝,具有丰富的纹样体系。在竹编家具的设计运用中,不同的纹样带来的效果也不同。比如为了追求家具面板的平整光洁,多采用平面纹样,而如果是为了强调层次与肌理感,则多用立体纹样装饰^[12]。竹编家具产品中,竹编通常以平面或曲面形式呈现,广泛应用于桌凳表面、扶手、家具板面等部位,既承担结构功能,又兼具装饰美学。

家具设计中,色彩的运用与表达也至关重要。徐明宇的竹编家具系列,借鉴了意大利孟菲斯色彩风格,采用高饱和度的红、黄、蓝等颜色,打破了竹本身寂静沉稳的特征,从而体现出灵动活泼之感,让竹编家具在保留传统根脉的同时,获得了强烈的当代气息。在平行竹编吊灯系列中,各色竹篮形灯罩呈层叠排列,白天阳光穿透时,会在映射出抽象的几何图案。而夜晚灯光亮起时,原色的竹编搭配不同的光彩,为室内添上温柔的气氛,这种光影的生成,让竹编从静态的器物升华为动态的空间艺术,让人仿佛置身于竹林之间。

可见,色彩不再是材料的被动属性,而是主动参与空间氛围的营造。

(二) 竹文化符号的意义转化

竹文化的内涵包括气节、虚心、正直、禅意。而如何通过设计将产品转化为可感知的语言符号,使其成为文化意义的载体,这是转译的精神升华,也是从“物用”走向“叙事”的核心环节。

形态隐喻是竹文化符号意义转化中最直接的策略,通过提取竹的形态特征进行抽象、简化、重构,不求形似,

但求神似。通过有限的形态暗示,唤起观者对竹的文化联想。中国传统艺术又称之为线的艺术,传统竹家具通过采用竹竿和竹条之间的排列组合,形成具有线状穿插的形态结构,以竹之挺拔为韵,形成了独特的线性美学^[13]。从形态上来讲,竹的线性形态主要为直线与曲线,不同的形态会给受众不同的体验。直线为水平竖直方向交叉,体现线条的流畅性,给人以刚直、简明以及严谨的秩序感。由于竹材韧性较高,在竹家具中经常能看到曲线的构成,曲线在圈椅中颇为常见,相较直线的简练,曲线更显柔和优雅。由中国美术学院团队设计的“曲趣”系列,在设计中加入竹编的元素,将竹片进行了三个维度的弯曲,采用竹片与金属的结合,具有流线感的同时又添加了产品的戏剧性。设计团队指出产品之所以能带来某种神秘感,正是竹材线性潜力被充分挖掘后带来的审美效果。

如果说形态隐喻是在器物层面展开,那么空间叙事则将竹的意象延伸至空间体验的营造。通过对光影、虚实、遮挡关系的处理,设计创造出一种“身在城市,心在竹林”的意境体验。根据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理论,空间叙事可以从物理的、心理的与社会的角度展开^[14]。石大宇的“椅屏”系列,三面格栅平行排列,以格栅简明虚实,让人仿佛置身于竹林之中,当光线穿过格栅,投射出一种若有若无的光影效果,进而形成一种竹林意向,该作品通过探讨“隐”与“现”的关系,竹让静态的容器转化为动态的空间艺术,让人置身于原始自然与现代城市的双重空间。

(三) 使用者与竹家具的互动建构

在室内设计中,家具的物理属性与空间环境并非孤立存在。正如吉布森所言,环境的可供性正是在与人的互动中生成。竹材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它所能提供的特定叙事方式与空间场景。竹材的物理属性并非静止的特征,而是在人与物的日常互动中不断被激活、被赋予意义。

因使用者的文化背景、生活经验及认知能力的差异,同一件家具对于不同用户或出现在不同的空间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功能。以一把椅子为例,当人感到疲惫时,它便具备了供人落座休息的功能;当人需取用高处物品时,它则成为可供人站立的支撑物;而当天热时,它又能发挥挂衣物的作用^[15]。因此,在家具设计过程中,应当考虑如何让使用者从“观看者”变为“体验者”,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参与”。台湾地区工艺师范承宗深受中华竹文化的熏陶,成立了自己的同名竹艺品牌,以当代美学与设计理念,为台湾地区传统竹工艺注入新的演绎。他设计的Flow躺椅,椅面展现的是通过火烤后的曲线竹片,整张竹躺椅具有飘逸之感。这种设计不仅追求视觉美感,更邀请使用者亲身感受竹材的触感与温度。

场景构建的核心,在于将单件家具放入一个完整的生活情境之中。一把竹椅不只是竹椅——当它置于茶室,与茶台、茶具、茶席相伴,它便成为茶文化的载体;当它置于书房,与书案、笔墨、香炉相伴,它便成为文人精神的象征。场景让器物获得意义,让使用者从使用走向体验。设计不再是意义的发送者,使用者也不再是意义的接收者,二者在互动中共同完成意义的建构。正是这种互动性与场景感,使竹家具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成为连接人、物、空间与文化的媒介,在当代生活中延续着竹文化的生命力。

三、结语

本研究以竹文化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转译为核心问题,通过对竹文化内涵的解读,进而揭示了家具设计中竹文化从“物用”到“叙事”的完整路径。研究揭示了竹文化转译的内在机制,这三个维度不是先后相继的阶段,而是共时并存的关系。

基于研究结论,本研究对当代竹家具设计实践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竹家具的未来发展趋势从简单的“功能附着”逐步迈向“体验重构”阶段^[16]。当下,智能化设计层出不穷,如何平衡传统现代技术以及人文价值至关重要。竹设计师在进行竹家具创作时,应做到向下扎根与向上生长,深入理解竹材的物理本性,尊重材料自己的语言,同时又能把握竹文化的哲学内核,理解气节、虚心、坚韧的精神意涵,让设计承载文化记忆。只有既懂材料又懂文化,才能完成从“物用”到“叙事”的转译。第二,中国在竹资源培育与加工技术方面不断实现突破,逐步成为竹产业发展规模最大的国家^[17]。对于竹家具产业来看,当前竹家具产业多用竹材替代木材、金属、塑料,追求功能上的使用价值。事实上,竹家具的真正价值不仅包括材料本身的价值,还包括文化赋能,产品竞争的核心应当聚焦于竹文化的意涵。从“卖材料”到“卖文化”,才是竹家具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第

三,在设计教育中,竹材教学不应止步于工艺技术训练,更应引导学生理解竹文化的深层价值。竹材的物理可供性,在其与人的互动中,生成了竹文化的丰富意涵;竹文化的符号意涵,在设计与使用者的互动中,生成了当代的叙事可能。这正是“从物用到叙事”的转译之道。竹告诉我们:真正的设计,不是附加意义,而是让意义自然生长。竹之“柔中带刚”,是设计的智慧与态度。竹家具设计的意义,正在于为现代人提供这样一种生活场景,能够在竹的线性韵律中感知时间,在竹的文化叙事中寻回精神的栖居。从“物用”到“叙事”,转译的不是竹,而是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对文化的传承,对设计的信念。这既是竹的转译之道,也是中国设计的生长之路。

参考文献:

- [1] 寇思. “以竹代塑”的审美伦理意蕴[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24(2): 168-172.
- [2]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3] GIBSON J J.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 [4] 唐纳德·A. 诺曼. 设计心理学[M]. 梅琼,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 [5] 朱新民, 范道正. 竹工技术[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2.
- [6] 黄天杨. 基于竹文化的现代家居产品设计开发研究[D]. 福州: 福州大学, 2014.
- [7] 王军, 陈思宇, 潘荣, 等. 刨切薄竹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美学特征与设计创新[J]. 包装工程, 2021, 42(2): 173-179.
- [8] 鲍德里亚. 物体系[M]. 林志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9] 乐爱国. 王阳明的“格竹”与“竹有君子之道”[J].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5(5): 1-5, 37.
- [10] 刁秋宇. 赤水竹编工艺文化中的“比德”观[J].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2(3): 88-93.
- [11] 白居易. 白居易集笺校[M]. 朱金城,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12] 陈红, 甄晟瑶, 索朗次仁, 等. 竹编纹样及其在家居中的应用研究[J]. 林产工业, 2023, 60(9): 68-73.
- [13] 林峰, 孙巍巍, 宋魁彦. 我国传统竹家具的“线”艺术研究[J]. 世界竹藤通讯, 2017, 15(2): 15-19.
- [14]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商务印书馆, 2021: 5.
- [15] 刘伊航, 宋莎莎. 基于可供性的家具材料 CMF 应用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22, 43(18): 80-86.
- [16] 朱慧旒, 戴向东. 设计驱动下智能竹家具与未来生活交互创新[J/OL]. 家具与室内装饰, 1-5.
- [17] 王戈, 陈复明, 程海涛, 等. 中国竹产业的特色优势与创新发展[J]. 世界竹藤通讯, 2020, 18(6): 6-13, 29.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Mechanism of Bamboo Culture 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Jin Yuxuan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Bamboo culture is deeply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ossessing distinctive significance across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sign translation pathways of bamboo culture with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contemporary furniture design. Methods The multi-layered connotations of bamboo culture are progressively deconstr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material, sensory, and spiritual.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case study methodology, the specific translation modes of bamboo culture in furniture design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Conclus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design translation of bamboo culture transforms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bamboo into perceptible visual languages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structural manifestation, material presentation, and color expression. Simultaneously, by employing strategies such as morphological metaphor, spatial narrative, and scenario construction,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bamboo culture become experiential aesthetic objects, thereby achieving the elevation of translation significance. This translation mechanism offers a referential methodolog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contemporary furniture design.

Keywords: Bamboo Culture;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Design Translation

从医者修养到关系伦理： 中医药文化视域下医患关系的叙事转向

周贵阳¹，叶璐¹，陈德超¹，黄颖安¹，石玉丰¹，贺利敏¹，伍广山¹，潘韞琳¹，吴丽莎^{2*}

(1 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广东 深圳 518101；2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广东 深圳 518116。)

摘要：中医药文化中的医者修养传统蕴含仁爱、精诚、慎独和整体关怀等伦理资源，是中国医学人文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然而，现代医患关系已不再是以医生单向施治为中心的传统诊疗关系，而是由医生、患者、家属和医疗制度共同构成的复杂关系实践。若仅从医生个人品格层面理解传统医德，容易忽视患者主体性、共同决策、家庭参与和制度支持等现代伦理要求。本文从中医药文化视域出发，分析传统医者修养的价值结构及其在现代医患关系中的转化限度，提出应借助叙事医学实现从“医者修养”到“关系伦理”的理论转向。叙事医学通过倾听、理解、回应和协商，将患者疾病经验、生命处境、家庭关系和价值选择纳入临床实践，使传统医德由单向道德要求转化为医患之间的理解生成、关系协商和责任共担。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临床沟通、共同决策、医学教育和医院治理四条实践进路，并指出应防止传统医德浪漫化、叙事医学形式化、共情表演化和关系伦理空泛化。中医药文化视域下医患关系的叙事转向，不仅有助于推动叙事医学本土化，也为现代医学人文建设提供了具有中国文化根基的伦理路径。

关键词：医者修养；关系伦理；叙事医学；中医药文化；医患关系；共同决策；医学人文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25年度中医药监测统计研究课题（C-109）、广东省医院管理研究所2025-2026年度专项课题（GDXYGS2025068）、深圳市宝安区医学会医疗卫生科研项目（BAYXH2024042）、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启航人才培养项目（2024-2026年）。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22

引言：医患关系中的传统医德资源与叙事转向

现代医学的发展显著提升了疾病诊断、治疗和管理能力，也使医疗实践日益呈现技术化、专科化、流程化和制度化特征。医学技术的进步扩展了人类干预疾病的能力，但也带来了新的医患关系问题^[1]。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并不只是生物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载体，而是具有痛苦体验、家庭责任、价值判断、风险感知和生活期待的具体生命主体^[2]。当诊疗过程主要围绕检查、指标、诊断和治疗方案展开时，患者的疾病经验和生命处境便可能被压缩为症状信息，医患沟通也容易被简化为病情询问、结果告知和治疗安排^[1-2]。

与此同时，现代患者角色已发生深刻变化。患者不再只是被动接受治疗的一方，而是拥有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表达权的医疗主体^[2-3]。尤其在慢病管理、肿瘤治疗、老年照护、康复调养和生命终末期照护等场景中，治疗方案往往涉及疗效、风险、费用、生活质量、家庭照护和价值偏好等多重因素^[3-5]。医患关系中的矛盾，因而不只是信息不对称或沟通技巧不足的问题，也涉及信任生成、价值协商和责任分担。换言之，现代医患关系所需要的，不只是医生“态度更好”或“解释更多”，还包括患者经验能否被理解、患者价值能否被尊重、患者选择能否被纳入，以及医疗制度能否为人文关怀提供稳定支持^[2-4]。

在这一背景下，中医药文化中的医者修养传统具有重新阐释的必要。中医药文化长期强调“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医乃仁术”等价值观念，重视医者仁爱、专业精进、慎独自律和生命敬畏^[6]。这些传统医德资源为现代医学人文建设提供了重要价值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医者修养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医生要有爱心”，也不能被直接等同于现代医学伦理。传统医德多从医者一侧提出要求，强调医生如何修身、如何待患、如何施治；而现代医

作者简介：周贵阳（1993-），男，硕士研究生，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卫生应急管理，中医药管理，医院管理；
通讯作者：吴丽莎（1991-），女，硕士研究生，公共卫生硕士，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与卫生政策研究。

患关系则是由医生、患者、家属和医疗制度共同构成的关系场域。若传统医德不经现代转化,便可能停留于单向的道德要求,难以充分回应患者主体性、共同决策和制度保障等现代伦理问题^[2,6]。

叙事医学为这种转化提供了重要方法中介。叙事医学强调通过倾听患者故事、理解疾病经验、回应生命处境,使医学实践从单纯解释疾病走向理解患病之人^[6-7]。它并不否定医学技术和专业判断,而是试图把患者的生命经验、家庭关系、情绪困境和价值选择纳入临床理解之中^[6-7]。由此,传统医者修养可以不再只是抽象的道德要求,而能够通过具体的医患互动过程获得当代表达:从“医生应当有仁心”,转向“医生如何倾听患者”;从“医生应当负责”,转向“医生如何解释、协商和支持”;从“医生应当修身”,转向“医生如何在具体关系中尊重患者并承担责任”^[3,6-7]。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中医药文化中的医者修养包含哪些伦理资源?为什么仅强调医生个人修养,已难以充分回应现代医患关系的复杂性?叙事医学如何作为方法中介,使传统医者修养从单向道德要求转向医患关系中的理解、协商与共担?中医药文化视域下的医患关系叙事转向,又应如何落实到临床沟通、共同决策、医学教育和医院治理之中?本文认为,中医药文化中的医者修养为医患关系提供了仁爱、精诚、慎独和整体关怀等伦理资源,但现代医疗关系已不再是单向施治关系,而是多主体参与的关系实践。医患关系的伦理发展,应从以医生个人修养为中心,转向以叙事理解、关系协商、信任生成和责任共担为核心的关系伦理^[2-4]。

一、传统医者修养的价值结构

中医药文化中的医者修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职业道德训诫,而是以生命关怀、专业责任、自我约束和整体理解为核心的价值结构。它既包含医者面对患者痛苦时的仁爱意识,也包含医者对专业能力、医疗权力和患者处境的持续反思。对这一价值结构的分析,是理解其现代转化的前提^[1,6]。

(一) 仁爱修养:以生命关怀奠定医患关系的价值基础。

仁爱是传统医者修养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医药文化中的“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医乃仁术”等观念,均强调医学活动并非单纯技术操作,而是面对患病之人的生命关怀^[6]。医者面对的不是抽象疾病,而是承受疼痛、恐惧和不确定性的具体生命个体。仁爱修养要求医生在诊疗过程中保持对患者痛苦的敏感,对患者处境的体察,以及对救治责任的承担^[1,6]。

这种仁爱修养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现代医学越是强调指标、流程和效率,越需要保持对患病之人的伦理敏感。患者的痛苦并不总能被检查结果完整呈现,患者的恐惧也不一定能够通过治疗方案自然消解。医生如果只看到疾病分类、病理机制和治疗指南,而忽视患者作为生命主体的体验,医疗便可能失去应有的人文温度。仁爱修养的价值正在于提醒医者:医学不仅是处理疾病,更是照护患病之人^[1,6]。

但仁爱修养的现代意义,并不是要求医生居高临下地施予善意。仁爱如果缺少主体尊重,便可能转化为善意的替代和单向的施予。现代医患关系中的仁爱,应当是对患者痛苦的回应,也是对患者表达、选择和参与的尊重。由此,仁爱修养为医患关系提供基本的伦理温度,但其当代表达必须与患者主体性相结合^[2-3]。

(二) 精诚修养:以专业责任维系医患信任。

传统医者修养中的“精诚”具有双重意涵。“精”指医术精进、判断准确和诊疗审慎;“诚”指态度诚敬、言行可信和责任真切。中医药文化并不把医德理解为单纯的善意或温情,而是强调医术与医德相统一。只有善意而缺乏专业能力,难以真正承担生命责任;只有技术而缺乏诚意,则容易使医疗沦为冷漠操作^[1,6]。

现代医患信任的形成,也并不只依赖医生的态度亲和。患者信任医生,既是因为医生能够表达关怀,也是因为医生具有专业能力、解释能力和持续负责的态度。在临床场景中,患者往往并不能完全判断治疗方案的专业优劣,但能够感受到医生是否认真倾听、是否清楚说明、是否回应疑虑、是否愿意承担责任。因此,精诚修养在现代医疗中的意义,不只是“医生医术要好”,更包括医生能否将专业判断转化为患者可以理解和信赖的沟通过程^[3-5]。

从这一角度看,精诚修养并不反技术,而是要求技术能力与伦理责任相互支撑。现代医学越复杂,医生越需要在专业判断和人文解释之间建立联系。缺乏解释的专业判断,容易被患者感受为强制;缺乏专业支撑的人文关怀,也容易流于空泛。精诚修养的现代价值,正在于把技术能力、伦理态度和沟通责任统一起来^[3-4]。

(三) 慎独修养:以自我约束回应医疗权力不对等。

医患关系天然存在知识和权力不对等。医生掌握专业知识、诊疗判断和制度资源,患者则常常处于信息弱势、身体弱势和情境弱势。医生的语言、态度、解释方式和治疗建议,都会深刻影响患者对疾病的理解和对方案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医疗并不是纯粹中性的技术活动,而是包含权力结构的关系实践^[2,4]。

传统医者修养中的慎独、自省和敬畏,可以转化为现代医疗中的权力自觉。慎独并不只是个人道德修身,而

是要求医者在无人监督或患者难以判断时,仍然保持审慎、诚实和克制。现代医疗中的慎独,意味着医生要意识到自身专业优势可能带来的沟通支配,避免以专业权威压制患者表达,避免以善意替代患者选择,也避免因流程压力而忽视患者的理解需求^[2-3]。

因此,慎独修养的现代价值,在于将医者的自我修养转化为对医疗权力的自觉约束。医生并不是因为拥有知识优势而自然获得伦理正当性,恰恰因为拥有知识优势,才更需要在沟通、解释和决策中保持谦抑。医者修养在这里不只是“修己”,更是对患者脆弱处境的体察和对自身权力位置的反思^[2,4]。

(四) 调和修养:以整体观理解患者生命处境。

中医药文化强调整体观、辨证思维、形神合一、因人制宜和身心调和。这些内容通常被理解为中医诊疗原则,但其背后也包含着对患者个体差异和生命处境的伦理尊重。中医并不把疾病理解为孤立发生于某一器官或组织的事件,而是强调身体、情志、生活方式、环境变化和个体体质之间的关联^[6]。

这种整体观为现代医患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患者的疾病并不只是病理事件,也常常是生活事件、家庭事件和意义事件。一个失眠患者的症状,可能与工作压力、家庭关系、情绪状态和生活节律相关;一个慢病患者的依从性,可能与经济能力、照护资源和健康信念相关;一个肿瘤康复患者的焦虑,可能与死亡恐惧、家庭责任和未来想象相关。医生如果只看到疾病指标,就难以理解患者真正面对的困境^[5,8]。

调和修养的现代价值,在于使医者不只关注疾病本身,也关注患者所处的身心关系和生活网络。这一点与叙事医学具有内在关联。叙事医学强调通过患者故事理解其生命处境,中医药文化则为这种理解提供了整体性视角。二者结合,有助于医患关系从单纯的治疗关系,转向更具理解性和支持性的关系实践^[6-8]。

二、医者修养在现代医患关系中的转化限度。

传统医者修养具有重要价值,但如果不经现代转换,也存在明显限度。现代医疗关系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诊疗关系,患者权利、医疗风险、家庭参与、制度压力和共同决策等因素,使医患关系呈现出更复杂的伦理结构^[1-3]。仅依靠医生个人修养,难以充分回应这些变化^[7-9]。

(一) 从“医者中心”到“患者主体”的张力。

传统医者修养多从医生一侧提出要求,强调医生应当仁爱、精诚、慎独、审慎施治。这种伦理结构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医生确实在医疗关系中承担重要责任。然而,现代医患关系强调患者也是表达主体、价值主体和行动主体^[2-4]。患者并不是等待医生施善的被动对象,而是有权表达自身经验、理解治疗方案、参与医疗决策的主体^[2-3]。

如果只强调医者仁爱,而忽视患者主体性,传统医德便可能滑向“善意的家长主义”。医生可能出于善意替患者决定,却未充分了解患者的真实意愿;可能认为自己“为患者好”,却忽略患者对生活质量、治疗风险和家庭负担的独特判断;可能强调自身责任,却压缩患者表达和选择的空间^[9]。

因此,医者修养不能替代患者主体性。仁爱只有经由主体尊重,才能成为现代医学伦理资源。现代医患关系中的医生责任,不只是替患者判断什么是好,还包括帮助患者理解何为可能、何为风险、何为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支持患者参与决策^[3,5,10]。

(二) 从“单向施治”到“共同决策”的张力。

传统医疗关系中,医生往往承担主要诊疗判断责任。患者对医学知识了解有限,通常依赖医者判断。这种结构在某些情境下仍然存在,但现代医疗已经越来越多地面对多种治疗选择和复杂价值权衡。同一种疾病可能存在保守治疗、手术治疗、药物治疗、康复调养等不同方案;不同方案又涉及疗效、风险、费用、生活质量和患者偏好等因素^[3,5,10]。

在这种情况下,医患关系不再只是医生单向施治,而是需要共同决策。共同决策并不意味着患者替代医生作专业判断,也不意味着医生放弃专业责任。它要求医生将专业判断转化为患者能够理解、比较和参与的沟通过程,也要求患者表达自己的价值偏好、生活处境和风险承受能力^[3,10-11]。

中医药治疗尤其强调辨证施治、长期调养和生活方式改变,这更需要患者参与。若患者不能理解治疗逻辑,不能接受调养要求,不能在生活中持续执行,治疗方案便难以真正落地^[6]。因此,现代医患关系不是医者修养的单向施予,而是医生专业判断与患者价值选择之间的协商过程^[3,10-11]。

(三) 从“个人修养”到“制度支持”的张力。

传统医德强调医生个体修养,这是医患关系的重要基础。但现代医疗是高度组织化、流程化和制度化的实践。医生是否有时间倾听患者,受门诊量、绩效压力和流程安排影响;医生是否接受沟通训练,受医院培训体系影响;

患者经验是否能够进入服务改进,受患者反馈机制和质量管理制度影响^[10,12-13]。换言之,医患关系的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医生个人品格。

如果将医患关系问题全部归结为医生个人修养不足,容易遮蔽制度因素。一个有仁心的医生,如果长期处于超负荷门诊、极短诊疗时间和高强度绩效压力之下,也难以持续进行充分沟通。相反,一个制度良好的医疗环境,可以通过合理流程、沟通培训、患者反馈、投诉复盘和人文评价,为医生的人文实践提供支持^[1,13-14]。

因此,现代医患伦理不能只依赖个体修养,还需要制度安排为人文实践提供稳定条件。医者修养只有进入制度化场景,才能从个体美德转化为可持续的关系实践^[1,9,14]。

(四)从“患者个体”到“关系网络”的张力。

中国医疗实践中的患者,常常并不是孤立个体。家属参与病情理解、治疗决策和照护安排,是中国医患关系的重要特征。患者的治疗选择可能受家庭经济状况、亲属意见、照护能力和社会角色影响;患者本人的意愿也可能与家庭期待存在张力。医生面对的并非单一患者,而是由患者、家属、照护者和医疗机构共同组成的关系网络^[8-9,11]。

传统医德如果仅被理解为医生对患者个人的仁爱,仍不足以解释这种复杂关系。现代中国医患伦理需要从个体伦理扩展为关系伦理。所谓关系伦理,并不是简单强调“关系和谐”,而是关注不同主体在具体关系中的表达、理解、协商和责任分担。医生需要尊重患者本人意愿,也需要理解家庭照护结构;需要回应家属关切,也不能让家属意见遮蔽患者主体;需要进行专业解释,也需要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价值差异^[8-9,11]。

由此可见,传统医者修养在现代医患关系中仍有价值,但必须完成从个人修养到关系伦理的转向^[7,9]。

三、叙事医学介入医患关系的作用机制

叙事医学为传统医者修养转向关系伦理提供了方法中介。它并不只是“讲故事”或“写故事”,而是通过倾听、理解、回应和协商,把患者经验纳入医疗实践,使医患关系从单向诊疗走向关系生成^[6-7,15]。

(一)倾听机制:从症状询问到生命表达。

问诊是医疗活动的重要环节。传统问诊重视症状、病程、体征、既往史等信息采集,中医问诊还关注寒热、饮食、睡眠、情志、二便等内容,具有较强的整体性。然而,叙事医学进一步拓展了问诊的内涵,使其从症状询问走向生命表达^[6-7]。

叙事化倾听并不是让医生脱离医学问题进行无边界交谈,而是在诊疗需要的范围内,关注患者如何理解自己的疾病、疾病如何改变其生活、患者最担心什么、对治疗有什么期待和疑虑、家庭照护条件如何^[7,12,15]。医生不仅问“哪里不舒服”,也要理解“疾病对你意味着什么”;不仅问“症状持续多久”,也要关注“疾病如何影响你的生活”;不仅问“用过什么药”,也要了解“你对治疗最担心什么”。

倾听机制的意义在于,它使患者不再只是信息提供者,而成为经验表达者。医患关系中的伦理转向,首先发生在倾听之中。没有倾听,仁爱容易停留于医生自我理解中的善意;有了倾听,医生才能真正进入患者的生命处境^[6-7,15]。

(二)理解机制:从病理说明到疾病经验理解。

医生当然需要解释疾病机制、诊断依据和治疗方案,但患者真正经历的并不只是病理变化。疾病可能改变患者的工作、家庭、身份、情绪和未来想象。患者的焦虑、沉默、犹豫、抗拒或过度依赖,并不一定是“不理性”或“不配合”,而可能是恐惧、误解、经济压力、家庭责任和生命不确定性的表达^[2,7,9]。

叙事医学的价值,在于帮助医生从患者叙述中理解其疾病经验。患者说“我怕这个病拖累家人”,其核心未必只是疾病恐惧,也可能是家庭责任焦虑;患者拒绝某种治疗,未必只是缺乏医学知识,也可能是对副作用、费用或生活质量的担忧;患者反复询问疗效,可能并非不信任医生,而是面对不确定性时寻求安全感^[7,9,11]。

叙事理解使医生从“看见疾病”进一步走向“看见患病之人”。这种理解不是对医学判断的替代,而是对医学判断的补充。只有理解患者的生活世界,医生才能更准确地解释方案、回应顾虑和支持治疗^[6-7,15]。

(三)回应机制:从情感共情到行动支持。

共情是叙事医学的重要内容,但共情不能停留于情绪感染和温情表达。真正的共情并不是医生简单地“我理解你”,而是将理解转化为具体照护行动。患者需要的不仅是被安慰,也需要被解释、被支持、被协助和被持续关注^[6-7,14]。

叙事回应包括多个层面。首先是解释回应,即医生用患者能够理解的语言说明病情、风险和治疗逻辑。其次

是情境回应,即医生根据患者年龄、文化背景、家庭条件和心理状态调整沟通方式。再次是协助回应,即在患者遇到调养困难、依从性问题或家庭照护压力时,给予具体支持。最后是持续回应,即通过随访、复诊和反馈机制,让患者感受到照护关系并未在一次诊疗后终止^[12-14]。

因此,共情的伦理意义不在于情绪共鸣本身,而在于将理解转化为照护行动。叙事医学使医者修养从内在情感转向外在实践,使“仁心”通过解释、协商和支持获得具体表达^[6-7,14]。

(四) 协商机制:从医者判断到共同决策。

叙事医学把医生的专业知识、患者的经验知识和家庭的照护知识放在同一沟通场域中。医生提供医学判断,患者表达疾病经验和价值偏好,家属提供照护条件和家庭支持信息。三者共同影响治疗方案能否被理解、接受和执行^[3,10-11]。

协商机制尤其适用于中医药诊疗。中医治疗常常涉及长期调养、饮食起居、情志调适和生活方式改变。这些内容如果不能与患者生活实际结合,就难以持续实施^[6]。医生不能只告诉患者“应该怎么做”,还需要了解患者“能不能做到”“为什么难以做到”“需要什么支持才能做到”。这种协商并不削弱医生专业性,而是使专业判断更具现实可行性^[3,10-11]。

协商机制是关系伦理在临床层面的具体体现。它使医生不再只是治疗方案的发布者,患者也不再只是方案的执行者,而是在专业判断、疾病经验和生活条件之间共同寻找可行路径的参与者^[3,9-10]。

四、从医者修养到关系伦理的理论转化

从医者修养到关系伦理,并不是对传统医德的否定,而是其当代表达方式的转换。传统医者修养强调医生应具有仁爱、精诚、慎独和整体关怀;关系伦理则进一步强调这些修养如何进入医患互动、家庭参与和制度支持之中。其理论转化可从价值、认知、关系和责任四个维度展开^[6,9,17]。

(一) 价值维度:从仁心仁术到主体尊重。

仁心仁术强调医生对患者的善意和责任,是传统医德的重要表达。但在现代医患关系中,仁爱不能停留于医生单方面的施善,而应转化为对患者主体的尊重。患者不是医生仁爱的对象,而是具有表达权、理解权、参与权和选择权的医疗主体^[2-3]。主体尊重并不意味着取消医生专业责任,也不是将所有决定完全交给患者。相反,它要求医生以更负责任的方式帮助患者理解病情、判断风险、明确选择。医生的仁爱不是替患者决定,而是支持患者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参与决定;医生的责任不是压制患者表达,而是使患者表达成为诊疗理解的一部分^[3,5,10]。

因此,仁心仁术只有转化为主体尊重,才能成为现代医患伦理资源。没有主体尊重的仁爱,可能成为善意的支配;具有主体尊重的仁爱,才能转化为现代关系伦理^[2,9]。

(二) 认知维度:从辨病施治到叙事理解。

医患伦理不只是态度问题,也是认知问题。医生如何理解患者,决定医生如何对待患者。如果医生只看到疾病,就容易忽视患者生活处境;如果医生能够理解患者叙事,就能更好识别其顾虑、期待、家庭压力和依从性问题^[6-7,17]。中医辨证思维与叙事医学在此具有内在相通性。辨证思维强调从复杂现象中把握整体关系,叙事医学强调从患者故事中理解疾病经验。二者都提醒医生,临床判断不能只依据孤立指标,也要理解具体患者的整体处境^[6,17]。

关系伦理首先是一种理解伦理。医生对患者的尊重,不仅体现在态度上,也体现在认知方式上。真正尊重患者,就不能把患者简化为病种、指标或治疗对象,而要理解其作为具体生命主体所处的关系和处境^[2,6]。

(三) 关系维度:从医患二元到患者—家庭—医生共同体。

现代中国医患关系具有明显的关系性和家庭参与特征。患者故事常常包含家属故事,患者选择常常受到家庭照护、经济条件和亲属意见影响。医生面对的不是抽象的“患者个体”,而是患者—家庭—医生共同参与的关系场域^[8-9,12]。关系伦理不是简单强调“医患平等”,而是在具体关系网络中实现尊重、沟通和协商。医生需要尊重患者本人意愿,也要理解家庭照护结构;需要回应家属的焦虑和关切,也要避免患者主体性被家庭意见淹没;需要协调治疗目标和生活条件,也要在必要时帮助患者及家属理解疾病的不确定性^[2,8,11]。

从医患二元走向患者—家庭—医生共同体,并不是扩大医患关系的复杂性,而是承认医患关系本来就处在复杂关系之中。叙事医学的作用,正是把这种复杂关系显现出来,使医生能够在关系中理解患者,在协商中支持患者^[7,9,17]。

(四) 责任维度:从个体修养到共同责任。

关系伦理不是否定医生个人修养,而是把医生个人修养放入医患互动和制度安排之中。现代医患关系中的责任并不只属于医生,也不只属于患者,而是由医生、患者、家属和医疗机构共同承担^[1,9,14]。医生承担专业解释、诊疗判断和照护责任;患者参与健康决策和行为改变;家属提供照护支持和情感支持;医院提供沟通条件、制度

保障和质量改进机制。只有这些责任能够相互衔接,医患关系才可能从单向要求走向共同承担^[12,14,16]。

因此,关系伦理的成熟形态,是个体修养、医患互动和制度责任的统一。医者修养是基础,叙事理解是方法,关系协商是过程,责任共担是目标^[1,7,9]。

五、中医药文化视域下医患关系叙事转向的实践进路

医患关系的叙事转向不能停留在理论表达中,而应进入临床沟通、共同决策、医学教育和医院治理等具体场景。实践进路的提出,并不是将理论简化为操作流程,而是说明关系伦理如何获得现实支撑^[7,17]。

(一) 临床沟通进路: 建立叙事化问诊机制。

中医问诊本身具有较强叙事性,但在现代医疗流程中,问诊仍容易被压缩为信息采集。叙事化问诊要求医生在关注症状、病程和用药的同时,进一步关注患者对疾病的理解、情绪反应、家庭影响、治疗期待和生活调养条件^[6-7,15]。叙事化问诊可以围绕若干问题展开:疾病如何影响你的生活?你最担心的是什么?你对中医治疗有什么期待?你在生活调养上遇到什么困难?家人如何参与照护?这些问题并非临床之外的闲谈,而是理解患者经验、判断治疗可行性和促进医患信任的重要入口^[7,15]。叙事化问诊使中医问诊从“问病”扩展为“问人、问境、问关系”。它并不是增加医生负担,而是在关键节点上提高沟通质量,使医生更准确地理解患者处境,也使患者更愿意参与治疗^[6,14-15]。

(二) 共同决策进路: 建立解释—协商—共担机制。

共同决策是关系伦理的重要实践方式。中医药诊疗强调辨证论治和调养配合,更需要患者理解治疗逻辑并参与健康行动。因此,应建立解释—协商—共担机制^[3,6,10]。所谓解释,是医生用患者能够理解的语言说明病情、辨证逻辑、治疗方案和调养要求。所谓协商,是医生与患者、家属讨论不同选择的可行性,包括治疗方式、调养计划、生活节律、服药习惯和复诊安排。所谓共担,是医生承担专业责任,患者参与健康行动,家属提供照护支持,医疗机构提供制度保障^[3,10-11]。共同决策不是让患者替代医生判断,而是让医学判断获得患者理解、认同和参与。只有当患者理解方案为何如此、自己需要如何配合、家属如何支持时,治疗才更可能成为一种持续的共同实践^[3,11-12]。

(三) 医学教育进路: 将传统医德转化为叙事能力训练。

传统医德教育常常以经典背诵、价值宣讲和案例感化为主,这些方式具有必要性,但如果缺少能力训练,医德教育容易停留于抽象层面。医德教育的现代转化,不是弱化价值教育,而是为价值教育提供方法支撑^[1,17-18]。医学教育可通过中医医案叙事阅读、平行病历写作、患者故事访谈、跟师过程中的医患沟通记录、医患冲突案例讨论和反思写作等方式,训练学生的倾听能力、理解能力、解释能力和价值协商能力。学生不仅要知道“大医精诚”的价值,更要学会在具体医患场景中如何倾听患者、如何回应痛苦、如何解释治疗、如何面对冲突^[7,17-18]。由此,传统医德不再只是价值口号,而成为可训练、可反思、可实践的叙事能力。医者修养的养成,也不再只依赖个人悟性,而可以通过教育过程获得方法化支持^[17-18]。

(四) 医院治理进路: 将医患叙事纳入人文管理。

医患关系改善不能只依赖医生个人努力,也应成为医院人文治理的重要内容。医院可将患者故事、医患沟通案例、投诉案例、随访记录和医务人员反思作为人文管理资源^[1,14,16]。具体而言,医院可以建立患者叙事反馈机制,系统收集患者在就医流程、医患沟通和治疗理解中的真实体验^[16];建设医患沟通案例库,用于培训和质量改进;开展投诉案例叙事复盘,从患者叙述中发现服务痛点和制度问题;将患者体验纳入质量改进,使患者故事成为医院治理的资料来源;开展医务人员叙事能力培训,使医者修养获得组织支持^[13-15]。医院治理中的叙事转向,意味着患者故事不只是宣传材料,而是发现服务问题、理解患者需求和改进医疗过程的重要资料。当医患叙事进入治理过程,关系伦理才可能从理念变为制度化实践^[1,14,16]。

六、医患关系叙事转向的边界与风险

医患关系的叙事转向具有积极意义,但也需要保持必要边界。若缺少反思,传统医德可能被浪漫化,叙事医学可能被形式化,共情可能被表演化,关系伦理也可能停留于空泛表达^[7,17,20]。

(一) 防止传统医德浪漫化。

传统医德具有重要价值,但不能被直接等同于现代医学伦理。不能用“仁心仁术”替代患者权利,不能用“医者父母心”遮蔽知情同意,不能以传统文化为家长式决策辩护。传统医德的现代价值,不在于复古,而在于经过现代伦理转换后继续发挥作用^[2,9,19]。因此,对中医药文化的运用应保持双重态度:既要看到其生命关怀、整体理解和医者修养价值,也要看到其需要与现代患者权利、共同决策和制度规范相衔接。只有经过现代转化,传统医德才不会成为对现代伦理问题的简单遮蔽^[2,6,19]。

(二) 防止叙事医学形式化。

叙事医学不能变成讲故事、写征文、做宣传。故事只是载体，不是目的。叙事医学的核心是理解患者经验、改善沟通和支持决策。如果缺少临床回应和制度改进，叙事容易沦为形式^[7,17,20]。形式化的叙事医学甚至可能消解医学人文的严肃性。当患者故事只被当作宣传素材，而不能转化为服务改进；当平行病历只成为写作比赛，而不能改变医生对患者的理解；当叙事活动只停留在感动层面，而不能进入临床流程，叙事医学便失去了应有的伦理力量^[17,20]。

（三）防止共情表演化。

共情不是温情表态，也不是医生展示道德优越感。共情如果只停留于“我理解你”的表达，而不回应患者真实困境，就可能成为表演式沟通。真正的共情必须落实为解释、帮助、协商和支持^[6-7,14]。医生的共情应当具有行动性。它要求医生回应患者疑虑，解释治疗方案，尊重患者选择，关注患者生活条件，并在必要时调整沟通方式。共情只有转化为行动回应，才具有真正的伦理意义^[6,14-15]。

（四）防止关系伦理空泛化。

关系伦理不能停留在“医患平等”“互相尊重”等口号中。关系伦理需要具体机制承载，如知情同意、风险沟通、共同决策、患者参与、隐私保护、患者体验评价和投诉反馈机制。没有制度支撑，关系伦理容易成为抽象概念^[3,19,21]。因此，医患关系的叙事转向必须进入临床流程和医院治理。只有当倾听有时间保障，沟通有培训机制，患者表达有反馈渠道，共同决策有制度支持，叙事医学和关系伦理才能真正获得现实基础^[13-14,21]。

七、结语：传统医者修养的当代表达与医患关系的叙事转向

传统医者修养仍是中国医学人文的重要资源，但其现代意义不在于简单复述传统医德，而在于转化为能够回应现代医患关系的伦理资源。仁爱、精诚、慎独和整体关怀，不应停留于医生个人品格层面，而应进入医患沟通、共同决策、医学教育和医院治理之中^[1,6,17]。

叙事医学为这种转化提供了方法中介。通过倾听、理解、回应和协商，传统医者修养可以从医生单方面的道德要求，转向医患之间的理解生成、关系协商和责任共担。医者的仁爱不再只是内在情感，而体现为对患者经验的倾听；医者的精诚不再只是专业能力，而体现为可理解、可信任的解释；医者的慎独不再只是个人修身，而体现为对医疗权力的自觉约束；医者的调和不再只是诊疗原则，而体现为对患者生命处境的整体理解^[6-7,9]。

从医者修养到关系伦理，并不是传统医德的失效，而是其当代表达方式的转换；从仁心仁术到叙事转向，也不是话语层面的更新，而是医患伦理从单向施善走向相互理解、关系协商和责任共担的过程。中医药文化视域下医患关系的叙事转向，既为叙事医学本土化提供了新的理论空间，也为现代医学人文建设提供了具有中国文化根基的伦理进路^[17-18,20,24]。

参考文献

- [1] 高川, 周俞余, 郭旭芳, 等. 医学人文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J]. 协和医学杂志, 2022, 13(1): 152-157.
- [2] 张霄翎, 程旺. 医患共同决策中患者主体性的缺失与寻回[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3, 36(9): 965-969.
- [3] 房志敏, 猴一鸣. 患者参与医患共同决策的思考[J]. 医学与哲学, 2024, 45(10): 20-24.
- [4] 袁香儿, 赵睿雯, 朱冬青. 医患个体特征影响共享决策的心理路径: 基于内隐原型视角[J]. 心理科学进展, 2023, 31(6): 1044-1054.
- [5] 叶康丽, 徐志杰, 杜亚平, 等. 应对未分化疾病: 从过度诊断走向医患共同决策[J]. 中国全科医学, 2020, 23(36): 4541-4547.
- [6] 王昊, 韩佳桐, 王子旭, 等. 叙事医学语境下中医学的仁爱精神[J]. 现代中医临床, 2023, 30(2): 49-53.
- [7] 房志敏, 猴一鸣. 患者参与视角下的叙事医学实践反思[J]. 中华高血压杂志(中英文), 2024, 32(11): 1095-1099.
- [8] 马晴雅, 王斗, 张欢, 等. 护士对老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参与临床决策认知的质性研究[J]. 中华护理杂志, 2022, 57(11): 1345-1350.
- [9] 晏珑文. 医患关系中个人自主的局限与突围: 关怀伦理对医疗决策的启示[J]. 医学与哲学, 2022, 43(20): 41-45.
- [10] 翁冰冰, 陈文, 蒋虹丽. 医患共同决策模型及实践应用进展[J]. 医学与哲学, 2023, 44(5): 21-25.
- [11] 杨林宁, 郑红颖, 赵丹, 等. 医生对医患共享决策认知的质性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22, 25(10): 1213-1219.
- [12] 赵铁夫, 王娜, 彭洁, 等. 医患共同决策对患者家属诊疗期望值及满意度的影响[J]. 医学与哲学, 2024, 45(10): 25-27.
- [13] 邓黎黎, 廖晓阳, 伍佳, 等. 国外医患沟通模式对我国全科医生沟通技能培训的启示[J]. 中国全科医学, 2021, 24(13): 1684-1689.
- [14] 邵建文, 李群, 王锦帆. GLTC 医患沟通方案干预住院患者效果分析[J].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20, 36(11): 934-938.
- [15] 邵建文, 谭港锐, 王梦婷, 等. 门诊经验沟通与 GLTC 沟通对门诊医生情绪状态及沟通细节影响的比较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24, 27(16): 1956-1961.
- [16] 许洛, 胡银环, 冯显东, 等. 我国公立医院应用人工智能改善患者体验的典型案例分析[J]. 健康发展与政策

研究, 2024, 27(4): 301-307.

[17] 金贞爱. 关于儿科学发展融入叙事医学理念的思考[J].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024, 26(4): 325-330.

[18] 张睿, 许亮, 李嘉鑫, 等. 健康人文潜力之医学动画: 叙事医学与医学动画交叉融合的创新教育[J].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2025, 56(3): 887-892.

[19] 陈化. 知情同意临床实践的伦理隐忧及其消解[J]. 医学与哲学, 2024, 45(20): 11-16.

[20] 中华预防医学会叙事医学分会. 平行病历质量评价专家共识 (2025) [J]. 医学与哲学, 2025, 46(2): 79-80.

[21] 常娜, 牛树敏, 毛姝然, 等. 患者多次投诉影响因素分析[J]. 医学与哲学, 2024, 45(8): 48-52.

[22] 朱伟俊, 崔文彬, 魏明月, 等. 基于患者视角的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发展路径[J]. 中国卫生资源, 2023, 26(4): 388-392.

[23] 厉欣怡, 陈烨, 彭红, 等. 项目制模式提升患者就医体验创新实践[J]. 中华全科医学, 2025, 23(8): 1415-1419.

[24]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印发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 (2021—2025 年) 的通知: 国卫医发〔2021〕27号[EB/OL]. (2021-10-14)[2026-05-06].

From Physician Self-Cultivation to Relational Ethics: The Narrative Turn of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ZHOU Gui-yang¹; YE Lu¹; CHEN De-chao¹; HUANG Ying-an¹; SHI Yu-feng¹; HE Li-ming¹; WU Guang-shan¹; PAN Yun-lin¹; WU Li-sha²

(1 Shenzhen Bao'an Pure TCM Treatment Hospital,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2 Longgang Central Hospital of Shenzhen,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 of physician self-cultiv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e embodies rich ethical resources, including benevolence, professional sincerity, self-discipline, and holistic care. It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humanities in China. However, the moder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s no longer a one-way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centered on the physician. Instead, it has become a complex relational practice involving physicians, patients, families, and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If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is understood merely as the personal virtue of physicians, it may fail to respond adequately to contemporary ethical demands such as patient subjectivity, shared decision-making, family particip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CM cultu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valu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physician self-cultivation and its limits in modern doctor - patient relationships. It argues that narrative medicine can serve as a methodological bridge for transforming physician-centered moral cultivation into relational ethics. Through listening, understanding, response, and negotiation, narrative medicine incorporates patients' illness experiences, life contexts,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value preferences into clinical practice. In this way, traditional medical virtues can be transformed from unilateral moral requirements into mutual understanding, relational negotiation,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 between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proposes four practical pathways: clinical communication, shared decision-making, medical education, and hospital governance. It also emphasizes the need to avoid romanticizing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formalizing narrative medicine, performing empathy superficially, and reducing relational ethics to empty rhetoric. The narrative turn of doctor - patient relationshi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CM culture may contribute to the localization of narrative medicine and provide an ethically grounded pathway for contemporary medical humanities in China.

Keywords: Physician self-cultivation; relational ethics; narrative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shared decision-making; medical humanities

中医药文化视域下叙事医学本土化建构研究

周贵阳¹, 叶璐¹, 陈德超¹, 黄颖安¹, 石玉丰¹, 贺利敏¹, 伍广山¹, 潘韞琳¹, 吴丽莎^{2*}

(1.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 广东 深圳 518101; 2.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广东 深圳 518116)

摘要: 叙事医学进入中国后, 已由概念引介转向临床实践与规范建构, 但其本土化仍面临理论根基不足、文化资源转化不充分、实践路径和评价机制不清等问题。中医药文化蕴含生命整体观、身心一体疾病观、仁心仁术伦理、辨证论治思维和治未病智慧, 可为叙事医学中国化提供重要资源。本文从中医药文化视域出发, 阐释叙事医学本土化的理论逻辑, 提出以患者生命经验整体理解为核心, 构建价值重塑、知识重组、方法转化和制度嵌入相统一的实践框架, 并从临床诊疗、医学教育、文化传播、医院治理和效果评价等方面提出实现路径, 以期推动叙事医学从理念倡导走向具有中国医学人文特色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 中医药文化; 叙事医学; 医学人文; 本土化; 医患关系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25 年度中医药监测统计研究课题 (C-109); 广东省医院管理研究所 2025—2026 年度专项课题 (GDXYGS2025068); 深圳市宝安区医学会医疗卫生科研项目 (BAYXH2024042); 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启航人才培养项目 (2024—2026 年)。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25

引言: 从叙事医学引介到中国医学人文范式建构

现代医学以实验科学、技术理性和循证方法为基础, 极大提升了疾病诊断、治疗和管理能力。然而, 技术能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患者生命经验的充分呈现, 也不必然自动生成医患之间的信任、理解和共同决策。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痛苦、恐惧、期待、家庭关系、文化信念和生命意义, 往往难以被单纯的生理指标、诊疗流程和技术方案完整容纳^[1]。叙事医学正是在这一现代医学人文张力中兴起的, 它通过叙事能力的培养, 使医者能够认识、吸收、解释并回应患者关于疾病与生命处境的故事。Rita Charon 早期将叙事医学界定为一种以“叙事能力”为基础的医学实践, 强调医生应能够承认、吸收、解释并回应他人的疾病故事和困境, 从而实现更具尊重、共情和信任的医疗照护^[2]。

国际叙事医学研究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 已经从理论倡导拓展至临床实践、医学教育和患者照护等领域。2024 年一项范围综述将叙事医学研究归纳为理论、临床实践、教育培训三类, 并指出叙事医学并非循证医学的替代物, 而是通过故事、沟通和经验理解, 将医生的临床知识与患者的疾病体验连接起来。该综述同时提示, 叙事医学未来仍需进一步发展可测量指标、实践路径和效果评价方法^[3]。这表明, 叙事医学的前沿问题已经不只是“为什么需要叙事”, 而是“如何将叙事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价、可推广的医学人文实践”。

在中国语境中, 叙事医学的发展也已进入新的阶段^[4-6]。《中国叙事医学专家共识 (2023)》指出, 目前中国叙事医学实践者对叙事医学的理解仍存在分歧, 实践既缺乏宏观指导, 也缺乏统一方案, 因此需要通过共识推动规范化实践、研究和发展^[6]。2025 年《中国医院叙事医学实践专家共识》进一步指出, 2023 年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叙事医学“做什么”的问题, 但医院层面仍存在“如何实施”的实践需求^[7]。由此可见, 叙事医学在中国已经从概念引介进入体系建构阶段, 其核心任务是形成符合中国医学文化传统、医疗实践结构和患者生活世界的本土化理论与方法^[4-5, 7]。

与此同时, 中医药文化的现代转化也面临从“文化传播”走向“实践转化”的内在要求。《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强调, 要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精髓, 阐明中医药学的哲学体系、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 并推动中医药文化融入大众生活、贯穿国民教育^[8]。《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 (2024—2027 年)》则提出, 要加强医学人文关怀、增进医患交流互信、改善医患关系, 并将医学人文关怀贯穿医学生培养全过程和医

作者简介: 周贵阳 (1993 -), 男, 硕士研究生, 法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卫生应急管理, 中医药管理, 医院管理;
通讯作者: 吴丽莎 (1991 -), 女, 硕士研究生, 公共卫生硕士, 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与卫生政策研究。

务人员职业全周期^[9]。这些政策导向共同提示：中医药文化不应仅被理解为传播对象和文化符号，也可以成为改善医学实践、重构医患关系和提升患者体验的重要人文资源。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叙事医学为什么需要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本土化建构？第二，中医药文化能够为叙事医学本土化提供哪些理论资源？第三，如何以中医药文化为基础，构建叙事医学中国化、本土化和实践化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5,10]？本文认为，中医药文化视域下的叙事医学本土化，实质上是中国医学人文实践范式的再建构。它不是将西方叙事医学概念直接移植到中国，也不是将中医药文化作为装饰性元素附加于叙事医学，而是在中国医学文化传统和现实医疗场景中，对叙事医学的价值基础、认知方式、伦理结构、实践机制和制度路径进行系统重构^[10]。

一、叙事医学本土化建构的现实语境与问题转换

（一）技术医学发展中的人文张力

现代医学以技术理性为重要特征。疾病被转化为可以观察、测量、诊断和干预的对象，人体被分解为器官、组织、细胞、基因和生物指标，医疗实践也被纳入标准化、流程化和效率化的管理体系^[1]。这种技术医学模式对于提升诊疗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其局限也逐渐显现：患者容易被还原为疾病载体，痛苦容易被简化为症状信息，医患互动容易被压缩为病情询问、检查安排和治疗告知^[1,11-12]。

叙事医学所回应的，正是技术医学中患者主体经验被遮蔽的问题。患者遭遇疾病时，所经历的并不只是生理异常，更包括生活秩序的中断、社会角色的改变、家庭关系的重组、未来预期的动摇以及生命意义的追问。医学若只处理疾病，而不能理解患病之人，就难以真正回应患者的整体需求。叙事医学通过患者故事进入其生活世界，使医学实践从“解释疾病”进一步走向“理解病人”^[2-3,11]。

需要指出的是，叙事医学并不是技术医学的对立面，也不是对循证医学的否定。其价值在于补足技术医学难以充分触及的经验维度、关系维度和意义维度。换言之，叙事医学不是要用故事替代证据，而是要使证据能够在患者具体生命处境中被理解、接受和转化为行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叙事医学成为现代医学人文的重要方法^[3,11]。

（二）叙事医学中国化发展的阶段性转向

叙事医学进入中国后，大致经历了概念引介、教育应用、临床探索和规范建构几个阶段。早期研究主要围绕西方叙事医学理论、叙事能力、平行病历、反思写作等展开，重点在于说明叙事医学之于医学人文教育和医患沟通的价值^[4-5,13]。随后，叙事医学逐渐进入医学院校课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护理实践、肿瘤照护、安宁疗护和医院文化建设等领域^[14-17]。

近年来，国内叙事医学发展呈现出两个明显转向。其一，是从理论引介转向规范建构。《中国叙事医学专家共识（2023）》形成 21 条共识，内容涉及叙事医学的概念和价值、叙事医学实践、叙事医学研究等方面。人民日报海外版对该共识发布的报道也指出，这一共识被视为我国叙事医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6,13]。其二，是从个体实践转向医院运行。2025 年《中国医院叙事医学实践专家共识》把医院层面的叙事医学实施问题进一步具体化，提示叙事医学需要组织保障、实践应用和评价方法的支撑^[7]。

然而，规范化并不意味着本土化已经完成。当前中国叙事医学仍需进一步回答：其理论基础如何与中国医学文化传统相衔接？其方法体系如何嵌入中国医疗场景？其伦理结构如何回应中国家庭参与式医疗和“患方”结构？其临床实践如何与中医诊疗、慢病管理、健康促进和医院治理相结合？这些问题决定了叙事医学能否真正从“引进来的理论”转变为“长出来的方法”^[5,10,13]。

（三）中医药文化现代化中的实践化需求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包含医药知识和诊疗技术，也包含理解生命、疾病、健康和医患关系的文化方式。长期以来，中医药文化传播多侧重知识普及、文化展示、名医故事、非遗保护、校园活动、社区科普等内容。这些工作对于增强公众中医药文化认同具有积极意义，但若仅停留在展示性和宣传性层面，中医药文化就难以充分转化为现代医学实践中的人文资源^[8,18-20]。

中医药文化现代转化的关键，是使其从“被传播的文化内容”进一步转化为“可参与医学实践的方法资源”。中医药文化中的整体观、辨证思维、情志理论、体质观念、治未病思想、医德传统和医案叙事，不仅能够用于文化传播，也能够进入患者沟通、疾病解释、慢病管理、康复调养、医学教育和医院治理。尤其是在中医医院和中医药院校中，中医药文化与叙事医学的结合具有天然场景基础^[10,19,21]。

《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7 年）》明确提出，要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

“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推动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并提出持续提升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18]。这意味着，中医药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在于传统文化传承，更在于通过文化认同、健康叙事和行为转化，参与健康中国建设^[18,21-22]。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的问题意识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为中医药文化与叙事医学的结合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仍存在四方面不足^[4-5,10]。第一，叙事医学研究存在“引介多、建构少”的问题。许多研究主要介绍西方叙事医学理论，强调其对医学教育和医患沟通的启示，但对叙事医学如何在中国医学文化内部生成自身话语体系讨论不足^[5,13]。第二，中医药文化研究存在“传播多、转化少”的问题。相关研究多关注中医药文化如何传播、如何普及、如何增强文化认同，但较少讨论中医药文化如何转化为临床沟通、患者照护和医院人文治理的方法资源^[8,19-20]。第三，二者结合存在“意义阐释多、机制分析少”的问题。不少研究强调中医药文化与叙事医学具有相通性，但对这种相通性如何转化为结构性框架、操作性流程和制度性机制，仍缺乏深入分析^[10,23]。第四，实践探索存在“活动化多、制度化少”的问题。叙事医学容易被简化为征文、演讲、故事会、平行病历比赛等活动形式，尚未充分进入临床流程、教育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价机制^[13,15,17]。

因此，本文的问题意识不在于一般性论证“中医药文化与叙事医学可以结合”，而在于进一步追问：中医药文化如何作为理论资源参与叙事医学中国化、本土化和实践化的系统建构？这一问题的提出，决定了本文不是一篇“融合意义”式论文，而是一篇“本土化建构”式论文^[10,13,23]。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一）叙事医学：从故事书写到疾病经验理解

叙事医学最容易被误解为“讲故事”或“写故事”。事实上，故事只是叙事医学的载体，而非其全部。叙事医学的核心不在于故事形式本身，而在于通过故事理解患者的疾病经验、生命处境和价值世界^[2-3,11]。从认知层面看，叙事医学是一种理解患者经验的方法。它通过患者的叙述，揭示疾病在其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使医生能够看到检查报告之外的患者^[2,11]。从伦理层面看，叙事医学是一种尊重患者主体性的实践。它通过倾听、共情和回应，使患者不再只是被诊断、被治疗、被安排的对象，而成为表达自身经验、参与医疗决策的主体^[23-24]。从临床层面看，叙事医学是一种医疗能力。它要求医务人员能够识别患者故事中的症状线索、情绪困境、价值冲突、家庭支持和治疗期待，并将其转化为更具人文关怀和临床适切性的照护方案^[7,13,24]。

因此，本文将叙事医学界定为：以叙事能力为核心，通过倾听、理解、解释和回应患者疾病故事，将患者生命经验纳入医疗实践，从而改善医患关系、提升照护质量并实现医学人文价值的方法体系^[2-3,11]。

（二）中医药文化：从知识符号到医学人文资源

中医药文化不能被狭义理解为中药知识、针灸技术、养生方法、节气文化、药膳符号或名医故事的简单集合。作为医学文化体系，中医药文化至少包含五个层面^[8,10,19]。其一是哲学层面，包括天人相应、整体观念、形神合一、阴阳平衡等生命理解方式。其二是认知层面，包括辨证思维、动态调节、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等疾病解释方式。其三是伦理层面，包括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医者德性、生命敬畏等医患关系规范。其四是实践层面，包括望闻问切、辨证论治、治未病、调摄养生、康复调养等诊疗与健康实践。其五是文本层面，包括中医经典、历代医案、名医经验、师承记录和患者调养故事等叙事资源^[10,19,25]。

因此，本文所谓中医药文化，并非仅指中医药知识和文化符号，而是指以中医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医患伦理和健康实践为核心的医学文化体系。它既是传统文化资源，也是现代医学人文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10,18-20]。

（三）本土化建构：从理论移植到实践再造

叙事医学本土化不是将西方叙事医学术语翻译成中文，也不是在西方理论外部添加若干中国文化元素。真正的本土化至少包括四重内涵^[5,10,13]。第一，文化翻译。即将叙事医学中的患者故事、叙事能力、平行病历、反思写作、共情回应等概念，放入中国医学文化和医患关系语境中重新解释^[5,10]。第二，问题重构。即不再简单复制西方医学语境中的理论问题，而是回应中国医疗实践中的医患信任、家庭参与、医院治理、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健康促进问题^[7,23-24]。第三，方法转化。即将叙事访谈、反思写作、患者故事分析等方法，与中医问诊、医案叙事、辨证论治、调养随访等实践结合^[10,13,24]。第四，制度嵌入。即推动叙事医学进入医学教育、临床诊疗、医院管理、文化传播和效果评价体系^[7,9,13]。

据此, 本文将叙事医学本土化界定为: 在中国医学文化传统和现实医疗实践中, 对叙事医学的价值基础、知识结构、方法体系和制度路径进行再阐释、再组织和再创造的过程^[5,10,13]。

(四) “价值—认知—伦理—实践—制度”的分析框架

中医药文化视域下的叙事医学本土化, 可以从五个维度展开。价值维度, 关注中医药文化如何重塑叙事医学的生命价值基础。认知维度, 关注中医药文化如何拓展叙事医学对疾病经验的理解方式。伦理维度, 关注中医药文化如何支撑医患关系中的主体尊重、信任生成和责任共担。实践维度, 关注中医药文化如何转化为临床问诊、医学教育、健康传播和慢病管理的方法。制度维度, 关注叙事医学如何进入医院治理、质量改进和评价体系^[10-11,23]。

这一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 它避免将中医药文化与叙事医学的关系简化为一般意义上的“互相启发”, 而是将二者关系置于价值、知识、伦理、实践和制度的整体结构之中^[10,13]。

三、中医药文化作为叙事医学本土化理论资源的内在根据

(一) 生命观根据: 从“疾病中心”走向“生命整体”

叙事医学的基本出发点, 是反对将患者还原为疾病对象。患者不是“一个病例”“一个病种”或“一个指标异常者”, 而是处于家庭、社会、文化和历史关系中的完整生命主体。中医药文化中的整体观、形神合一和天人相应, 为这种完整生命理解提供了深厚资源^[10,11,25]。

中医药文化理解生命, 强调人与自然、身体与精神、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联。疾病并非孤立发生于器官之中, 而是在身体状态、情志变化、生活方式、气候环境和社会关系的交织中显现。与叙事医学相比, 中医药文化更早地将生命置于整体关系之中理解; 与中医药文化相比, 叙事医学则提供了通过患者故事呈现整体生命处境的方法^[10,19,25]。

二者结合的理论意义在于: 中医药文化能够推动叙事医学从“疾病叙事”进一步走向“生命叙事”。疾病叙事关注患者如何经历某种疾病, 生命叙事则进一步关注疾病如何嵌入患者的身体、情感、家庭、社会角色和生命意义之中。中医药文化为叙事医学本土化提供的首要资源, 正是一种超越疾病对象化的生命整体观^[10-11]。

(二) 疾病观根据: 从“病理解释”走向“身心境遇”

叙事医学关注疾病的双重面向: 一方面, 疾病是可以被医学诊断和治疗的病理事实; 另一方面, 疾病也是患者实际经历和解释的生命事件。现代医学能够解释病理机制, 却未必能够充分解释患者如何感受疼痛、如何理解诊断、如何面对治疗、如何处理家庭压力和生命不确定性^[11,23-24]。

中医药文化中的辨证思维、情志理论、体质观念和因人制宜思想, 有助于深化叙事医学对疾病经验的理解。中医诊疗强调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重视症状与体质、情志、饮食、作息、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认知方式提示我们: 患者的症状并非孤立信息, 而是身体状态、生活方式和情绪处境的综合表达^[10,19,21]。

因此, 中医药文化能够推动叙事医学从“听见患者讲述疾病”深化为“理解患者身心境遇”。当患者讲述失眠、疼痛、乏力、焦虑、食欲下降或病后虚弱时, 叙事医学不应只记录其叙述内容, 而应进一步理解这些叙述背后的生活结构、情感关系和健康信念。中医辨证思维恰可成为连接患者故事与临床理解的重要中介^[10,21,23]。

(三) 医患观根据: 从“信息交换”走向“信任生成”

医疗过程并不只是信息交换过程。医生询问病情、患者提供信息、医生给出诊断、患者接受治疗, 这只是医患互动的表层结构。更深层地看, 医患关系是一种信任关系、责任关系和意义关系。患者愿意讲述自身痛苦, 前提是相信医生会认真倾听; 患者愿意接受治疗, 前提是理解并信任医生的判断; 患者愿意参与调养, 前提是其生活处境被看见和尊重^[12,23-24]。

中医药文化中的“大医精诚”“仁心仁术”等医德传统, 为叙事医学本土化提供了伦理资源。但这种资源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传统医德的复述, 而需要进行现代转化。传统医德强调医者德性, 现代叙事医学则进一步强调患者主体性、医患平等沟通和共同决策。二者结合, 应当实现从“医者有德”到“医患共建”的伦理转化^[10,23-24]。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医疗实践中, “患方”往往不仅包括患者本人, 也包括其家庭成员。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中国叙事医学专家共识 (2023)》的报道中提到, 共识主编郭莉萍指出, 中国文化中家庭是患者背后的重要支持力量, 因此叙事医学对象不仅包括患者, 也包括家属和医院管理者等^[6-7]。这一点揭示了中国叙事医学本土化的重要特征: 医患沟通常常不是医生与孤立个体之间的沟通, 而是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庭共同体之间的沟通。

因此, 中医药文化视域下的叙事医学, 应从“信息交换”走向“信任生成”, 从“医生解释病情”走向“医患共同

理解疾病”，从“个体患者叙事”走向“患者—家庭—医生”之间的关系叙事^[7,12,23]。

（四）实践观根据：从“治疗疾病”走向“调摄生命”

叙事医学不只是诊室内部的沟通技术，也关心患者患病之后如何重新安排生活、理解身体、面对不确定性并重建生命秩序。中医药文化中的治未病、养生调摄、康复调养、药食同源等思想，能够显著拓展叙事医学的实践边界^[10,25-27]。

对于慢性病、肿瘤康复、老年病、失眠焦虑、疼痛管理和亚健康状态而言，治疗并不只是一次性消除病因，而是长期的生活调适和身心重建。患者的饮食、起居、运动、情绪、家庭支持和健康信念，都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中医药文化重视日常生活方式和长期调养，恰好能够与叙事医学中的患者日记、康复故事、反思书写和随访叙事结合起来^[18,21,25]。

由此，中医药文化能够使叙事医学从临床沟通方法扩展为健康生活方式建构方法。患者不只是讲述疾病的人，也是参与调养、重建生活和生成健康意义的人^[23,28]。叙事医学本土化的实践价值，也正在于把患者从被动治疗对象转变为主动健康实践主体；这一转化既需要与中医药政策体系和传统医学发展战略相衔接，也需要回应治未病实践与公众中医信任的现实基础^[19,27,29-30]。

四、中医药文化视域下叙事医学本土化建构的理论逻辑

（一）文化逻辑：从外来理论移植到中国医学人文话语生成

叙事医学产生于西方医学人文传统，其理论源头涉及文学批评、伦理学、现象学、人类学、心理学和临床医学等多个领域。它进入中国后，为我国医学人文建设提供了重要方法启发。然而，叙事医学本土化不能停留在外来理论移植层面^[2-3,15]。

真正的中国化，不是在西方理论框架之外添加“中国元素”，而是在中国医学文化和现实医疗实践中重新生成问题意识。中医经典、历代医案、名医经验、师承传统、医德文本和患者调养故事，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医学中的叙事传统。这一传统并非现代叙事医学的替代物，却能够为现代叙事医学的本土化提供深层文化资源^[10,31-32]。

因此，叙事医学中国化应当体现为双向阐释：一方面，借助现代叙事医学理论重新理解中医药文化中的医案、问诊、医德和调养叙事；另一方面，借助中医药文化重新解释叙事医学中的患者故事、医患关系和生命经验。通过这种双向阐释，叙事医学才能从“外来理论”转化为“中国医学人文话语”^[10,31-32]。

（二）认知逻辑：从“故事采集”到“经验理解”

叙事医学在实践中容易被形式化理解为“收集故事”“书写故事”“举办故事分享”。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提升医学人文意识，但若缺乏深入分析，就容易使叙事医学停留在情感表达和活动展示层面^[3,12,15]。

叙事医学的认知核心，不在于收集更多故事，而在于通过故事理解患者经验。患者故事中包含身体感受、疾病解释、情绪变化、家庭关系、价值选择和生命期待。医生需要识别这些内容之间的关系，并将其转化为临床理解和照护行动^[15,18,25]。

中医辨证思维对于这一转化具有启发意义。辨证并不是机械对应症状与方药，而是在复杂现象中把握整体关系和动态变化。若将叙事医学与辨证思维结合，患者叙事就不只是医学人文材料，也可以成为理解证候、体质、情志、生活方式和治疗依从性的综合信息来源^[10,31-32]。

因此，叙事医学本土化的认知逻辑，是从“故事采集”走向“经验理解”，从“记录患者说了什么”走向“理解患者为何这样说、这样说意味着什么、医生应如何回应”^[3,10,15]。

（三）伦理逻辑：从“共情表达”到“主体尊重”

共情是叙事医学的重要内容，但共情不能被简化为情绪感染、道德感动或温情表达。真正的共情应当落实为对患者主体性的尊重^[2,19,33]。

患者主体性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生命主体性，即患者不是疾病载体，而是具有完整生命处境的人。第二，价值主体性，即患者对疾病、治疗、风险和生活质量有自身判断。第三，行动主体性，即患者应参与治疗方案、调养方式和健康行为的共同决策^[18,25,33]。

中医药文化中的医德传统强调医者责任和生命敬畏，为主体尊重提供了本土伦理语言。但在现代医学语境中，这种传统必须从单向的医者德性转化为双向的医患关系伦理。医生的“仁心”不能替代患者表达，医生的“善意”也不能取消患者选择。叙事医学本土化的伦理核心，正在于通过倾听和回应，使患者真正成为医疗关系中的

表达者、参与者和共同决策者^[10,25,33]。

（四）实践逻辑：从“个体修养”到“制度化运行”

医学人文长期面临一个困境：它常常被寄托于个体医生的道德修养，却缺乏制度保障。医生当然需要仁心与共情，但如果缺少时间安排、培训机制、流程设计、评价体系和组织支持，叙事医学就难以稳定运行^[1,9,13]。

《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明确提出，医疗卫生机构要将人文关怀融入患者诊治全流程，既要重视服务效率，也要重视服务效果和群众感受，并通过总结评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9]。这为叙事医学从个体实践走向制度化运行提供了政策依据。

因此，叙事医学本土化的实践逻辑，是从个体修养走向组织能力。它不应只是某些医生的自发写作，也不应只是医院文化活动中的阶段性项目，而应进入中医医院的门诊服务、病区管理、患者随访、投诉处理、健康教育、教学培训和质量改进体系。只有制度化运行，叙事医学才能真正成为可持续的医学人文实践^[7,9,12]。

五、中医药文化视域下叙事医学本土化的建构框架

中医药文化视域下的叙事医学本土化，可以概括为“一核四维五环”建构框架^[10,12,31]。

所谓“一核”，即以患者生命经验的整体理解为核心。所谓“四维”，即价值重塑、知识重组、方法转化和制度嵌入。所谓“五环”，即叙事采集、辨证阐释、意义共建、方案协商和反思反馈^[10,12,31]。

（一）一核：以患者生命经验的整体理解为核心

叙事医学本土化的核心，不是“故事”，也不是“中医药文化符号”，而是患者生命经验的整体理解。患者生命经验包括身体症状、心理感受、家庭关系、社会角色、文化信念、治疗期待和生命意义。叙事医学通过故事进入患者经验，中医药文化通过整体观和辨证思维解释患者处境，二者共同指向对患病之人的完整理解^[10,15,31]。

这意味着，患者经验是连接中医药文化与叙事医学的中介。离开患者经验，中医药文化容易成为抽象理念；离开中医药文化，叙事医学容易停留于一般人文关怀。二者结合，才能形成具有中国医学人文特色的患者理解方式^[10,15,31]。

（二）价值重塑：以生命整体观重建医学人文价值

价值层面回答“为什么建构”。中医药文化视域下的叙事医学，应以生命整体观重建医学人文价值^[1,10,15]。

这种价值重塑至少包含五个方面：第一，尊重生命，而非只处理疾病；第二，理解患者，而非只解释病理；第三，关注关系，而非只传递信息；第四，重视调养，而非只追求治疗；第五，强调共同参与，而非单向施治^[10,18,33]。

由此，医学人文不再只是医疗服务中的态度要求，而成为诊疗过程中的价值结构。医生不仅要知道患者“得了什么病”，还要理解患者“如何经历疾病”；不仅要说明“如何治疗”，还要解释“为什么这样治疗”；不仅要关注短期疗效，也要关注患者生活秩序和健康能力的恢复^[15,18,33]。

（三）知识重组：以中医药文化丰富疾病经验解释体系

知识层面回答“用什么理解患者”。叙事医学本土化不是用文化替代医学知识，也不是用患者故事替代临床证据，而是要重新组织医学知识、患者经验和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3,15,18]。

具体而言，叙事医学本土化应整合四类知识：第一，现代医学知识，包括疾病诊断、治疗方案、风险评估和循证依据；第二，中医药知识，包括证候、体质、情志、调养和治未病；第三，患者经验知识，包括疼痛感受、生活困扰、治疗期待和疾病理解；第四，文化意义知识，包括家庭观念、健康信念、生命态度和传统养生观^[10,19,23]。

这种知识重组的意义在于，使医疗实践不再只面对“病理事实”，也面对“经验事实”和“意义事实”。患者讲述的恐惧、犹豫、坚持、误解或期待，并非临床之外的杂音，而是影响治疗理解、依从性和医患信任的重要因素^[18,25,33]。

（四）方法转化：以叙事方法激活中医药文化资源

方法层面回答“如何操作”。中医药文化只有经过叙事方法转化，才能从文化资源变成医学人文实践资源^[10,32]。

第一，叙事问诊。在常规中医问诊基础上，进一步关注患者疾病经历、生活背景、情绪状态、家庭支持、健康信念和治疗期待，使问诊从信息采集扩展为经验理解^[17,33]。

第二, 医案转化。传统医案不仅是临床经验记录, 也是一种医学叙事文本。可将其转化为叙事医学教学案例、医患沟通案例和临床思维训练材料^[31-32]。

第三, 平行病历。平行病历可记录标准病历难以容纳的患者故事、情感困境、价值选择和医者反思, 使医生在书写中重新理解患者和自身^[13,34]。

第四, 反思写作。通过医学生、规培医师、护士和临床医生的反思写作, 培养其倾听能力、共情能力、解释能力和职业认同^[16,34]。

第五, 调养叙事。通过患者日记、康复故事、随访记录和健康行为叙事, 呈现治未病、慢病管理和康复调养中的生活实践^[20-23]。

(五) 制度嵌入: 以组织机制保障叙事医学持续运行

制度层面回答“如何持续”。叙事医学本土化的完成标志, 不是某一次叙事活动的开展, 而是其进入医疗机构日常运行体系^[7,9,12]。

在中医医院中, 可建立叙事医学培训机制、中医药文化叙事案例库、患者体验叙事采集机制、医患沟通质量改进机制和叙事医学实践评价机制。尤其需要将叙事医学与医院文化建设、门诊服务优化、病区人文管理、投诉纠纷预防、患者随访和健康教育结合起来^[7,9,34]。制度嵌入并不意味着把叙事医学机械流程化, 而是为医学人文实践提供稳定条件。只有当叙事医学被组织承认、被流程容纳、被评价支持、被持续改进, 它才能摆脱个体化、活动化和短期化倾向^[7,9,34]。

六、中医药文化视域下叙事医学本土化的实践路径

(一) 临床路径: 构建“叙事问诊—辨证理解—共同决策—调养反馈”模式

临床诊疗是叙事医学本土化的核心场域。中医药文化视域下的叙事医学, 不应被附加在诊疗过程之外, 而应嵌入问诊、辨证、解释、决策和调养全过程^[10,17,33]。

第一, 叙事问诊。医生在常规问诊之外, 应进一步关注患者如何理解自己的疾病, 疾病如何影响其生活和家庭, 患者最担心什么, 对中医药治疗有什么期待或疑虑, 以及患者愿意采取怎样的生活调养方式。叙事问诊并不是延长无边界聊天, 而是有目的地获取患者经验信息^[15,17,33]。

第二, 辨证理解。将患者叙事与中医辨证结合起来: 症状叙事与证候判断结合, 情绪叙事与情志因素结合, 生活叙事与体质、饮食、作息结合, 家庭叙事与照护资源和治疗依从性结合。这样, 患者故事才能转化为临床理解资源^[10,31-32]。

第三, 共同决策。医生不仅说明“怎么治”, 还要解释“为什么这样治”; 患者不仅被动接受治疗, 也参与治疗方案和调养计划的选择。中医药文化中的调摄、养生、治未病理念, 可转化为患者易理解、能执行、可持续的健康方案^[18,20,33]。

第四, 调养反馈。通过复诊、随访、患者日记、健康档案和患者报告结局, 持续了解患者身体变化、情绪变化、生活方式改变和文化认同变化。调养反馈使叙事医学从一次性沟通转化为连续性照护^[20-23]。

(二) 教育路径: 将叙事医学融入中医药人才培养全过程

医学教育是叙事医学本土化的重要基础。2026年发表的《中国医学院校叙事医学教育教学专家共识(2025)》提出, 叙事医学教育有助于提升医学生叙事能力和人文素养, 并建议医学院校结合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和包括中医药理念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本土化叙事医学教育模式^[35]。

对于中医药院校而言, 叙事医学不应只是增设一门医学人文课程, 而应贯穿经典学习、医案研读、跟师传承、临床见习和职业认同培养全过程^[14,35-36]。在课程层面, 可将叙事医学与中医经典、中医医史文献、医学伦理、医患沟通和中医药文化课程结合起来。在实践层面, 可组织学生开展患者故事访谈、平行病历书写、跟师叙事记录、社区健康叙事传播等训练。在评价层面, 可将倾听能力、共情能力、反思能力、沟通能力和中医文化理解能力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35-37]。通过这一过程, 叙事医学不仅培养学生“会沟通”, 更重要的是培养其理解患者、反思自身、敬畏生命和认同中医药文化的能力^[35-37]。

(三) 传播路径: 推动中医药文化从知识传播走向叙事传播

中医药文化传播长期偏重知识性表达, 如讲解中药功效、养生方法、节气保健、名医故事和传统理念。这种传播有其必要性, 但若缺少患者经验和生活场景, 容易形成单向灌输^[8,20-22]。

叙事传播的特点, 是通过具体故事呈现中医药文化如何进入人的生活, 如何影响健康行为, 如何改变患者

对疾病和生命的理解。中医药文化传播应从“专家讲授”转向“患者故事+专家解释”，从“文化展示”转向“生活场景体验”，从“单向宣传”转向“互动式叙事”，从“传播覆盖量”转向“认知、态度和行为改变”评价^[20-24]。例如，在社区慢病管理中，可通过患者调养故事呈现中医药生活方式干预的价值；在学校传播中，可通过生命教育故事呈现中医整体观和健康观；在企业健康促进中，可通过职业人群压力调适故事传播情志调摄理念；在新媒体传播中，可通过短视频、图文、音频和互动平台呈现“我家的健康故事”“我的调养日记”等内容^[20-24]。这种叙事传播并不是降低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性，而是增强其可理解性、可感受性和行为转化能力^[22-24]。

（四）治理路径：将叙事医学纳入中医医院人文治理体系

中医医院是中医药文化和叙事医学结合的关键场域。若叙事医学仅停留在医生个人层面，就难以形成持续影响。必须将其纳入医院人文治理体系^[7,9,12]。第一，建立组织机制。医院可成立叙事医学与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小组，统筹医学人文教育、患者体验改善、医院文化建设和服务流程优化^[7,9]。第二，建立培训机制。对医生、护士、导医、医务社工、投诉管理人员和行政管理者开展分层叙事能力培训，使叙事医学不只属于临床医生，也成为医院整体服务能力的一部分^[7,12,34]。第三，建立服务机制。在门诊、病房、护理、随访、投诉处理、健康教育和康复管理中引入叙事方法，使患者表达被看见、被理解、被回应^[7,17,34]。第四，建立案例机制。建设中医药文化叙事案例库，内容包括经典医案、医患沟通案例、患者调养案例、医务人员反思叙事、暖心服务案例和医院人文改进案例^[31-32,34]。第五，建立改进机制。将患者叙事作为医院流程优化、质量改进和人文关怀评价的重要依据。患者故事不仅是宣传素材，更是发现服务痛点、理解患者需求和改进医院治理的重要资料^[7,9,34]。

通过治理路径，叙事医学可以从“个人共情”提升为“组织共情”，从“医生能力”提升为“医院能力”^[7,9,12]。

（五）评价路径：建立“过程—结果—价值”三维评价体系

叙事医学本土化若缺乏评价体系，就容易停留在理念倡导和活动展示层面。因此，应建立过程、结果和价值三维评价体系^[7,34,38]。过程评价关注叙事医学是否被真实开展，包括叙事问诊是否充分，患者表达是否被尊重，医患沟通是否有效，平行病历和反思记录是否规范，医务人员是否接受培训，叙事材料是否被用于服务改进^[34,38]。结果评价关注叙事医学是否产生实际效果，包括患者满意度、医患信任、治疗依从性、健康素养、焦虑缓解、投诉纠纷减少、慢病管理效果和生活质量改善等^[33,38-39]。价值评价关注叙事医学是否形成更深层的医学人文价值，包括医务人员职业认同是否增强，医院人文氛围是否改善，中医药文化认同是否提升，患者是否形成更积极的健康生活方式，医院是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人文治理经验^[7,9,38]。

这一评价体系的意義在于，使叙事医学不再只是“有没有做”的问题，而是进一步进入“做得如何、是否有效、能否持续”的问题^[7,34,38]。

七、叙事医学本土化建构的边界、风险与规范

（一）防止文化浪漫化

中医药文化是叙事医学本土化的重要资源，但不能被浪漫化。不能因为强调中医药文化价值，就将其视为天然完美的医学人文方案。中医药文化进入现代叙事医学，必须经过现代医学伦理、临床规范和科学评价的转化。传统医德、医案叙事和养生智慧需要与现代医学制度、患者权利、知情同意和循证评价相衔接^[10,27,30]。

WHO《全球传统医学战略 2025—2034》也强调，传统、补充和整合医学的发展需要加强证据、确保安全与监管，并以以人为本的方式融入卫生系统^[30]。这一全球导向提示我们，中医药文化参与叙事医学本土化，必须坚持文化尊重与科学规范并重。

（二）防止叙事形式化

叙事医学不能被简化为写故事、讲故事、办比赛、做宣传。故事只是形式，经验理解才是核心；感动只是起点，行动回应才是关键。如果叙事医学不能改变医者对患者的理解方式，不能改善医患沟通过程，不能促进患者参与和服务改进，那么它就容易沦为形式主义^[3,12,34]。

因此，叙事医学本土化必须把重点放在患者经验的识别、解释和回应上。平行病历不是文学写作比赛，患者故事不是医院文化宣传素材，叙事活动也不是医学人文的全部。叙事医学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故事改变医学理解方式、医患关系结构和医疗服务过程^[15,18,34]。

（三）防止临床负担化

医务人员临床工作繁重，如果叙事医学设计不当，容易成为额外负担。叙事医学制度化不是简单增加记录

表格、培训任务和考核指标,而应通过流程优化提升沟通效率和患者体验^[7,9,34]。

因此,叙事医学实践工具应简便,流程应嵌入原有诊疗,记录应适度,培训应分层,评价应避免过度行政化。对于门诊高流量场景,可以采用简短叙事问诊提纲;对于慢病、肿瘤、老年病和康复患者,可以开展更深入的叙事随访;对于医学教育场景,可以通过平行病历和反思写作进行系统训练。不同场景应采用不同强度和形式的叙事方法^[7,17,34]。

(四) 防止伦理风险

患者叙事涉及疾病隐私、情感创伤、家庭矛盾、生命困境和价值选择,必须坚持伦理边界。患者故事不是可以随意采集、展示和传播的素材,而是需要被尊重和保护的生命的生命经验^[40-41]。

叙事医学实践应坚持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去身份化处理和范围限定。尤其在医院宣传、案例教学、学术研究和新媒体传播中,应避免消费患者痛苦,避免将患者故事工具化,避免在未经充分授权的情况下公开患者叙事。叙事医学越重视故事,就越应重视故事背后的人^[34,40-41]。

八、结语

中医药文化视域下的叙事医学本土化,实质上是中国医学人文范式的再建构。它以生命整体观回应疾病对象化,以辩证思维深化疾病经验理解,以医德传统重构医患伦理,以治未病智慧拓展健康实践,并通过制度化路径推动医学人文从理念倡导走向临床实践。这一建构至少包含三重转化。第一,从外来理论到中国医学人文话语。叙事医学本土化不是西方概念的直接移植,而是在中国医学文化传统和现实医疗场景中生成新的问题意识、理论表达和实践方法。第二,从文化资源到临床实践方法。中医药文化不只是被传播、被展示和被保护的對象,也可以转化为理解患者、改善沟通、重构医患关系和提升患者体验的方法资源。第三,从个体共情到制度化治理。叙事医学不应停留于医生个人情怀,而应进入医学教育、临床流程、医院管理、健康传播和评价体系,成为中医医院人文治理和医学人文建设的重要机制^[10,12,31-32]。未来,中医药文化与叙事医学的深度结合,还需在实证研究、评价工具、数字平台、患者报告结局、跨文化传播和伦理规范等方面继续推进:实证研究和项目评价可借鉴叙事医学项目系统综述及最新系统综述的证据路径^[42-43];医学教育与临床干预可进一步吸收住院医师、儿科和护理教育干预研究的经验^[44-46];数字叙事医学和智能辅助沟通为叙事资料采集、患者赋权和医患共情提供了新工具^[47-49];医学叙事能力量表等评价工具则为叙事能力测量和质量改进提供了方法基础^[50]。只有将理论建构、临床实践和制度保障结合起来,叙事医学才能真正形成具有中国医学文化根基、符合现代医疗需求、能够持续改善患者体验的本土化实践范式。

参考文献

- [1] 高川,周俞余,郭旭芳,等.医学人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协和医学杂志,2022,13(1):152-157.
- [2] Charon R. The patient-physician relationship. Narrative medicine: a model for empathy, reflection, profession, and trust[J]. JAMA, 2001, 286(15): 1897-1902.
- [3] Palla I, Turchetti G, Polvani S. Narrative Medicine: theory, clinic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 - a scoping review[J]. BMJ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24, 24: 1116.
- [4] 李飞.中国叙事医学实践的反思[J].医学与哲学,2023,44(8):8-13.
- [5] 廖伟聪,余佯洋.叙事医学本土化的若干思考[J].医学与哲学,2024,45(2):37-41.
- [6] 郭莉萍,朱利明,黄蓉,等.中国叙事医学专家共识(2023)[J].叙事医学,2023,6(6):381-411.
- [7] Mao Y, Wu J, Fang B, et al.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practice of narrative medicine in hospitals in China (2025)[J]. Asian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2025, 4(1): 20250056.
- [8]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EB/OL].(2021-06-29)[2026-05-02].<https://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article/zhengce/hyfg/202107/117800.html>.
- [9]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等.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J].协和医学杂志,2025,16(2):534-536.
- [10] 李飞,周家欣,丁希,等.叙事医学本土化:中医视角的启示与贡献[J].医学与哲学,2025,46(20):45-50.
- [11] Launer J, Wohlmann A. Narrative medicine, narrative practice, and the creation of meaning[J]. The Lancet, 2023, 401(10371): 98-99.
- [12] Zulman D M, Haverfield M C, Shaw J G, et al. Practices to foster physician presence and connection with patients in the clinical encounter[J]. JAMA, 2020, 323(1): 70-81.
- [13] 高等学校叙事医学实践教育联盟专家组.中国叙事医学体系构建共识[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3,36(11):1177-

1179.

- [14] 金贞爱. 关于儿科学发展融入叙事医学理念的思考[J].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024, 26(4): 325-330.
- [15] 胡成洋, 计红丽, 刘维静. 现象学视角下的叙事医学教育实证研究——一项基于医学生叙事医学认知及素养的联合调查报告[J].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2025, 63(10): 107-116.
- [16] Dong Y, Cai S Z, Yang H Y, et al. The current stat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dical narrative ability among 931 oncology nurses[J]. Journ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2025, 46(5): 162-169.
- [17] Zhang R, Xu L, Li J X, et al. The innovative education of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narrative medicine with medical animation: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health humanities[J].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Medical Sciences), 2025, 56(3): 887-892.
- [18]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 国家疾控局综合司. 关于开展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 (2024—2027 年) 的通知[EB/OL]. (2024-06-06)[2026-05-02]. <https://www.nhc.gov.cn/xcs/c100123/202406/1b02d90b7f8a439181d1800af1f44989.shtml>.
- [19] 万晓文, 黄蓉, 马利荣, 等. 中国中医药政策及发展现状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25, 28(10): 1161-1169.
- [20] 蒋温馨, 谭巍, 葛倩, 等. 信息获取对我国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的影响分析[J]. 医学与社会, 2022, 35(10): 72-78.
- [21] 齐瑛, 赵涛, 文可欣. 信息获取对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应用行为的影响[J]. 中医药导报, 2025, 31(2): 217-221.
- [22] 魏颖, 姜南, 王金凤, 等. 2021 年山东省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健康教育, 2023, 39(3): 242-247.
- [23] 陈雪, 景坚刚, 杨秋梅, 等. 生命健康语境下的隐喻叙事——以儿童疑难疾病为例[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2, 35(12): 1371-1375, 1393.
- [24] Liao H C, Wang Y H. Storytelling in medical education: narrative medicine as a resource for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 17(4): 1135.
- [25] 房志敏, 侯一鸣. 患者参与视角下的叙事医学实践反思[J]. 中华高血压杂志 (中英文), 2024, 32(11): 1095-1099.
- [26] 杨雨欣, 邵银燕, 李艳娟. 中医养生保健素养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 预防医学, 2025, 37(6): 577-582.
- [2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global traditional medicine strategy 2025–2034[R/OL].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5[2026-05-02].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113176>.
- [28] 王林, 王以新, 陈婷燕, 等. 叙事医学在基层医疗中的实践: 基于全科医生视角[J]. 中国全科医学, 2024, 27(24): 3057-3060.
- [29] 钟艾霖, 刘爱玲, 周尚成, 等. 广州市社区居民对中医“治未病”的知信行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24, 27(15): 1886-1892.
- [30] 张敏睿, 李丹, 何美慧, 等. “高知”群体更信赖中医吗? [J]. 中国全科医学, 2025, 28(9): 1044-1051.
- [31] 杨晓霖, 黄博. 中医古籍医案中的叙事思维及其对中国叙事医学实践的启发[J]. 现代中医临床, 2025, 32(5): 113-116.
- [32] 刘刃, 呼思乐. 基于叙事医学“细读”方法探讨中医医案叙事分析方法[J]. 医学与哲学, 2020, 41(9): 48-53.
- [33] Tian C Y, Wong E L Y, Qiu H, et al. Patient experie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shared decision-making: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mong outpatients[J].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2024, 129: 108410.
- [34] 贾俊君, 旻徽, 朱利明, 等. 平行病历质量评价专家共识 (2025) [J]. 医学与哲学, 2025, 46(2): 79-80.
- [35] Zhou J, Ding X, Fa C, et al. Expert consensus on narrative medicin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China's medical colleges (2025)[J]. Asian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2026, 5(1): 20250060.
- [36] Daryazadeh S, Adibi P, Yamani N, et al. Impact of narrative medicine program on improving reflective capacity and empathy of medical students in Iran[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for Health Professions, 2020, 17: 3.
- [37] Li S, Zhong L, Cai Y. Collaborative reflection and discussion using the narrative medicine approach: speech acts and physician identity[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4, 11: 651.
- [38] Bonsel J M, Itiola A J, Huberts A S, et al. The use of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measures to improve patient-related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J].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2024, 22: 101.
- [39] Meadows K.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measures: a call for more narrative evidence[J]. Journal of Patient Experience, 2021, 8: 23743735211049666.
- [40] Zhang H, Zhang H M, Zhang Z X, et al. Patient privacy and autonom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ases of ethical dilemmas[J].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024, 39(1): 1-10.

- emma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J]. BMC Medical Ethics, 2021, 22(1): 8.
- [41] 陈龙. 生前预嘱实施中的伦理争议与应对[J]. 协和医学杂志, 2025, 16(2): 338-343.
- [42] Remein C D, Childs E, Pasco J C, et al. Content and outcomes of narrative medicine programm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rough 2019[J]. BMJ Open, 2020, 10(1): e031568.
- [43] Massari M G, Di Trani M, Palmieri A, et al. Where science meets stories: a systematic review on narrative medicine[J].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025: 10497323251387023.
- [44] Bajaj N, Phelan J, McConnell E E, et al. A narrative medicine intervention in pediatric residents led to sustained improvements in resident well-being[J]. Annals of Medicine, 2023, 55(1): 849-859.
- [45] Tseng T C, Kuo P Y, Lin M J, et al. Narrative medicine in pediatric medical education and patient care: a scoping review[J]. Tzu Chi Medical Journal, 2025, 37(2): 167-174.
- [46] Xue M X, Sun H P, Xue J, et al. Narrative medicine as a teaching strategy for nursing students to developing professionalism, empathy and humanistic caring abilit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BMC Medical Education, 2023, 23(1): 38.
- [47] Sage C M. Digital narrative medicine: translating stories into medical education and better patient care[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26, 28: e93037.
- [48] Efthymiou E. Integrating digital and narrative medicine in modern healthcare: a systematic review[J]. Medical Education Online, 2025, 30(1): 2475979.
- [49] Ma H, Law E L C, Sun X, et al. Towards empathic medical conversation in Narrative Medicine: a visualization approach based on 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2025, 199: 103506.
- [50] 马婉贞, 顾平, 张晶晶, 等. 医护人员医学叙事能力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 中华护理杂志, 2020, 55(4): 578-583.

Localization of Narrative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ZHOU Gui-yang¹; YE Lu¹; CHEN De-chao¹; HUANG Ying-an¹; SHI Yu-feng¹; HE Li-min¹; WU Guang-shan¹; PAN Yun-lin¹; WU Li-sha^{2*}

(1. Shenzhen Bao'an Pure TCM Treatment Hospital, Shenzhen, Guangdong 518101, China; 2. Longgang Central Hospital of Shenzhen, Shenzhen, Guangdong 518116, 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narrative medicine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to clinical practice and normative construction. However, its localization still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grounding, inadequat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unclear practical pathways, and underdeveloped evaluation mechanism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with its holistic view of life,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of body and mind, ethical tradition of benevolence, pattern-based thinking, and preventive wisdom of “treating disease before it arises,” provides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narrative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CM cul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narrative medicine localization and proposes a prac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the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patients’ lived experiences. This framework integrates value reconstruction, knowledge reorganization, method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It further proposes practical pathways in clinical care, medical educa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hospital governance, and outcome evaluation, aiming to promote narrative medicine from conceptual advocacy toward a practical paradigm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medical humanities.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narrative medicine; medical humanities; localization;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被表征的实践：当代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困境与生成机制

谢勋^{1,2}

(1.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 401331, 2.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摘要：本文以“实践被表征化”为理论切口，反思当代公共艺术中公共性不断被符号化、景观化与制度化的问题。文章认为，公共艺术原本作为一种现实空间中的艺术实践，在当代文化生产机制中逐渐转化为可传播、可展示、可消费的象征对象。其“公共性”不再体现为真实艺术介入社会关系的生成，而日益成为由学术话语、策展机制、媒介传播与空间治理共同建构的符号型结构。文章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景观、空间生产与文化霸权的理论资源，分析公共艺术从现实介入转向表征生产的内在机制，并进一步指出，在新自由主义城市治理与文化资本逻辑下，公共艺术逐渐成为一种“被观看的参与”。最终，文章尝试重新讨论公共艺术中“实践”的生成可能，以回应当代公共性的现实危机。

关键词：公共艺术；表征化；景观机制；空间生产；话语规划；公共性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社区营造视野下重庆改制国企社区的艺术介入创新实践研究(23SKGH229)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33

引言

在当代语境中，公共艺术因其兼具理论向度与实践向度，逐渐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场域。然而，随着学术体系对知识生产规范的强化，公共艺术研究正呈现出一种值得警惕的结构性倾向：理论话语在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乃至规训了实践本身。大量研究通过引入“公共性”“在地性”“参与式”等概念框架，对具体项目进行阐释与归类，使实践更多地作为理论的论证“材料”而存在，其生成过程与复杂情境则被压缩为可被编码与再现的知识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公共艺术原本所具有的开放性、过程性与不确定性逐渐被削弱，实践不再作为问题生成的起点，而被纳入既定理论逻辑之中加以解释与评价。从公共性理论的视角来看，这一倾向进一步引发了深层次的张力。依据尤尔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公共性依赖于多元主体的参与、开放的讨论结构以及意义生成的协商机制。¹但在当前公共艺术研究中，实践所涉及的多元主体往往缺乏对其经验与意义的表达权，其声音被学术话语所转译甚至替代，导致“参与的实践”与“解释的权力”之间出现明显分离。与此同时，理论框架对实践的预设也在无形中限定了公共艺术的行动边界，使其从一种面向不确定公共情境的生成性实践，转化为符合学术规范的可识别对象。

因此，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当理论话语不断强化其解释与评价功能时，公共艺术的实践维度是否正在被过度编码，从而削弱其作为公共行动的开放结构？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重新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并重建公共艺术中多元主体的表达机制与意义生成过程，成为亟须回应的关键问题。

一、实践发生：公共艺术的原初生成性

公共艺术最初并非一种以“展示”为目的的艺术类型，而是一种介入现实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其核心不在于艺术作品本身的形式呈现，而在于艺术如何进入现实空间、组织社会关系并参与公共生活的生成。换言之，公共艺术最初所对应的，并不是一种被观看的文化对象，而是一种现实性的社会行动。这一点可以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加以理解。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那里，“实践”并非抽象观念的外化，而是人通过现实活动改变世界的过程。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²在这一意义上，实践并不是理论的附属物，而是社会关系生成的现实基础。实践意味着主体通过现实行动进入具体历史情境，并在行动中重新组织人与人、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

如果以这一实践观重新理解公共艺术，则其最初的公共性，并不来源于“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展示”，而来源

于艺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直接介入。公共艺术之“公共”，首先体现一种现实性的艺术实践。它并不只是占据城市空间，而是试图改变空间内部既有的社会关系结构，使原本被制度、资本或功能逻辑所规定的空间重新成为公众共同参与和共同感知的场域。因此，早期公共艺术的重要特征，并不是符号传播，而是现实行动。艺术在这一阶段更接近一种“事件性的实践”：它通过行动进入社会现场，通过参与重新激活公共关系，通过空间介入改变人们的感知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并非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审美对象，而是现实社会生产的一部分。

这一点也意味着，公共艺术最初具有明显的“生成性”特征。所谓“生成性”，并非指艺术预先拥有某种固定意义，而是指公共性本身是在实践过程中被不断生成的。公众并不是作为已经存在的统一主体被艺术“服务”，而是在共同参与、协商与共同感知中逐渐形成。换言之，“公共”并非先验存在，而是在实践中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这种生成性的公共实践，与后来被制度化的公共艺术存在根本差异。在原初实践阶段，艺术并不预设“公共性”的标准，也不依赖理论系统的合法化。艺术行动本身即构成公共性的发生过程。公共性并不是一种可以被命名和展示的结果，而是一种尚未完成的关系生成状态。

从空间维度来看，这种实践性的公共艺术实际上具有一种“反空间秩序”的倾向。现代城市空间往往被资本逻辑、行政规划与消费机制所主导，空间被功能化、景观化与秩序化。而公共艺术最初的重要意义，正在于通过临时性的行动、集体性的参与以及非功利性的互动，打破既有空间秩序的稳定结构，使空间重新显现出公共交流的可能性。艺术在这里并不是空间装饰，而是一种空间关系的重新组织。因此，在公共艺术的原初阶段，“公共”并不意味着一种被观看的开放性，而意味着一种现实性的共同实践。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其是否成功地“表现了公共性”，而在于它是否真正改变了人与空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公共艺术的核心并不是表征，而是实践；不是展示，而是生成；不是意义的传播，而是现实关系的生产。

也正因为如此，公共艺术最初实际上具有某种“反表征”的性质。它并不首先追求自身被记录、被传播或被理论化，而更强调行动本身对于现实的介入能力。然而，随着媒介传播、策展机制与文化制度的不断介入，这种原初的实践性开始逐渐转化为可被观看、可被叙述和可被消费的表征对象。公共艺术也由此开始从“现实实践”滑向“公共性的表演”。而这，正构成了当代公共艺术问题的真正起点。

二、实践被记录——公共艺术的媒介化转向

公共艺术体现为一种现实性的艺术实践，其真正发生转折的关键节点在于艺术实践开始进入媒介系统。公共艺术一旦被摄影、录像、展览、策展文本、学术论文以及数字传播机制所记录，它便不再只是一个发生于具体空间中的现实行动，而逐渐转化为一种可传播、可观看、可复制的文化对象。实践由此开始脱离其原初的现实情境，进入表征系统之中。这一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传播方式的改变，更意味着公共艺术存在方式的根本转型。因为在媒介逻辑之下，艺术实践不再以其现实介入能力作为核心价值，而日益以其可见性、可传播性与可叙述性获得意义。换言之，公共艺术开始从“现实行动”转向“被记录的行动”。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理论指出，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使艺术作品逐渐脱离其原有的时间与空间现场，进入大规模复制与传播之中。复制技术改变的不只是艺术的传播范围，更改变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³当艺术能够被无限复制时，其存在方式便开始从“现场性”转向“可观看性”。公共艺术恰恰是在这一媒介逻辑中逐渐发生变化的。由于公共艺术天然具有事件性、社会性与空间性，它尤其依赖媒介记录来获得传播与保存。许多公共艺术项目本身具有临时性，其现实行动往往在短时间内即告结束，因此摄影、录像与文本档案便成为其存在的重要方式。问题在于：当记录逐渐替代现场时，公共艺术的重心也开始发生转移。原本作为现实介入的艺术实践，在媒介化过程中开始转化为“事件图像”。艺术不再主要以其是否真正改变现实关系而被评价，而是日益以其是否形成具有传播力的视觉符号而获得关注。公众所接触到的，往往已经不是实践本身，而是实践被媒介加工后的视觉呈现。

例如，在大量当代公共艺术项目中，真正被广泛传播的并不是公众长期参与的现实过程，而是某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瞬间图像：一场集体互动、一组参与性场景、一次城市空间中的临时行动。这些影像经过摄影构图、媒体编辑与社交平台传播之后，逐渐成为公共艺术的主要存在形式。公众消费的，不再是现实行动，而是行动的视觉表象。在这一过程中，媒介记录逐渐改变了公共艺术内部的生产逻辑。艺术实践开始越来越主动地适应传播机制。艺术家与机构往往会在项目开始之前便预设其传播效果，考虑其在摄影中的视觉呈现、在社交媒体中的扩散能力以及在策展文本中的理论可解释性。于是，公共艺术开始从“面向现实公众”转向“面向媒介观看”。

这一变化意味着，公共艺术中的“公共性”开始发生重要转移。原本基于现实关系生成的公共性，逐渐转化为一种“被观看的公共性”。公众不再真正进入实践过程，而是通过图像间接观看“参与”的发生。参与本身开始成为一种可被展示的景观形式。这一问题在数字媒介时代尤为明显。社交媒体进一步强化了公共艺术的视觉传播属性。许多公共艺术项目日益倾向于制造具有“打卡性”“可分享性”与“视觉奇观性”的场景，以适应网络

传播逻辑。在这一机制中, 艺术实践逐渐从现实空间中的关系生产, 转向数字空间中的注意力生产。艺术是否真正形成公共讨论, 往往不再重要; 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能够形成传播热度与视觉流量。由此, 公共艺术开始进入居伊·德波 (Guy Debord) 所说的“景观社会”逻辑。在德波看来, 现代社会中真实的社会关系日益被影像所中介, 人们不再直接经验现实, 而是通过景观消费现实。景观并不仅仅是大量图像的堆积, 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被视觉化后的存在方式。⁴

公共艺术的媒介化正体现了这一过程。原本作为现实实践的公共艺术, 逐渐转化为可被观看的“公共性景观”。公众所面对的, 并不是现实中的社会关系重构, 而是关于“参与”“互动”“公共”的视觉叙事。实践本身开始退居幕后, 而图像则成为公共艺术的核心存在形式。更重要的是, 这种媒介化并不是公共艺术的外部附属现象, 而正在反向塑造公共艺术本身。因为当传播成为公共艺术获得社会合法性的重要方式时, 艺术实践便 increasingly 以媒介逻辑为中心展开。实践不再首先追求现实关系的改变, 而是优先追求可记录、可展示与可传播的效果。于是, 公共艺术逐渐从“实践生产”转向“表征生产”。在这一意义上, 媒介并非中性的记录工具, 而是一种新的生产机制。它重新定义了什么样的公共艺术能够被看见、被讨论与被承认, 也重新塑造了艺术家对于“公共性”的理解。公共艺术中的“公共”, 开始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可被观看的符号结构, 而非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共同实践。这也意味着, 当代公共艺术的问题, 并不仅仅是公共性不足, 而是公共性被媒介系统转化为一种可消费的视觉形式。

三、实践被叙述——公共艺术的话语化机制

如果说媒介化使公共艺术从“现实行动”转向“可观看的行动”, 那么进一步推动公共艺术发生根本变化的, 则是艺术实践开始进入知识话语系统。公共艺术一旦被命名、分类与理论化, 它便不再只是具体情境中的社会实践, 而逐渐成为一种能够被学术、策展与文化制度识别的“合法公共性”。在这一过程中, 理论不再只是对实践的解释, 而开始反向规定实践本身。这一转变是当代公共艺术最重要、但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因为公共艺术中的“公共性”, 越来越不是在现实社会关系中自然生成的, 而是在理论话语中被提前定义的。所谓“参与”“社区”“协商”“介入”等概念, 并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学术语言, 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整套公共艺术的价值筛选机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参与式艺术”“社会介入艺术”“关系美学”等概念逐渐成为国际当代艺术的重要理论关键词。特别是在尼古拉斯·伯瑞奥德 (Nicolas Bourriaud) 提出“关系美学”之后, 艺术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关系生产”。艺术的价值不再主要体现在物质作品本身, 而在于其是否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⁵在这一理论背景下, “参与”开始成为公共艺术合法性的核心标准。问题在于, 当“参与”被理论确立为公共艺术的重要价值之后, 它便逐渐从一种开放性的现实实践, 转变为一种可被制度识别的艺术形式。也就是说, 艺术家不再只是面对现实公众展开行动, 而日益开始面对学术系统与策展系统对于“公共性”的期待。这一变化可以通过大量双年展与社会介入项目的运作逻辑加以观察。例如, 在许多国际双年展中, 越来越多的作品强调: 社区合作、公共互动、社会议题、日常参与、地方经验。这些项目往往在策展文本中被描述为“激活公共空间”“建立社会关系”“促进共同参与”。然而, 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 这些“公共性”究竟是现实生成的, 还是被策展话语提前规定的? 许多项目在尚未展开之前, 其“公共意义”实际上已经被理论语言预先命名。艺术家需要在项目申请、策展提案与机构评审阶段不断证明: 项目具有参与性、项目具有社区价值、项目具有社会议题、项目能够形成公共讨论。于是, “公共性”开始成为一种需要被展示的能力。艺术家不仅需要进行现实实践, 更需要生产一套能够被学术与制度识别的“公共性叙事”。这一问题在当代公共艺术的文本结构中尤为明显。许多公共艺术项目往往同时伴随着: 理论说明、社会调研、社区报告、策展陈述、学术关键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文本的重要性已经超过实践本身。公众可能并未真正参与项目, 但只要项目能够被纳入“参与式艺术”“社区营造”或“社会实践艺术”的理论框架, 它便能够获得制度性的合法化。这意味着, 公共艺术中的实践开始越来越倾向于生产“可被理论识别的行动”。艺术行动是否真正改变了现实关系, 反而逐渐退居次要位置; 更重要的是, 它是否符合当代艺术系统关于“公共性”的叙述标准。这一过程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说的文化资本生产机制。在布尔迪厄看来, 文化领域并不是完全自由开放的, 而是由特定制度、教育体系与知识结构所构成的“场域”。⁶在这一场域中, 什么能够被认定为“高级文化”、什么能够获得合法性, 并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由掌握文化资本的机构与群体所决定。如果将这一理论放入公共艺术语境中, 则可以发现: “公共性”本身也正在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并不是所有现实社会行动都能够被承认为“公共艺术”, 只有那些能够进入理论话语系统、能够被策展语言解释、能够符合当代艺术价值结构的行动, 才会被制度认可。

例如, 同样是社区中的现实行动: 普通居民的自发公共活动, 往往不会进入艺术史叙述; 但一旦艺术家以“社会介入”名义进入社区, 并通过策展与理论文本加以包装, 这一行动便能够进入美术馆、双年展与学术研究体系。

问题并不在于艺术家是否真诚,而在于:制度本身正在筛选何种“公共”可以被看见。于是,公共艺术开始形成一种明显的悖论:它看似越来越强调公众参与,实际上却日益面向文化制度本身。公共艺术真正需要回应的对象,逐渐从现实公众转向:策展人、学术系统、文化基金、双年展机制、艺术机构。艺术家不仅需要组织现实行动,更需要让这些行动能够被理论命名、被文本化、被制度阅读。于是,“公共性”逐渐从一种现实关系,转化为一种话语表演。这一点在许多“参与式项目”的实际运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部分项目中的公众参与,实际上只是短暂性的、仪式化的互动。公众更多扮演的是“参与者形象”的角色,而非真正拥有公共协商能力的主体。换言之,公众的意义往往在于证明项目“具有公共性”。因此,当代公共艺术中的“参与”,越来越成为一种可被展示的参与;而“公共”,也日益成为一种被制度生产出来的话语效果。在这一意义上,公共艺术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景观化问题,更是知识生产问题。因为真正决定何种公共实践能够被看见、被传播与被承认的,并不仅仅是现实社会,而是整个文化制度对于“合法公共性”的筛选机制。公共艺术中的实践,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从现实行动滑向被叙述、被命名与被表征的文化对象。

四、重塑打开公共性:表征时代的实践生成

当代公共艺术的问题,在于公共实践不断滑向媒介化、话语化与景观化,那么“公共性生成”真正需要回答的,便不再是如何恢复一种未经媒介污染的“原初公共”,而是在表征已经无法被取消的历史条件下,公共性如何仍然可能继续生成。过去关于公共艺术的批判,往往倾向于将“真实实践”与“景观表征”对立起来,似乎只有脱离媒介与制度,公共性才可能重新出现。然而,在当代社会中,媒介传播、文化制度与空间治理已经构成公共艺术无法摆脱的现实条件。公共艺术不可能重新回到一种“无媒介”的原初状态。抑或说,当代公共艺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公共性被媒介化,而在于公共性在媒介、制度与景观机制中逐渐被预设、被封闭,并最终失去继续生成关系的能力。换言之,问题并不在“表征”本身,而在于表征是否提前规定了公共性的意义。真正需要反思的,并非公共艺术如何拒绝媒介,而是在如何在媒介、话语与制度内部重新打开实践生成的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公共性生成”不再意味着一种稳定结果,而是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中的关系过程。公共并非既定实体,也并非可以被提前定义的价值目标,而是在不断协商、冲突、感知与空间互动中被持续生成的社会关系。因此,公共艺术真正重要的,不是“表现公共性”,而是是否能够重新打开公共关系的生成机制。

如果将本问题重新回到本文所提出的“实践—媒介—话语”结构加以理解的话。那么首先在“实践”维度中,公共性的核心并不在于参与规模,而在于关系结构是否被重新组织。当代大量公共艺术项目日益倾向于通过“参与人数”“互动场景”与“社会传播”来证明自身公共性,但这种公共性往往停留在事件化层面。真正的公共关系,并不是在一次性活动中瞬间完成的,而是在长期协商、日常互动与现实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公共性的生成首先是一种时间性的生成。

本观点可以借助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加以理解。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通过景观与消费不断压缩人的现实经验,而真正具有解放性的空间实践,则往往隐藏于日常生活内部。⁷因此,公共艺术若想重新恢复生成性,便不能仅停留于短暂的事件制造,而应重新进入日常关系结构之中。⁸与其说公共艺术需要制造“震撼性的公共事件”,不如说它需要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关系介入。真正的公共性,并不产生于一次展览的高潮,而产生于长期共同生活中的关系变化。例如,在部分长期社区艺术实践中,艺术家并不以完成作品为目标,而是通过数年时间持续进入社区,与居民共同协商空间使用、公共活动与日常关系。这种实践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是否形成强烈视觉传播,而在于它重新组织了人与空间之间的现实关系。在这里,公共艺术不再是“被观看的活动”,而成为一种缓慢生成中的公共过程。其次,在“媒介”维度中,公共性的重新生成,并不意味着拒绝媒介,而意味着避免媒介提前封闭意义。今天的公共艺术已经无法脱离影像传播与数字平台,但问题在于:媒介是否将公共实践压缩为一种固定图像。在社交媒体逻辑中,公共艺术日益倾向于生产“可被拍摄的参与”。公众进入空间,往往首先成为视觉传播链条中的一部分,而非真正进入关系协商过程。于是,参与日益被转化为一种“可观看的参与”,公共性则被压缩为视觉效果与传播热度。因此,生成性的公共艺术,并不是取消媒介,而是在媒介内部保持实践的开放性与未完成性。换言之,媒介不应成为公共意义的终点,而应成为关系继续展开的起点。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媒介与实践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在景观逻辑中,媒介往往将实践转化为已经完成的“结果图像”;而在生成性的公共艺术中,媒介应当保留实践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冲突性与持续性。公众看到的不应只是“公共已经发生”的图像,而应是公共关系仍在形成中的过程。因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公共艺术是否传播,而是它是否在传播中保留了实践继续生成的可能。

最后,在“话语”维度中,公共性的生成问题,实际上涉及谁能够进入公共感知结构的问题。当代公共艺术日益被策展、学术与制度语言所定义,“参与”“协商”“社区”“社会介入”等概念逐渐成为公共艺术合法性的标准。然而,当公共性被理论提前命名时,实践本身反而容易失去开放性。公众并非真正参与公共关系生产,

而是作为“参与者形象”被纳入既定话语结构之中。因此，公共艺术真正需要重新打开的，并不仅仅是参与机制，而是“感知结构”。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关于“感性分配”的理论认为，政治的核心并不只是制度协商，而是谁能够被看见、被听见以及被承认为“可感知者”。所谓公共性，并不只是意见表达，而是感知秩序本身的重新组织。景观化公共艺术的问题恰恰在于：公众虽然“出现”了，但他们只是作为视觉元素存在，并未真正改变既有感知结构。公共艺术中的边缘者、社区居民与普通参与者，往往只是作为“公共性的证明”被呈现，而非真正成为公共关系中的主体。因此，生成性的公共艺术，并不是简单增加互动，而是重新组织感知结构：让原本不可见的经验进入公共空间，让被压抑的声音重新获得可感知性，让公众不仅“参与”艺术，更重新经验现实。

当代公共性的生成机制，不是拒绝表征，而是在表征内部重新打开关系、空间与感知的持续生成过程。而当当代公共艺术的问题，也并不在于公共性被媒介化，而在于公共性在媒介、制度与景观机制中逐渐被预设、被封闭，并最终失去继续生成关系的能力。真正的生成性公共艺术，并非拒绝表征，而是在表征内部重新打开关系、空间与感知的未完成状态。在这一意义上，公共艺术的“生成”，并不是生产一个最终完成的公共结果，而是在媒介、空间与制度内部持续打开关系、感知与协商的未完成状态。因此，当代公共艺术真正的生成机制，并不意味着回到一种未经媒介与制度污染的“真实公共”，而是在表征无法取消的现实条件下，重新恢复实践内部的开放性。

参考文献：

- [1]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9.
- [2] (德) 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
- [3] (德)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著；王才勇译.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81-84.
- [4] (法) 居伊·德波著；张新木译. 景观社会[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2.
- [5] (法)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著；黄建宏译. 关系美学[M].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6-9.
- [6] 张意 著. 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5-21.
- [7] 张一兵著. 日常生活场境与空间关系生产——列斐伏尔社会批判理论转换的历史逻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25-26.
- [8] 吕峰著. 感性分配的政治 朗西埃美学思想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10-11.

Represented Practice: The Publicity Dilemma and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Contemporary Public Art

XieXun

⁽¹⁾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China; ⁽²⁾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representationalization of practice” as a theoretical point of departure to reflect on how publicity in contemporary public art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symbolized, spectacular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It argues that public art, originally conceived as an artistic practice embedded in real social space, has gradually been transformed within contemporary mechanism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to a representational object that is communicable, exhibitable, and consumable. Its “publicity” no longer lies in the genuine gener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hrough artistic intervention, but is increasingly constituted as a symbolic structure jointly produced by academic discourse, curatorial mechanisms, media dissemination, and spatial governance. Drawing on Western Marxist theories of praxis, spectacl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cultural hegemon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ublic art shifts from real social intervention to the production of representation. Furthermore, it argues that under the logic of neoliberal urban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capital, public ar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form of “participation to be viewed.” Finally, the paper seeks to reconsider the generative possibilities of “practice” in public art in response to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of publicity.

Keywords: Public Art; Representationalization; Spectacle Mechanism; Production of Space; Discursive Discipline; Publicity

集句诗的新形式：龚璁“颠倒集句诗”述论

靳梓培

(遵义师范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0)

摘要:清代集句诗的创作进入了繁荣期,涌现出了许多新的集引形式。龚璁《留春山房集古诗钞》开创了将集句与回文倒读手法相结合的“颠倒集句诗”,即一联诗中一句按正序集引原诗,一句按倒序集引。在回文与集句的双重创作规则下,龚璁巧妙地化解了倒读成文、平仄押韵、对仗衔接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将来源不一的前人诗句“编织”成了一首首流畅自然、“如出一手”的新作。颠倒集句诗是清代集句诗创作求新、求善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龚璁;集句诗;回文;《留春山房集古诗钞》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黔北文化研究中心基地项目(2023JDPY03)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62

龚璁(生卒年不详),字玉亭,贵州遵义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进士,道光年间历任山东武城、益都、汶上知县。著有《留春山房集古诗钞》(以下简称《诗钞》)十卷,含初集二卷、二集三卷、三集三卷、四集二卷,刻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诗钞》全帙共645首诗,集引七百六十余位诗人的诗句,涵盖了古诗、五七言律诗、绝句等体裁,还开创了一种新的集句诗形式——颠倒集句诗。所谓“颠倒集句”是将集句和回文倒读的手法相结合,一联诗中一句正序集引,一句倒序集引。这种创作方式既要求诗人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又考验诗人敏捷灵活的思维。整体来看,《留春山房集古诗钞》集中体现了清代集句诗“求多”“求全”“求新”“求善”^[1]的典型特点。可惜龚璁一生才名不彰,回文与集句又长期被视为游戏之作,颠倒集句诗一直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但作为集句诗的独特形式,颠倒集句诗集中体现了传统诗歌中集句与回文的双重创作智慧,它既要追求集句诗的“意贯而对偶”,还需满足回文的回环往复、倒读成文。因此,剖析颠倒集句诗的创作形态,可以更好地了解回文灵活的修辞手法,还能进一步探讨集句诗的创作机制。

一、《留春山房集古诗钞》概述

《留春山房集古诗钞》是一部集句诗集。龚璁自序中称,幼年起即听从父训,每日记诵唐宋人诗,中进士之后开始进行集句诗的创作。彼时的龚璁尚未授官,以教书为业,“授徒之暇,每喜拈古句,寻思对偶,久之,稍有所获,或连缀成篇。”^{[2]53}道光十年(1830)入仕之后,龚璁就忙于吏事,暂停了集句诗的创作。后龚璁赋闲,便重拾集句用以消遣旅怀。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龚璁因事返回家乡遵义,短暂停留后又匆匆赴山东任职,往返一载有余,途中之所见所思、与亲友的聚散离合皆以集句诗的形式婉转记述,《诗钞》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书的。集中多是怀人、别友、述怀、记事之作,虽集前人诗句而成,但情思真切,宛若己出。

《诗钞》集“三唐人句居多,亦有兼集宋元明句者”^{[2]54}。除去第四卷中的专集集句诗(包括“集李(白)诗”“集义山(李商隐)诗”“集韩(偓)诗”),龚璁引用频次最高的前十位诗人分别是杜甫(182句)、白居易(171句)、李白(91句)、陆游(81句)、李商隐(80句)、刘禹锡(73句)、王维(63句)、许浑(60句)、苏轼(57句)、刘长卿/杜牧(各53句)。龚璁在每一首诗后都依次注出了集引诗句的原作者,以示句有来处,在自序中也说“非敢妄易一字”,严格遵守集句诗的创作规则。自序中还注明“长篇中有一人用数句、律诗中有一人复二句者,原非出自一首中”^{[2]54},亦恪守集句诗不从同一首诗中集句的规则。集句之作,似易实难。侯桐序中称龚璁“酿万花而作蜜,味近自然;集千腋以成裘,衣成无缝。雪洗凡艳,风吹古襟。有勾心斗角之能,无靚粉缀金之迹。”^{[2]15-16}虽有溢美之嫌,但亦能见出《诗钞》艺术水平之不俗。

《诗钞》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尤其是龚璁的独创的颠倒集句诗,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智力与才情。所谓颠倒集句,即将集句与回文的手法相结合,在集引前人诗句时,一句用顺序,一句则用倒序。如“白云幽绝处,晴雪夜山深。”^{[2]519}前一句出自张乔《终南山》“白云幽绝处,自古属樵人。”后一句出自

作者简介:靳梓培(1988—),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卢纶《偶宿山中忆畅当》“深山夜雪晴，坐忆晓山明。”龚璿用回文的手法将“深山”句的语序进行了调整，但诗句依然明白晓畅，意义连贯。《诗钞》中的颠倒集句诗共 11 首，分别是三集卷二的《孤馆闻莺》和四集卷二的组诗“江村即景颠倒唐句十首”。虽然数量不多，但形式新颖，是集句诗的新形式。

颠倒集句是集句诗进入清代后，进一步求新、炫才的产物。清代沈雄曾概括集句诗创作存在七难：“徐士俊谓集句有六难，属对一也，协韵二也，不失粘三也，切题意四也，情思联续五也，句句精美六也。……余更增其一难，曰打成一片。”^{[3]843} 由此可知，集句本就是对创作者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的层层考验，然而由宋至清随着越来越多的诗人加入集句诗的创作，集句原本的创作规则已渐渐不能满足创作者自我挑战的需要，于是越来越多的集句形式渐次而兴。在这种背景下，龚璿将回文的手法融入集句诗的创作，是挑战者对“游戏”难度的自我加码。需要注意的是，颠倒集句诗并非直接集引回文诗，而是用倒读的手法将前人诗句颠倒成诗。集句者本就需要在明确的题旨和风格下，搜寻摘录合适的诗句，而“颠倒集句”除了要符合作者预设的主题和美学之外，还需满足回文倒读成文的规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集句与回文常被人视作“游戏”，但此二者在真实的创作过程中“一字未妥，则句便费解；有一字未谐，则句便失叶”^[4]，其难度并不低于一般诗歌，且包蕴着精巧的创作智慧，正所谓“文人慧笔，曲生狡狴，此中固有三昧，匪徒乞灵窈家余巧也。”^{[3]653} 纵观颠倒集句诗的双重创作规则，龚璿面临着回文倒读、平仄押韵、对仗衔接等一系列难题，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生出一篇意脉连贯、“如出一手”的“新诗”，其背后的技术困境和意义生成机制较一般的集句诗更为复杂，也更值得探究。

二、倒读成文的考验

颠倒集句诗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回文诗句的倒读成文。集句诗是以诗句而非字词作为基本构建单位的，回文诗句的句意是否成立是全诗能否意脉通顺的基础。《诗钞》中的十一首颠倒集句诗均为五言律诗，龚璿巧妙地利用了五言诗的语法和句式特点，确保了颠倒诗句的合理性。

“近体诗的句式一般是每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节奏单位，每一个节奏单位相当于一个双音词或词组。音乐节奏和意义单位基本上是一致的。”^[5] 五言律诗的句子在节奏上可分为“头节—腹节—脚节”三部分，每一部分又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意义单位。五言诗句式结构基本上不外乎“2-1-2”和“2-2-1”两类。其中，“2-1-2”颠倒为“2-1-2”的诗句处理起来相对简单，其颠倒之后句式不发生变化，意义单位也不需打乱，但要确保作为枢纽的“腹节”与前后的“头节”和“脚节”组合恰当，全句的句意才得以成立。

颠倒集句诗的回文诗句很多都是“2-1-2”颠倒“2-1-2”句式的，如：

“路细/通/危壑”^{[2]524} 出自王安石《泊雁》：“壑危/通/细路，沟曲绕平田。”

“芳夜/得/春游”^{[2]522} 出自沈佺期《夜游》：“今夕重门启，游春/得/夜芳。”

以上两例颠倒句的“腹节”都是谓语，前后可以衔接主语、宾语或者状语，与“头节”和“脚节”的联系都比较连贯。并且，近体诗的句式经常改变语序，倒装句在诗中非常常见。因此，“头节”和“腹节”交换，主语、宾语或者状语错位都不影响句意。如原诗句“壑危通细路”宾语前置，句式是宾+谓+主，意为高高的深壑有细路可通，语序颠倒之后“路细通危壑”的句式变为主+谓+宾，可直译为细细的小路通向高高的深壑。无论哪一种语序都符合近体诗的习惯，即使倒读句意也流畅清晰。

“头节”和“腹节”内部的词序颠倒也是需要关注的细节。近体诗的“头节”和“脚节”常为两个单音节字构成的词组，由于汉语词汇具有多义性，且短语结构灵活多变，很多时候词序颠倒之后意义也能成立，如原诗中主谓结构的“壑危”“夜芳”可以颠倒为偏正结构的“危壑”“芳夜”，意思都能讲通。不过，与“壑危”不同，“夜芳”颠倒之后词意发生了改变。沈佺期原诗“游春得夜芳”意为游春时偶然得遇夜间开放的芳花，龚璿颠倒为“芳夜得春游”可理解为得以在鲜花开放的夜晚游春。虽然“夜芳”变为“芳夜”中心词发生了变化、意义不同，但回文句同样句意流畅、意境相似。

此外，“2-1-2”句式也有颠倒后变为“2-2-1”句式的，原诗中的“头节”和“腹节”需要打乱，重组为回文诗句的“腹节”和“脚节”。句式的变化更为复杂，如：

“川晚/落霞/收”^{[2]521} 出自王安石《泊雁》“泊雁鸣深渚，收霞/落/晚川。”

“萧萧/晚叶/红”^{[2]523} 出自许浑《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

“收霞落晚川”变为了“川晚落霞收”，虽然语序调整后原诗的“脚节”变成了“头节”，但意义单元没有打散，偏正结构的“晚川”颠倒为主谓结构的“川晚”，意义也没有发生变化。不过，原本的“头节”与“腹节”则面临意义单元重组的复杂情况。无论是“收霞/落”还是“落霞/收”，“收”和“落”都是用来修饰“霞”的，“收”和“落”都是动词，在诗句中蕴含的意义也十分接近，颠倒位置也不影响原本句意的表达。原诗可以直译为即将收场的霞光落在了傍晚的河川上，回文诗句可以理解为在傍晚的河川上即将落下的霞光安然收场，虽然句式、语序发生了调整，但句意基

本没变。“红叶/晚”“晚叶/红”的情况也类似，两者都是主谓结构，“晚”和“红”都是用来修饰“叶”的形容词，都可以与“叶”组成偏正短语，无论是“红叶处于晚秋”还是“晚秋叶子红了”，传达的意思也基本一致。

颠倒集句诗中也有“2-2-1”颠倒为“2-2-1”句式的，语序调整后，“头节”“腹节”“脚节”的意义单位将全部打破，重新组合。这种句式的变化最为复杂，也最为考验作者功力，如：

“静坞/连声/鹤”^{[2]519} 出自顾非熊《姚岩寺路怀友》“鹤声/连坞/静，溪色带村闲。”

“晴雪/夜山/深”^{[2]519} 出自卢纶《偶宿山中忆畅当》“深山/夜雪/晴，坐忆晓山明。”

“集鸦/寒树/远”^{[2]520} 出自李建勋《感故府二首》（其二）：“高楼暮角断，远树/寒鸦/集。”

“2-2-1”句式可以简单地分为“2-3”结构，以上的几个例子皆可依此结构划成两个并列的名词性词组。如“深山+夜雪晴”“晴雪+夜山深”，虽然语序发成了调整，但无论在原诗句还是回文诗句中，两个词组的中心词都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山”和“雪”，第一个字“深”和最后一个字“晴”也没发生变化，依然分别修饰原本的中心词。这类句式的转换，枢纽依然放在第三字上，它将离开原本的“腹节”，与“头节”中的第二字组成新的意义单元，这个组合是否恰当是决定回文句能否成立的关键。如第一例的“连”字可与“坞”组合，形容毗邻相连的村坞，也可与“声”相连，形容声音的连绵不断。同样第二例的“夜”与第三例的“寒”也类似，这些使用场景灵活多样的文字，给了回文诗句打散重组的可能。

回文句最后一种变化是“2-2-1”颠倒为“2-1-2”，原诗的“头节”变为“脚节”，“腹节”和“脚节”被打乱重组。如：

“清露/凝/庭户”^{[2]519} 出自刘禹锡《捣衣曲》“户庭/凝露/清，伴侣明月中。”

“闲鸥/浴/暖波”^{[2]522} 出自许浑《重游郁林寺道玄上人院》“雨晴巢燕急，波暖/浴鸥/闲。”

“头节”的处理最为简单，因为意义单元未变，仅需满足词组内部的逻辑就行，“户庭”“波暖”颠倒成“庭户”“暖波”意义依然成立。“脚节”需被打乱，与“腹节”的第二字组成新的意义单元，如“凝露清”要变为“清露凝”，但这三字本就是一个意义单元，中心词也未发生变化，所以“脚节”的处理也不甚复杂。这一句式的变化，核心考验依然是在第三字上。作为独立出来的新意义单元，“腹节”能否与“头节”和“脚节”贯通逻辑，成为句意成立的关键。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原诗第三字都是动词，独立为“腹节”后可作为谓语连通全句。原诗“户庭凝露清”的句子结构是状+主+补，意为庭院中凝结的露水很清透，颠倒之后，“清露凝庭户”的句子结构变成了主+谓+状，意为清透的露水凝结在庭院中。“闲鸥浴暖波”的情况亦是如此。动词“凝”与“浴”既可与中心词组成短语构成主语，亦可单独作为谓语使用，是保证句意成立的关键。

总体来看，回文句的成立是建立在汉语的弹性上的。所谓弹性即“语词本身的不固定性”，在以炼字、炼句为重的传统诗词中，选择合适语词是个重要的条件，若“选辞得当，……有时可使成谐隐，有时可使成回文。”^[6]颠倒集句诗的回文句是龚璿巧妙“选辞”后的产物，他如同一位技术精湛的编织匠，精心地选取合宜的诗句，进行精妙的变形，在回环颠倒之中将前人的诗句“安顿得宜”。

三、平仄押韵的规范

颠倒集句诗还面临着平仄和押韵的问题。从平仄来看，颠倒集句诗因为涉及到倒读回文，在平仄的处理上比一般集句诗更加讲究。

从倒读情况来看，五言律诗的四种基本句式颠倒之后，略作调整也能合格律诗的平仄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其一，(仄)仄平仄仄【仄平脚】—— (仄)平平仄仄【仄仄脚】

其二，平 平仄仄平【仄平脚】—— (平)仄仄平平【平平脚】

其三，(平)平平仄仄【仄仄脚】—— 仄仄平平 (仄)【仄平脚】

其四，(仄)仄仄平平【平平脚】—— 平平仄仄 (平)【仄平脚】

律诗的平仄规律中有“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说法，大意就是诗句中的单数节可以有条件的放宽，偶数节却要做到一丝不苟。规则看似简单明了，但实际创作中，情况要复杂的多。具体就五言律诗而言，考虑到“犯孤平”“三平尾”“三仄尾”的规避情况，平仄谱式大致如上，其中加括号的字可平可仄。

灵活的平仄规则是颠倒句平仄成立的前提。第一句型“仄仄平平仄”倒读之后为“仄平平仄仄”，恰好是第三句型“(平)平平仄仄”的变形。如《西涧晚清》中的“月明澄水绿”^{[2]521}就是典型的例子。该诗句出自张易之《泛舟侍宴应制》“绿水澄明月，红罗结绮楼。”原诗是典型的【仄平脚】，句式为“仄仄平平仄”，龚璿颠倒之后，平仄变成了“(仄)平平仄仄”，是【仄仄脚】的变形，颠倒之后依然合格律诗平仄的规范。

第二句型“平平仄仄平”颠倒之后为“(平)仄仄平平”，正好是第四句型“(仄)仄仄平平”【平平脚】的变形。如《月夜遣怀》中的“霜夜几封书”^{[2]521}用的就是这一句式。这一句出自骆宾王《同张二咏雁》“阵照通宵月，书封几夜霜。”原本的平仄为“平平仄仄平”【仄平脚】，颠倒后平仄变为了“(平)仄仄平平”。

第三句型“(平)平平仄仄”直接颠倒之后为“仄仄平平平”，犯了“三平尾”的忌讳。若将首字改为仄声，那么“仄

平平仄仄”颠倒之后就成了“仄仄平平仄”，恰是第一句型的典型范式。如《西涧晚清》中的“个个犹飞燕”^{[2]521}就是采取的这一句式。这一诗句出自徐铉《春分日》“燕飞犹个个，花落已纷纷。”原诗用的是【仄仄脚】的变形，平仄为“仄平平仄仄”，颠倒后恰是“(仄)仄平平仄”，正是【平平脚】的典型。

第四句型“(仄)仄仄平平”若直接颠倒则变为“仄仄平平平”，是格律诗要尽力避免的“三仄尾”。若将首字改为平声，则颠倒之后就会变为“平平仄仄平”，恰是第二句型的典型范式。如《东篱秋霁》中的“卑枝压朵繁”^{[2]520}，出自方千《题友人山花》“浓香薰叠叶，繁朵压卑枝。”原诗是“(平)仄仄平平”的【平平脚】，颠倒后变为了“平平仄仄平”的【仄平脚】。

整体而言，五言律诗的倒读回文，在处理平仄问题时，变化相对比较清晰。在明确倒读的平仄范式后，依据格律诗的对粘要求，依此集引诗句即可完成颠倒集句诗的创作。虽然，站在后来者的角度可以很轻易地总结出写作规则，但实际创作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创作者需在格律诗严苛规范的前提下，灵活地搜集诗句，并运用逆向思维颠倒诗句，其难度较一般集句诗是指数级的。如果说集句诗的创作是戴着镣铐舞蹈，那么颠倒集句诗的创作就类似于背着枷锁远行。

《诗钞》中的十一首颠倒集句诗，基本都能做到符合平仄，仅有一句诗犯了“三仄尾”的忌讳。《草阁乘凉》的尾联为“陶陶醉卧稳，江槛俯鸳鸯。”^{[2]520}前一句出自白居易《劝酒十四首》(其七)“不如来饮酒，稳卧醉陶陶。”原诗的平仄为“仄仄仄平平”，颠倒之后变为了“平平仄仄仄”。虽然“三仄尾”不太符合平仄规范，但相对“犯孤平”来说算不得大忌，律诗中的“三仄尾”也不罕见，不算出律，如“潮平两岸阔”(王湾)“谁为含愁独不见”(沈佺期)等很多名句都是“三仄尾”。因此，顶着重重技术难题完成的颠倒集句诗，虽偶有瑕疵，但瑕不掩瑜。

从押韵来看，龚璁的颠倒集句诗用韵严谨，基本符合格律诗的用韵规范。律诗对韵脚有着严格的要求，若单纯创作集句诗，集引同一韵部的诗句即可，但颠倒集句诗需对诗句的语序进行调整，这就意味着逆序集引的诗句，不必考虑本来的韵脚，但首字需符合全诗押韵的需要。这对诗人的记忆力和创造力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不过，律诗一般奇数句不入韵，偶数句才入韵。《诗钞》中的十一首颠倒集句诗，逆序集引的诗句也并非都是偶数句。《孤馆闻莺》中颠倒句分别出现在第二、三、六、七句，《松窗坐啸》中颠倒句出现在第一、三、五、八句，《草阁乘凉》出现在第一、三、五、七句，《东篱秋霁》出现在第一、四、六、八句，《西涧晚清》出现在第二、三、五、七句，《月夜遣怀》出现在第二、四、六、七句，《村桥随步》出现在第二、四、五、七句，《花溪垂钓》出现在第一、四、六、七句，《竹径扶筇》出现在第一、三、六、八句，《小槛看山》出现在第一、五、七句，《寒宵访友》出现第一、四、六、七句。除倒数第二首未能严格遵守“每联一句顺文，一句回文”的创作规则外，其余十首都符合颠倒集句诗的要求。在这些诗作中，颠倒句出现在偶数句的情况共有十八次，约占颠倒句总数的小半。

龚璁显然不想把颠倒集句的规则设置地过于严苛，以致于失去了创作的乐趣。颠倒集句诗中的颠倒句不用必须出现在偶数句，而且《诗钞》中的十一首诗作也多押宽韵或者中韵。《孤馆闻莺》押庚韵，“江村即景颠倒唐句十首”分别押侵韵、阳韵、元韵、尤韵、鱼韵、尤韵、歌韵、东韵、灰韵、麻韵。十一首颠倒集句诗，基本均符合律诗的规范，仅一首诗出现了出韵的情况：

纷思何由遣，烟烽有复无。风尘三尺剑，霜夜几封书。郊外亭皋远，渚前秋叶疏。冷床吟白月，应念寂寥居。(《月夜遣怀》)^{[2]521}

此诗首句不入韵，全诗押“鱼韵”，但第二句“烟烽有复无”的韵脚却存在一定下次。此句出自唐代姚合《送李廓侍御赴西川行营》“从今嵩州路，无复有烽烟。”龚璁在集引时将该句的语序进行了颠倒。“无”属于“虞韵”，“鱼”与“虞”是邻韵，在诗中夹杂他韵，并不符合格律诗一韵到底的规范。虽然韵脚上略有瑕疵，但考虑到集句和回文的双重压力，通押邻韵似乎也不应太过苛责。

四、对仗衔接的艺术

《诗钞》中的颠倒集句诗均为五言律诗，这就意味着龚璁在创作时除了遵循集句的创作规则外，还必须遵守近体诗的基本规范。其中对仗正是两者都非常看重的内容。近体诗要求颌联、颈联必须对仗工整，集句诗也非常强调对仗，认为优秀的集句诗应当“对偶亲于本诗”。颠倒集句诗虽然面临着复杂的创作规则，但《诗钞》内的11首诗多为山水田园诗，题材较为常见，押韵也比较宽，创作者拥有较大的空间，因此颠倒集句诗的对仗也都十分工整。如：

深院幽花落，疏帘夜月通。炎氛临水静，寒雨入斋空。(《竹径扶筇》)^{[2]523}
 栖鹤出高树，困鸥浴暖波。槛虚花气密，春早扇风和。(《花溪垂钓》)^{[2]522}
个个犹飞燕，双双下野鸥。月明澄水绿，风急夜江秋。(《西涧晚清》)^{[2]521}
 风静听溪流，弦低月映楼。老年疏世事，芳夜得春游。(《村桥随步》)^{[2]522}

这些诗句基本上都是合掌对,其中划线的是回文句。虽然出处不同,语序相异,一句顺文、一句回文,却句式整齐、音韵和谐。这些诗句或许来自龚璁偶然的灵感迸发,或许是搜肠刮肚的推敲,但创作者的精心剪裁其实并不能完全逃出原诗的影响。上述例子中的很多诗句,可以明显看到原诗的启发,如:

“深院幽花落,疏帘夜月通。”前一句出自元稹《看病》“残月晓窗迥,落花幽院深。”此句为颠倒句。后一句出自骆宾王《月夜有怀简诸同病》“闲庭落景尽,疏帘夜月通。”

“风静听溪流,弦低月映楼。”前一句出自张九龄《未阳溪夜行》“月明看岭树,风静听溪流。”后一句出自王安石《泊雁》“柝随风敛阵,楼映月低弦。”

通过对比,我们会发现这两联诗句在整体氛围上和局部文本上都与原诗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深院幽花落,疏帘夜月通”刻画了月夜深院中的静谧景色,无论是元稹还是骆宾王的原诗,都以夜月和院落作为核心意象。龚璁在创作时,有意无意地集引了如此类似的诗句,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原文本的某种“制约”。“风静听溪流,弦低月映楼”的情况也是如此。张九龄和王安石的原诗在意象与风格上都有类似之处,上下两句诗都以风静与月明相对,龚璁的诗作中也延续了这一对仗,虽然用回文手法颠倒了语序,但诗句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一致的。

平心而论,集句诗看似是创作者利用知识和才情从海量文本中撷取前人诗句为我所用的活动,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本自身也蕴含势能,一种互相召唤(calling)、互相联结(connecting)的势能。”^[7]集句诗的创作机制是如此的“不自由”,因此在这种强大的势能之下,创作出“对偶亲于本诗”的作品成为了所有集句诗人的目标。

颠倒集句诗在回文的基础上完成诗句的基本对仗本就是一场难能可贵的胜利,可在这样严苛的条件下,龚璁还是创作出了不少令人惊喜的偶句。如《孤馆闻莺》中的“夜夜愁中曲,悠悠枕上情”^{[2]383}就比原诗来的更有兴味。其中“夜夜”句出自郑愔《春怨》“曲中愁夜夜,楼上别年年。”原诗是闺怨诗,这一句写出了女子在等待中蹉跎漫长岁月的哀愁。龚诗中对该句的语序进行了颠倒,中心词从渲染时间的“夜夜”变为了抒发诗人情思的“愁中曲”,情感的表达更为直接。原诗的上下句意思相类,无论是“夜夜”还是“年年”都是在强调别离时间的漫长,虽然对仗工整,但却稍有重复。《孤馆闻莺》“悠悠”句出自李中《秋夕病中作》“卧病当秋夕,悠悠枕上情。”原诗并不对仗,龚璁却单拈出“悠悠”一句与“夜夜”句相对,形成了一个工整的合掌对。而且从“愁中曲”顺接到“枕上情”,从物自然过渡到情,相较于郑愔《春怨》原诗中意义相类的对仗,多翻出了一层意味。

然而,即使解决了押韵、平仄、对仗等技术问题,一首集句诗的写作也仍然没有完成。集句诗是补缀的艺术,如何将来源不同的诗句衔接成“如出一手”的新作才是这场“游戏”的最终目的。颠倒集句诗的创作亦是如此,一首合格的集句诗,并非随意拼接的语料,而是逻辑顺畅、结构严整、意脉连贯的整体,因此衔接问题也是集句作者必须跨越的难题。

集句诗的衔接,其实主要是讲究诗歌内部的逻辑性,由于诗词的一大语言特性就是跳跃性,因此在诗句衔接上并不要求像散文一样的线性连贯。尤其对于格律诗而言,颌联和颈联承担着重要的对仗任务,所以首联和尾联在逻辑衔接上要更强一些。就龚璁的颠倒集句诗来看,他特别喜欢在尾联上呈现出“因果联系”的紧密连接,如:

冷床吟白月,应念寂寥居。(《月夜遣怀》)^{[2]521}

好山云处见,客思转悠哉。(《小槛看山》)^{[2]524}

转帆汀漠漠,归路思犹赊。(《寒宵访友》)^{[2]524}

以上几联诗句均是上句回文写景,下句顺文抒情,因景生情。《月夜遣怀》描写了诗人独居江村,亲友音信稀少的境况,尾联“冷床”句刻画诗人月夜独吟的境况,“应念”句则直接点出了诗人寂寥落寞的情怀。“冷床”句出自李洞《题刘相公光德里新搆茅亭》“月白吟床冷,河清直印闲。”龚璁颠倒语序之后,诗句的中心从“吟床冷”变为了“吟白月”,既呼应了诗题,又由景生情,自然引出了下句的“寂寥”之感。《小槛看山》的写作逻辑也基本类似,在对眼前山色进行描写后,自然而然地引出诗人的客居之思。上句“好山云处见”出自李咸用《题陈正字山居》“见处云山好,吟中岁月长。”语序颠倒之后变成了宾语前置的句子,原诗写所见之处云影山色的美好,龚诗的回文句则曲折地告诉读者“好山”要到白云生处才可得见,一波三折,韵味悠然,云深之处的幽寂自然引出了下句的客居之思,更显得情景交融,两相得宜。《寒宵访友》亦是如此,由景及情,先写眼前所见江上行船的景色,再写不愿归家别友的情思,上下句衔接自然,条理通畅。

尽管龚璁的颠倒集句诗尾联的衔接处理地都很精巧,但对于集句作者来说局部的衔接固然重要,整体的和谐连贯才是最终目的。以《诗钞》中的第一首颠倒集句诗《孤馆闻莺》为例,来看一下龚璁是如何在回文手法的基础上,巧妙地编织出“如出一手”的集句作品的:

梨花度寒食,歌啭百声莺。夜夜愁中曲,悠悠枕上情。地偏心易远,苔长砌稀行。和尽诗篇百,吟多寐不成。^{[2]383}

全诗采用顺接的形式,抒发了诗人初春时节客居驿馆的愁绪。首联上下句之间的联系非常自然,上句顺文,下句回文,由寒食节绽放的梨花过渡到树上的鸣莺,既呼应诗题,又在婉转的鸟声中营造出惆怅的情调。颌联上

句回文，下句顺文，对仗工整，写出了诗人夜中难寐的愁思。从首联到颔联看似衔接松散，但实则由景入情，自然合理，意脉不断。颈联顺着颔联“情”字而下，上句“地偏心易远”写出了诗人幽居的孤寂，下句“苔长砌稀行”则十分细节地写出了诗人独居的境况。这句诗是回文句，出自章孝标《次韵和光禄钱卿二首》（其一）“望远云生海，行稀砌长苔。”语序颠倒之后，诗句内部的因果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原诗是“因”在前“果”在后，由于行人稀少，台阶上生出了青苔。回文句则反之，先“果”后“因”，别添了一份宛转的况味。尾联继续写诗人独居时的场景，描摹诗人在百无聊赖中独自酬和他人诗篇的身影，独吟并未帮诗人排遣愁绪反而加深了愁思，竟至夜不能寐。尾联在平顺衔接颈联的同时，也遥相呼应了颔联。颔联的“愁中曲”早已交代了尾联“寐不成”的原因，而“枕上情”亦是“寐不成”的注脚。纵观全诗，意脉连贯，衔接自然，龚璁颠倒前人诗句的语序并巧妙地拼接起来，在逆、顺之间，完成了一首兼具回文与集句两种“趣味”的佳作。

结语

由宋至清，集句诗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两种创作趋势，一种沿着文天祥“集杜诗”的路子，以集句的形式与原诗形成精神世界的“互文”；一种则继续走镂金刻玉的路子，追求极致的形式美，并在前人影响的焦虑下，走向了新形式的探索。龚璁的颠倒集句诗显然是后者的产物。无论集句还是回文，都常被视作“游戏之作”，但这两类作品都是对创作者审美和才智的极致考验，不可视作“小道”。因为“人对文字游戏的嗜好是天然的，普遍的。……巧妙的文字游戏，以及技巧的娴熟的运用，可以引起一种美感，也是不容讳言的。”^[8]由此来看，颠倒集句诗实现了集句与回文的精妙集合，呈现出了典雅规整、回环变化之美，具有独特的审美和修辞价值。

参考文献：

- [1] 张明华,李晓黎.集句诗嬗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93-195.
- [2] 龚璁.留春山房集古诗钞[M].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 [3] 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843.
- [4] 刘铁冷.作诗百法[C]//叶嘉莹.民国诗学论著丛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182.
- [5] 王力.王力谈诗词格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253.
- [6] 郭绍虞.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5.
- [7] 潘静如.集句诗及其意义的生成——以李商隐集句诗为例[J].原诗,2022,(00):139-164.
- [8]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M].上海:上海文以出版社,1982:47.

A New Form of Jijü Poetry: A Study of Gong Cong's "Reversed Jijü Poetry"

Jin zipa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Zunyi Normal University, Zunyi, China)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jijü* (集句) poetry (poems composed entirely of lines from earlier poets) entered a period of prosperit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giving rise to various new forms of quotation. Gong Cong (龚璁)'s *Collection of Ancient Poems from the Spring-Retaining Mountain Studio* (<留春山房集古诗钞>) pioneered the "reversed *jijü* (集句) poetry," which integrates the technique of *jijü* (集句) with the palindrome. In this form, one line of a couplet quotes from an original poem in normal order, while the other line quotes in reverse order. Under the dual compositional constraints of the palindrome and *jijü* (集句), Gong Cong skillfully resolved a series of technical challenges—including the legibility of reversed text, tonal patterns, rhyme schemes, and parallelism—thereby "weaving" disparate lines from earlier poets into a new poem that reads fluently and naturally, as if written by a single hand. The reversed *jijü* (集句) poetry epitomizes the Qing Dynasty's pursuit of novelty and excellence in *jijü* (集句) composition.

Keywords: Gongcong; *jijü* poetry; palindrome; *Collection of Ancient Poems from the Spring-Retaining Mountain Studio*

传统文化元素在卡牌游戏美术设计中的视觉叙事研究

顾嫣然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随着数字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卡牌游戏逐渐成为融合视觉艺术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传统文化元素在卡牌游戏美术设计中的应用,不仅丰富了游戏视觉表现形式,也强化了游戏叙事能力与文化内涵。本文以视觉叙事理论为基础,结合传统纹样、色彩体系、神话意象及角色造型等内容,分析传统文化元素在卡牌游戏中的视觉表达方式,并以《阴阳师》《忘川风华录》等游戏案例为研究对象,探讨传统文化元素如何通过角色设计、场景构建及界面视觉形成叙事功能。研究认为,传统文化元素能够有效提升玩家的沉浸体验与文化认同感,同时推动传统文化在数字媒介中的创新传播。

关键词:传统文化;卡牌游戏;美术设计;视觉叙事;角色设计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69

一、传统文化元素与卡牌游戏美术设计的融合背景

随着数字游戏产业的快速发展,游戏已不再只是娱乐产品,而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尤其是在“国潮”文化兴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游戏开始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视觉设计之中,通过数字化方式重新激活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卡牌游戏因其角色数量丰富、视觉风格鲜明以及世界观塑造完整等特点,成为传统文化视觉表达的重要载体。

在当代年轻群体审美需求不断变化的环境下,玩家不仅关注游戏玩法,也更加重视游戏中的文化氛围与视觉体验。传统文化元素能够通过服饰纹样、色彩搭配、建筑风格以及神话符号等形式,增强游戏的艺术表现力与文化辨识度,使玩家在娱乐过程中获得文化认同感与沉浸体验。

与此同时,视觉叙事逐渐成为游戏美术设计中的核心内容。相较于传统文本叙事,视觉叙事更强调通过图像、色彩、场景与角色造型等视觉语言传递故事信息。因此,传统文化元素在卡牌游戏中的应用,不仅是审美层面的装饰,更承担着塑造世界观、强化角色身份以及推动剧情表达的重要作用。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游戏媒介逐渐由单纯的娱乐消费产品转向综合性文化传播平台。相比传统影视与文学作品,游戏具有更强的互动性与沉浸感,玩家能够通过角色操控与场景探索主动参与叙事过程。因此,视觉艺术在游戏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美术设计已不再只是辅助内容,而成为影响玩家情感体验与文化认知的重要因素。

此外,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游戏产业也开始更加重视本土文化表达。越来越多游戏企业尝试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数字视觉内容,通过年轻化、艺术化的方式增强传统文化传播效果。这种趋势不仅推动了传统文化元素在游戏中的广泛应用,也使视觉叙事逐渐成为连接文化表达与玩家体验的重要桥梁。

二、传统文化元素在卡牌游戏中的视觉呈现方式

(一) 传统纹样与装饰符号的应用

传统纹样是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卡牌游戏美术设计中,祥云纹、水纹、敦煌纹样以及传统花卉图案等元素经常被应用于角色服饰、武器装饰以及界面设计之中。例如,《阴阳师》中的部分角色服饰大量采用和风纹样与传统装饰图案,通过细节设计强化角色的文化属性与身份特征。

作者简介:顾嫣然(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此外,传统纹样还能够增强游戏整体的东方审美氛围,使玩家在视觉层面快速建立文化联想。相较于单纯的装饰作用,这些纹样更承担着视觉叙事功能,通过符号化设计向玩家传递角色背景与世界观信息。

(二) 传统色彩体系的视觉表达

中国传统色彩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例如朱砂红、石青色、黛绿色等传统色彩不仅具有装饰价值,也蕴含丰富的文化寓意。在卡牌游戏设计中,传统色彩的应用能够有效强化视觉层次与情绪表达。

以《忘川风华录》为例,游戏整体采用偏古典的青绿色与暖金色调,营造出具有历史感与东方幻想色彩的视觉氛围。不同角色之间的色彩差异,也能够体现人物性格与身份定位,从而增强角色辨识度与情感表达能力。

(三) 神话意象与角色造型设计

中国传统神话为游戏角色设计提供了丰富素材。《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传统戏曲服饰以及古代神话人物等内容,均能够转化为卡牌角色设计的重要灵感来源。

在角色设计过程中,美术设计师通常会结合现代审美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重构,使角色既保留传统文化特征,又符合当代玩家的视觉审美需求。这种融合方式不仅增强了角色艺术表现力,也提升了传统文化在数字媒介中的传播效果。

除了角色造型本身,游戏中的动态特效设计同样会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例如水墨扩散效果、书法笔触动画以及古典纹样粒子特效等内容,都能够进一步强化角色视觉表现力。这类动态视觉设计不仅增强了游戏画面的艺术感染力,也使传统文化元素从静态符号转化为具有叙事功能的视觉语言。

与此同时,部分卡牌游戏还会结合传统节日、历史人物以及民间传说推出限定角色与主题活动,使玩家在游戏体验过程中进一步接触传统文化内容。这种融合方式不仅提升了游戏内容丰富度,也增强了传统文化在数字媒介中的传播深度。

三、卡牌游戏美术中的视觉叙事构建

(一) 角色设计中的身份叙事

角色设计是卡牌游戏视觉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角色服饰、武器造型以及动作设计均能够向玩家传递角色背景信息。例如,具有传统宫廷服饰元素的角色往往代表高贵身份,而采用水墨风格设计的角色则更容易体现东方幻想气质。

通过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角色形象不仅具有视觉美感,也能够形成更加完整的人物叙事结构,使玩家在视觉观察过程中完成对角色身份与性格的理解。

(二) 场景设计中的氛围叙事

场景设计是构建游戏世界观的重要方式。传统建筑、园林布局以及古典山水元素能够有效增强游戏环境的文化氛围。例如古风庭院、灯笼街景以及水墨山川等场景设计,不仅能够丰富画面层次,也能够推动游戏叙事情绪的发展。

在视觉叙事过程中,场景不仅是角色活动的空间,更是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通过传统文化场景的构建,玩家能够更加深入地进入游戏世界,从而获得更强的沉浸体验。

(三) 界面设计中的情感叙事

游戏界面设计同样具有视觉叙事功能。许多卡牌游戏会在UI设计中加入书法字体、水墨卷轴以及传统纹样边框等元素,以强化整体视觉风格的统一性。

这些设计不仅能够提升游戏艺术美感,也能够细节层面增强玩家对传统文化的感知,使视觉体验与文化表达形成统一。

在卡牌游戏中,视觉叙事不仅体现在单一画面之中,更贯穿于角色成长、剧情推进以及玩家互动的全过程。玩家通过视觉信息不断理解游戏世界观,并在长期游戏体验中逐渐形成情感认同。因此,优秀的游戏美术设计不仅需要具备艺术审美价值,也需要具备较强的信息传达能力与叙事逻辑。

传统文化元素的加入,使卡牌游戏视觉叙事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玩家在欣赏角色与场景设计的同时,

也能够通过视觉符号感知传统文化背后的历史意义与审美精神, 从而实现娱乐体验与文化传播之间的融合。

四、传统文化元素在视觉叙事中的价值

传统文化元素在卡牌游戏中的应用, 不仅提升了游戏的视觉表现力, 也推动了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通过视觉叙事方式, 传统文化能够以更加年轻化、娱乐化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 从而增强当代年轻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认同。

此外, 传统文化元素还能够提升游戏产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竞争力。具有鲜明东方审美特色的游戏更容易形成独特品牌形象, 并在全球化传播过程中展现中国文化特色。因此, 将传统文化元素与卡牌游戏美术设计相结合, 不仅是游戏产业发展的需求, 也是传统文化创新传播的重要路径。

从艺术设计角度来看, 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也推动了游戏美术风格的多样化发展。相较于西方奇幻题材的同质化视觉表现, 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游戏更容易形成独特视觉辨识度, 并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展现东方审美特色。近年来, 越来越多国产游戏在海外市场受到关注, 也说明传统文化视觉表达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数字艺术的重要代表形式。

因此, 在未来游戏美术设计中, 应进一步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 通过现代视觉语言与数字技术手段, 推动传统文化在年轻群体中的持续传播与发展。

五、结语

随着数字艺术与游戏产业的不断发展, 传统文化元素在卡牌游戏中的应用将更加多样化。通过视觉叙事方式, 传统文化不仅能够提升游戏艺术表现力, 也能够数字媒介环境中实现新的传播与转化。未来, 游戏美术设计应进一步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视觉语言之间的融合方式, 从而推动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会娟. 传统文化元素在游戏美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 艺术科技, 2023, 36(12): 85-87.
- [2] 李梦瑶. 视觉叙事理论下的游戏角色设计研究[J]. 大众文艺, 2022(18): 102-104.
- [3] 王一帆. 国风游戏中的传统文化表达研究[J]. 美术教育研究, 2021(22): 76-78.
- [4] 陈思远. 数字游戏中的视觉叙事机制分析[J]. 传媒论坛, 2020, 3(15): 91-92.
- [5] 刘佳宁. 传统纹样在游戏角色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 鞋类工艺与设计, 2023, 3(08): 45-47.
- [6] 张晓琳. 中国传统色彩在数字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 艺术评鉴, 2022(10): 56-59.

Research on Visual Narrative in Card Game Art Design Based on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Yanran Gu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card gam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medium integrating visual art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card game art design not only enriches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games, but also strengthens narrative ability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Based on visual narrativ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card games through traditional patterns, color systems, mythological imagery and character modeling. Taking games such as Onmyoji and Wangchuan Fenghualu as examples, the study explores how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form narrative functions through character design, scene construction and interface visual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players' immersive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while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digital media.

Key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Card Game; Art Design; Visual Narrative; Character Design

民国时期相国寺民众娱乐研究

付裕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民国时期, 相国寺由传统寺院逐渐转变为集商业、娱乐于一体的城市公共空间, 成为观察近代开封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寺内戏曲、说书、日光电影等娱乐活动兼具传统与现代特征, 反映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与娱乐需求。相国寺的空间转型及娱乐活动的发展, 折射出近代城市社会世俗化和公共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相国寺; 民众娱乐; 开封; 世俗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68

相国寺是开封城内重要的公共空间, 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关于相国寺的研究, 学界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是相国寺的历史沿革研究。熊伯履《相国寺考》是目前研究相国寺历史最为系统的专著之一。作者利用地方志、碑刻、寺院文献等资料, 对相国寺自唐代创建以来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梳理, 重点考察了其在唐宋时期作为皇家寺院的特殊地位, 以及明清以来的兴废过程。该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实基础, 但其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寺院制度与历史沿革, 对于近代相国寺的社会功能转型关注相对有限。^[1]其二是空间功能研究。陈燕妮从宗教与文学互动的角度, 指出相国寺兼具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特征, 揭示了其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复杂属性。她在论文当中指出, 相国寺具有世俗和宗教两面性的特点。这也是相国寺直到近代民国时期相国寺一贯有之的鲜明特点。然而自从其更名为州山市场可以看出, 其宗教色彩几乎已经消磨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单一的世俗性。^[2]其三是民俗与社会文化研究。张履谦《相国寺民众娱乐调查》则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民国时期相国寺娱乐业态的第一手资料。^[3]王玉霞从民俗学视角考察相国寺庙会活动的历史演变, 分析了民众信仰与商业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由此结合时代背景具体分析相国寺庙会的演变。^[4]

总体而言, 既有研究虽对相国寺的历史沿革、宗教功能及民俗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并保存了丰富的娱乐史料, 但对娱乐活动本身所反映的社会变迁关注不足。相国寺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也是观察近代开封社会互动以及文化转型的重要窗口。基于此, 本文以民国时期相国寺的娱乐活动为切入点, 考察其世俗化转型过程, 分析娱乐生活的类型特征及其所折射的社会文化变迁。

一、相国寺的世俗化转型

相国寺作为开封的重要历史文化地标, 其空间功能的演变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民国时期, 寺院的宗教功能逐渐弱化, 而商业和娱乐活动逐渐成为主要用途。寺院、市场与娱乐场所原本共存, 民国时期则形成以商业和娱乐为主导的新型公共空间, 揭示了宗教空间向世俗公共空间的深刻转变。

相国寺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555年), 初名建国寺。^{[1][6]}唐延和元年(712年), 唐睿宗李旦以其旧封“相王”即位, 认为自己曾在此发愿祈福, 于是赐名“相国寺”, 自此成为皇家寺院。^{[5](367-368)[6](5)}北宋时期, 东京开封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相国寺不仅承担宗教功能, 更成为皇家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寺内拥有东塔普满、西塔广愿以及资圣阁等大型建筑群, 院落众多, 僧侣云集, 香火鼎盛, 其宗教地位达到历史巅峰。^{[7][91]}明代时期, 朱元璋诏名大相国寺置僧纲司管辖开封各州县寺院的僧侣, 将南大黄寺、北大黄寺和景福寺并入大相国寺。这样的举措, 为相国寺的名望提升和功能集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清朝时期, 相国寺在前朝的废墟上进行重建, 其中尤以乾隆年间工程量最大, 朝廷特批万两库银, 寺内的一众设施得以完善。

然而, 自晚清至民国, 宗教功能逐渐弱化。清朝重建时, 相国寺由于“周遭各设公廨”, 各种行业抢占场所, 已经使得相国寺的整体规模比以前少了许多。1924年时, 相国寺已成为“三教九流聚集之地”。《大公报》的一则新闻报道了孙洪伊在张福来陪同下游览宋代相国寺的情景。1924年4月, 广州军政府原顾问孙洪伊接受孙中山委托去北方工作, 途经上海、南京、江西、开封、洛阳等地。及至开封, 直系军阀、河南督理张福来为迎接

作者简介:付裕(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孙洪伊的到来,令当地警方提前清场,从辰时起便将寺内游人全部驱散。^[8]按照传统观念,寺院本应是僧侣修行和信众礼佛的神圣场所,但报道中却出现了警方提前清场、驱散游人的情景。值得注意的是,被驱散的并非香客,而是大量聚集于寺内的普通市民。这说明此时相国寺最主要的使用者已经不再是宗教信仰者,而是前来游览、娱乐、交易的普通民众。寺院空间的神圣性正在被公共性所取代。后来1927年冯玉祥督军开展“破除迷信、庙产兴学”活动,大相国寺寺产充公,僧人解散,众多的佛像、匾额等均遭到破坏,后更名为“中山市场”。^[9]这个时期的相国寺宗教属性基本消失,变为热闹的集市。民国士人谢五知对此颇有感触,言道:“据普通人一般的观念,一想到庙和寺的内容,除了山门大殿以外,便是名义上的主人神像……都是‘静’的象征,消极的表现。”“但是天下事物,常有绝对相反的,因此等寺庙里也有些是冷清荒僻的处所,而商贾杂凑,货物云集,并不是古树参天,而肩摩轮接,如大宋朝东京汴梁的相国寺”。^[10]

相国寺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开封极为重要的市场交易和娱乐场所,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自其诞生之初,相国寺便兼具市场与娱乐双重属性。在宋代的开封城内,汴河自西向东蜿蜒流淌,而相国寺恰好坐落于这条河道的必经之地。汴河穿寺而过,经罗城的角门子,再流向第三重外廓的东南角,使得物资流通极为便捷。此外,民众频繁入寺参拜、游园等活动,也使得相国寺逐渐具备了市场的功能。尤其在经济繁荣发达的宋代,相国寺的市场性和娱乐性表现得尤为突出。《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幕露屋义铺,卖蒲合、章席、屏帟、洗漱、鞍辔、弓箭、时果、脯腊之类。近佛殿,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幘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11](29)}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相国寺由寺院向市场、由神圣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转变,实际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世俗化的发展趋势。这里所说的世俗化,并非宗教信仰完全消亡,而是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逐渐下降,经济活动、娱乐活动以及市民日常生活逐渐占据中心位置。相国寺空间功能的变迁,正是这一历史进程在地方社会中的具体体现。如果说宋代相国寺是宗教、商业与娱乐三者并存的复合空间,那么民国时期的相国寺则已经发展成为以商业和娱乐为主导功能的新型城市公共空间。

二、娱乐生活类型

娱乐活动是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观察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及时代变迁的重要窗口。近代以来,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和传统公共空间功能的转型,娱乐逐渐摆脱节庆性、宗教性的附属地位,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民国时期的相国寺正是这样一个典型场域。作为开封城内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间,相国寺汇聚了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乃至不同地域的人群,其娱乐活动既保留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又不断吸收现代娱乐形式,在传统与现代、雅与俗、乡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了复杂而多元的文化生态。

1930年代《食货》杂志曾记载:“相国寺每日寺中有说书、算卦、相面,百艺逞能,亦有卖吃食等项。”^[12]短短数语,便勾勒出相国寺热闹繁盛的景象。无论是戏曲演出、说书讲古,还是日光电影、西洋镜等新兴娱乐形式,都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开封市民的精神生活世界。从内容上看,相国寺娱乐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传统娱乐与新兴娱乐两类。前者主要包括戏曲、说书、杂技等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艺术形式;后者则包括日光电影、西洋镜等近代传入的娱乐项目。这些娱乐形式的共存,体现出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交织发展的鲜明特征。

(一) 戏剧

在相国寺众多娱乐形式中,戏剧无疑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中原河南地区戏剧历史悠久,起源于早期原始社会的巫术表演。宋代时期,河南出现了如《踏摇娘》之类的歌舞小戏。^[13]南宋,金人入主中原,又出现了“金院本”。至元代中国戏曲始趋成熟,直至明代河南戏曲演唱活动相当普遍,城乡庙会多有演出,并出现了朱有燬等知名杂剧、传奇作家,弦索腔、昆曲等剧种在省内已流行。^[14]到清代乾隆年间,豫剧已成为河南很有影响的戏曲剧种,形成了丰富细腻、朴实醇厚、富于乡土气息的剧种特色。民国时期,开封城内戏院林立,戏剧演出极为繁盛,而相国寺则成为戏曲活动的重要集聚地。

1. 梆子戏

梆子戏是民国时期相国寺最受欢迎的戏曲形式之一。作为豫剧的重要前身,梆子戏植根于中原农村社会,长期活跃于城乡民众之间。近代开封城内的戏院共有河南大舞台、明星大戏院、醒豫舞台、春华戏院、易俗学社、华光戏院、永安舞台、国民舞台、永乐舞台和同乐戏院等十家。^{[15](1)}表演形式主要分为梆子戏、京剧和坠子戏三类,其中尤以梆子戏最受看客欢迎。当时梆子戏的三个戏院长期演的剧目有220个,如《反五关》《后楚国》

《黄金台》《收黄忠》《古城会》《打龙袍》《铡美案》《收卢俊义》等,从剧目所反映内容来看,主要弘扬传统的道德观念,封建礼教的氛围浓厚,比如忠君爱国、三纲五常等传统的伦理思想。其中也不乏诸如《打孙继祥》《李纲打朝》等弘扬正义、鞭挞奸邪的作品,呼应了各时代民众对公序良俗与人间正道的期待。

然而,梆子戏之所以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喜爱,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道德说教,更在于其与普通民众生活经验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梆子戏由基层劳动者集体创造而来,其创作者与早期观众多属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阶层,因而剧目内容与艺术风格不以雅致婉约见长,而是洋溢着质朴率真、甚至被部分文人视为“俚俗”的乡土气息。其唱腔风格尤为独特,常呈现出凄切激昂的特点,音调如泣如诉,恍若底层民众艰辛生活的声腔化表达。

《相国寺民众娱乐调查》中记载:“梆子强者……其声呜呜然,如大声疾呼,如痛哭流涕,悲伤嗷然,感人最深。”^{[3](5)}这种带有悲怆色彩的唱腔,实际上反映了底层社会的情感结构。民国时期河南地区长期受到战争、灾荒与经济萧条的影响,大量农民破产流入城市谋生。对于这些生活艰辛的普通民众而言,戏曲不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情感宣泄方式。舞台上忠臣良将的不平遭遇、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往往能够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2. 京剧

与梆子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京剧。京剧在河南省也有“徽戏”“安庆戏”之称。关于京剧传入河南的确切时间虽未见明确记载,但其发展轨迹呈现出明显的受众下移特征。最初主要受到中上层人士的青睐,至民国时期逐渐向普通民众普及,成为跨阶层的娱乐形式。位于开封的同乐戏院是当时河南地区重要的京剧演出场所,共有艺员21人。这些艺人多数自幼学艺,通常在10岁左右开始接受系统训练。值得注意的是,艺人的收入差距悬殊,头牌演员余慧琴每月包银可达240两,而七龄童、贾进才和刘振亭等底层艺人每月仅有15两,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演艺行业的阶层分化,也折射出民国时期戏曲市场的商业化特征。^[15]艺人的学艺过程充满艰辛,业内称为“打戏”,即通过严格乃至严苛的训练方式培养艺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艺人学艺、表演的艰难,颇具现实意义。30年代,很多京剧知名演员先后到开封演出,如韩鸿奎、王鸿章、张鸿元、武鸿福、马最良、李雨田、芙蓉黄智斌、高媚兰等。1934年6月,梅兰芳、王义辰、姜妙香等百余人曾到开封人民会场为赈济河南灾民演义务戏8天,主要剧目有《洛神》《宇宙锋》《奇双会》《西施》等。^{[14](55)}

京剧与梆子戏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文化属性。梆子戏以表现下层社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风俗习惯为主,剧中人物多为平民百姓,剧情贴近市井生活,语言浅显直白,大量使用方言土语,演唱时多用口音,腔调高昂急促,整体风格粗犷质朴,不求细腻,以真挚浓烈的情感打动观众,体现出“俗”的特色。而京剧则主要展现上层社会的生活场景与礼仪规范,剧目题材多涉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词句文雅规范,采用官话演唱,发音讲究技巧,腔调舒缓圆熟,表演追求细腻传神,力求符合人物身份与剧情逻辑,呈现出“雅”的审美。这种艺术风格的差异根植于不同的观众群体:梆子戏因其通俗性深受占人口多数的下层民众欢迎,而京剧则更多为士绅阶层所欣赏。

这种差异实际上反映出近代城市社会内部的文化分层。不同社会阶层由于教育程度、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不同,其娱乐选择也存在明显差异。普通市民更倾向于观看情节通俗、情感浓烈的梆子戏,而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则更欣赏京剧所体现出的高雅艺术。

不过,相国寺作为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并未形成严格的文化区隔。梆子戏与京剧能够同时存在于同一空间之内,说明民国时期的城市公共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不同阶层虽然拥有各自偏好的娱乐形式,但仍共享同一公共空间,这也构成了近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特点。

(二) 说书

如果说戏曲是视觉与听觉相结合的综合艺术,那么说书则是一种完全依靠语言魅力进行传播的娱乐形式。在一个旷地中或者一间狭小的茶社里,摆下一张大桌,放一个四五寸长的醒木、一把茶壶、一个茶杯,外加几根木凳,便构成说书演出的全部设施。说书人立于其间,用极具表现力的语言和肢体动作,讲述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兴衰。当时在开封相国寺内说书的有八人,多集中于中山市场与振兴商场前的四个书棚中进行表演,其道具极为简单,仅有一个醒木、一把纸扇而已。说书在当时颇具影响力,《食货》载:“(正月)自初一日后,赴相国寺萧墙街,听谈古说因果。”^[12]演出时,听众环坐四周,说书人或依本宣科,或即兴发挥,每至关键情节,便击醒木、展纸扇,辅以丰富动作描摹人物情态,时而穿插诙谐言语以活跃场面,其表演形态已与现代说书近乎无异。

说书人在当时社会中存在着多样的文化形象,有调查将其归纳为“十二相”^{[3](96)},包括私塾教师、学校教员、大学学生、戏台名角、东方曼倩、木铎老人、观音大士、耶稣基督、传教牧师、魔术大家、爱国学生与革命健儿。这一分类虽带有主观色彩,却反映出时人说书人社会角色认知的多样性,以及其在民众精神世界中所承载的复合功能。相国寺内较具代表性的说书艺人包括戴明印、楚至钢、王福堂等,其中多数曾接受私塾教育,每日收入

介于四角至八角之间。其所演述的书目极为丰富, 涵盖《东周列国》《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施公案》《儿女英雄传》等七十三种, 题材纵横历史、侠义、神怪, 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民间艺术体系, 在娱乐大众的同时, 也承担着传承历史观念、道德伦理与集体记忆的文化功能。

(三) 日光电影

与戏曲和说书相比, 日光电影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娱乐形式。1928年, 中安社日光电影院在相国寺开业。虽然其设备十分简陋, 但却成为开封市民接触现代影像技术的重要窗口。其老板史幼斋最初以经营小杂货店为业, 后因生意亏本而贩卖玩具, 又因经济萧条, 最终选择改行从事日光电影的放映活动。^{[16] (154)}该影院设备较为简陋。放映时, 于室内墙壁悬挂白色布幕, 幕前放置数张矮凳; 放映机则架设于室外, 机后置一面小型反光镜, 使其光线能透过镜头及墙洞, 将电影画面投射在室内的幕布上。

在经营方式上, 影院采取集中放映而非按时放映的模式。影院助手在门外吆喝“百钱看电影”, 招揽十几二十位观众后便将门掩上, 开始放映电影, 每场大约一刻钟。所放映的片子比较芜杂, 包括西洋风景、家庭生活、市场风貌以及华人生活片等共十二类。此外, 在观影时, 史幼斋常常在放映时亲自解说片中场景, 但这并非为帮助没有见识过异域风情的观众理解影片中的内容, 而是史老板为了增加放映场次, 故意把影片裁剪开来, 然而放映时却并未组接得当, 于是变成凌乱的片段, 史老板只得在电影播放时牵强解说。^{[3] (236)}放映日光电影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 每到雨天或者大风天, 靠日光为源的日光电影便放映不了。不过若是观众多且没有日光, 史老板也会去购买影片放映。

关于影院的资本, 据史幼斋说只有二十多元, 买放映机占十五元。若买三元一盘的影片, 有四盘就够用了。影院的收入方面, 平均每天有一元五角, 房地租每月三元五角, 捐税约计二元。电影放映外, 该影院还兼营图书销售, 以此补贴家用, 在相国寺诸多娱乐经营中属于运作相对稳定的一例。这种多元化经营策略, 既反映出早期影院在技术局限下的适应性调整, 也体现了民国时期民间娱乐业者在商业化与生存压力之间的现实选择。

日光电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娱乐。更重要的是, 它改变了民众获取信息和认识世界的方式。过去, 人们只能通过口耳相传了解外部世界; 而电影则首次以视觉影像的形式将异域风光呈现在观众面前。因此, 电影进入相国寺不仅意味着一种新娱乐形式的出现, 也象征着现代技术开始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传统戏曲与现代电影同时存在于同一空间, 恰恰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历史特征。

三、娱乐场所的社会秩序

相国寺作为民国时期开封重要的公共娱乐中心, 其娱乐活动丰富多样, 人流密集, 但随之而来的治安问题也极为突出。民国时期的城市治理体系尚不完善, 公共权力对娱乐场所的管理存在明显缺位, 各类安全事件频繁发生, 形成一种制度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

据《大公报》报道, 当时相国寺内“看白戏”风气盛行, 戏院经营者常需向地方势力中的“大老板”提供票务恭维, 以防遭受报复。未遵从者可能面临暴力威胁。最典型的案例是和平戏院在演出期间突遭手榴弹袭击, 造成观众二死七伤, 而此前继国光电影院亦曾遭到破坏。^[17]这些事件显示, 地方强势群体通过暴力手段渗透娱乐市场, 使娱乐场所成为权力博弈的场域, 同时暴露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不足。

此外, 1939年《申报》记录了相国寺藏经阁前的恶性骚乱事件。河工王某携带歌妓游览时, 在藏经阁外言辞戏谑, 引来闲杂人群围观起哄。王某激怒后与民众发生争执, 演变为肢体冲突。混乱中, 歌妓遭受凌辱, “玉颜被污, 黛鬓蓬松, 衣裙尽裂, 备极踉跄”, 肇事者趁乱逃逸。官方派员追缉, 但因人群密集未能成功抓获。恰在此时, 石栏倾倒, 砸死两人。此事便不了了之, 未能有效缉凶。^[18]该事件充分暴露了公共场所秩序失控、基层执法力量薄弱以及社会道德观念的淡薄。

相国寺的治安问题具有多重成因。其一, 地方强势群体利用暴力干预娱乐市场, 形成事实上的“治外势力”, 而政府对其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其二, 城市下层民众在社会动荡、就业困难和经济压力下, 容易因失业、贫困而引发社会冲突与骚乱, 而政府缺乏社会疏导与就业保障机制。其三, 公共设施长期维护不足, 如石栏倒塌致人死亡, 反映出基础安全投入的缺乏和管理责任的淡化。此外, 娱乐场所内部管理规范缺失, 工作人员训练不足, 也加剧了安全风险。

治安问题不仅是安全隐患, 也是社会秩序与文化行为之间的张力体现。相国寺的娱乐活动展现了民众文化生活的活力和创造力, 但同时也反映了城市治理与社会规范在民国时期的脆弱性。娱乐场所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交错的空间, 这种交错既促进了公共文化的繁荣, 也带来显著的社会管理挑战。

结语

相国寺在民国时期的变迁, 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转型的历史进程。随着宗教功能的衰退, 商业

交易与娱乐活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促使这一传统寺院转变为市民社会的重要活动场所。戏曲、说书与日光电影等娱乐形式的共存,反映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汇;而娱乐场所中秩序失范与治安问题的频发,则揭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旧有规范瓦解与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现实处境。

因此,相国寺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民国时期开封民众的娱乐生活图景,更在于为理解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透过这一空间的功能变迁,得以窥见世俗化趋势下公共文化的发展,以及普通民众如何在时代变动中重塑自身的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

参考文献:

- [1] 熊伯履.相国寺考[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63.
- [2] 陈燕妮.城市中的宗教与文学——论北宋相国寺的存在意义[J].江汉论坛,2020(8):104-109.
- [3] 张履谦.相国寺民众娱乐调查[M].郑州:中国曲艺志河南卷编辑部,1989.
- [4] 王玉霞.民俗学视野下的相国寺历史变迁[D].开封:河南大学,2009.
- [5] 赞宁.宋高僧传:唐东京相国寺慧云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6] 李学良,赵道山,王剑生.大相国寺[M].北京:中国县镇年鉴社,2002.
- [7] 王明荪.东京梦华录:大城小调[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 [8] 孙洪伊在之情形表面游览古迹实则另有作用[N].大公报(天津版),1924-04-23(2).
- [9] 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政治卷·卷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1094.
- [10] 谢五知.忆相国寺[J].朔风,1939(3):12.
- [11]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李士彪,注.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 [12] 食货[J].第2卷第7期:31-32.
- [1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7[M].四库全书本.
- [14] 邵文杰.河南省志:第53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 [15] 王守谦,张明水.民国时期的开封街头娱乐[J].寻根,2012(3).
- [16] 开封市电影志编辑室.河南省开封电影志:上册[M].开封:开封市电影志编辑室,1989:154.
- [17] 锁链锁壮丁炸弹炸戏院[N].大公报(天津版),1946-11-03(4).
- [18] 申报[N].1939-11-23(12).
- [19] 开封社会近况中原战区几经残毁不景气中娱乐场极发达[N].大公报(天津版),1932-02-03(5).

Research on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People at Xiangguo Templ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Fu Yu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Xiangguo Templ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a traditional temple into an urban public space integrating commerce and entertainment, becoming an important window into the social changes of modern Kaifeng. The temple's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such as opera, storytelling, and daylight movies, combined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haracteristics, reflecting the cultural life and entertainment needs of the citizens.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at Xiangguo Temple refle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ecular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e in modern urban society.

Keywords: Xiangguo Temple; entertainment of the people; Kaifeng City

威尔士被纳入“大不列颠”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路径

巩晴

(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今天的英国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由英格兰(England)、苏格兰(Scotland)、威尔士(Wales)、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四个构成国组成的联合王国。其中关于威尔士纳入“大不列颠”的过程,最关键历史事件就是爱德华一世在13世纪末对威尔士的军事征服。然而,军事征服并不等于政治共同体的一体化。在1284年《威尔士法令》颁布之后,威尔士仍保留了部分本土的行政单位、土地习俗和部分法律,英格兰对其实行的是“被控制但未完全整合”的间接统治。直至16世纪亨利八世时期颁布1536和1543年的《联合法案》,威尔士才在法律、行政和代表制上真正被纳入“大不列颠”政治共同体。

关键词: 威尔士; 爱德华一世; 《联合法案》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31

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形成中,威尔士的加入过程往往被视为英格兰早期扩张的典型案列。然而,与苏格兰通过王位继承与条约实现合并、北爱尔兰通过殖民与条约确立地位不同,威尔士的纳入路径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时间跨度。截至目前,国内学术成果对于威尔士的融入路径目前仍主要出现于英国通史、英格兰扩张史或民族国家形成史的叙述之中,缺乏从军事征服、间接统治到法律整合三个环节贯通的系统性分析,本文拟做一浅显尝试。

一、军事征服阶段:13世纪爱德华一世的战争与初步控制

威尔士位于大不列颠岛的西南部,东面与英格兰接壤,西邻圣乔治海峡,南面是布里斯托尔湾,北靠爱尔兰海,该地区山峦叠嶂,气候恶劣,仅有少量平原分布在南部。中世纪时期的威尔士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而是由多个王公领地构成,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为英格兰的扩张提供了条件。正如R.R.戴维斯所说,“诺曼底人用一个世纪在黑斯廷斯征服英格兰,却用了两个世纪才完成对威尔士的征服”。“威尔士多山的地貌和各形各色的土著政治使它很难走向统一,从而加深了英格兰征服威尔士的困难。”^{[1]65}因此,英格兰的征服受限于威尔士多山的地貌和分散的政治结构。

直到13世纪后期,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通过1276—1277年、1282—1283年的两次大规模战争及1287年、1294年两次平定叛乱,彻底打破了威尔士本土势力的抵抗。^{[2]165-219}1276-1277年第一次威尔士战争的爆发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是由于13世纪以后,英格兰逐渐走上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趋势决定了爱德华一世继位后必然改变以往英格兰君主对威尔士的妥协策略,他的政治生涯也因此与威尔士紧密相连。^{[3]268-270}偶然性则是这个时期爱德华一世继位不久,军事实力尚且不足,无法实现他对于威尔士地区彻底的征服。“封建军役骑士配额严重缩减,与爱德华一世迫切的军事需要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冲突。”^[4]但随着1255年小卢埃利在布林德温击败兄弟欧文和大卫,随即囚禁欧文,并与大卫达成协议,其势力得以稳固后开始着手夺取威尔士的支配权,之后与亨利三世于1267年签订《蒙哥马利条约》,按照其规定应向正在十字军东征途中的爱德华一世宣誓效忠并按时缴纳贡金,但卢埃林表示拒绝并乘机率军进犯英国的边界地位。因此,爱德华一世继位后受制于现实条件并没有立刻对威尔士盲目发动战争,但卢埃林自大好战的行为使其“才决定施行其威尔士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于是在回国后对威尔士采取进攻行动。^{[1]66}1276-1277这场战役展示了英格兰王国动员战争资源的迅速性和彻底性:

作者简介: 巩晴(2002-)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世界史。

“弩手从加斯科涅招募，重型战马从法国进口，大量工匠和工程师被强制征募，意大利银行家提供充足的现金流。这一切使得爱德华能够轻松克服此前英军面临的补给问题。同时，这也是新兴民族国家动员其资源进行协调一致的中央集权式战争努力的一次展示。”^{[5]334-335} 战后双方签订了《康韦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卢埃林需向爱德华行臣服礼并宣誓效忠，承认已被爱德华征服的领土为英王领地，同时归还所欠英王的债务；作为交换，爱德华则承认卢埃林“威尔士亲王”的称号，并允许他在北部地区继续实行威尔士的法律和习俗。1278年，卢埃林在威斯敏斯特正式向爱德华行了效忠礼。

爱德华一世从第一次威尔士战争的胜利中看到了征服威尔士地区的可能性，于是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对威尔士发起第二次征服战争。1282年，边疆贵族与卢埃林之间的财产纠纷，以及威尔士土王之间的争端应由爱德华还是卢埃林裁决这一问题导致争端又起。“爱德华一世在其中的推诿和法律欺诈也只能被视为持续表现出严重的政治迟钝，或是一种蓄意的政治羞辱行为——无缘无故地贬低他的对手和更重要的臣民。正如卢埃林自己所说，他‘完全陷入绝望’，他感到被羞辱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所涉土地的任何价值。绝望的人是危险的人。”^{[5]346-347} 然而，卢埃林个人的绝望本身并不足以引发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只有与威尔士本土民众更普遍的不满和愤怒相结合时，起义才有可能发生。“面对专横的英王官员与日益沉重的税收压榨，备受压迫的威尔士人的反感之情愈发明显。”^{[6]99} 面对这种情况，爱德华一世决定在1282年至1283年间进一步发动对威尔士的决定性征服。在卢埃林兄弟反叛的背景下，英军迅速集结重装骑兵、步兵和弓箭手，控制了海洋补给线。第二次战争与第一次战争一样，并不仅仅依靠优秀的将领指挥或是决定性的战役取得胜利，而是借助高效的资源整合和巧妙的资源部署，但第二次战争已不再像1276-1277年间那样不紧不慢。“起义爆发后的四天内，他便设立了三个军事指挥部来组织对挑战的初步应对，并将指挥权委托给了他最亲近的三个心腹，然而，速度的提升并未削弱大规模进攻准备的周密性。除了来自西部各郡的郡征兵和雇佣兵外，还增加了一支1000人的高效但昂贵的弩手部队；征用了40多艘船只，用于运输补给和准备进攻安格尔西岛；……当资金短缺时，爱德华毫不犹豫地没收了为十字军在圣殿骑士团和各座大教堂筹集的资金；鼓励教士和市民提供自愿贷款；议会在1283年1月对动产征收了三分之一税；资金通过王室内务府进行调拨，并为此次战役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内务府账户。”^{[5]349-350} 最终，1283年卢埃林战死，次年其弟大卫被处极刑。此后，爱德华一世通过1284年颁布的《威尔士法令》（也称《鲁德兰法令》），将北威尔士划分为若干郡，由王室官员直接管理，实现了对威尔士的军事控制，对威尔士地区实现了全面征服。之后发生在1287年、1294年的两次叛乱起义也很快得到了镇压，威尔士问题至此得到彻底解决。

二、间接统治阶段：征服之后的分化与妥协

第二次威尔士战争的胜利标志着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完成了对威尔士地区的军事征服。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征服并不等于整合。威尔士并不是在被征服之后就立即成为英格兰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英格兰在威尔士实行的是一种“差异化统治”。

一方面，爱德华一世并未试图将其法律和行政区划扩展到边疆领地，而是允许边疆领地根据“当地习俗”解决争端，只有在最后关头才提交给国王的法官。“爱德华一世时期的威尔士行政区划仅限于国王直接管辖的地区。爱德华一世并未试图将其法律和行政区划扩展到边疆领地，甚至未扩展到他在1277-1283年间慷慨设立的那些领地。边疆地区的自由特权已经根深蒂固；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特权赋予了边疆领地几乎不受国王行政、司法和财政控制的豁免权。只有在未成年或因政治没收的情况下，国王的控制才会延伸到边疆地区，而且国王对边疆地区最终司法监督的主张仅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被行使。爱德华一世无意挑战这一现状。事实上，他明确规定边疆领地之间的争端应根据“当地习俗”解决；只有在最后关头，此类争端才应提交给国王的法官。”^{[5]376-377}

另一方面，威尔士的法律和习俗在某种程度上被保留下来。例如，《威尔士法令》保留了当地威尔士社会的土地习俗和民事程序，只有在这些习俗违反英国惯例所传达的自然公正和基督教道德时，才会被禁止。此外，在行政区划层面，爱德华一世在其威尔士领地中引入了郡（shire）作为财政和司法组织的关键单位。“每个郡都由一位郡长负责，郡长和英格兰的郡长一样，是负责郡财政收入的郡首席财政官和主持郡法院开庭的郡首席司法官……威尔士最显著的特征是郡的建立和郡长的建立。”^{[7]75} 在地方层面，爱德华一世的行政制度创新性较少。原有的威尔士行政单位——commote（当时已被接受地称为“百户区”，即郡以下的一级行政机关）——仍然是

司法判决和税收征收的基本单位。地方习俗、边界、官职及费用基本保持不变；在人事任命与制度安排上，地方治理也必须适应既有的本土威尔士社会结构。^{[8]177}

与此同时，当爱德华一世专注于在威尔士本土奠定新的英国统治基础时，坎特伯雷大主教佩克姆也在同时处理那里的教会事务。佩克姆积极捍卫威尔士教会的自由，甚至多次提醒爱德华一世要尊重威尔士教会的自由。“他警告国王要保护威尔士教士免受“肉体智慧，精神愚昧”的王室官员的侵害，以免国王的荣耀增长“最终演变成教会的哀悼”。^{[7]107} 爱德华一世作为一名统治者虽然内心非常不愿意，但是他知道必须尽可能争取教会的支持。公元 1284 年，爱德华一世和佩克姆分别进行了两次巡视，六月前往圣戴维斯，为该教区和一些修道院颁布了禁令，并为修复战争中受损的威尔士教堂积极筹集资金。九月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威尔士皇家巡游。之后又与他的王后一起以朝圣者的身份来到了圣戴维斯，以此向威尔士的圣地示好。由此，爱德华一世和佩克姆在威尔士教会确立了他们的权威。

为了维持在威尔士地区的统治，爱德华一世还通过象征性手段安抚威尔士人。据传，他曾许诺给威尔士人一个“土生的亲王”。1284 年，爱德华一世和埃莉诺的孩子爱德华二世在卡那封出生，他便以此为“威尔士亲王”，这一称号从此成为英王太子的传统头衔。^{[9]162} 因此，这一时期的威尔士可以说处于一种“被控制但未完全整合”的状态。

三、法律整合阶段

虽然爱德华一世在 13 世纪已经奠定了军事和法律的基础，例如通过《威尔士法令》引入英国普通法的惠益，允许寡妇享有亡夫三分之一的土地作为嫁妆、允许女性在无男性后裔时继承土地等。“鉴于威尔士的习俗与英格兰不同，关于遗产的继承，遗产可在男性继承人之间分割，并且自人们记忆所及以来一直如此，我们的国王不愿废除这一习俗，而是希望遗产继续与以往一样分割，并且同一遗产的分割继承人之间应如以往一样进行。但有一点例外，从今以后，私生子不得继承；并且不得与合法继承人共同占有份额，也不得在没有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占有份额，如果将来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任何遗产都将传给女性，她们是该遗产的合法继承人。我们将以我们特别恩典允许这些女性在我们法庭上获得她们的份额，尽管这与威尔士以前使用的习俗相悖。”^{[10]25-26} 但这些措施在当时并未彻底打破威尔士的本土社会结构。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 16 世纪。亨利八世推动通过 1536 年和 1543 年的《联合法案》，将威尔士纳入英格兰的法律与行政体系。托马斯·克伦威尔是首要政策制定者，他根据威尔士地区独特的地理情况和社会情况，采取实现王国境内统一、提高管理效率的战略。“克伦威尔知道，威尔士海岸缺乏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并且它的边地领主大多桀骜不驯，所以，威尔士是一处非常不安定的地方，并且它还阻碍着他建立一个更具效率、更加先进的政府体系目标的实现。”^{[6]155} 1536 年法案的制定较为仓促，因为立法者迫切地希望把边地领主的势力扫除并且借助建立郡政府统一威尔士内部。威尔士被重新划分为 13 个郡，在议会中获得 27 个席位。如图 1 所示“威尔士分成了 13 个郡。其中的六个郡——安格尔西郡、卡那封郡、梅里奥尼斯郡、弗林特郡和卡马森郡——是在 1284 年《威尔士法令》后就存在了，而新成立的七个郡则是从那些已经死去或者受人痛恨的边地领主区内重新规划而出现的，它们是：登比郡、蒙哥马利郡、布雷肯郡、拉德诺郡、蒙茅斯郡、格拉摩根郡和彭布鲁克郡。”^{[6]156} “威尔士的每个郡都享有议会席位：蒙茅斯郡两名议员，其他各郡各一名议员，除梅里奥尼斯郡外，各郡内所有古老自治市镇各一名议员。”^{[11]56} 此外，英语成为所有官方事务的法定语言。“对于那些在威尔士担任公职的绅士和自由持有者而言，掌握英语将是强制性的；任何仅懂威尔士语的人，除非在任职期间知晓并使用英语，否则不得担任或享有公职。”^{[12]159} 因此，此后成为公职人员对于只掌握单一威尔士语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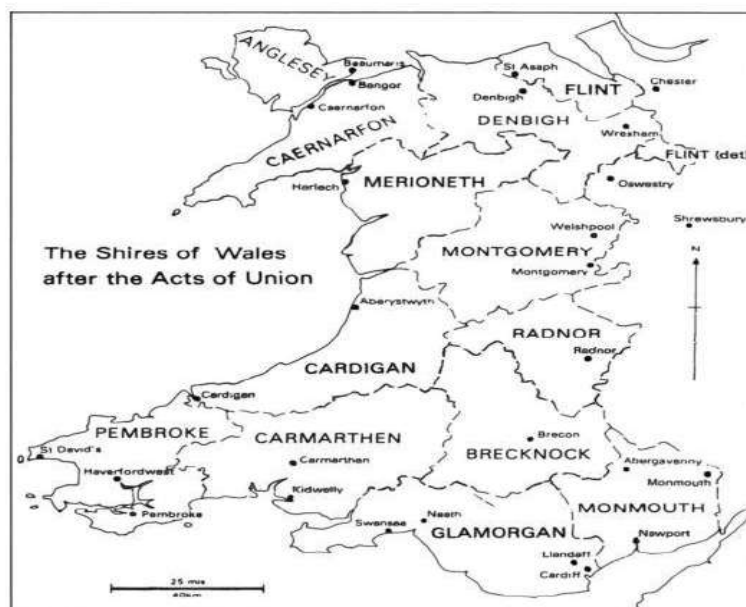


图 1: The Shires of Wales after the Acts of Union^{[11]57}

1543 年议会通过第二部法案。长子继承制取代了威尔士传统的土地分割继承。“继承与土地保有形式的变革——尤其是引入英格兰土地保有形式、长子继承制的发展以及土地处置的更大自由——促进了自由持有地产的发展，并遏制了继承人之间土地分割的趋势。”^{[13]81} 郡的行政管理模式与英格兰完全一致，设有治安法官、郡长等，并且因为威尔士某些郡的乡绅阶层较为贫困，取消了之前需要拥有价值每年 20 英镑土地的财产资格要求。

“1543 年的法令认可了威尔士之前的郡划分，并作了些许修改……特别是郡治安官和治安法官的职位对郡政府至关重要。每个郡最多只能任命八名治安法官，但人数很快超过了规定。”^{[14]67-68} 高等法院新增巡回区，覆盖除蒙茅斯郡外的整个威尔士地区，废除了所有威尔士刑法。这些变革永久界定了领土边界，带来了统一的法律体系、行政结构和更高效的司法，威尔士人口也因此大幅增长。

在社会与宗教层面，1536 年和 1543 年的联合法案推动了深刻但复杂的变革。土地贵族受益于边境特权的废除和教会财产的重新分配。“从 1535 年起，亨利和克伦威尔显然准备默许将部分修道院土地赠予或出售给他们的亲信……不久之后，几乎所有收益都归于本地地主。”“最大的买家是本地士绅……如约翰·普赖斯（布雷肯）、赖斯·曼塞尔（马加姆）、爱德华·卡恩（尤文尼）等。”“废除边境领主特权后，廷特恩修道院的土地被赠予伍斯特伯爵，以补偿他在边境领主特权废除中所受的损失。”^{[15]290-291} 英语教育迅速扩展，牛津大学耶稣学院专门招收威尔士学生。“1571 年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建立，加强了发展中的新教、英语语言、向英格兰看齐的习惯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协同作用……该学院实际上成为威尔士的大学。”^{[13]100} 然而，官方强制使用英语使只会说威尔士语的普通民众常常受到欺骗和剥削，但双语词典和启蒙读物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语言所产生的隔阂。宗教方面，威尔士的许多宗教建筑被破坏，修道院被解散，教会财产被低价出售。“在威尔士剩下的约四十座宗教建筑中，大多数都遭到了破坏，有些甚至完全消失了。其中一些在被取缔之前就已经严重破败不堪；例如斯特拉塔马尔塞拉（Strata Marcella）的西多会修道院，到十六世纪初就已经处于严重的破败状态。如今那里地上什么也看不见了，格雷斯迪厄（Grace Dieu）、马内恩（Maenan）、惠特兰（Whitland）和兰塔纳姆（Llantarnam）的修道院也是如此。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在克姆希尔也发生，已经采取了措施，以防止那里仅存的中殿被偷走而消失殆尽。”^{[16]91} 但改革后的宗教仍获得信徒。到 16 世纪中期，威尔士才真正从“被征服的边疆”转变为“国家结构的一部分”，完成了从军事征服到制度整合的长期过程。^[17]

四、结语

综上所述，威尔士并不是通过一次事件被纳入大不列颠，而是经历了从军事征服到制度整合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英格兰的领土扩张，也反映了其国家权力如何通过法律和制度向边缘地区延伸。因此，英格兰

对威尔士的统治并非单纯的武力征服，而是伴随着制度上的妥协与渐进融合。

参考文献：

- 1、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 2、（英）马克·莫里斯，李若曦译，《爱德华一世：伟大而令人战栗的国王和他锻造的不列颠》，中信出版社，2018。
- 3、（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英语国家史略》（上卷），新华出版社，1985。
- 4、王向鹏，孟广林，《论爱德华一世朝英国骑兵役征募制之破立——以威尔士战争征召令状为例》，《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
- 5、R. R. Davies, *The Age of Conquest wales 1063-1415*,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6、吉拉恩特·H.詹金斯，孙超译，《威尔士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
- 7、Trevor Herbert ,Gareth Elwyn Jones.Edward I and Wales,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1988.
- 8、（美）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道格拉斯·R.比松著，潘兴明等译，《英国史上册：史前—1714年》，商务印书馆，2013。
- 9、（英）西蒙·沙玛著，彭灵译，《英国史 I：在世界的边缘 300BC—AD1603》，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 10、Bowen,Statutes of Wales,1284.转引自 Trevor Herbert ,Gareth Elwyn Jones.Edward I and Wales,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1988, p.87.
- 11、J.GRAHAM JONES,The History of Wales,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14
- 12、Katharine K. Olson, The Acts of Union: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Wales, c. 1540-1700,in Geraint Evans, Helen Fulton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elsh literature.
- 13、Black, Jeremy.A New History of Wales. Stroud, Gloucestershire, England: Sutton,2000.
- 14、Jones, Gareth Elwyn.Modern Wales: A Concise History. 2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5、Williams, Glanmor, Renewal And Reformation: Wales c.1415-1642 (Oxford History of Wales) (Vol 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6、Davies, John.The Making of Wales. Stroud, Gloucestershire, England: The History Press,2009.
- 17、邵逸舒，《亨利八世时期威尔士政府改革》，《世界历史评论》，2025年第3期。

The Historical Path by which Wales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of "Great Britain"

Qing Gong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China)

Abstract:Today,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is the full name of the country. It is a union of four constituent countries: England, Scot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 The most crucial historical event regarding the incorporation of Wales into "Great Britain" was the military conquest of Wales by King Edward I in the late 13th century. However, military conquest does not equate to the integration of a political community.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Welsh Ordinances" in 1284, Wales still retained some of its native administrative units, land customs, and some laws. England exercised indirect rule over it, "controlled but not fully integrated". It was not until the 16th century 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that the "Union Acts" of 1536 and 1543 were promulgated, and Wales was tru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of "Great Britain" in terms of law, administr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Keywords:Wales; Edward I; The Union Act

“俄克人”移民与二战后加州现代保守主义的兴起

董奕成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 20世纪30至40年代,一批被称为“俄克人”的美国南方白人移民群体迁入加利福尼亚州。这一亚文化群体在二战后加州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兴起的过程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俄克人”初入加州之时,是民主党“新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了加州进步主义在20世纪40至50年代的强盛。但是随着“俄克人”在经济领域完成中产化,文化坚持福音派信仰。在全国性政党重组与福音派保守主义兴起的大背景下,“俄克人”成为加州乃至全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这一历史现象的具体表现便是“俄克人”的政党认同经历了从民主党到独立选民、再到共和党的政治转向。至今,“俄克人”都是加州共和党的稳固基本盘。

关键词: 加利福利亚州; 俄克人; 福音派; 政党重组; 现代保守主义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45

在二战后美国的政治版图之中,加利福尼亚州戏剧性的转变是一个格外引发史学家注意的现象。这个在大萧条以及战争时期以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著称的“黄金之州”,在20世纪60年代却成为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重要摇篮。正是在加州,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等代表性人物崛起,此后更是超脱出加州,将他们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到了整个美国。20世纪60年代,现代保守主义在加州的崛起和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一场美国国内移民大迁徙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便是“俄克人”(Okies)群体的迁徙。正如南方黑人的两次迁徙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种族格局并推动民权运动的发展,作为美国南方外迁白人的代表,“俄克人”也重塑了加州的文化与政治版图。

一、“俄克人”与加州政治生态的初遇

“俄克人”(Okies)^②最初只是对“俄克拉荷马人”(Oklahomans)一词的简称,在大萧条时期的加州成为对当时从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阿肯色和密苏里四州迁往加利福尼亚的贫困白人的贬称,后来随着20世纪40年代新的“俄克人”的到来以及这一群体整体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一词语逐渐成为针对加州的西南部白人移民亚文化(Subculture)^③群体的称呼。

1910年至1950年间共有约140万美国西南部居民定居在加州^④,这些人及其后代构成了“俄克人”的主体。这场人口外流可以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三个时期,20世纪10年代至大萧条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对“俄克人”形成影响较小,只能算序幕。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迁徙到加州的“尘暴难民”(Dust Bowl Migration)和20世纪40年代国防工业发展引发“第二次淘金热”(The Second Gold Rush)带来的“国防俄克人”(Defense Okies)群体才是加州“俄克人”的主要来源。

加州的“俄克人”移民潮的产生本质上是一场延续数十年遍布全美国的结构性人口再分布的庞大历史背景中的一环。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大量的南方人口迁出故乡,前往其他地区,这一现象一直要持续到20世纪70

作者简介: 董奕成(2002—),男,湖南省常德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② Okies一词在中文中常常被翻译为“俄克佬”,采用这一翻译的原因大体是因为其贴合美国著名小说《愤怒的葡萄》之中的文学意境。考虑到“俄克佬”一词所带有的贬义色彩,故笔者将该词语翻译为不包含任何情感色彩的“俄克人”一词。

^③ 亚文化(subculture)是一种具有相当弹性的概念。其是一种社会形态,拥有独特的规范与价值观体系,能为其成员带来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并为社会互动提供特定的场域。关于“俄克人”亚文化更详细地论述可以参见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9-145.

^④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

年代,“阳光地带”兴起、北方城市逐渐衰落,南方外流人口数量增长才趋于平缓。^①这一时期被美国学术界称为“南方大迁徙”(Southern Diaspora)。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于南方黑人群体的两次大迁徙,却很少关注到南方白人群体同样是“南方大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1970年,约有700万非拉丁裔南方白人居住在南方以外,而同一时间只有约330万南方黑人群体居住在其他地区^②。加州的“俄克人”正是反应这一“南方白人大迁徙”的重要代表群体。

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俄克人”内部在文化认同与政治理念上有着较为清晰的特征。在政治态度上,“俄克人”来自于南方民主党历史传统深厚的大平原地区,这使得他们初抵加州时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党支持者。同时他们也深受19世纪末的人民党运动(Populist Movement)和农民联盟(National Farmers Union.US)的影响——往往呈现出文化与种族议题上保守,经济议题上呈现民粹主义与农本思想。^③这一群体对罗斯福新政怀有情感与政治的双重认同,并毫不掩饰对于共和党的敌意。一个经典的“俄克人”笑话便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小女孩的三只小猫起初是共和党人,可出生一周后,它们睁开眼睛,就变成了民主党人。”^④

“俄克人”还秉持着一种被称为“平民美国主义”(Plain-Folk Americanism)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只承认两大社会阶级:生产者和寄生者。在追求社会公平的同时,这种意识形态还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其所追求的社会公平只是白人内部的平等,且带有对少数族裔的歧视。这一意识形态还并且呈现出强烈文化保守主义与反共主义的色彩。^⑤

单从人数上而言,“俄克人”便是加州政治无法忽视的一个群体。20世纪20年代便有约25万人定居加州;大萧条时期,又有25万至30万人迁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防工业热潮又吸引了约60万至70万西南地区居民的到来。截止1960年,共计又170万“俄克人”定居加州,占到当时加州人口的八分之一,且这一群体大多数都是白人。^⑥如此庞大的迁入规模,直接冲击了加州既有的政治格局。

“俄克人”首次大规模展现其政治影响力,是在1934年的“结束加州贫困”(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简称EPIC)运动及随后的州长选举中。这场运动由著名进步主义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发起,主要主张为“为了使用而生产而非为了追求利润”。这一带有左翼色彩和民粹色彩的政治主张吸引了大量因为大萧条陷入困境之中的贫困选民,辛克莱本人也借此声望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与到1934年的加州州长大选之中。^⑦尽管辛克莱最终因建制派的强力反击而败选,但“结束加州贫困”运动展示了加州民粹主义政治的巨大能量,而“俄克人”正是这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除“结束加州贫困”外,同一时间发生的声势浩大的养老金运动也能说明“俄克人”对加州政治的影响力。1933年,长滩医生弗朗西斯·汤森(Francis Townsend)提出了每月向老年人发放150美元养老金的计划,以此来通过刺激消费来结束萧条,^⑧该运动在“俄克人”社区中尤其受欢迎。虽然计划最终失败,但是在1937年,该计划又引发好莱坞公关人士艾伦兄弟(Allen brothers)主导了新的养老金计划——史称“火腿与鸡蛋”(Ham and Eggs)运动。该运动主张每周四向50岁以上的失业者发放30美元的凭单。“火腿与鸡蛋”集会遍布全州,展现出了惊人的影响力。^⑨最终这一提案以139.8万票反对、114.3万票支持的结果被否决。^⑩尽管最终失败,但“火腿与鸡蛋”运动在动员“俄克人”选民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其支持率在“俄克人”聚居区远高于加州其他地区。

“俄克人”对加州政治最直接的制度性影响,体现在1938年的州长选举中。民主党人卡尔伯特·奥尔森

^① James N. Gregory, *The Southern Diaspora: How the Great Migrations of Black and White Southerners Transformed Americ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p. 12.

^② James N. Gregory, *The Southern Diaspora: How the Great Migrations of Black and White Southerners Transformed Americ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p. 14.

^③ Walter J. Stein, *California and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Greenwood Press, 1973, pp. 88-89.

^④ Walter J. Stein, *California and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Greenwood Press, 1973, p. 90.

^⑤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9-171.

^⑥ James N. Gregory, “Dust Bowl Legacies: The Okie Impact on California, 1939-1989,” *California History*, vol. 68, no. 3 (1989), p. 76.

^⑦ Carey McWilliams, *Southern California: An Island on the Land*, Gibbs Smith, 1973, pp. 310-312.

^⑧ Carey McWilliams, *Southern California: An Island on the Land*, Gibbs Smith, 1973, p. 313.

^⑨ Kevin Starr, *California: A History*, Modern Library, 2007, p. 212.

^⑩ Carey McWilliams, *Southern California: An Island on the Land*, Gibbs Smith, 1973, p. 320.

(Culbert Olson) 成功击败共和党在任州长弗兰克·梅里亚姆 (Frank Merriam), 这是自 1890 年代以来民主党首次赢得州长职位。“俄克人”表现出来对民主党的忠诚, 而且他们的选民登记活动对选举结果产生了实质性影响。1938 年中期, 该州的选民登记人数增加了 20 多万, 这一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出现在农村地区, 特别是“俄克人”迁入区。马德拉县增幅达 35%, 默塞德县 24%, 克恩县 22%。在这些地区, 奥尔森取得了重大的胜利。^①这些地区在“俄克人”到来之前, 长期被支持共和党的农业利益集团所把持着, 共和党借此长期约束着城市之中的民主党势力。诚然, 在“俄克人”到来之前, 这些地区已经呈现出民主党选民增加的趋势, 但是“俄克人”的到来无疑加速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 此时的“俄克人”毫无疑问是民主党新政联盟的支持者, 对民主党保持着高度政党忠诚。他们的到来推动了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加州进步主义在的发展。同时, 我们也应当看到“俄克人”思想之中的矛盾性所在, 这种矛盾性使得“俄克人”在战后逐渐脱离新政联盟, 转向现代保守主义。

二、郊区“俄克人”的保守化

“俄克人”在进入加州之后, 呈现出两股不同的居住倾向——一部分集中在以洛杉矶、湾区和圣迭戈为代表的大城市的郊区地带, 另一部分则集中于以圣华金谷 (San Joaquin Valley) 为代表的肥沃农业谷地的城镇与小城市之中。^②无论是居住在何处的“俄克人”都在战后出现了保守化的倾向。

不论是居住在大城市地区, 还是居住在农业谷地, “俄克人”在战后都经历了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根本性改善。在美国正式参加二战之前, 加州仍饱受失业率居高不下问题的困扰, 但是随后到来的国防建设热潮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 甚至导致加州一度出现劳动力紧缺的局面, 不得不重新打开国门, 引入墨西哥劳工。

在战争期间, 大量的西南人参加军队, 在军中服役, 剩下的“俄克人”也纷纷进入工厂之中, 成为了国防工业创作出的庞大蓝领大军中的一员。据统计, 战时里士满的凯撒造船厂的 90000 名工人之中有 28% 的成员来自于西南部四州——这也是“俄克人”的主要来源地。在洛杉矶的终端岛 (Terminal Island) 加州造船厂之中, 34000 名员工有 19% 是 1941 年 12 月以后到达加州的西南部移民, 这还不包括此前就已经到达加州西南人员工。^③大量的“俄克人”成为蓝领工人的现象对群体本身产生了两大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俄克人”整体经济条件的进步与社会身份的跃升。据统计, 1940 年至 1950 年期间, “俄克人”男性的收入中位数增长了 152%, 家庭收入增长了 131%, 即使去除同一时期上涨了约 70% 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俄克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任然是提升的。众多“俄克人”移民成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即使是留守在农业谷地的“俄克人”也享受到了国防经济发展的红利, 到 1949 年, 当地“俄克人”居民家庭收入中位数已经达到 2970 美元, 与其他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缩小。^④经济收入的提升也带来了社会地位的提升, 郊区“俄克人”逐渐融入到当地的白人社区之中。

伴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 “俄克人”也深度参与到战后白人郊区化的浪潮之中。这一郊区化趋势在战争期间便已经开始。为了满足国防工人住房的需要, 洛杉矶东南部的贝尔花园、林伍德、唐尼, 旧金山湾区附近的瓦列霍、布里斯班、奥克兰地区的工人阶级郊区便在这一时期修建, 并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进入。这些社区的居民之中很大一部便是“俄克人”。^⑤战后, 凭借着战时积攒的积蓄, 或者是利用退伍军人的身份, “俄克人”借助联邦住房管理局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和退伍军人管理局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提供的贷款担保, 成为了加州城市郊区扩张的积极参与者。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社区便是长滩附近的莱克伍德 (Lakewood), 作为由开发商规划的新型郊区样板社区, 该社区的首批定居者之中便包括很多“俄克人”。^⑥在随后的日子里有更多的“俄克人”搬入该社区, 使得该群体在这一社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① Walter J. Stein, *California and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Greenwood Press, 1973, pp. 92-93.

^②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9-40.

^③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75.

^④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87-189.

^⑤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76.

^⑥ Peter La Chapelle,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130.

郊区化带来了大都市地区“俄克人”的社会关系的重组,在富裕的郊区社区之中“俄克人”呈现出对中产阶级和加州身份认同。这点在莱克伍德社区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许多“俄克人”居民放弃了原有的宗派,同时试图隐藏自己的西南部口音,他们在中产阶级化的同时也继承了加州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

乡村音乐的转变反映出了“俄克人”的文化保守化倾向,同时乡村音乐的保守化也反过来加速了作为音乐受众的“俄克人”的保守化。乡村音乐在加州的转型可以简单概括为,从20世纪30年代服务于特定群体的地区性民俗歌谣到20世纪40年代为国防工业之中的工人阶级群体服务的西部摇摆乐(western swing),再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为白人中产阶级,乃至全美观众服务的商业化流行音乐。

20世纪50年代,乡村音乐开始了明显的“中产阶级化”转型,这一过程伴随着“俄克人”迁入更白人化和更富裕的郊区,表演者和行业从业者开始可以淡化40年代乡村音乐与蓝领群体之间的关联性。甚至不再强调“俄克人”身份的独特性,转而强调一种模糊的牛仔意向,将受众定位为更年轻化的郊区中产阶级群体——这一群体在文化和种族构成上也更具有同质性。^①这一转型在广告和赞助模式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赞助乡村音乐的主要是服装、食品杂货和汽油等必需品商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对全乡村音乐电台和新的乡村音乐电视节目提供主要商业支持的公司开始转向销售更昂贵的耐用品,例如家具连锁店和电视机制造商”^②。汽车经销商成为乡村音乐广播的重要赞助者,而唱片公司和粉丝杂志则开始通过强调听众的中产阶级属性来吸引广告商。到20世纪60年代末,当地主导的粉丝杂志《乡村音乐生活》宣称其读者“70%拥有住房,每户家庭拥有1.6辆汽车”,尽管更客观的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乡村音乐听众家庭年净收入不足11000美元”^③。乡村音乐行业正在积极塑造一个与其核心受众实际经济状况并不完全匹配的消费群体想象,并且消费群体也乐于接受这种想象。

乡村音乐成为现代保守主义政治文化的载体。“大萧条时期电影中乡村音乐牛仔形象脱离了自由民粹主义的根基,到20世纪50至60年代,这一形象又重新出现,成为一种全新、白人郊区化美国主义的象征,这种美国主义敌视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与世俗主义”^④。曾经在“俄克人”边缘时期为边缘群体呐喊的乡村音乐,如今成了郊区白人中产阶级确认自身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这一转型深刻反映了“俄克人”从被歧视的“乡巴佬”到郊区中产阶级的身份蜕变,也为其政治立场的右转提供了文化合法性。

彼得·拉·沙佩勒(Peter La Chapelle)认为亚文化鲜明的“俄克人”身份特征开始逐渐瓦解,融入更广泛的“郊区白人”范畴之中,放弃了平等主义的冲动。^⑤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首先是笔者并不认为20世纪40年代西部摇摆乐时期的乡村音乐是其发展主流,恰恰相反,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俄克人”推崇的平等主义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这一色彩远远超过他们到来之前的加州本土白人中产阶级,植根于其来源的大平原地区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观念之中。其次,是我们将在下文展开论述的,大都市郊区地区的“俄克人”并不是“俄克人”的全部,但就从亚文化的角度来阐释,农业谷地的“俄克人”认同要远比郊区的“俄克人”认同来的牢固,郊区“俄克人”认同的消融并不能说明“俄克人”身份认同的瓦解。

综上所述,大都市郊区的“俄克人”融入到郊区白人中产阶级的大共同体之中,但是其政治影响并没有随着文化身份的表面消解而消退,反而是其保守主义价值观得以通过郊区空间和消费实践得以更为有效地传播和固化。同时也超脱出地域的限制,成为面向全美白人中产阶级的流行音乐。

三、福音派与农业谷地“俄克人”的保守化

当郊区的“俄克人”努力的隐藏自己的西南部口音的同时,居住在农业谷地的“俄克人”却自豪地展示着他们从家乡带来的风土人情,如果让一个毫不知情的加州人前往“俄克人”聚集的圣华金谷,他甚至会感觉身处在俄克拉荷马州而非加利福尼亚州。与他们在郊区社区中居住的同乡不同,山谷之中的“俄克人”不但赢得了这场

^① Peter La Chapelle,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123.

^② Peter La Chapelle,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124.

^③ Peter La Chapelle,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127-128.

^④ Peter La Chapelle,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115.

^⑤ Peter La Chapelle,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173.

“文化战争”的胜利，他们还反过来同化了社区周围的其他白人居民。“俄克人”的基督教福音派信仰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福音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主要派别，由众多不同的新教分支派别组成，其共同点在于对福音主义的追求，即着重强调个人灵性感觉的重要性。^①“俄克人”此前居住的美国西南部有着浓厚的福音派宗教背景，当地几乎见不到其他的宗教和宗派信徒，信仰极其单一，多为基督教新教福音派，且深受复兴主义-基要主义的影响。^②福音派在20世纪的变革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作为其忠实信徒的“俄克人”。

在现在的美国，福音派常常与新右翼与新保守派相联系，但是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一战前美国西南部激进主义盛行的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了福音派传教士和虔诚农民的支持，社会主义主张被认为与千禧年主义基督教(chilastic Christianity)教义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③但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这种联系开始发生改变，福音派奉行一种回避主义的态度，拒绝参加政治活动，因为其认为任何形式的世俗活动都应该避免，否则便会分散人们追求个人救赎的注意力。这种主张使得，大萧条期间，试图在“俄克人”之中发展组织的美国劳工组织屡屡碰壁。战间期的福音派也饱受教派分裂之苦，20世纪20年代基要主义在北方主要教派中遭遇失败，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更给保守派福音派贴上了“无知和偏执”的标签，整个运动陷入分裂与孤立^④，难以形成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二战后，福音派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政治与神学转型，其核心特征是组织化、主流化以及与冷战反共主义的深度绑定。1943年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简称NAE)的成立标志着教派冲突时期的结束。该协会的宗旨号称要带领美国基督徒应对“自由主义这只可怕的章鱼”、“唯物主义的毒害”以及“滔天的邪恶浪潮”。^⑤这一组织本质上是一个宗教保守主义政治组织，通过跨教派的新教合作以干涉国会立法，应对美国社会世俗化、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挑战。在意识形态层面，福音派原本便存在的反共立场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之下迅速强化，这使得其将自身定义为美国基督教文明对抗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守护者。新一代的福音派布道家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社会的变化，开始积极推动福音派向主流社会的融入。

在福音派转型并掀起美国社会广泛的基督教新右翼运动的进程之中，加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标志着福音派从“宗教异类”转变为保守主义联盟的核心之中的1949年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的布道会便在洛杉矶举行。^⑥之所以，加州会在这一转变中扮演重要角色，离不开迁徙至此的“俄克人”。

伴随着“俄克人”和其他南方移民大量涌入加州，南方各福音派开始进军加州。在此之前，因为南北战争造成的美国南北教会的分裂，加州的宗教市场长期被北方教会所主导。根据南北双方教会达成的协议与长期的默契，南方教会在加州的影响十分有限。但是以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为代表的福音派教派打着“收拢失散羊群”的旗号，刻意将自身与“南方性”(Southernness)绑定，以此来吸引那些在加州感到格格不入的西南部移民。传教士在布道中频繁提及西南部各州，让移民们想起家乡与传统，并强调教会是这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将宗教归属与地域身份深度绑定的策略。美南浸信会教堂成为“俄克人”在异乡重建“家乡感”的核心场所，其运作高度类似于一个“种族教会”。^⑦留在南方的美南浸信会并不强调自己的南方属性，更喜欢称呼自己为浸信会，以此来同美北浸信会竞争。

靠着与“俄克人”的绑定，美国南方更保守与基要的福音派派别在加州拥有了稳定的受众，并以此为跳板，深刻地改变了加州的宗教格局与政治版图，成为加州现代保守主义兴起的主要支撑力量。

学者詹姆斯·赖辛格(James Reisinger)在其研究中注意到，1940年至1970年间发生的南方白人大迁徙为美

^① 刘艳：《美国政党政治形成与黑人奴隶制废除过程中的新教福音派》，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3页。

^②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92.

^③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2.

^④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11.

^⑤ Darren Dochuk, *From Bible Belt to Sunbelt: Plain-Folk Religion,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p. 118.

^⑥ Darren Dochuk, *From Bible Belt to Sunbelt: Plain-Folk Religion,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p. 134.

^⑦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13-214.

国其他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南方移民不仅改变了他们直接定居的社区，还通过社会互动影响了周围非南方人的信念和行为。他认为这些影响是通过南方移民对非南方白人的外溢效应 (spillover) 而实现的。^①居住在农业谷地的“俄克人”对周围非“俄克人”白人的影响就是南方移民外溢效应的最好体现。

“俄克人”秉持的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对周围白人群体的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展现。一是途径是通过福音派的进一步扩展与传播，包括教会组织跨族群的吸纳与全国性平台的构建。二是“俄克人”与其他白人群体在社区中的日常社会互动。

美国南方白人移民为福音派在南方以外地区的扩张奠定了领导核心与信众基础。但福音派并没有满足于这一成就，开始有意识地突破了“俄克人”族群边界，向更广泛的白人群体敞开大门。很多福音教派也乐于营造出一种充满怀旧情怀的“老家般”氛围。不过，这些教派同时对明确的亚文化认同没那么上心。它们的理念激进且具有普世性，极力招揽各类信徒。^②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五旬节派 (The Pentecostal Church)，其普世主义倾向使其成为跨族群传播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美国南方白人移民传播文化的一个相关渠道是通过媒体。在南方白人偏爱带有右翼政治倾向或宗教布道的广播节目的情况下，散居社区会推动南方以外地区对这类媒体的需求。久而久之，非南方地区民众接触到新颖保守派声音的机会可能会增加。^③这些媒体网络与全国性福音派组织相结合，将圣华金河谷地方教会的草根动员与全国性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连接起来，使原本局限于农业谷地的宗教保守主义得以向全州乃至全国辐射。

跨族群传播效应对于其他族裔的影响同样明显，加州的拉丁裔五旬节教徒同样受到现代保守主义影响。在由俄克拉荷马人运营的五旬节派宗教机构中接受培训的墨西哥裔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受到“俄克人”亚文化的影响，进一步作用于其所能影响到的墨西哥裔社区，使得圣华金谷的墨西哥裔在社会层面比加州其他地区的墨西哥裔更为保守。^④

除去宗教生活，世俗的日常交往也会传播“俄克人”的现代保守主义思想。在圣华金河谷等农业聚居区，“俄克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与谷地中的非南方白人——包括早期定居的中西部移民后代、城镇商人和专业人士、以及从事农业管理的白领阶层——存在着广泛而持续的日常接触。这种接触广泛存在于工作场所、商业交易、子女教育、社区活动等多个场景。

“俄克人”与其他白人的社会交往在现代保守主义价值观的传递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研究显示，在南方白人居住得更靠近非南方人、且与非南方人通婚更频繁的县，长期来看与更高的共和党得票率相关。住房和婚姻市场中更高的融合程度与对共和党的更大支持度相关。跨族裔通婚则是衡量这种文化传播深度的重要指标。在通婚率高一个标准差的县，南方白人与共和党得票率的关联度大约高出 20%。^⑤当非南方白人通过婚姻进入“俄克人”家庭网络时，他们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后者的宗教保守主义、反共立场和文化保守观念。除去婚姻这种直接的交往方式，混居的居住模式也起到价值观传递作用。在居民混居程度更高的县，“俄克人”的选举影响力往往更大。^⑥农业谷地中“俄克人”在与非南方白人的混居和通婚中，凭借着更强的群体凝聚力，实现了对非南方白人的同化。

综上所述，在“俄克人”亚文化的外溢效应的影响下，以圣华金谷为代表的加州农业地带与以橙县为代表的白人中产阶级郊区社区共同成为加州现代保守主义的策源地。

四、“俄克人”政党认同的最终转变

“俄克人”从战前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逐渐转变为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的过程并不是短时间之内发生的，要

^① James Reisinger, “Southernization: The Long-Term Effect of Migration on Racial Prejudice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SSRN Working Paper, No. 3930708, 2021, pp. 4-6.

^②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14.

^③ Samuel Bazzi et al., “The Other Great Migration: Southern Whites and the New Righ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38, no. 3 (2023), p. 1635(58).

^④ Adam J. Ramey, “The Grapes of Path Dependence: The Long-Run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4 (2021), pp. 531-533.

^⑤ Samuel Bazzi et al., “The Other Great Migration: Southern Whites and the New Righ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38, no. 3 (2023), p. 1630(53).

^⑥ Adam J. Ramey, “The Grapes of Path Dependence: The Long-Run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4 (2021), p. 537.

理解这一政党认同 (party identification) 变革的发生,就必须理清同一时间段美国全国性政党格局变动的大背景。

政党重组 (Party Realignment) 是美国政治学界用以描述美国政治史上政党体系周期性巨变的一种理论。重组由一场关键性选举 (critical election)^① 引发,在这场选举中形成的新的政治联盟取代旧的政治联盟,根据联盟实力的变化形成新的美国两党基本盘与政治格局,从而建立新的政党体系。^②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政局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再一次完成了政党重组,由罗斯福新政带来的“新政联盟”彻底瓦解,第六政党体系 (Sixth Party System) 建立。这一政党体系最大的特点便是保守主义的抬头与美国政治的右倾,“种族”与“身份”问题取代“经济”问题成为两党争论核心,南部与西部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加。^③长期作为民主党铁票仓的“稳固南方” (Solid South) 翻红,共和党完成保守派夺权与对民主党的优势。这一转变始于 1948 年“迪克西特党” (Dixiecrat) 叛乱,加速于 1964 年《民权法案》的通过,最终在 1968 年总统选举这场“关键性选举”中得以定型。

1948 年是美国南方政治变革的关键节点。在 1948 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南方代表集体退场,转而组建了州权民主党 (States' Rights Democratic Party),即“迪克西特党”,参加 1948 年的总统大选。这一变故的发生植根于新政期间南方黑人与白人之间激烈的“种族问题”,而北方民主党对黑人群体的支持引发了南方民主党的不满,最终借由“州权”的名义表现出来。^④在 1948 年选举失败后,南方保守派意识到靠第三党是无法赢得全国政权,必须依靠两党体系才能完成夺权。此后,南方各州的白人保守派开始集体加入共和党,并从内部改造。南方的共和党分支因为民主党“稳固南方”的缘故长期以虚弱小党的形式存在,很快便因为南方保守派的加入完成转变。^⑤南方政治局势的变化很快便助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Dwight Eisenhower) 赢得 1952 年的美国大选与 1956 年的连任。艾森豪威尔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保守派和右翼的胜利,因为其共和党内部的自由派领袖罗伯特·塔夫脱 (Robert Taft) 参议员关系密切,实质上成为一个中间派政府领袖。面对这一局面,保守派共和党——以西部和南部新晋共和党为主——团结在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 (Barry Goldwater) 周围争夺共和党内部的话语权。^⑥

1964 年《民权法案》的通过成为南方白人彻底脱离民主党的催化剂。巴里·戈德华特及其支持者利用南方白人对《民权法案》普遍的不满,赢得了 1964 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成功颠覆了共和党在种族问题上传统的温和路线方针。虽然其在随后的总统选举之中遭到惨败,但其却率领共和党成功拿下南方五个州,坚固南方彻底瓦解。^⑦戈德华特本人过于极端的立场和反主流策略遭到失败,但是其却完成了西部和南部保守派的整合,同时他开创的现代保守主义成为足以取代传统共和党理念的另一种思潮,这一思潮被里根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扬光大。^⑧

在戈德华特的基础之上,尼克松以更为灵活的政治手段继承了戈德华特的遗产,通过诸如“法律与秩序”、“新联邦主义”和“沉默的大多数”等一系列带有狗哨政治 (dog-whistle politics) 色彩的全新且温和的政治口号,来指代戈德华特式的“支持种族隔离”“支持州权”和“重视南方白人”等极端主张,^⑨并持续推行南方战略以

^① 所谓“关键性选举”又称“关键性选举重组” (critical electoral realignment) 或“政党选民重组选举” (realigning election) 指的是在一系列选举中出现了新的政党选民联盟和投票模式 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进程,详见张业亮:《“关键性选举”与美国选举政治的变化》,载《美国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② 付随鑫:《当代美国的南部政党重组与政治极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 年 4 期,第 111 页。

^③ 王传兴:《美国第五政党体系中的两次少数派颠覆事件及影响——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第 66-67 页。

^④ Kari Frederickson, *The Dixiecrat Revolt and the End of the Solid South, 1932-1968*,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p. 28-30.

^⑤ Glenn Feldman, *The Great Melding: War, the Dixiecrat Rebellion, and the Southern Model for America's New Conservatism*,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5, pp.278-297.

^⑥ 王传兴:《美国第五政党体系中的两次少数派颠覆事件及影响——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第 68 页。

^⑦ 谢韬:《从大选看美国的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美国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36 页。

^⑧ 付随鑫:《当代美国的南部政党重组与政治极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 年 4 期,第 115 页。

^⑨ 王浩、付思源:《美国共和党的楔子战略与执政联盟的构建 (1854~2024)——从林肯、戈德华特到特朗普》,《美国研究》2025 年第 4 期,第 100-101 页。

改善共和党的选举态势。最终，尼克松赢得 1968 年大选，民主党“新政联盟”瓦解，美国最终完成政党重组。

加州“俄克人”在全国性政党重组的背景之下，政治立场经历了从民主党忠诚选民到独立选民、再到共和党核心票仓的完整转变。

正如笔者前文提到，“俄克人”初抵加州时，几乎清一色是民主党支持者。他们来自传统上的民主党州，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新政怀有深厚的情感认同，这一情感认同同样被投射到了战后的杜鲁门政府身上。

“俄克人”在战后初期维持着对民主党的忠诚，一方面是因为此时“迪克西特党”叛乱还没有发生，南方民主党还未公开与北方民主党决裂，“俄克人”依靠着自己的政治惯性继续支持民主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杜鲁门秉持的中西部理念和支持奖励劳动者和应得者的社会立法深受“俄克人”的欢迎。^①因此，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民主党都牢牢把握着对“俄克人”的吸引力。

然而，随着民主党全国政府推动民权议程，打破与南方民主党的联盟，南方民主党脱离民主党并加入共和党，两党政治势力开始重组。在加州，1945 年“火腿与鸡蛋”运动再次复活，这一次该运动试图获得新崛起的福音派宗教的支持，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其失败预示着福音派宗教与经济激进主义的脆弱联盟就此告终。^②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末，普通南方福音派信徒的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因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正面交锋而深受触动，也因新政联盟向进步主义议程妥协的方式而幻灭，尽管许多人仍保留民主党登记身份，但他们进入 50 年代时已成为独立选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要凭良心投票，^③“俄克人”也属于这些南方福音派信徒中的一员。

加州的投票制度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之前，一直有着交叉提名特权，这使得加州的政党组织性较弱，政党对政治与党员的控制力较弱，正是因为这种灵活性，使得“俄克人”不必在两党之间选边站。许多“俄克人”的政治认同开始倾向共和党，但政党认同转变并不完全。虽然“俄克人”在选举中支持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但更多是出于对其本人的支持而非共和党的追随。

20 世纪 60 年代是“俄克人”政治转向的关键十年。1964 年，林登·约翰逊在克恩县等“俄克人”聚居区以绝对优势击败戈德华特——彼时美国社会尚未极端化，戈德华特过于激进的种族主义主张在较为温和的“俄克人”之中并未取得支持。民主党的这一优势并未持续太久，到 1966 年，里根便在加州州长竞选中在该地区取得压倒性胜利。加州白人在 1965 年的瓦茨黑人暴动后陷入到焦虑与恐慌之中，“俄克人”亦受此影响愈发保守化。民主党利用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议题”在经济向好的大背景下最终被“价值观议题”所取代，1964-1968 年的多次选举之中，“俄克人”的投票选项愈发保守。^④“俄克人”最终倒向了共和党，成为了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一直持续至今。

五、结语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这一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跨度之中，“俄克人”完成了从大萧条时期新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到战后成为加州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这一剧烈的政治转变，其政党认同也从民主党转变为了共和党。“俄克人”移民群体的存在，极大地推动了加州战后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成为加州共和党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强盛的基石，并推动了现代保守主义的外溢，影响到周围地区的白人选民。即使到了加州翻蓝已久的今日，加州中央农业谷地——曾经的“俄克人”聚居区——现在依然是加州共和党的顽固堡垒，“俄克人”的影响持续至今。

参考文献：

- [1] GREGORY J N.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 STEIN W J. California and the Dust Bowl Migration[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3.

^① Dan Morgan, *Rising in the West: The True Story of an "Okie" Family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hrough the Reagan Years*, Knopf, 1992, p. 234.

^② Darren Dochuk, *From Bible Belt to Sunbelt: Plain-Folk Religion,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p. 101.

^③ Darren Dochuk, *From Bible Belt to Sunbelt: Plain-Folk Religion,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p. 134.

^④ Dan Morgan, *Rising in the West: The True Story of an "Okie" Family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hrough the Reagan Years*, Knopf, 1992, pp. 233-235.

- [3] MCWILLIAMS C. Southern California: An Island on the Land[M]. Layton: Gibbs Smith,1973.
- [4] STARR K. California: A History[M]. New York: Modern Library,2007.
- [5] LA CHAPPELLE P.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 [6]刘艳。美国政党政治形成与黑人奴隶制废除过程中的新教福音派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 [7]DOCHUK D. From Bible Belt to Sunbelt: Plain-Folk Religion,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2010.
- [8]REISINGER J. Southernization:The Long-Term Effect of Migration on Racial Prejudice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R]. Rochester:SSRN Working Paper,2021.
- [9]BAZZI S, et al. The Other Great Migration: Southern Whites and the New Righ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23,138(3).
- [10]RAMEY A J. The Grapes of Path Dependence: The Long-Run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Dust Bowl Migration[J]. Journal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2021,1(4).
- [11]付随鑫。当代美国的南部政党重组与政治极化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8 (4).
- [12]王传兴。美国第五政党体系中的两次少数派颠覆事件及影响 —— 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 [J].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19 (4).
- [13]谢韬。从大选看美国的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 [J]. 美国研究, 2012,26 (4).
- [14]王浩, 付思源。美国共和党的楔子战略与执政联盟的构建 (1854 ~ 2024) —— 从林肯、戈德华特到特朗普 [J]. 美国研究, 2025 (4).
- [15]MORGAN D. Rising in the West: The True Story of an "Okie" Family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hrough the Reagan Years[M]. New York: Knopf,1992.
- [16]DOCHUK D. From Bible Belt to Sunbelt: Plain-Folk Religion,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2010.

“Okie” Migrat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onservatism in Post-World War II California

Dong Yi C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40s, a group of white Southern migrants known as “Okies” moved into California. This subcultural group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onservative movement in post – World War II California. When the Okies first arrived in California, they we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s New Deal coalition and helped sustain the strength of California progressivism in the 1940s and 1950s. However, as the Okies became economically middle-class while culturally adhering to their evangelical faith, and against the broader backdrop of national party realignment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 the Okies became a crucial social base for the modern conservativ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and even nationwide.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of this historical phenomenon was a political shift in Okie party identification: from Democrat to independent voter, and then to Republican. To this day, the Okies remain a solid base of the California Republican Party.

Keywords: California; Okie; Evangelicalism; Party Realignment; Modern Conservatism

“埃及人”的身份困境：罗马治下的身份变迁与社会偏见

高悦涵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长期以来，学者在讨论罗马统治下的埃及人时，往往将他们笼统地归结为地方诺姆的埃及土著居民。这种简化掩盖了“埃及人”身份的多重面向。本文通过分析罗马埃及行省中“埃及人”法律身份的演变，结合血缘、文化与等级身份的交叉差异，考察了“埃及人”身份在不同阶层间的浮动，并探讨造成这一差异的社会因素。文章旨在挑战对“埃及人”身份的单一化界定，揭示其身份的多元性与流动性，并强调历史语境与社会偏见对身份认同的深刻塑造。

关键词：罗马帝国；埃及行省；身份认同；埃及人

基金项目：“罗马帝国埃及行省治理模式研究”（21BSS047）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37

引言

长期以来，在讨论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时，人们习惯于将“埃及人”（Egyptians）简单等同于居住在地方诺姆（Nome，即“州”）、从事农业生产且承担沉重赋税的本地居民。他们没有罗马公民权，也被排除在亚历山大等“埃及希腊城市”的公民权之外。然而，这种看似清晰的界定掩盖了“埃及人”身份的复杂面向。在希腊—罗马社会长期持有的偏见之下，“埃及人”一语远非一个单纯的法律或地域标签，而是法律身份、血缘身份、文化身份与等级身份相互交织的产物，无法用单一标准加以固定。

要追问“谁是‘埃及人’”，就必须审视这一身份在时间中的演变轨迹及其界定上的困难。从法老时代颇为淡薄的民族意识，到托勒密王朝刻意区隔的“希腊人”与“埃及人”两种法律身份，“埃及人”逐渐带上了歧视色彩，成为叛乱者或底层群体的代称。与此同时，血缘与文化的混合又不断模糊着这种区隔：一个改用希腊姓名、成为骑兵的埃及人，便可以拥有双重的法律身份和文化认同。罗马吞并埃及后，在旧有的分类之上又叠加了“罗马人”这一新法律身份，原有的“希腊人”被统摄进更宽泛的“埃及人”范畴。于是，罗马官方视野中的“埃及人”既包括享有免纳人头税特权的亚历山大城公民，也包括散居乡野的普通农民；而亚历山大大人自身却拒绝与后者共享同一个称呼，认为只有那些没有希腊文化背景、不具公民资格的人才是“真正的埃及人”。至于地方诺姆的精英，他们的血缘和文化习惯与埃及农民相近，却在法律地位上被罗马人看作“特殊的埃及人”，甚至有机会跻身罗马公民行列。这种来自不同视角的认知错位，使“埃及人”身份愈加模糊不清。

造成上述界定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希腊—罗马社会上层对“埃及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与刻板印象。从希腊戏剧中的讥讽，到罗马文学中的鄙夷，再到书信中日常化的侮辱，“埃及人”被反复塑造成狡猾、无礼、不守法纪的底层形象。这种刻板印象使得法律身份与文明等级被紧密捆绑：亚历山大城公民强调文化上的希腊属性以撇清自己与“埃及人”的关联，罗马官员则把乡村逃亡农民视为“真正的埃及人”而加以驱逐。可见，“埃及人”绝非一个边界分明的群体，它可以是一种法律身份，一种等级身份，一种文化身份，甚至一种血缘身份，其含义随语境和评价者的立场而变动。无视这种多元性和灵活性，便无法理解罗马治下埃及社会的真实生态，也无法看清在偏见与融合并存的进程中，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如何在帝国后期逐渐萌生。

一、“谁是‘埃及人’？”——埃及身份的演变与界定难题

作者简介：高悦涵（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

通讯作者：高悦涵

要真正理解“埃及人”这一身份的复杂性，首先必须将法律身份、血缘身份与文化身份这三个层面加以区分。三者虽有交叉，却并不完全重合，其间的落差恰恰构成了身份认同中最难以厘清的地带。依据埃及行省的重要法规《皇帝特殊账目指南》（*The Gnomon of the Idios Logos*）的规定，一名罗马男子若在不晓得女方身份背景的情况下与埃及女子结合，其所生子女可以承袭父亲的罗马公民身份；然而，若他明知对方是埃及人仍选择与之成婚，子女的法律身份则被归入“埃及人”之列。这意味着，经过短短两代人的混合通婚，一个家庭的后代可能在法律上被界定为埃及人，在血缘上却携带着罗马祖先的血统，而在文化认同上更可能同时受到埃及本土传统、希腊化风尚以及罗马生活方式的多重熏染。面对如此错综的交叠，任何试图凭借单一标准——无论是法律条文、血统谱系还是文化归属——来判定“谁是埃及人”的做法，都注定陷入困境。事实上，这种困境并非罗马统治时期所独有，它的根源深埋在此前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

（一）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人”身份

在更为遥远的法老时代，埃及作为尼罗河谷的强盛王国，其民众对所谓“民族身份”的意识相当淡薄。彼时的普遍观念是：凡在尼罗河水浇灌的土地上生长的人，便是埃及人。至于努比亚人、利比亚人、亚细亚人等周边族群，尽管与埃及人往来频繁，却至多被视为“外乡人”或遭逢战败的敌人，埃及人并未对他们抱持后世所常见的那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敌视或排斥。这种相对包容的身份观，与法老埃及长期处于区域强权的地位密切相关——当一种文明自信于自身的优势地位时，往往无需通过刻意抬高身份门槛来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

然而，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以及随之而来的希腊—马其顿移民浪潮，从根本上撼动了这一古老的身份格局。托勒密王朝建立后，为了确保希腊—马其顿统治集团的特权地位，开始在法律上有意识地划分“希腊人”与“埃及人”两大类，并以制度手段使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在这一时期，“埃及人”的称谓开始沾染上明显的歧视意味。公元3世纪后期，一位名叫赫拉克拉底斯（*Herakleides*）的希腊人在写给当地诺姆将军（*Strategos*）的投诉信中愤然指责：“不要无视那个埃及女人对我这个希腊人的无端侮辱！”这句话的语气清楚地显示，在他的认知中，“希腊人”与“埃及人”之间已经横亘着一道等级化的鸿沟，以至于一个埃及妇女对希腊人的冒犯，被视为某种阶层上的逾矩。不仅如此，托勒密官方的政治话语也惯于将“埃及人”与“叛乱分子”联系在一起。公元前2世纪末，塞琉古王国与托勒密王朝再度兵戎相见之际，大臣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在亚历山大城起事，官方文书便斥责他“煽动埃及人叛乱”——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埃及臣民并未参与其中，依然对王朝效忠。

在这样一种结构性偏见的持续作用下，埃及人对希腊人的敌意也悄然滋长。一位希腊隐士曾诉苦称，自己仅仅因为希腊人，便在神庙中遭到埃及人的暴力对待。然而，倘若因此就将希腊人与埃及人之间的关系想象为界限森严、水火不容的对立，则又失之于简略。一份流传至今的诺姆档案记录了一名士兵的晋升轨迹：此人原本拥有一个典型的埃及名字，却选择将其弃用，改用一个全新的希腊姓名，并由此进入国王的骑兵部队服役。这一案例至少包含两重启示：其一，纸草文献中屡见不鲜的“马其顿士兵阶层”（*Katoikoi*），绝非清一色的希腊—马其顿定居者后裔，埃及血统者同样可以跻身其间；其二，希腊身份与埃及身份之间的界限远非现代研究者有时设想的那般绝对。正如学者所恰当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区分”。在托勒密王朝的现实中，一个人完全可以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同时拥有双重的文化认同、双重的血统归属，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双重身份。

（二）罗马兼并后的“埃及人”身份

公元前30年，罗马兼并埃及，将其纳入行省体系，这一政治剧变带来了身份分类框架的重新洗牌。罗马统治者在托勒密王朝原有的“希腊人”与“埃及人”两种法律身份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方面，“希腊人”这一旧有法律类别被取消，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身份层级存在；另一方面，则新增了“罗马人”（即拥有罗马公民权者）这一更具特权色彩的法律身份。由此造成的后果颇具悖论意味——托勒密时代分属两个法律类别的“埃及人”与“希腊人”，在罗马的新分类体系中被一并归入了广义的“埃及人”范畴。换言之，一个曾经以“希腊人”身份自居的亚历山大城公民，在罗马官方的法律视野中，与尼罗河畔耕种的农民同属“埃及人”。当然，正如托勒密时期那位通过改名换姓从“埃及人”跃升为“希腊人”的士兵所昭示的那样，“埃及人”的法律身份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埃及成为行省之后，外来移民的流入基本趋于停滞，此后出现的罗马公民，大多是通过服满兵役、个人恩赐或特许等方式获得公民权的本地居民及其后代。

然而，法律条文的统一分类，并不等于社会现实的无差别处理。在那些被现代学者冠以“埃及希腊城市”之名的特殊共同体中——亚历山大城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其公民虽然被罗马官方视作广义的“埃及人”，但实际享有的权利与地位却与普通埃及人判若云泥，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特权便是免缴人头税。这一微妙的差异在当

时已被敏锐地察觉。曾为自己的医生谋求罗马公民权的小普林尼,在书信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困惑:“更有经验的人提醒我,最好先替他取得亚历山大城公民权,然后再申请罗马公民权,因为他是一个埃及人。”这段文字意味深长:它一方面说明在罗马统治阶层的认知中,亚历山大城公民终究还是“埃及人”;另一方面又表明,这种“埃及人”身份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等级梯度,亚历山大城的公民权可以被视为通往罗马公民权的一块垫脚石。与此形成呼应的,是这些“特殊埃及人”自身的态度。尽管被罗马官方笼统地归入“埃及人”行列,亚历山大城的居民在心理上却极力与此保持距离——在他们的日常话语中,“埃及人”一词依然承载着托勒密时代延续下来的轻蔑意味。公元1世纪,当“犹太人能否免缴人头税”成为亚历山大城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时,该城的伊西多罗斯(Isidorus)在公众场合宣称:“(犹太人)和我们不是一类人,他们更接近埃及人,难道不应该和那些缴纳人头税的人处于同一水平吗?”据文献记载,此语一出,当场获得了不少亚历山大市民的附和。在这里,“埃及人”不仅是法律标签,更是一种用以区隔“我们”与“他们”、文明与粗鄙的符号武器。

罗马史家约瑟夫斯曾以一句极为简洁的判断概括了这种普遍印象:“‘埃及人’没有公民权利,法律地位低下。”由此衍生出一种颇为流行的界定思路:以“是否参与地方自治”与“是否缴纳人头税”等具体权利标准来圈定“埃及人”的外延。依此标准,亚历山大的特权公民自然被排除在“埃及人”范畴之外,而广大的乡村农民则被清晰地划入其中。然而,这一看似明晰的标准,在面对地方诺姆的精英阶层时却暴露出严重的局限。诺姆精英在罗马官方的法律分类中同样属于“埃及人”,他们并非亚历山大等希腊城市的公民,必须承担缴纳人头税的义务;同时,由于罗马人全盘继承了希腊人关于“埃及人无法无天,不适合公民生活”的古老偏见,这些地方精英同样被排斥在地方自治的大门之外。然而,倘若据此便认为他们与普通埃及农民处于同一社会层级,则大错特错。正如罗马当局自身所意识到的那样,诺姆精英“仅在血缘和习惯(包括家庭结构与继承方式)上与埃及人基本相似”,他们拥有的财富、影响力以及希腊化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罗马官员眼中远非普通的“埃及人”可比。这些表面的身份限制,并未对他们构成实质性障碍——他们依然可以较为顺利地转化为实际上的“特殊埃及人”,甚至最终为自己或后代争取到罗马公民权。

总而言之,在罗马官方的认知框架中,“埃及人”首先是一个涵盖整个行省居民的法律范畴,尽管其内部存在“特殊的埃及人”(如亚历山大城公民)与“普通的埃及人”(如乡间的农民)之间的区分。而在亚历山大城公民的视角下,“埃及人”的内涵则远不限于法律身份的界定,它还深刻地牵涉到血缘谱系与文化素养的考量:在他们看来,唯有那些既不具有希腊城市公民资格、又缺乏希腊文化熏陶的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埃及人”。至于地方诺姆的精英阶层,他们在血缘和文化归属上或许认同自己与埃及土地的关联,但其实际的法律地位与社会处境却远远凌驾于一般埃及民众之上,被罗马统治者视为某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特殊埃及人”。这三种视角彼此交错、互不相容,使“埃及人”这一称谓的所指始终处于流动与争议之中,其身份的模糊性也因此深深嵌入罗马埃及的社会肌理之中。

二、“困难的根源”——围绕“埃及人”的刻板印象

“埃及人”身份之所以长期难以界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希腊—罗马社会中上层对该身份所怀有的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在这些人所构建的想象图景中,“埃及人”的形象被刻意简化为一个单一的社会类型:即那些终日在尼罗河畔的泥泞中劳作、从事农业生产、承担沉重赋税的底层农民。正是由于这一固化的刻板印象,不同群体才发展出各自的身份策略:罗马统治者需要刻意区分“特殊的埃及人”与“普通的埃及人”,以免享有特权的希腊城市公民与服务于帝国的精英被笼统归入他们自己所鄙夷的范畴;亚历山大城的公民则断然拒绝仅凭法律身份便被称作“埃及人”,因为他们心中的那个称谓满载着粗鄙与不文明的联想;甚至那些在血缘和文化上与埃及土地紧密相连的诺姆精英,也由于这种偏见的弥漫,被罗马当局视为某种需要另行归类的“特殊的埃及人”,仿佛“埃及人”这三个字天然地不足以涵盖他们的体面与地位。要理解这一系列身份界定的困境,就必须回到塑造这些刻板印象的具体历史和文本现场中去。

(一) 古典文学中的埃及刻板印象

对埃及人的负面刻板印象最早可追溯至希腊古典文学。在希腊作家的笔下,埃及人逐渐被类型化为一群“狡猾、无礼、好偷盗”的人,这一形象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中已屡见不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语中曾出现一个专门的动词“Aigyptiazēin”,其字面意思为“像埃及人那样行事”,而在实际使用中则暗含着欺诈、鬼祟等贬损意味。一个动词能够被创造出来并进入日常语言流通,本身就说明对埃及人的轻蔑绝非仅仅停留在戏剧舞台的插科打诨之中,而是已经渗透进雅典市民的口语与思维惯性。这是一种比文学虚构更令人不安的事实:如果说戏剧中的嘲弄尚可被视为艺术夸张,那么一个专门用来描述“埃及式行径”的动词,则宣告这种偏见已经被编织进了语言本身的肌理之中。

托勒密王朝建立后,希腊人作为统治阶层定居于埃及本土,与埃及人比邻而居,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并未消解原有的偏见,反而由于殖民统治的内在需要而进一步强化了它。统治集团需要维持一种心理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感,而贬低被统治者的形象正是维系这种优越感的重要手段。诗人西奥克里特(Theocritus)的作品为这种心态提供了极佳的注脚。他曾以讥讽的口吻记录下当时希腊人对埃及人的流行看法:“(希腊人说)如今,没有哪个罪犯会像埃及人那样鬼鬼祟祟地伤害路人……那些游手好闲的埃及人热衷各种邪恶的游戏,比如合伙欺骗某人。”在这段话中,埃及人不仅被描绘成罪犯,而且被放在了罪犯序列中最卑劣的位置——他们不是凭借力量或胆量作恶,而是以偷偷摸摸、成群结伙的方式行事,这与希腊人自我标榜的“光明正大”的公民品格形成了刻意对照。与此同时,西奥克里特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埃及希腊人社群内部的微妙心态。他塑造了一个名叫普拉克西诺亚(Praxinoa)的角色,这位居住在亚历山大城的女子热衷于向其他希腊人炫耀自己流利的多利安方言和古老的科林斯血统,甚至自比为“希腊英雄珀尔修斯(Perseus)的后裔”。这一文学形象之所以意味深长,是因为它揭示出:即便在已经享有特权地位的埃及希腊人中,身份的焦虑也从未真正消散。他们需要不断借助语言、血统叙事乃至神话谱系来加固自己与“真正的希腊人”之间的纽带,仿佛稍一松懈,就可能滑向他们自己所鄙夷的“埃及人”行列。这种焦虑越是强烈,就越是反证了“埃及人”这一身份标签在当时社会中所承载的沉重污名。

当希腊化世界为罗马所征服,希腊文学中关于埃及人的刻板印象并未随之消散,而是被罗马作家几乎全盘继承,甚至以更具系统性的方式加以深化。塔西佗在《历史》中曾以一句极具浓缩力的判断来概括整个埃及行省:“一个交通不便、盛产谷物、因迷信和放纵而宗派林立、混乱无序、不懂法律、蔑视长官的省份。”这句话中的每一个定语都值得仔细审视:所谓“交通不便”,暗示的是埃及远离文明中心的地缘劣势;“盛产谷物”看似中性,实则帝国语境中暗含着埃及作为粮仓的工具性角色——它存在的意义在于供给,而非在文明序列中占据一席之地;而“迷信”“放纵”“宗派林立”“混乱无序”“不懂法律”“蔑视长官”这一连串密集的指控,则从信仰、道德、政治秩序到法律意识,对埃及进行了全方位的贬损。在塔西佗的修辞中,埃及与其说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行省,不如说是一面哈哈镜,映照出罗马帝国所自我定义的秩序、理性与法度的反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罗马社会中流行的一句俗语:“吕底亚人的邪恶位列倒数第二,埃及人的邪恶倒数第一。”在罗马人眼中,被征服民族各有各的缺陷,但埃及人在这一道德排序中被固定在了最底端。换言之,在罗马文学所塑造的帝国想象中,埃及人不仅是“一个”被歧视的对象,而且是歧视链条的终点,是所有负面品质的集大成者。

(二) 文书资料中的埃及刻板印象

如果说文学文本中的刻板印象尚有可能被解释为修辞惯性或艺术夸张,那么大量流传至今的书信与官方文书则有力地证明:这些偏见绝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空洞套话,而是活生生地渗透进了现实生活的人际交往与权力运作。在实际的社会互动中,“埃及人”的标签常常作为一种贬低对方的武器被反复使用,其效果之直接,远非文学形象的潜移默化所能比拟。

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公元2世纪后期的一封“罗马老兵请愿书”。其作者盖乌斯·尤利乌斯·尼格尔(Gaius Julius Niger)拥有多重身份:他是一名罗马高卢军团的老兵,同时也是埃及安提诺波利斯(Antinoopolis)——埃及仅有的四个希腊城市之一——的公民。尼格尔在一桩橄榄园所有权纠纷中与一位地方官员发生冲突,后者依法行使职权,拔掉了他插在园中主张所有权的标签。这本是一起普通的执法行为,但尼格尔在致行政长官的请愿书中却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措辞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我竟遭到一个埃及人的侮辱!……一个罗马人居然在一个埃及人手里忍受这样的折磨!”在这段文字中,纠纷的事实本身——谁真正拥有橄榄园的所有权——几乎被搁置不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身份等级为核心的对立叙事:一方是“罗马人”,另一方是“埃及人”;前者天然应当受到尊重,后者天然不配对前者行使任何权力。尼格尔显然深谙这套话语的运作规则:他并非仅仅在控告一次不利的执法裁决,而是在诉诸一个更大的、为帝国统治阶层所共享的价值预设——一个“埃及人”竟敢执法到一个“罗马人”的头上,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秩序颠倒。在这个意义上,“埃及人”标签所承载的偏见已经深刻地嵌入了罗马埃及的法律实践和权力结构之中,成为弱势一方——哪怕他是依法行事的官员——无力反驳的身份原罪。

另一封同样来自纸草文献的书信也呈现出类似的心态,但角度略有不同。寄信人阿莫尼奥斯(Ammonius)在写给友人朱利叶斯(Julius)和希拉罗斯(Hilarus)的信中,以一种几乎是“提前辩解”的语气写道:“朋友们,你们或许会认为我是个野蛮人,或是一个不人道的埃及人,但我向你们保证绝非如此……”阿莫尼奥斯的措辞之所以值得细读,是因为他所做的并非在回应一个已经提出的指控,而是预先想象自己可能在对方眼中被归入“野蛮人”或“不人道的埃及人”这一范畴,并抢先予以否认。这一细节表明,“埃及人”的刻板印象在当时社会中已经强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个与此标签有关联的人不得不时刻警惕它的阴影,甚至在并无具体质疑的情况下也要主动与其划清界限。偏见一旦内化到被偏见所针对的群体自身,其影响力便远比施加偏见者的主动侮

辱更为深远而持久。

而在另一封由亚历山大城公民赫拉克拉斯 (Heraclas) 写给他的养子阿凯劳斯 (Archelaus) 的信中, 偏见则以一种更为粗暴和工具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赫拉克拉斯在信中要求对方派遣一名沙漠卫兵并附上逮捕令, 去抓捕一个名叫拉斯塔斯 (Lastas) 的人, 理由是该人对他“施暴”。然而, 在陈述这番请求之后, 赫拉克拉斯补上了一句颇具意味的话: “你知道埃及人都是些什么货色!” 这句话的修辞功能远不止于一句简单的抱怨。它暗示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 对于像阿凯劳斯这样的收信人而言, “埃及人是什么货色” 根本无需解释, 因为答案已经在他们共享的文化偏见中被预先给定。最意味的是, 写信人赫拉克拉斯自己在罗马官方的法律分类中同样属于“埃及人”——他是亚历山大城公民, 是“特殊的埃及人”, 但他却毫不迟疑地使用“埃及人”这一标签来贬低另一个在法律上与他同类的诺姆居民。在这里, 同一法律身份内部的裂痕被放大到了几乎不可弥合的程度: 赫拉克拉斯通过将拉斯塔斯归入他所鄙夷的那个“埃及人”范畴, 实际上也在无声地宣告自己不属于那个世界。这一案例为我们理解“埃及人”身份的界定困境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因为就连“埃及人”本身, 也拒绝承认另一些“埃及人”与自己同属一类。

除上述民间文书所呈现的视角之外, 官方文献同样为这一偏见提供了权威性的佐证。罗马皇帝卡拉卡拉致亚历山大城居民的那封著名信件, 集中展示了帝国最高统治者本人如何看待“埃及人”问题。卡拉卡拉在信中下令, 将那些从农村逃往亚历山大城的埃及人驱逐出境。他给出的理由是: “埃及人不想从事农业劳动……他们人数众多, 不务正业, 给城市带来了麻烦。”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皇帝随后补充了一项据称具有可操作性的鉴别标准: “埃及人很容易辨认……他们的生活习惯不符合文明社会, 暴露了他们乡巴佬的出身。”寥寥数语, 帝国权力的傲慢与对底层埃及人的刻板想象展露无遗。在卡拉卡拉的口吻中, 真正的埃及人被描述为一种本质上属于乡村的生物, 他们的身体和生活习惯都打上了无法磨灭的“乡巴佬”烙印, 以至于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可以凭肉眼将他们从文明的城市人群中甄别出来。然而, 即便在这封充斥着居高临下的鄙夷的信件中, 卡拉卡拉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复杂性。他特意补充了一条保留条款: 那些“进城参观的埃及人”或“为亚历山大城提供服务的埃及人”, 不应在驱逐之列。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附加说明, 恰恰最为直接地暴露了“埃及人”身份内涵的多元性。帝国的官方话语在同一个文本中同时处理了至少三种不同类型的“埃及人”: 第一种是皇帝下令驱逐的“逃亡农民”, 他们是刻板印象中那个不文明、不务正业的类型; 第二种是皇帝明确予以宽容的“为城市服务的埃及人”, 他们虽然也是“埃及人”, 却因为提供了某种有用的功能而获得了有限的容忍; 第三种则是没有在信中被直接点名、但始终作为对话对象而存在的亚历山大城公民——他们同样是法律意义上的“埃及人”, 却似乎完全悬置在这封关于“埃及人”的信件所针对的范围之外。正如文本所示, “埃及人”的含义绝非凝固的铁板一块, 它可以在卡拉卡拉的同一道谕令中同时指向驱逐的对象、宽容的对象, 以及那个始终在场的、不言自明的例外。

文学传统与日常生活实践共同编织了一张偏见之网, 使“埃及人”这一身份在帝国社会中被赋予了远远超出法律条文的额外负重。在这种偏见的支配下, “埃及人”不仅是一个分类标签, 更是一个可以随语境和说话者立场而伸缩的带价值判断的概念武器。它可以在法律层面上指称所有非罗马公民的埃及行省居民, 可以在等级意义上被亚历山大人用来区隔那些“真正底层的埃及人”, 可以在血缘意义上被延伸至拥有埃及血统的罗马公民, 也可以被卡拉卡拉这样的最高权力者灵活地用于区分应被驱逐的、可被容忍的, 以及无需纳入讨论的各色人群。正因为这种多层次性与偏见的高度缠绕, “埃及人”的身份界定才变得异常困难。现代学者在审视这一问题时, 必须充分意识到古代社会偏见在建构和扭曲身份认同中的巨大作用, 并以此为前提来理解“埃及人”这一范畴所特有的流动性与语境依赖性。

结语

诚然, 希腊—罗马人对埃及人存在种种偏见, 但我们已经看到, 希腊—罗马身份与埃及身份并非截然对立。在埃及行省, 希腊文化与埃及文化都能在罗马帝国的框架下蓬勃发展, 并逐渐融入整个帝国的文化脉络。在这一趋势影响下, 到了帝国后期, 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也将在埃及行省生长起来。

综观罗马埃及的身份变迁, 对“埃及人”的界定始终徘徊于法律范畴、文化偏见与社会现实之间。行政律令虽然将绝大多数行省居民圈入“埃及人”这一宽泛的法律身份, 并以此作为征税和治理的凭据, 亚历山大城的公民、地方诺姆的精英乃至凭借军功或恩赐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普通埃及人, 却不断用各自的方式突破这种范畴的束缚。他们的经历表明, 身份并非凝固的烙印, 而是一种可以通过文化习得、财富积累和帝国恩赐不断重新协商的社会资产。正是这种流动性, 使希腊—罗马精英所想象的那种单一的、固化的“埃及人”形象屡屡在现实面前松动。

那些书信与请愿中刻薄的言辞, 固然折射出深刻的歧视心理, 但歧视之所以被反复强调, 恰恰因为界线时常变得模糊。一位口操流利希腊语、享有罗马公民权的人, 仍可能因其埃及血统而沾染“埃及人”的嫌疑; 而一位

出身诺姆的农民，在进入军队或为城市服务之后，其身份在官方和民间的话语中也会悄然变化。由此可见，偏见不仅未完全阻断融合，反而从反面印证了身份的多重性与可渗透性。

希腊—罗马文化与埃及本土传统在行省内的长期共存，为这种多重身份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神庙与竞技场比邻而立，科普特语与希腊语在日常中并用，埃及的神祇被赋予希腊化的面容，希腊的文学也间或征引埃及的智慧。这些日常的文化实践逐渐消解着“希腊人/埃及人”的二元对立。进入帝国后期，随着罗马公民权的逐步扩展，法律意义上那种将大量居民统摄为一体的广义“埃及人”概念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将罗马政治认同、希腊文化熏陶与埃及地方特性交织在一起的新身份认同。它既不再单纯以族裔或旧法律地位为唯一标准，也不再完全臣服于昔日的傲慢与偏见，而是在帝国普遍公民权与地方文化复兴的共同作用下，孕育出晚期古代埃及独有的面貌。

因此，“埃及人”的身份困境，本质上是一场由权力、法律、文化与日常实践共同参演的漫长戏剧。对它的追溯提醒我们，身份从来不是可供简单归类的静态标签，而是历史语境中不断被建构、争夺和重塑的意义场域。

参考文献：

- [1] ROWLANDSON J. Dissing the Egyptians: legal,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Roman Egypt[J].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Supplement*, 2013: 213-247.
- [2] BAINES J. Contextualizing Egyptian representations of society and ethnicity[M].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1996: 84.
- [3] CLARYSSE W. Greeks and Egyptians in the Ptolemaic army and administration[J]. *Aegyptus*, 1985, 65(1/2): 57-66.
- [4] CLARYSSE W, Johnson J. Some Greeks in Egypt[C]//Life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Egypt from Cambyes to Constantine and beyond, Date: 1990/09/04-1990/09/08, Loc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1992: 51-56.
- [5] JONES K R, JONES K R. The figure of Apion in Josephus' "Contra Apionem"[J].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 in the Persian,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 2005: 278-315.
- [6] HARKER A. Loyalty and dissidence in Roman Egypt: the case of the Acta Alexandrinorum[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3-35, 57-58.
- [7] Strabo, *Geog.* 17.1.12.
- [8] Tac., *Hist.* 1.11.1.
- [9] P.Oxy. XLII 3061.

The Identity Dilemma of the “Egyptians” : Identity Changes and Social Prejudices under Roman Rule

Gao Yue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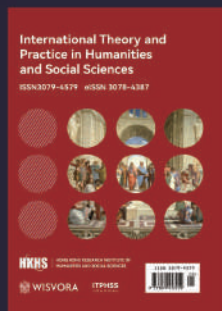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scholars discussing Egyptians under Roman rule have tended to broadly categorize them as the indigenous Egyptian inhabitants of the local nomes. This oversimplification obscures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the “Egyptian” identity. By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legal status of “Egyptians” in Roman Egypt and considering the intersecting differences of descent, culture, and social hierarchy,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Egyptian” identity fluctuated across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and explores the social factors behind such differences. It aims to challenge monolithic definitions of the “Egyptian” identity, reveal its plurality and fluidity, and underscore how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ocial prejudices have profoundly shaped identity formation.

Keywords: Roman Empire; Roman Egypt; Identity; Egyptians

WISVORA 出版社：專注於學術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編輯、論文出版和國際索引、期刊創辦、期刊託管等服務，增強學術研究的全球傳播和影響力。

www.wisvora.com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是由香港 WISVORA PUBLISHING 出版、面向全球發行的國際中文學術期刊。本刊聚焦人文社科領域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應用，深耕學科核心議題與前沿研究，倡導跨學科、跨文化的多元研究視角，打通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的溝通壁壘，推動學術知識的傳播、共享與轉化，助力全球華語學術界交流與發展。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電子出版 ISSN 3078-4387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權責聲明

本期刊所刊載的評論、意見、觀點等均出自文章作者個人立場，不代表本期刊的觀點或看法。對於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內引用材料給任何個人、機構、及其財產所帶來的任何損失及傷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擔任何責任。我們鄭重聲明，本出版社的出版業務，不構成對任何產品商業性能的保證，也不表示本社業已承認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內容適用於某特定用途。如有疑問，請尋找專業人士協助。